

平山久雄

语言学论文集

© 平山久雄 著



商務印書館

ISBN 7-100-04293-3/H·1071

定价：18.00 元

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

平山久雄 著

仅供个人科研教学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平山久雄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293-3

I. 平… II. 平…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05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PÍNGSHĀNJǏUXIÓNG YǔYÁN XUÉ LǔNWÉN JǏ

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

平山久雄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293-3/H·1071

2005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18.00 元

仅供个人科研教学使用!

序

平山久雄教授是日本当今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十年前他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的教授职位退下来之后，又受聘到日本最有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特任基础汉语教授，兼文学部研究院教授；并被东京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今年3月平山先生年届古稀，又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下来，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论文集，正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和祝寿活动。

平山久雄先生常常自谦地说，他没有出版过专著，但我的意见是，古往今来确乎有些学人只有论文行世，然而却是大家、大师，其原因在质而不在数。平山先生已经发表了80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对汉语语法与汉语方言的研究也都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成就多在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古代方音特别是古声调的构拟。在音韵学领域里，平山先生的研究也很广泛，无论传统的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还是近代语音学也都有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

这本文集共收论文17篇。

其中上古音1篇，即《用声母腭化因素*j来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1994)，这是针对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声母体系中为解释精

组、端组分别演变出庄组与知组以及二等韵的来源，而构拟的介音 *r，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平山先生认为中古的知组还未演变为卷舌音，*r 介音就失去作用，还不如用腭化因素 *j。记得平山先生在 1993 年 9 月大阪第 26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此文后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

其他 16 篇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关于探讨中古音及其到近代或现代的演变规律的；一组是研究汉语声调史的，着重探讨现代汉语一些方音的变调现象，并分析其成因，或构拟其古调值的。

后一组共有 11 篇，其中《日僧安然〈悉曇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1987)主要从文献上进行分析，认为唐代平上去入四声已分轻、重，即阴、阳；还介绍了唐时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及日本汉语音韵学史的情况，考证了日语里吴音与汉音之始(初时吴音叫和音，汉音称正音)，令我们增长不少见识。《中古汉语的清入声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规律》(1990)一文，对一般认为北京话里古清入字的演变无规律可寻的现象，从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层次以及语法词性的区别重新作了深入的分析，找出了一些有趣的对应规律，视角新颖。1989 年曾在北大讲台上作过报告，颇受欢迎，后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

《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1975)、《江淮方言祖调值的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1984)、《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1998)、《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类型及其成因》(1999)、《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2000)等是一组同类的论文。关于汉语的声调历

史,特别是调值的演变历史,过去中外的汉语音韵学者都比较忽略,只注重声母与韵母的历史研究。平山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对此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既对南北一些具体方言的调值及其历史进行研究与构拟,又提出一套研究声调调值的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从描写、记录现代方言的变调现象入手,结合历史文献的分析,运用内部构拟和方言比较的方法,以拟测出该方言古调值或祖调值,从而说明声调调值的变化趋势。平山先生把他这个理论称之为“环流说”。这是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创新,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声调调值变化环流说”的形成和应用过程》一文就是他研究汉语声调调值演变史的理论总结,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于研究中古音及其至近、现代演变规律的论文收有 5 篇。《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1990)通过对《毛诗音》的几种主要残卷注音形式的分析研究,指出其反切结构基本相同,当来自隋代的一个祖本;揭示其反切结构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反切上字的选用上,即贯彻了切上字与被切字洪细开合一致的原则。这篇文章的内容平山先生也曾在北大作过报告,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重组问题在日本》(1997)是他在台湾一次重组专题国际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日本前辈汉学家有坂秀世、河野六郎等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运用日本的“万叶假名”和朝鲜语与越南语中的汉字读音对《切韵》音系里的重组进行考察及其对重组的看法(即认为重组的区别在于介音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修订意见。《中古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反映》(1991)一文也很有意思,在现代河北省顺平县方言里也有相似的反映(参看刘淑学的《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这表明平山先生思想

敏锐,观察细致,研究深入。《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998)一文根据赖惟勤、三根谷彻、李方桂和蒲立本等先生的看法,也主张“把中古汉语里舌根音韵尾韵部拟分为带唇化和非唇化两种舌根音韵尾的韵母”,并列表附其音值;但他不同意赖惟勤、河野六郎、桥本万太郎和蒲立本等将《切韵》音系梗、曾二摄的韵尾拟为另一套硬腭韵尾的意见。观点鲜明。平山先生做学问写文章,有个突出的特点,非常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并详细介绍前人的成果。因为一切学问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的结果。其次,平山先生十分重视文献材料,他学识渊博,汉学功底扎实,所有论著无论篇幅长短都言之有据,为学界所推崇。

关于《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1995),平山先生引证了大量的历史音韵材料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认为“昆”等同小韵的系列字由古浑切改读为苦昆切是由于避讳,即避“暉”字(褻衣,即内裤,又作“裨”、“裨”)。“‘昆’等字若按其见母的本音念出来,就会使人联想到那个秽字,感到不快和滑稽”;“如果‘古浑切’小韵没有‘暉’字,我们今天就会把‘昆明’‘崑山’说成 Gunming, Gunshan 的。”对此我有个小小的疑点,即“暉”(或“裨”、“裨”),是个比较偏僻的字(古人口语里是否常用有待证明),也算不上秽字,无必要回避它。我从明代徐孝的《合并字学集韵》的收字得到一点启发。其平声卷第十九昏(韵),[见]“裨、孤温切”小韵下共收有 51 字;正如平山先生所指出,其中“昆琨鷗鍤”等字又见于[溪]“坤,枯村切”小韵(共收 34 字)下,而“暉(裨、裨)”仅有孤温切一读。但还有一种现象,即“崑、崑(山名)”却只有枯村切一读。这表明用于山名、

地名、古国名的“崑(崐)”字最先改读,其原因待研究,也许是受方音或少数民族语言的读音影响。“崑崙”本又可作“昆侖”,声符又相同,所以也跟着变读了。我的这个想法也很不成熟,提出来向平山先生请教。

平山先生的许多论文曾发表在日本的刊物上,而且不少是用日文写的,中国同行不一定看得到、看得懂。十多年前我就建议他在中国出版一本自选文集。目的是让我们中国学者能更好地学习、借鉴平山先生及他的论文中涉及的其他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方法等等。时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的李思敬兄也很支持我的提议。可是平山先生非常谦虚,多次以自己的东西还不成熟、没有时间整理修改为由而婉言辞谢。平山先生做学问勤奋、严谨,为人也很宽和、诚恳,乐于助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中国学者都有同样的感受和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所有到过日本东京大学进行访问、任教或开会的人无不受到他无私的关爱与照顾。我本人就深有体会。1993年9月我应邀到日本大阪参加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平山先生是研讨会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会务繁忙,还亲自到机场接我们从中国来的一行四位与会者(李荣先生、孙宏开兄、戴庆厦兄和我),第二天又领我游览大阪与神户。会后他又送我到京都,让木津祐子博士陪同我到60年代初就相识的老朋友、老前辈池田武雄教授府上。此后数日游览奈良、仙台、东京,都是平山先生早已安排妥的,一路上有大西克也、花登正宏、远藤光晓、古屋昭弘、中岛干起等教授和折笠摄子博士陪伴关照,已令我感激不已。在我回国前一天,他在百忙中一早带我去游箱根,先乘新干线到小田原,改乘公交车上山,参观雕塑博物馆,尝了硫

磺温泉煮的黑鸡蛋。他说这次已来不及洗温泉澡了，于是坐观光缆车下山，乘轮船游了芦之湖，又漫步在旧日东海道驿道的杉木林荫道上，是晚准时回到东京一家越南餐馆，参加预订的送别宴会。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因为平山先生对我的关怀太深刻了。

去年秋天平山先生终于来信同意出版他的论文集了，他说：“我并不是不愿意在中国出版论文集，这样自然就能更多的接受中国学者的批评和指教，但主要是由于对自己论文的质量没有把握，总是犹豫不定，偏向于消极。这次承蒙先生热情劝诱，我觉得也许应该往积极方向考虑问题。”而且因为今年3月他就要从早稻田大学完全退下来，比较有时间 and 精力进行整理、选编，于是我即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副主任何宛屏女士联系，她见告平山先生的论文集已列入“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希望他尽快交稿。此后往返数次交换信件，今年3月平山先生就将选定的17篇论文及其主要论文目录邮寄给何女士，并转给我，另来信要我写篇序。我甚感惶恐，实在不敢接受。但平山先生说：“我以为自己的论文集属‘著名语言学家论文集系列’和先生写序应该是两回事，所以让我再次恳请先生写序文，为拙著添光彩。不管长短，对论文的内容表示怀疑都行。”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再拜读先生的大作，写了以上一点粗浅的读后感；同时也是对平山先生的信任与关爱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唐作藩

2003年8月6日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目 录

序	唐作藩
一、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	1
二、重组问题在日本	25
三、中古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反映	51
四、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	59
五、用声母腭化因素 *j 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 *r ——对上古舌齿音声母演变的一种设想	84
六、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	103
七、日僧安然《悉曇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	113
八、中古汉语的清入声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规律	142
九、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	160
十、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173
十一、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 调值初案	191
十二、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 不同类型及其分布	219

2 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

十三、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 轻声前变调	249
十四、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 类型及其成因	263
十五、再论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281
十六、汉语声调起源窥探	288
十七、“声调调值变化环流说”的形成和应用过程	302
附录 平山久雄中文著作目录	326
后记	332

敦煌《毛诗音》残卷

反切的结构特点

—

1.1 敦煌石窟发现了几种《毛诗音》，都不能知道正式的书名，因其内容是对《毛诗诂训传》注音的，所以通常叫做《毛诗音》。注音主要用反切，一部分用直音和其他方法。现存《毛诗音》残卷一共有五种，请参看〈表一〉。

〈表一〉 《毛诗音》残卷目录

残卷编号	所存行数	所存范围	反切总数	直音和其他
S. 2729	129(开头 3 行残烂, 第 121 行以下存下半行)	〈周南·关雎〉至〈唐风·山有枢〉	约 1100 (约 850 种 ^①)	20
Дх-1366a	17(皆存上半行, 可与 S. 2729 缀合)	〈齐风·载驱〉至〈秦风·驺骝〉	约 80	
P. 3383	96	〈大雅·旱麓〉至〈召旻〉	约 670(约 550 种)	约 80

* 本文原系 1989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演讲的讲稿, 再经过改订和整理。在此感谢郭锡良先生对我的劝导和鼓励。

① 上、下字均相同的反切, 不管被切字是否相同, 就算一种。下文皆仿此。

续表

P. 2669V.		〈大雅·大明〉至〈文王有声〉	29	1
S. 10V.		〈邶风·燕燕〉至〈静女〉	约 100	约 40

潘重规先生 60 年代两度赴巴黎、伦敦，搜尽两处所藏敦煌《诗经》卷子，写了几篇考证和校勘的文章，在《新亚学报》、《新亚学院学术年刊》上登载，后来加以增补订成一书，即潘重规（1970），上面五种《毛诗音》全文都移录在那本书里（惟 P. 3383 只载照片）^{注1}。

从量的方面来看，五种里主要的是两种，即 S. 2729 和 P. 3383。Дx-1366a 本来属于和 S. 2729 连接的一个卷子，这一点已由潘重规（1970：77—132 页）作出了证明^①。S. 2669V. 是在 S. 2669《毛诗诂训传》的纸背写的，是对正面的文字在正当其背面的地方用细小的字迹注上读音的。30 个被注字中有 12 个和 P. 3383 重复，反切用字也大都一致，可见是一类的。S. 10V. 也是在 S. 10《毛诗诂训传》的纸背写的，形式和 P. 2669V. 一样，有的被注字和 S. 2729 重复，反切的用字不相一致的比较多，可知和 S. 2729 是属另外一种系统的。

1.2 我对这些《毛诗音》残卷发生兴趣，是早年读过周祖谟（1957）的时候开始的。周先生这篇论文专就 P. 3383《毛诗音》残卷考证其撰者问题，也载全部的照片。我看着照片，就觉得它上面的反切很有特色，和《切韵》、《广韵》的反切以及六朝隋唐时期许

① 下文称 S. 2729 时都包括 Дx-1366a 而言。

多音义、字书之类的反切相比,不但用字不大一样,而且反切的结构迥然不同,似乎是根据一种十分精密的音韵学理论来构造的,因此它作为音韵史资料以及音韵学史资料都会有独特的价值。于是我调查敦煌本各种音义的残卷中还有没有采用同样特殊结构的反切的,结果发现只有一种 S. 2729《毛诗音》残卷,其反切的结构与 P. 3383 相同。当时京都大学小川环树先生访问苏联回来,把他在列宁格勒手抄的敦煌本《诗经》音义给我看,我看出来是和 S. 2729 极为类似的,这就是 Дх-1366a。敦煌残卷以外的音义中则没有找到采用同样的“革新派”反切的,只是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有点相近,可是也有不同之处(参看本文 § 5. 3)。S. 10V.《毛诗音》残卷的反切也有点类似的地方,想必和其他《毛诗音》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仍然保持《切韵》等一般的“传统派”反切的若干特色,应该说是“中间派”。后来我读到潘重规先生那本书,才知道还有一种 P. 2669V.《毛诗音》,其反切也属“革新派”。

我当时就开始对 S. 2729、P. 3383 两种《毛诗音》残卷的反切加以整理和分析,因为牵涉的问题不少,再加上我工作效率不高,竟把我个人搞学问的几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上面,从 1966 年起到 1987 年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七篇有关《毛诗音》反切的文章(即平山久雄 1966—1987),音韵方面的分析大致作完了,文献学方面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但总算差不多了。现在想对这一系列拙文的内容作出简单的提要,介绍一下《毛诗音》反切的特色,向学者请教就正。

二

2.1 在说明反切结构的特色之前,需要把一些文献方面的问题交代一下。

第一是残卷的抄写年代。S. 2729 能确定是在公元 800 年以前抄写的。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65 页)的记载,S. 2729 残卷是一共由五个部分组成的,即:

(一)辰年三月 日僧尼部落朱净言牒;(二)二月□十使
论悉诺啰接谟勒牌子历;(三)毛诗音;(四)悬象占;(五)太史
杂占历

按照片来观察,(一)和(二)其实是一个相连的文书,是敦煌十几个佛寺的僧尼名单,和(三)贴合起来,在背面写了(四)和(五)两种占卜书。敦煌学专家池田温先生曾告诉我:当时纸是贵重的,所以敦煌的寺院从外面把废纸买进来,利用背面再抄写自己的文书,S. 2729 也当属此列。关于(一)和(二),藤枝晃(1959)考订是吐蕃占领沙州后作过人口调查时的一个记录,经过几年没用了,就卖给了佛寺;因此(一)上面的“辰年”当指公元 788 年。(五)的末尾也有日期,云“大蕃国庚辰年^{补注2}五月廿三日沙州□”(下缺),藤枝先生在上述文中考证是 800 年,底下当有抄写人的名字。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只有一次庚辰年,所以(五)的抄写年代是可以这样确定的。那么当时作废纸卖掉的(三)《毛诗音》,它的书写年代就不能晚于公元 800 年了。

关于上限,按理讲,当在公元 600 年左右。S. 2729 第 15 行

“息”下说：“炫以休求韵，疑‘息’当为‘思’”。这是对〈汉广〉一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里“息”字的注释。“炫”就是刘炫，据《隋书·儒林传》，他是在隋末的动乱中饿死的，时年 68 岁，著有《毛诗述义》四十卷。假定他在 600 年左右完成了《毛诗述义》，那么 S. 2729《毛诗音》的抄写也不会早于此时了。有人认为卷中“世”字作“𠄎”，是避了唐太宗的名讳而缺一画的，但我看这出于有意的缺笔是很可疑的，因为六朝的碑刻已经有这种字体^①。

S. 2729 的抄写年代上下限相距 200 年，根据字迹的印象来说，实际的抄写年代大概比较接近下限，但离下限起码要上溯十几年，也许上溯几十年，因为抄写以后，像下文再谈到那样，由于反复阅读，卷子的开头部分弄得残破，终于烂掉了，那不会是仅仅才几年的事情。所以笼统一点说，S. 2729《毛诗音》当是在 8 世纪的后半期抄写的。

2.2 P. 3383“民”字有缺笔，其他的唐讳都不避，一般认为是盛唐抄本。其字迹精美，很可能是从中原地区带来的，那么它不会写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P. 2669 残卷卷首之背面有“大顺贰年伍月十九日□□□”的题记。大顺贰年是公元 891 年，但不能断定这是否和 P. 2669V. 的音注出于一人之手笔。S. 10V. 也没有材料能确定它书写的年代，一般也认为是盛唐抄本。

^① 例如伏见冲敏(1974:13 页)所载北魏《元徽墓志》、东魏《李显族造像》。

三

3.1 第二是撰人问题。潘重规（1970：80—81页）根据上述S. 2729〈汉广〉“息”字下的注文，断定S. 2729当是刘炫所著《毛诗音》。《隋书》不载他著有《毛诗音》，潘先生认为是失载的。潘文认为“息”下注文里的“炫”是他的自称，我看这未必然。如果这本《毛诗音》是刘炫的著作，那么卷首应该题着他的姓名，就没有必要在书中再题自己的名字。凡是注者在音义的注项中题名，一般是在以称引各家的注释为体例的书里，用来区别己说，如颜师古《汉书音义》、李善《文选注》等皆是。但S. 2729《毛诗音》并不是那样的汇编性质，照例只记一家之说，因此注者在一个注项的开头记名字是不好理解的。我认为不如把“息”下的注文解释为是这本《毛诗音》的著者介绍刘炫《毛诗述义》里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只记他的名，不记姓呢？我想那是因为他和刘焯并称于世的缘故。据《隋书·儒林传》，当时人把刘焯、刘炫称为“二刘”。刘焯则著有《五经述议》。孔颖达《毛诗正义》就是对刘焯、刘炫二人的注解加以增删的（见《毛诗正义》序）。就像后代学者论《说文解字》常把徐铉、徐锴只称“铉”、“锴”一样，论《诗经》说“炫”，当时人就应该明白指的是刘炫了。

周祖谟(1957)推断P. 3383《毛诗音》是隋人鲁世达《毛诗音义》。我觉得积极的证据还嫌太少。还有一点使我怀疑的是，鲁世达是余杭人，P. 3383、S. 2729的反切里却找不到南方音的特点。

当时的南方学者所著《玉篇》、《经典释文》等书里不分从母和邪母，也不分船母和禅母，韵母方面则不分脂韵和之韵。我们的两种《毛诗音》把这些音分得很清楚（P. 3383 里有脂、之两韵通用的反切，不过是个别的）。

我认为 S. 2729、P. 3383 两种《毛诗音》残卷到底是谁人的著作，正式的书名叫什么，这些目前只好阙疑。看 S. 2729 残卷从〈周南·关雎〉的诗序“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里“王”字的音注开始，大概现存的第一纸（从第 1 行至第 7 行）也就是整个卷子的第一纸，由于频繁阅读，大约开头三分之二就烂掉丢失了，那上面一定题有书名和撰人姓氏，这实在太可惜了。不过这卷子因为卷首残破，当废纸利用纸背，才有机会藏在敦煌石窟里保存下来了。我们与其恨书名和撰人姓氏的丢失不传，宁可感谢这卷子的主人十分勤学，终于把卷首弄掉了。

根据所存部分在《毛诗诂训传》里所占的比率来推算，S. 2729、P. 3383 两种《毛诗音》本来都是由 25 纸左右构成的，论卷数大概才一卷，顶多两卷，这将为拟测具体书名提供一个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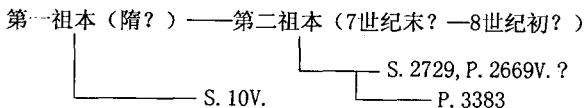
3.2 S. 2729、P. 3383 两种残卷在注音形式、反切结构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应该共同回溯到一个《毛诗音》祖本。P. 2669V. 也是同类。S. 10V. 则是反切结构有所不同，但和 S. 2729、P. 3383 好像也有一定程度的亲近关系。因此我假定曾有过两种《毛诗音》祖本，即“第一祖本”和“第二祖本”，S. 10V. 当属第一祖本的系统，其他则属第二祖本的系统。第一祖本的撰述可能在隋代，第二祖本则是对第一祖本的反切按照新的结构原则加以改造的，其产生当在 7 世纪末或 8 世纪初。P. 3383、S. 10V. 都用“虎”作反切上字，

是唐高祖的祖讳。S. 2729 有一个反切作“民世”(第 102 行),竟把唐太宗的名字颠倒过来了。这些很可能是继承了第一祖本的用字,唐朝人自己选定反切恐怕不敢采用这类字。

在第二祖本的系统, S. 2729 似乎比较忠实于第二祖本,因为它基本上只包含音注,义注极少,音注又是基本上都使用反切,少用直音。P. 3383 则是义注稍微增加,直音较多,这些特点应该是传写的过程中补充或改动的,可见它离第二祖本稍远一点。反切这个标音方法无论构造得怎样合理,也敌不过直音的直截了当,因此在传写的过程中(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同音字)逐渐拿直音来代替反切,这是很自然的。P. 2669V. 直音的比率很少,可能和 S. 2729 一样,是比较接近第二祖本的。这里所说的关系远近,以及属于哪一祖本的系统,这些当然和抄写的早晚不是一回事^{注3}。

综上所述,《毛诗音》残卷的系统关系大致可拟如〈表二〉。

〈表二〉 《毛诗音》残卷的系统



四

4.1 现在要说明反切的结构。五种《毛诗音》残卷除了 S. 10V. 一种以外,其反切可视为结构方式相同,不妨合并起来分析。它们结构上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反切上字的选用方面。为了说明这方面的特色,先要把中古汉语的音节分作七种“类”,各类的定

义如下：

“一等类”：韵图上的一等字，即包含中舌、后舌元音的洪音字。

“二等类”：韵图上的一、二等字，即包含前舌[a]类元音的洪音字。

“四等类”：韵图上的“纯四等”字，即包含前舌[e]元音的洪音字。此类包括齐^①、先、屑、萧、青、锡、添、怙诸韵。

“A类”：韵图上的四等(除“纯四等”外)唇牙喉音字，即包含前舌元音的唇牙喉音细音四等字。此类相当于“重组四等”，即包括支、脂、祭、真、质、淳、术、仙、薛、宵、幽、侵、缉、盐、叶、清、昔诸韵^{补注4}的唇牙喉音四等字(幽韵唇音四等除外)。

“B类”：韵图上的一部分三等唇牙喉音字，即包含前舌元音的唇牙喉音细音三等字。此类相当于“重组三等”，即包括支、脂、祭、真、质、淳、术、仙、薛、宵、幽、侵、缉、盐、叶、庚、陌诸韵的唇牙喉音三等字，以及蒸、职韵^②唇音、喉音合口和一部分牙喉音开口三等字(幽韵唇音四等要算B类^③)。

“AB类”：和A类、B类同韵(再加麻韵三等)的舌齿音字，即包含前舌元音的舌齿音细音字。蒸、职韵庄组(正齿音二等)亦属此类。

① 《切韵》韵目举平声以赅上、去两声。入声韵目另举。下文皆仿此。

② 蒸韵、职韵按声母和开合的不同而分属B类、C类、AB类，即唇音字、喉音合口字以及少数牙喉音字(如“抑”)属B类，多数牙喉音字和舌齿音字(除庄组)属C类，庄组字属AB类。参看平山久雄(1974)。

③ 这一点参看周法高(1952:257页)。

“C类”：韵图上的B类以外的三等唇牙喉音字，以及与此同韵的舌齿音字，即包含中舌或后舌元音的细音字。此类包括东_三、屋_三、钟、烛、之、微、废、鱼、虞、欣、迄、文、物、元、月、阳、药、尤、严、业、凡、乏诸韵，以及蒸、职韵除去属B类和AB类的部分。

上述七类的定义按照我的拟音可以用〈表三〉来概括：

〈表三〉 各“类”在中古音值上的定义

洪 细 主要元音		洪音	细音	
			唇牙喉音	舌齿音
中舌、后舌		一等类	C类	
前舌	a	二等类	A类(重组四等)、B类(重组三等)	A B类
	e	四等类		

4.2 照上述诸“类”的区别来观察，敦煌《毛诗音》的反切有一个独特的结构特点，就是：被切字的“类”和上字的“类”是一致的。即：一等类反切^①用一等类上字^②；二等类反切用二等类上字；四等类反切用四等类上字；A类反切用A类上字；B类反切用B类上字；唇牙喉音C类反切用C类上字。

我们把这个原则称做“类一致原则”。只有在AB类和舌齿音C类，被切字和上字的“类”不一定互相一致：AB类反切里和舌齿音C类反切里用AB类上字或用C类上字没有一定，都可以用。应该承认：在此范围之内，“类一致原则”不能成立。还有庄组二等

① 被切字属一等类的反切叫做“一等类反切”，他皆仿此。比方说“开口反切”就是被切字属开口的反切。

② 反切上字要是属一等类就叫“一等类上字”，他皆仿此。

类反切多用 AB 类上字和 C 类上字(这情况和《切韵》类似),也在“类一致原则”适用的范围之外。知组二等反切多用二等类上字,虽少数用 C 类上字(《切韵》反切则多用 C 类上字),这里可以承认“类一致原则”还能适用。

《毛诗音》反切还有一个独特的结构特点,就是:被切字的“开合”和上字的“开合”是一致的。即:开口反切用开口上字;合口反切用合口上字。

我们把这一结构特点叫做“开合一致原则”。开口和合口的定义是:不带介音 u 的音节叫做开口,带有介音 u 的音节叫做合口。唇音声母之下没有开合口的对立,因而也就无所谓开合一致了。

4.3 为了证实上面提到的两个特点,我们列出了〈表四〉。

〈表四〉 S. 2729 反切举例(每一类从卷首各类 10 例)

编号	行	反切		被注字音类	上字音类	类	开合
1	3	耦	五口	侯上 疑一	模上合疑一	○	
2	4	左	宰贺	歌去开精一	歌上开精一	○	○
3	4	茈	莫报	豪去 明一	铎入 明一	○	
4	5	澣	胡管	桓上合匣一	模平合匣一	○	○
5	5	皂	前考	豪上 从一	先平开从四	×	
6	5	横	古乱	桓去合见一	模上合见一	○	○
7	6	抔	徒丸	桓平合定一	模平合定一	○	○
8	6	藜	存东	东平合从一	魂平合从一	○	○
9	6	漚	胡郭	铎入合匣一	模平合从一	○	○
10	7	统	当敢	谈上 端一	唐平开端一	○	
11	3	间	下狠	山平开匣二	麻上开匣二	○	○
12	4	觉	皆孝	肴去 见二	皆平开见二	○	

续表

13	5	濯	柎孝	肴去 澄二	庚平开澄二	○	
14	6	嗜	更谐	皆平开见二	庚平开见二	○	○
15	7	纮	怀泓	耕平合匣二	皆平合匣二	○	○
16	9	虺	化怀	皆平合晓二	麻去合晓二	○	○
17	9	隗	浊怀	皆平合澄二	觉入 澄二	○	
18	10	觥	瓜宏	庚平合见二	麻平合见二	○	○
19	12	鰐	瓜顽	山平合见二	麻平合见二	○	○
20	12	椽	竹角	觉入 知二	屋入 知 C	×	
21	5	萋	千兮	齐平开清四	先平开清四	○	○
22	8	苓	歷丁	青平开来四	锡入开来四	○	○
23	14	桔	经切	屑入开见四	青平开见四	○	○
24	14	榼	刑结	屑入开匣四	青平开匣四	○	○
25	16	怒	年歷	锡入开泥四	先平开泥四	○	○
26	17	定	帝径	青去开端四	齐去开端四	○	○
27	17	题	田兮	齐平开定四	先平开定四	○	○
28	18	姪	定结	屑入开定四	青去开定四	○	○
29	18	娣	廷帝	齐去开定四	青平开定四	○	○
30	19	溪	牵兮	齐平开溪四	先平开溪四	○	○
31	6	馱	因艳	盐去 影 A	真平开影 A	○	
32	10	糝	兼蚰	幽平 见 A	添平 见四	×	
33	11	帚	因营	清平合影 A	真平开影 A	○	×
34	13	赳	吉酉	幽上 见 A	质入开见 A	○	
35	15	翹	祗遥	宵平 群 A	支平开群 A	○	
36	17	表	方遥	宵平 帮 A	阳平 帮 C	×	
37	20	嚶	因遥	宵平 影 A	真平开影 A	○	
38	21	螿	并灭	薛入 帮 A	清去 帮 A	○	
39	21	蕨	脾宾	真平 並 A	支平 並 A	○	
40	22	滨	并民	真平 帮 A	清去 帮 A	○	
41	5	绌	卿逆	陌入开溪 B	庚平开溪 B	○	○

续表

42	8	险	戏贬	盐上 晓 B	支去开晓 B	○	
43	12	夭	英骄	宵平 影 B	庚平开影 B	○	
44	13	逵	权追	脂平合疑 B	仙平合疑 B	○	○
45	14	被	皮羲	支去 並 B	支平 並 B	○	
46	15	域	荣逼	职入合匣 B	庚平合匣 B	○	○
47	15	桥	奇妖	宵平 群 B	支平开群 B	○	
48	15	泳	为命	庚去合匣 B	支平合匣 B	○	○
49	16	饥	巾师	脂平开见 B	真平开见 B	○	○
50	17	燬	兄委	支上合晓 B	庚平合晓 B	○	○
51	1	王	于放	阳去合匣 C	虞平合匣 C	○	○
52	1	虞	元于	虞平合疑 C	元平合疑 C	○	○
53	4	右	于救	尤去 匣 C	虞平合匣 C	○	
54	6	闻	亡羹	文去 明 C	阳平 明 C	○	
55	6	刈	言废	废去开疑 C	元平开疑 C	○	○
56	7	衣	应气	微去开影 C	蒸平开影 C	○	○
57	7	祱	勋归	微平合晓 C	文平合晓 C	○	○
58	8	否	甫久	尤上 帮 C	虞上 帮 C	○	
59	8	筐	曲狂	阳平合溪 C	烛入合溪 C	○	○
60	10	痛	妃于	虞平 滂 C	微平 滂 C	○	
61	3	参	创今	侵平 初 AB	阳去开初 C	×	
62	3	差	楚宜	支平开初 AB	鱼上开初 C	×	○
63	4	萋	苴葉	葉入 精 AB	鱼平开精 C	×	
64	4	展	张鞞	仙上开知 AB	阳平开知 C	×	○
65	5	施	羊豉	支去开羊 AB	阳平开羊 C	×	○
66	5	緜	勅梨	脂平开彻 AB	职入开彻 C	×	○
67	5	浸	子鸩	侵去 精 AB	之上开精 C	×	
68	6	敦	羊石	昔入开羊 AB	阳平开羊 C	×	○
69	7	缜	盈栳	仙平开羊 AB	清平开羊 AB	○	○
70	7	適	式石	昔入开书 AB	职入开书 C	×	○

续表

71	1	驹	侧流	尤平 庄 C	职入开庄 C	○	
72	4	菹	侧居	鱼平开庄 C	职入开庄 C	○	○
73	6	煮	真汝	鱼上开章 C	真平开章 AB	×	○
74	9	陟	张力	职入开知 C	阳平开知 C	○	○
75	9	使	色吏	之去开生 C	职入开生 C	○	○
76	10	殂	七余	鱼平开清 C	质入开清 AB	×	○
77	11	螽	支嵩	东平 章 C	支平开章 AB	×	
78	11	蚣	宣容	钟平合心 C	仙平合心 AB	×	○
79	11	蜻	息余	鱼平开心 C	职入开心 C	○	○
80	13	杙	羊力	职入开羊 C	阳平开羊 C	○	○

〈表四〉把 S. 2729 里各“类”反切从残卷的前头分别采录了 10 个，一共 80 个反切，上字或下字残缺不明的没有录。对每一反切都记上了被注字和上字的中古音类，以便对照。

表中“被注字”一栏和“上字”一栏分别记载被注字和上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如“歌去开精一”表示“歌韵去声(即个韵)开口精母一类”。声母为唇音和韵尾为唇音(即-u, -m, -p^h)时韵母没有开合口的对立，因此一律不记开合。还有一部分所谓“独韵”，如东韵三等、江韵等，也视为无关开合的。另外一部分“独韵”则在反切结构上明显地属于开口一边或合口一边，表中作“开”或“合”来对待，即鱼韵作“开”，东韵一等、屋韵一等、模韵、虞韵、钟韵、烛韵作“合”之类。

表右“类”一栏和“开合”一栏标明被注字与上字的“类”和“开合”是否一致：一致就记○，不一致就记×

4.4 关于“类一致原则”，〈表四〉中的反切从编号 1 到 60 中只有 4 个反切违反这个原则，即编号 5、20、32、36，其中 5 的被注字“皂”在《毛诗诂训传》(《葛覃》)里找不到，大概是孱入的。其他

56个反切都合乎这一原则。从编号61到80是AB类和舌齿音C类,“类一致原则”在此范围里难以成立。

关于“开合一致原则”,〈表四〉“开合”一栏填有记号的有50个反切,其中31个开口反切,全都用开口上字;19个合口反切,除了编号33一个以外,都用合口上字。虽然如此,〈表四〉中四等类都是开口反切,A类只有一个合口反切,也没有开口(就〈表四〉中记“开”的范围而言)反切,AB类没有合口反切,舌齿音C类只有一个合口反切,因此〈表四〉对这些“类”还不足以证明“开合一致原则”。若看整个残卷中的情形,四等合口反切在S. 2729一共才有四个,P. 3383才有两个,都用合口上字。A类开口反切在S. 2729有五个,P. 3383有三个,都用开口上字;A类合口反切在S. 2729有七个(P. 3383没有),其中六个用合口上字。在这两类反切“开合一致原则”可以说是成立的。AB类合口反切在S. 2729有37个(28种),其中有21个(14种)用合口上字,P. 3383则有22个(20种),其中有17个(15种)用合口上字。舌齿音C类合口反切在S. 2729有四个,其中有两个用合口上字,在P. 3383则有两个,都用合口上字。“开合一致”对这两类似乎还称不上“原则”,只能称为“倾向”罢了。但是要注意,这两类的开口反切全都是用开口上字的。

带唇音韵尾的韵母在“开合一致原则”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很有意思。带唇音韵尾的韵里有一些,如谈韵、肴韵、萧韵、添韵、侵韵等,这些韵的反切都采用开口上字,就算等于开口;还有一些韵就处于开口和合口的中间:如豪韵反切,两个残卷共有49个(38种),其中24个(18种)用开口上字,25个(20种)用合口上字,比率恰各一半,可称为“半开半合”。再如侯韵反切,共有20个(16

种),其中 18 个(14 种)用合口上字,两个用开口上字,接近合口,可称为“准合口”^{补注6}。同样地,尤韵可称“准开口”。至于一些“独韵”的性质也是同样的,如江韵、觉韵等于合口,东韵三等、屋韵三等要算是“准开口”。

五

5.1 上面的两项结构原则在《切韵》的反切等当时一般的反切中是看不到的。一般的反切中也有个别合乎这两项原则的,例如《刊谬补缺切韵》入声薛韵“缺,倾雪反”,被切字是溪母合口 A 类,上字也是溪母合口 A 类(清韵)。但多数传统派反切的结构不是这样,是更单纯的。多数反切在被切字、下字和上字之间只有“洪细一致原则”,就是说,要是被切字是洪音,即一等类、二等类、四等类,那么上字照例也选用洪音字;要是被切字是细音,即 A 类、B 类、C 类和 AB 类,那么上字照例也选用细音。且洪音上字多采用一等类字,细音上字多采用 C 类字。关于开合,一般的传统派反切多采用开口上字,不管被切字是开口还是合口;只有一等类的模韵上字虽然能算是合口,但它不管被切字是开或合都用得极多。在《毛诗音》的反切中,用模韵上字的范围一般只局限在一等类合口反切里面。

陆志韦(1963)对《切韵》以及其他一些六朝音义的反切的结构分析得非常精细。陆文提倡的观点是:古反切要求念起来顺口,因而除了上字的声母、下字的韵母各需要和被切字的声母、韵母相同以外,还需要上、下字的整个语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正确、顺利地

念出被切字的语音来。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例如上字和下字的洪细要互相一致,这条原则在语音学上的意义就应该在两个方面:

(一)上、下字都是细音,即都有前舌介音,这样搭配的反切应该比较顺口,因为上、下字所重复的前舌介音可以做枢纽,容易让上字的声母跟下字的韵母结合起来。

(二)细音的声母受前舌介音的同化作用是多少带腭化的,洪音则不然。同是一个声母,带不带腭化在音色上、构音上都有相当显著的区别。因此造反切的时候要是把上字的声母选得和被切字同样带腭化,或者同样不带腭化,那么念反切的时候上字的声母就可以照原样作为被切字的声母念出来,这样构造的反切不是念得更顺口吗?

5.2 这种看法自然对敦煌《毛诗音》的反切也可以适用。“类一致原则”在语音学上的含义应当如下:

同是洪音,声母的音色也不一定相同。一等类的声母,因为一等的主要元音是中舌或后舌的,所以它完全没带腭化,而有较暗的音色。二等类的声母则不然。因为二等的主要元音是[a]类的前舌元音^{补注7},所以它就带一点较明亮的音色,构音时舌头靠前,嘴角稍往横里拉,这有点类似腭化。四等类的声母,因为四等的主要元音是前舌的[e](或[ε]),所以它的音色也较明亮,舌位比二等声母提得更高,嘴角更往横里拉,更是接近腭化了。《毛诗音》反切的作者认识到这三类声母音色上的不同,把上字选得和被切字同带一种声母音色,以求反切念起来顺口。我以为这当是“类一致原则”在洪音方面的语音学含义。

至于细音方面,情况当是一样的。唇牙喉音 A、B、C 三类的声母虽然多少都带腭化,但其腭化的情况应当有所不同:A 类的声母带着强度腭化(越南借音把 A 类唇音多作舌音 t-, t^h-, j-, ny-等便是强度腭化的反映);B 类的声母则腭化较弱;C 类的声母则与嘴角往横里拉的同时,下腭稍稍后退,以便迅速往中舌或后舌的主要元音过渡(这种构音特色给 C 类的唇音声母带来了上齿和下唇的接触,使它后来变为“轻唇音”),这就会给 C 类声母添上较暗的音色。《毛诗音》的作者应该认识到了这三类唇牙喉音声母音色上的不同,才把上字选得和被切字同带一种音色,以求反切念起来更加顺口。

为什么在舌齿音细音里,即舌齿音 AB 类和 C 类之间,“类一致原则”不能成立呢?我看那是因为舌齿音声母的发音部位都在口腔前部,用舌尖或前舌面阻挡气流,加上后面紧接着前舌介音,所以整个舌头都被提到口腔前部,再没有余地受主要元音舌位的影响而带出明显的音色区别来。庄组二等类反切多用细音上字,那应该这是由于庄组是卷舌音,后面的前舌介音受其卷舌的影响而变得极弱的缘故。

至于《毛诗音》反切里“开合一致原则”在实际语音上的作用,那更是不难推测的。在合口介音 u 的前面,声母总是多少带唇化的。因此造反切的时候,要是把上字的声母选得和被切字同样地带唇化,或者同样地不带唇化,那么念反切的时候上字的声母可以照原样作为被切字的声母念出来,这样一定是很顺口的。和“类一致原则”结合起来看,《毛诗音》反切的作者就是运用他对语音特征的高度认识,在各种腭化特征和唇化特征上使上字声母和被切字

声母互相一致,以求反切念起来更加顺口、正确。

5.3 9世纪初撰成的慧琳《一切经音义》里包含大量的反切,它们多数的结构不同于传统式反切,上字的“类”和“开合”都和被切字一致^①,在这两点上它们可谓和《毛诗音》反切是一路的。不过慧琳的反切有一种显著的倾向,即喜欢采用和被切字同音异调(声母、韵母都同,只有声调不同)的上字^②。《毛诗音》反切则与此不同,这种同音异调的上字用得极少,好像有意回避了似的。例如 S. 2729 帮母一等类的反切共有 10 个(8 种),都用“补”(模韵上声)来作上字,只有切“圃”(模韵去声)的时候用“本”(痕韵上声),作“本故”(第 114 行),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还有一点不同是:慧琳的反切所反映的音系里韵母系统已大为简化^③,四等类和 A 类、AB 类合并, B 类和 C 类也合并为一,因此虽说慧琳的反切里也有“类一致原则”,但其“类”的内容已经与《毛诗音》中有所不同了。“类一致原则”对拟音能应用的范围(请看下一节)也就不免随之降低。

六

6.1 现在举例介绍一下敦煌《毛诗音》反切的特殊结构原则在构拟音值方面发挥的作用。先介绍应用“开合一致原则”的一个例子。鱼韵字,鉴于“开合一致原则”就明显地属于开口一边。两个残卷合起来共有 58 个(42 种)鱼韵反切,都用的是开口上字,例

① 参看 Chao(1941:207—208 页)。

② 参看河野六郎(1955)。

③ 参看黄淬伯(1931)。

如〈表四〉编号 72, 73, 76, 79。虞韵(除唇音)则共 42 个(34 种)反切, 几乎全用合口上字, 例如〈表四〉编号 52, 与鱼韵对比明显。高本汉把鱼韵拟为 $-wio$, 看做是合口, 但多数学者改拟 $-io$, $-io$ 等。《毛诗音》反切不但支持他们去掉 w 的看法, 还要求把主要元音拟做非圆唇的, 或者圆唇性极弱的元音。因而我就把鱼韵拟做 $-iə$ 。《韵镜》鱼韵作“开”, 正和《毛诗音》相合, 可证《韵镜》并没有错。

6.2 作为“类一致原则”的应用例, 可举止摄脂韵和之韵的拟音。这两韵的音值高本汉没能拟出区别来, 都拟做 $-i$, 只用符号 α 、 β 来分开。我们按照“类一致原则”来观察, 《毛诗音》反切里脂韵唇牙喉音字表示 A 类或 B 类的特点, 就是说, 脂韵重组四等字作为被切字、上字都表现 A 类的性质, 例如 P. 3383 第 50 行“毗, 频夷”(上字是 A 类), 脂韵重组三等字则表现 B 类的性质, 例如〈表四〉编号 44、49(上字是 B 类)。之韵牙喉音字(之韵没有唇音)与此不同, 它们作为被切字、上字都表现出 C 类的特点, 例如 S. 2729 第 107 行“綦, 求基”(上字是 C 类)。据此可以拟测: 脂韵的音值当是 $-i$ (A 类)、 $-i:$ (B 类), 主要元音是前舌的; 之韵则当是 $-iə$ 或 $-i$, 主要元音多少含有中舌的成分。把之韵的主要元音拟测为中舌的, 是李荣(1957)、王力(1958)等已经提出的, 其根据是上古音。上古离中古一千多年, 用上古音拟测中古音, 未免太间接了。我们则用中古时期的材料证明中古音, 可谓最直捷的。当然在音值的细节上学者会有不同意见。

6.3 不少学者以为《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人工杂凑的, 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那样复杂的韵母系统。我们观察《毛诗音》反切的结构, 在同一韵摄内部而同等同开合的一对韵母, 如止摄三等开口脂

韵和之韵,在牙喉音底下反切上字的“类”就有区别,如上面已介绍的那样;又如山摄四等开口仙韵和先韵,前者用A类(牙喉音)和AB类、C类(舌齿音)的上字,后者用四等类的上字,都是泾渭分明的。反切上字的这种分用现象,若不假定基于实际发音上的区别,是难以理解的。因此,虽然另有一些韵母的区别如二等重韵等,不能从《毛诗音》反切里找到语音区别的线索,但也应该承认,《切韵》内部杂凑的成分即使有,也不过是比较局部的,《切韵》里面韵母的细微区别多数还是以实际语音作为基础。

七

7.1 最后要谈一下敦煌《毛诗音》反切在汉语音韵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我们应该承认,《毛诗音》反切的作者的脑子里已经存在着相当于后世的《韵镜》、《七音略》等韵图里的“等”和“开合”一类的音韵概念,这样才能运用“类一致”和“开合一致”两条原则来选定反切上字。“等”和“开合”从现代音位论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常透彻的抽象概念,中国很早就有这种概念,是很了不起的。

7.2 各家对于等韵图成立的年代说法不一,晚的说在唐末五代,甚至在宋初,且多说是出于“胡僧”之手。我们分析敦煌《毛诗音》的反切,从中得出来的结论是:在7世纪末,或者在8世纪初,顶晚也在8世纪中叶,“等”和“开合”这两个等韵学的基本概念事实上已经成熟了。同时也能知道,这些等韵学概念并不是佛家的专利,也不一定是在佛僧的手里成熟起来的,因为《毛诗》是儒家的经典。小川环树(1951)指出,东汉王充《论衡》卷二十五〈诂术〉

有下面一节：

五音之家，用口调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

口有张歛，声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实。

小川先生认为，这里的“五音”很可能不是对音高的分类，而是对念字时口腔开度的大小、宽窄的分类。“张歛”、“外内”确实很像有关口腔开度和舌位前后的尺度，也许反映的是等位和开合这些韵母分类法的萌芽状态。1世纪的东汉已经如此，那么在初唐、盛唐时期，这种音韵学概念更是发达、精练，而且应用到了造反切的技术方面，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惜这种高度技术后来都已失传，《毛诗音》反切的作者姓甚名谁都湮没无闻了。要是本文还能使这位佚名的中国古代学者对语音的深入认识得到彰显，并能初步说明他在汉字标音法演进史上所作的贡献，那我写本文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引用文献

- 黄 淬 伯 1931:《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北京—上海。
- 李 荣 1956:《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
- 陆 志 韦 1963:《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5:349—385页。
- 潘 重 规 1970:《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新亚研究所，香港。
- 王 力 1958:《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北京。
- 周 法 高 1952:《三等韵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上;《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1968年，239—261页。
- 周 祖 谟 1957(原撰于1942):《唐本毛诗音撰人考》，《汉语音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3页;《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北京，

162—167 页。

伏见冲敬 1974:《書道大字典》(上),角川書店,東京。

河野六郎 1955:《慧琳衆經音義の反切の特色》,《東京教育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会報》5. 1;《河野六郎著作集 2 中国音韻学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 年,261—266 頁。

平山久雄 1966—1987:《敦煌毛詩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14. 3,1966 年,左起 1—243 頁。《敦煌毛詩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中之一至中之六),《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8,1979 年,左起 1—105 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80,1980 年,左起 1—69 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90,1982 年,左起 81—148 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97,1985 年,左起 1—53 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0,1986 年,左起 1—61 頁;《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05,1987 年,左起 1—27 頁。

1974:《切韻における蒸職韻開口牙喉音の音価》,《東洋学報》55. 2, 64—94 頁。

藤枝晃 1959:《敦煌の僧尼籍》,《東方学報:京都》29,1959, 285—338 頁。

小川环树 1951:《反切の起源と四声および五声》,《言語研究》19—20;《中国語学研究》,創文社,東京,1977 年,48—56 頁。

Chao, Y. R. (赵元任)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3—4, 203—233 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 年。

1990 年

补注

1 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收载 S. 2729(包括 D_x-1366a)、S. 10V. 的录文和 P. 3383 的照片。

2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误做“庚申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敦煌研究院编,中华书局,北京,2000 年)正之为“庚辰年”。

3 远藤光晓《在歐のいくつかの中国語音韻史資料について(关于在欧

洲的几种汉语音韵史资料》)(《开篇》7, 1990年, 25—44页)的〈5. 毛诗音〉(36—43页)一节中根据就原卷识读的记录对平山久雄1979里〈S. 10V. 補正校録表〉加以补正, 并认为S. 10V.《毛诗音》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而是某一种《毛诗音》和《经典释文》的混合物, 即有人根据其需要从这两部书中把音注抄写出来的结果。远藤光晓《敦煌〈毛诗音〉S. 10V. 写卷考辨》(青山学院大学全学共通科目〈論集〉編輯委員會《論集》42, 2001年, 53—62页)里的结论也与此基本相同, 并认为还有一些音注可能是从《毛诗音》和《经典释文》以外的书籍抄录的。如果是这样, 本文所拟的“第一祖本”和“第二祖本”之别也就没有必要了; 应该说, S. 2729, P. 3383, P. 2669V. 以及S. 10V. 里的“某一种《毛诗音》”都来自一个祖本, 而那祖本的年代当在隋代。

4 我认为清、昔韵与庚、陌韵(三等)在音位上同音, 在语音上则不同音。因此在唇牙喉音下面清、昔韵与庚、陌韵(三等)构成重组的对立。参看本书第四篇《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2。淳、术韵牙喉音只有合口A类, 与此对立的合口B类则属于真、质韵。

5 唇音韵尾(补注6所谓“唇音性韵尾”)其实还有-wŋ, -wk, 只是本文按一般的看法没有列在一起。下文所举“独韵”中东、屋、钟、烛、江、觉诸韵是以-wŋ, -wk收尾的。

6 覃、合韵也算“准合口”。两个残卷共有20个(13种)覃、合韵反切, 其中有17个(10种)反切用合口上字, 与谈、盍韵一共7个(6种)反切都用开口上字形成明显的对比。至于带“唇音性韵尾”-u, -m, -p, -wŋ, -wk(关于后二种韵尾参看《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的诸韵可分为“开口”、“半开半合”、“准合口”、“合口”等的原因, 我认为是跟其韵母对声母发挥唇化作用的强弱不同有关: 如果声母没有被唇化, 就算“开口”; 如果声母的唇化十分显著, 那就算“合口”, 其他可以类推。例如谈韵/am/由于主要元音较开, 因此其声母难以受到韵尾的同化作用, 而覃韵/Δm/的主要元音较关, 因此其声母易受韵尾的同化, 通常发为带唇化的辅音。

7 如何把二等重韵的音值区别开来是中古汉语拟音上的一个难题。我把它写成主要元音/a/和/ə/之别(如删韵/an/: 山韵/en/), 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法, /ə/其实也应算是一种前舌元音。很可能在《毛诗音》反切的基础音系中, 二等重韵已经合并为一了。

重组问题在日本*

提要 《韵镜》、《七音略》韵图上唇牙喉音三、四等重组的问题,在日本较早受到学者的注意,因为古代日本的“万叶假名”里面有元音甲类和乙类的区别,日语甲类 i 的音节多用重组四等的汉字来表示,乙类 i 的音节则多用三等的汉字来表示。

关于重组的音值,在 30 年代由有坂秀世、河野六郎二人提出了一致的看法,即根据朝鲜借音与越南借音等材料,推断重组是介音 i (四等) 和 i (三等) 的对立。这在日本几乎一直被视为定论。战后三根谷彻提出了新的音位解释,认为在音位的层次上重组是声母包含腭化成分(四等)与不包含腭化成分(三等)的对立,指出这样就可以消除舌上音与来母字的介音是 i 还是 i 的疑难问题。

本人赞同三根谷氏的解释,但认为在语音的层次上重组是相当复杂的现象,其语音表现视声母、声调及方言等条件而有所不同,如此假定才能理解重组在《切韵》反切上与外国借音上反映的具体状况。



1.1 日本 7、8 世纪还没有创造平假名与片假名的时候,人们就借用汉字的“音读”和“训读”来书写日语。这种古代书写用的汉

* 本文系第四届国际暨第十三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议(1995 年 5 月,于台湾师范大学)上的专题演讲。

字,因《万叶集》(8世纪后半所编日语诗集)而称做“万叶假名”。《万叶集》以外包含大量万叶假名的文献有《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等。万叶假名中借用汉字的音读的叫“音假名”,借用汉字的训读的叫“训假名”。本文称“万叶假名”则专指“音假名”,因为“训假名”与汉语音韵无关。

一个日语词用万叶假名书写时可有多种写法,例如 hito(ひと即“人”)单在《日本书纪》有“比苔”、“比等”、“比登”、“比騰”、“臂苔”、“臂等”等写法。根据这种“同用”关系可对万叶假名加以分类,正如系联反切那样,例如“比”、“臂”等可成一类,“苔”、“等”、“登”、“騰”等又可成一类。如此分类的结果共得 88 类,这意味着古代日本语区别 88 种音节。这数目比后代的音节总数多出 21 种,从与后代假名的对应关系来说,这 21 种音节在万叶假名所代表的古代日语中各分两类,即(音值是现代音。现代 h 来自古代 p):

き ki, ぎ gi, ひ hi, び bi, み mi;

え e; け ke, げ ge, へ he, べ be, め me;

こ ko, ご go, そ so, ぞ zo, と to, ど do, の no, よ yo, ろ ro, も mo。

其中 mo 分两类只限于《古事记》。

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分用现象是由于后世的元音 i, e, o 在古代各分两种元音的缘故(只有え不在此列,是 e 与 je 的不同)。那些元音当时的实际音值不容易知道,一般将与后世的音值似乎相同或相近的一部分称做“甲类”,将另一部分称做“乙类”,如“甲类 i”、“乙类 i”等。音节也可同样称呼,如“比”、“臂”等代表的音节称“甲类 hi”,“苔”、“等”等代表的音节称“乙类 to”。

1.2 在 i, e, o 三个元音甲、乙两类的区别当中, i 的两类和重组有着密切关系。包含甲类 i 的音节多用止摄四等字来表示, 包含乙类 i 的音节多用止摄三等字来表示, 例如《日本书纪》里表示甲类 hi 的有“卑”、“避”、“譬”、“臂”(支韵^①四等)、“毗”、“比”(脂韵四等)、“必”(质韵四等), 表示乙类 hi 的有“彼”、“被”(支韵三等)、“悲”(脂韵三等)。表示乙类的三等字并不限于重组三等, 如表示乙类 ki 的有“紀”、“基”(之韵)、“機”、“幾”(微韵)等。

桥本进吉(1927)指出了这一对应关系, 并说: 从汉语本身无法了解原来三、四等是怎样区别的, 但从朝鲜汉字音似乎可知一些实况。他接着把日语乙类 i 暂拟为于 i 之前带一种“模糊”元音的复合元音。这似乎意味着他根据朝鲜音来拟测, 止摄开口三等大概是(或类似)ii 的复合元音, 这样和四等 i 就有了区别。桥本氏这篇文章是学生笔录的讲义, 且他讲得非常慎重, 因此这一段写得未免简略、含糊, 但可算是日本学者研究重组问题的嚆矢吧。

二

2.1 在日本的语言学界和汉学界, 有坂秀世要算是最早对重组的音值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下具体结论的人。这不但是在日本, 在全世界范围恐怕也是最早的。有坂是桥本进吉的高足, 为研究日语音韵史的需要而开始钻研汉语音韵, 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为日本学者研究汉语音韵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阐

① 本文举平声韵目以兼赅与之相配的上、去声韵(有时也赅入声韵)。

发重组问题是其中的成绩之一。

有坂氏认为唇牙喉音三等和四等的区别在介音上，遂将三等介音拟做 \bar{i} ，四等介音拟做 i 。 \bar{i} 在这里表示央高元音，即与 i 同，与我们有时用此来表示现代汉语“资”、“刺”、“思”中的“舌尖元音”不同。此说最初见于有坂秀世(1935)(1936)，但有关的叙述都很简短，是摘要性的，到有坂秀世(1937—1939)才有详细而系统的说明^①。在这篇文章中他先批评高本汉忽视三、四等重组的错误，引《颜氏家训》〈音辞篇〉“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等材料，证明三、四等重组确实反映某种语音上的区别，然后按止摄、臻摄以及其他诸摄的顺序分段进行拟音。现把其内容综合起来可以分条概括如下：

(1) 外国借音和现代方言中，反映重组对立最清楚的是朝鲜音和越南音。朝鲜音在牙喉音之下反映重组的区别，即：

止摄三等字韵母译做 ii ^②，四等字韵母译做 i 。

臻摄三等字韵母译做 in 或 $\bar{a}n$ (舒声)， il 或 $\bar{a}l$ (入声)，四等字韵母译做 in (舒声)， il (入声)。

其他诸摄三等字韵母译做洪音(仅效摄译做细音)，四等字韵母译做细音。

(2) 越南音在唇音之下反映重组的区别，即：

三等字声母译做 p, p^h, b, m, f, v 等唇音，四等字一般译做 t ,

^① 有坂秀世(1955)是有坂氏的遗稿，第三部〈奈良時代における國語の音韻組織について〉写于1933年，其中〈漢字音(古代支那語の音韻組織)〉一章中对重组的叙述已具备有坂秀世(1937—1939)的内容。参看庆谷寿信(1981)、森博达(1981)。

^② \bar{i} 是朝鲜字母一，也转写作 u 。

t^h, j, ny 等舌音(四等唇音声母作舌音,在止摄、臻摄里例外很少,其他摄里例外较多)。

(3) 据此可以拟测,三等与四等的区别当在介音上,即细音三等韵母有“非硬腭性”介音 i ,细音四等韵母有“硬腭性”^①介音 i 。越南音把唇音四等声母变做舌音,当是“硬腭性”的前高介音带来腭化的结果,正如同日语有些冲绳方言 *hiruma*(\langle *piruma*,白天)说成 *tiruma*, *izumi*(泉水)说成 *izini* 等。

(4) 反映重组的材料还有:

臻摄牙喉音开口三等,日本吴音作 *on*(舒声)、*otsu*(入声),福州音作 *üŋg*,汕头音作 *in*;四等吴音作 *in*(舒声),*ichi*、*itsu*(入声),福州音作 *ing*,汕头音作 *in*。此外《大唐西域记》用止摄字“比”、“卑”、“毗”、“避”、“臂”、“弥”、“祇”、“耆”、“伊”等来描写梵语包含元音 i, i 的音节,这些汉字都是四等字,不夹杂一个三等字。上述拟音都可以解释这些现象。

(5) 据前面的看法,唇牙喉音重组的各摄韵母其音值可拟测如下:

止摄三等 $\dot{i}i$	四等 i	蟹摄三等 $\dot{i}ei$	四等 $\dot{i}ei$
臻摄三等 $\dot{i}ən/t$	四等 $\dot{i}ən/t$	山摄三等 $\dot{i}en/t$	四等 $\dot{i}en/t$
效摄三等 $\dot{i}eu$	四等 $\dot{i}eu$	梗摄三等 $\dot{i}eŋ/k$	四等 $\dot{i}eŋ/k$
流摄三等 $\dot{i}əu$	四等 $\dot{i}əu$	深摄三等 $\dot{i}əm$	四等 $\dot{i}əm$
咸摄三等 $\dot{i}em/p$	四等 $\dot{i}em/p$		

该文只拟测开口的音值,合口可以类推。上面的拟音把各摄

① 有坂秀世(1935)(1936)(1955)未用“非硬腭性”、“硬腭性”,而用“央元音性”、“前元音性”的说法。

同等的不同韵母——如止摄三等支、脂、之、微——合并为一，这应该是要把议论的焦点集中到介音的缘故。

(6) 舌齿音没有重组的对立，它的介音是 \bar{i} 还是 i ? 正齿音二等的介音当是 \bar{i} ，其他声组的介音当是 i ，这是根据声母本身的语音性质以及朝鲜音译做细音与否来拟测的，例如正齿音二等是卷舌音，不好与前高的 \bar{i} 结合，朝鲜音亦把止摄正齿音二等韵母译做 ii ，和牙喉音三等相同^①。不过对半舌音、舌上音、舌头音的介音似乎还有研究余地（理由没有明说，似乎是因为这些声母的构音方式不一定像正齿音三等、齿头音以及半齿音那样只适合于与 \bar{i} 配合，并且朝鲜音把半舌音偶尔也译做洪音的缘故）。

(7) 顺便谈到齐、先、萧、青、添诸韵的音值。这几个韵的字在韵图上只列在四等。高本汉把这几个韵拟做带元音性质的介音 i 。这些韵的反切上字照例用一等字，这一点与一等韵、二等韵相同，相结合的声母也和一等韵相同，那么它们在《切韵》时代应该是洪音的 ei , en 等。它们在隋末唐初就变成了 iei , ien 等，结果和重组四等同音了。

以上是有坂秀世(1937—1939)的主要内容。后来有坂秀世(1940b)指出，牙喉音四等合口个别字在后代的资料中读做开口；这是音韵对应规律的例外，如“遗”、“役”、“季”、“尹”、“营”、“倾”等在《中原音韵》、现代北京话均是开口，而牙喉音三等合口字没有这

① 有坂氏还说：假定正齿音二等的介音是 \bar{i} ，也可以说明上古的 ts , ts^h , dz , s 如何分成中古的齿头音和正齿音二等；这些声母在介音 \bar{i} 的前头保持了原来的音值，而在介音 i 的前头变为卷舌音，这就是正齿音二等；发 i 时舌头往后稍缩，容易使前面的 ts 等变为卷舌音。对此问题我另有看法，参看平山久雄(1994: § 2. 2)。

个现象。他认为，“硬腭性”介音再加合口的动作，音色的变化也不太显著，且舌面前部抬得很高，就妨碍嘴唇和嘴巴的动作，这些因素会引起合口性的弱化甚至开口化。这一事实反过来支持他对三、四等介音的拟测。齐、先等韵的个别合口字亦在此列，如“携”、“县”、“血”等在《中原音韵》、现代北京话都读做开口，这就反映此类韵母后来由洪音变为细音，变同重组四等了。

2.2 有坂氏认为重组的区别在介音，不在主要元音，其理由可推测如下：

(1) 朝鲜借音里止摄、臻摄以外的牙喉音三、四等一般表现为洪细不同，例如山摄三等“件”kən、四等“遣”kiən，主要元音相同，只以有无介音来区别。

(2) 越南借音里唇音四等译做舌音，这是声母腭化的结果，那么给声母带来腭化的因素应该紧接在声母的后面，那就是介音。

(3) 如果假定三、四等的区别在主要元音，而为此多拟几个主要元音，那么那些元音只出现在细音韵母中，不出现在洪音韵母中。这种分布情形显得不自然。

(4) 主要元音的同一性对诗歌的押韵极为重要，因此要回避一个韵包含两种元音的拟测。介音的同一性则对押韵不一定那么重要。

2.3 河野六郎(1939)也提出了与有坂秀世(1937—1939)几乎一致的拟音。他把《切韵》及《玉篇》(据《玉篇残卷》与《篆隶万象名义》)里止摄支、脂两韵的反切系联起来，参考朝鲜音对此加以调整，证明两韵的牙喉音反切都基本可以分成四类，即开、合口三、四等。朝鲜音里支、脂韵这四类的反映如下：

甲(开口四等) i

乙(开口三等) i

丙(合口四等) iu 或 ioi

丁(合口三等) ui 或 uoi, oi

关于四类的语音本质,他赞同有坂氏的看法,认为是介音的不同,把各介音的音值拟测为^①:

甲(开口四等) ī

乙(开口三等) ī

丙(合口四等) ī^w丁(合口三等) ī^w

除了朝鲜音以外,他举出支持这项拟音的三种材料:

(1) 在反切的系联上,正齿音二等与乙类、丁类相近,正齿音三等等与甲类、丙类相近。从各声母的音值(正齿音二等是卷舌音,三等等是舌面音)来看,前者与 ī 相配合,后者与 ī 相配合,是很自然的。

(2) 越南音把甲类唇音译做舌音,这意味着甲类介音的硬腭性较强。

(3) 古代日语 ki, hi 的甲、乙两类中,只有乙类与 ko(乙类)、ku 交替,例如 ki^z (树) → ko^z dati (树林), tuki^z (月) → tukuyo (月夜)。这表示乙类 i 的音值当是 ī, 因为语音性质上 ī 比 i 与 o、u 更近。万叶假名照例用汉语的止摄四等字表示包含甲类 i 的音节,用止摄三等字表示包含乙类 i 的音节,上述的拟音正与此符合。

上面四种介音说当然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韵摄。他还说,伴随着介音的不同,牙喉音声母的发音部位应该也有不同:甲、丙两类的牙喉音当是硬腭辅音(palatals),乙、丁两类的牙喉音当是软腭辅音(velars)。

关于舌齿音的介音,如上所记,他认为正齿音二等是 ī, ī^w, 正齿音三等等是 ī, ī^w, 齿头音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测他是认为 ī, ī^w

^① 此说已见于河野六郎(1937)。这是东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的。关于舌音(包括半舌音)的介音,他说似乎在两种介音的中间,因为唇牙喉音甲、乙类和丙、丁类的反切常常以舌音字为媒介系联起来,但他没有下最后的结论^①。

2.4 上面所介绍的有坂、河野二位学者把重组归为介音 $\underset{1}{i}$ (三等)和 $\underset{4}{i}$ (四等)的对立的看法,后来被称为“有坂、河野说”,在日本几乎被视为定论,至今仍为多数学者所遵用。

平山久雄(1967)也采用此说,但把三等的介音改拟为 $\underset{1}{i}$ (合口是 $\underset{1}{y}$)^②,因为这样就更容易说明朝鲜音把唇音的韵母不管三、四等都译做细音,越南音把止摄的韵母不管三、四等都译做 $\underset{4}{i}$ 的事实。 $\underset{1}{i}, \underset{1}{y}$ 表示比 $\underset{4}{i}, \underset{4}{y}$ 稍微偏低、偏央,大约在 $\underset{4}{i}, \underset{4}{e}, \underset{4}{i}$ 交界处的元音,音值和陆志韦(1947)所拟相同。有坂秀世(1955)也曾考虑过把三等介音拟做 $\underset{1}{i}$ 的可能性,但未敢肯定,理由是和四等介音 $\underset{4}{i}$ 过于接近。不过我以为伴随着介音 $\underset{1}{i}, \underset{4}{i}$ 之别,声母腭化的音色应该也有不同,足以帮助人们听辨三等与四等两种音节的区别。

2.5 对于舌上音、半舌音的介音归属,有坂、河野二位都有所犹豫。对此辻本春彦(1954)提出了明确它为 $\underset{4}{i}$ 的看法。他指出,《切韵》系韵书以及其他中古时期资料的反切里,要是反切上字属

① 另外河野六郎(1950)提出“第一口盖音化(第一次腭化)”说,拟测在上古与中古之间,牙喉音声母曾在介音 $\underset{4}{i}$ 前面由于腭化而变入了正齿音三等(疑母则变入了日母)。明、清之间也发生过同样的腭化音变,所以他称做“第一次”。但这一音变只发生在中古汉语白话音的基础方言里,文言音的基础方言没有受其影响。根据主要有两点:(1)牙喉音重组四等比三等字少,小韵往往也不齐全,(2)牙喉音四等字在谐声上常与正齿音三等字(包括半舌音)相通,其中正齿音字似乎多是口语里常用的,如“支”、“只”、“舌”、“热”。此说也见于河野六郎(1937)。

② 我的论文中照例将介音的符号略去,以便印刷。

重组四等,被切字一定也属重组四等;要是反切上字属重组三等,被切字一定也属重组三等。反切上字属于没有重组对立的诸韵的时候,则可由反切下字来决定被切字属重组三等还是重组四等。依据这个关系来观察,反切上字属重组三等或四等时,就不管下字是什么声母,完全可以按上字来决定被切字是三等还是四等。他说唇牙喉音重组的反切若上字属于没有重组的韵,而下字是舌上音或半舌音的话,被切字就一定属于重组三等,由此可以决定舌上音、半舌音的介音应该是*i*。但为了处理这条规则的例外,他就得改动一些反切用字,如《广韵》“篇,芳连切”、“便,房连切”的“连”改为“延”,“癸,居谏切”的“居”改为“吉”等,这恐怕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后来也有人祖述此说,如松尾良树(1974)、森博达(1983)等。

关于辻本春彦(1954)所论述的被切字和反切上字在重组类别上的关系,上田正(1957)^①也曾作过讨论。他对三、四等韵里唇牙喉音的反切提出了下面七项公式。A是重组四等即A类,B是重组三等即B类,甲是与重组无关的三等韵,即一般所谓C类,如东韵三等、鱼韵等。公式是:

(1)甲甲=甲 (2)甲A=A (3)甲B=B (4)AA=A

(5)AB=A (6)BB=B (7)BA=B

(1)表示:C类韵的反切都用C类上字;(2)、(3)表示:重组韵的反切若用C类上字,被切字的类则与下字一致;(4)、(5)、(6)、(7)表示:反切上字若用A类或B类,被切字的类则与上字一致。

^① 这是中国语学研究会(现日本中国语学会)年会上报告的提要,下面介绍的公式写在油印的材料上。

他进而应用这些公式证明有一些韵虽然内部不包含重组,但其唇牙喉音都属重组的一类,即:清韵属 A 类,幽韵属 B 类,职韵属 B 类(他举的例子都属唇音)。

A 类字和 B 类字在一个反切里互相不作为被切字和上字(A 类上字中“匹”字是例外),这是周法高(1952)指出的唇音反切上字的规律。上述辻本、上田二位的看法,可以说把这一规律扩大到牙喉音的反切。平山久雄(1966)把这一规律写成下表的形式,并称之为“类相关”。这个名称后来在日本就比较通行了。

被切字 上字	A 类	B 类	C 类
A 类(除“匹”)	○		
B 类		○	
C 类	○	○	○
“匹”	○	○	○

这里清韵、幽韵牙喉音(除“休”小韵)算 A 类,庚韵三等、幽韵唇音(和“休”小韵)、蒸韵唇音以及牙喉音合口(蒸韵只有入声职韵具合口)算 B 类。我认为蒸韵牙喉音开口 $ieŋ$ 属 C 类,唇音 $ieŋ$ 、职韵牙喉音合口 uek 都属 B 类,两者含有不同的主要元音^{*註1}。

三

3.1 战后随着音位论受到重视,就开始有人对重组现象加以音位分析。藤堂明保(1954)把三等、四等的介音各解释为 $/rj/$ 、 $/j/$,例如支韵开口三等 $/rje/$ 、四等开口 $/je/$ 、三等合口 $/rjwe/$ 、四等合口 $/jwe/$ 。这看来确是巧妙的办法,因为可以利用这个 $/r/$ 来把舌

上音解释为/tr/、/t^hr/、/dr/（这是二等，三等是/trj/）；正齿音二等解释为/cr/、/c^hr/、/dzr/等（与三等韵结合时是/crj/、/c^hrj/、/dzrj/等）；正齿音三等解释为/cj/、/c^hj/、/dzj/等（齿头音四等解释为/c-j/、/c^h-j/、/dz-j/等）。但这种解释对后来学者几乎没有影响，大概是因为/r/在唇牙喉音之后并不起卷舌作用，它只不过是使介音/j/的语音表现偏央而已，这一点未能令人满意；何况他把齿头音和介音/j/用/-/号隔开，以便与正齿音三等作出区别，也不见得是上乘的办法。其后藤堂明保（1957）废除了/-/号，而把正齿音三等改拟为/crj/等，齿头音四等改拟为/cj/等。正齿音二等与三等韵结合时则不用/j/，把韵母看做洪音，例如鱼韵“所”记为/sro/，韵母不巧地和模韵相同。如此又难免引起议论^{补注2}。

3.2 在藤堂之前，三根谷彻（1953）提出了从音位论观点把重组的区别解释为声母的腭化与不腭化的看法。他用统计法观察《广韵》重组三等和四等反切中以舌音各类字充做反切下字的频率，又观察舌齿音各类反切中以重组三等字和四等字充做反切下字的频率，结果推断：正齿音三等（包括半齿音和喻母四等）和齿头音跟重组四等相近；正齿音二等跟重组三等相近，舌上音和半舌音则跟重组三等和四等都有同样程度的关系。由此看来，舌上音和半舌音的语音性质应该介于重组二类的中间，不能把它硬归到一处去。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最好把重组的区别解释为声母的辅音音位包含与不包含腭化成素/j/的不同，即四等声母是/ $\widehat{p}j$ /、/ $\widehat{k}j$ /等^①，三等声母则是/p/、/k/等。照此一解释，如“笔”（质韵三等）、

① $\widehat{\quad}$ 号表示“复合音位”（compound phoneme）。

“必”(质韵四等)各是/piet/、/p̂jiet/，“眷”(线韵合口三等)、“绢”(线韵合口四等)各是/kiuan/、/k̂jiuan/，齿音、舌音则是(以质、栉韵为例)“质”/t̂jiet/、“七”/t̂shiet/、“瑟”/ŝjiet/、“室”/t̂jiet/、“栗”/li-et/等，这样重纽韵里舌上音、半舌音的归属问题在音位的层次上就不用计较了。而在语音的层次上，可认为舌上音、半舌音的介音大略在[i]和[ɨ]的中间。

既然连续的或邻近的音位作为具体的语音实现时，其构音互相牵连、互有影响，所以音节中一个成员的音位性不同，能引起其他所有成员的语音不同。三根谷氏说：重纽三等音节和四等音节的语音，不但声母有不腭化与腭化的差异，连介音、主要元音也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看法并不与向来的“介音说”以及“主要元音说”互相排斥；各说的差异，可以说在于把重纽的区别归到音节中哪一成员的音位对立上。

以下让我对三根谷氏的“声母音位说”再作些补充说明。唇牙喉音重纽三等声母如果是不腭化(语音上应该说“弱腭化”)的，那么介音的舌位则难免随着多少偏央、偏低；重纽四等的声母如果是腭化(语音上应该说“强腭化”)的，那么介音的舌位则难免随着偏前、偏高。至于舌齿音声母后介音的舌位，则取决于该声母的舌位如何，其情况大致可拟如下：

正齿音二等是卷舌音 tʂ 等，舌尖上翘，介音就不能不偏央、偏低，近似重纽三等的介音。

正齿音三等是舌面音 tɕ 等，舌面前部向硬腭接近，介音的舌位就被拉高，近似重纽四等的介音。

齿头音 ts 等，虽然是不腭化的，但其舌位十分偏前，所以后面

的介音音值也近似重组四等的介音。

舌上音₁等,虽然是腭化音,但后面的介音如果舌位太高就会使声母带上塞擦音色彩,容易和正齿音三等混淆,因此它的舌位总要多少偏低,大略在重组三等介音与四等介音的中间。

半舌音₁虽然也是舌尖辅音,但其构音方式是边音,舌尖的气流通路是中间闭塞而两边开放,和前高介音的气流通路中间开放两边闭塞正好相反,因此介音的舌位也要偏低,大略在重组三等介音与四等介音的中间。

以上所拟各声组介音的舌位,当然也依主要元音、声调等条件而会有一定幅度的变异。

3.3 我赞同三根谷氏的音位解释,除了它能解决舌上音、半舌音之后介音的归属问题之外,还有一层理由: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中,齿头音和正齿音三等的关系以及舌头音和舌上音的关系都可视做不腭化辅音与腭化辅音的对立。因此假定唇音、牙喉音也有同样的对立,那是合乎音位论中系统化的要求的。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重组是声母的对立,那为什么多数的反切不把重组的区别用不同的反切上字标示出来?我的回答是:现代音位论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性的分析,反切则是实用的工具,只要能综合反切上、下字的语音来读出被切字的语音就行^①。齿头音与正齿音三等需要严格使用不同的反切上字,是因为这两种声母跟同一韵母结合时,韵母的语音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必须

^① 我同意陆志韦(1963)的看法,认为反切是连读上、下字而读成一音的。要不然,在没有表音文字也没有韵图的时代,怎么能从反切得出被切字的音来?

用反切上字作出区别。重组三等声母与四等声母跟同一韵母结合时,韵母的语音一般有明显差异,因此用反切来表示重组区别时采用不同的下字即可,上字则不妨是共通的。

3.4 Chao, Y. R. (1941) 早已指出,《慧琳音义》的反切上字分用重组三等和四等。敦煌发现的《毛诗音》S. 2729、P. 3383 两种残卷的反切也有此现象,我在平山久雄(1990)里作过介绍,请参看。这一类反切告诉我们,重组两类音节在声母的语音上确实也有不同,但我们不能借此证明重组的音位区别就在声母,不在别的成分,正如不能根据这两种资料的反切上字分用开口和合口的事实,来证明开合口是声母音位的对立那样。这种反切着重描写声母腭化、唇化等语音特色,以便使人更容易从反切念出被切字的语音来。重组两类的唇音声母在越南音里有不同的反映,这也只有语音上的意义,对我们决定音位解释起不了关键作用。

北宋邵雍(1011—1077)所撰《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以“十声”与“十二音”的配合来表示当时标准音里存在的(以及可能存在的)所有音节。“声”大略相当于韵母,“音”大略相当于声母,都显示高度的归纳和系统化,很多地方符合现代音位论的思想。“音”分“开”、“发”、“收”、“闭”四个范畴,各自相当于一、二、三、四等,这是学者都能同意的见解。这里以“一音·清水”的四个字母为例,介绍平山久雄(1993)里的拟音,即:

开“古”、发“甲”、收“九”、闭“癸”各代表/k/、/kj/、/ki/、/kji/。若拿“三声·辟日·平声”的字母“千”代表的/an/(平声)说明“音”与“声”的配合,即:

“古千”当表示/kan/“干”;“甲千”当表示/kjan/“间”;“九千”

当表示/kian/“椌”；“癸千”当表示/kjian/“坚”。

若拟音没有错，这里一等和二等、三等和四等的关系，分别可以看做声母是否带腭化成分的对立。

南宋赵与时(1175—1232)所撰《宾退录》卷一介绍当时民间流行的射字法，是用两首七言诗，从中各选一字，用反切的方法把它们拼成一个字音的游戏。第一首“西希低之機诗资……”是字母诗，每个字代表一个声母，整首42字就算声母总表。第二首“罗家瓜篮斜凌伦……”是韵母诗，整首49字就算韵母总表。周祖谟(1966)对这两首诗里的字加以整理，各按中古的声母(三十六字母)、韵母排列成表。据此可知，字母诗中一个字照例配合一个声母，但有些声母有两个字与之配合，如並母有“皮”、“毗”，影母有“依”、“伊”，这些都限于唇牙喉音。刘文献(1973)认为这些重复的字代表重组的区别，如“皮”、“依”各代表重组三等，“毗”、“伊”各代表重组四等，只是当时韵母系统已有所变化，之、微与支、脂三等合并，都算重组三等，齐与支、脂四等合并，都算重组四等。那么射字诗的作者所采用的音韵分析中，重组就被看做是声母的对立了^{补注3}。

当然这些也不能保证把中古的重组解释为声母的对立是不误的，因为从中古到宋朝中间有过音系的变动，并且古人的分析也不一定最为妥善。不过这些材料暗示我们，这种音位解释似乎并未违背当时人的“土人感”。

四

4.1 作为语音的问题,重组的实际表现会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音位的语音随其所处的环境而能有相当宽的变异幅度;例如北京话的音位/ə/,单独成韵母(即拼音 e)时表现为[ɤ],在/əi/(即拼音 ei)中表现为[ə],在/iəu/、/iən/、/iəŋ/(即拼音 iu、in、ing)中其语音几乎被介音所吸收,但/iəu/里的/ə/在零声母第三、第四声下面又表现为[o]等等。因此,我们也不能把重组的语音看得太固定僵化了。

以下按通行的办法把重组四等称做 A 类,把重组三等称做 B 类,与重组无关的细音韵母称做 C 类,参看本文 § 2.5。

平山久雄(1977)把重组反切分成第一式和第二式两类:

第一式反切:不管被切字是 A 类还是 B 类,均用 C 类上字,如“卑,府移”、“彼,甫委”等,“卑”A 类,“彼”B 类,“府”、“甫”都是 C 类。

第二式反切:对 A 类被切字用 A 类上字,对 B 类被切字用 B 类上字,如“匕,卑履”、“陂,彼为”等,“匕”、“卑”A 类,“陂”、“彼”B 类。

此外有些滂母重组反切用 A 类上字“匹”,“匹”的用法与 C 类上字相同。

该文以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对象,对两式反切在各声调的分布情况做成统计表如下:

被切字	唇音							牙喉音(除匣母)			
	A			B				A		B	
式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一	第二
上字	C	A	匹	C	B	匹	其他	C	A	C	B
平声	15	3	1	17	3		2	29		52	2
	79%	16%	5%	77%	14%		9%	100%		96%	4%
上声	9	7	1	10	6	2	1	17	1	40	6
	53%	41%	6%	53%	32%	11%	5%	94%	6%	87%	13%
去声	2	15	6	2	15	1		20	5	34	11
	9%	65%	26%	11%	83%	6%		80%	20%	76%	24%
入声	6	5		3	7		1	13	3	19	9
	55%	45%		26%	64%		9%	81%	19%	68%	32%

匣母只在 B 类出现(即喻母三等),多数用第二式反切,即:

上字	被切字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C 类		4	1	1
B 类		3	3	5	3

就唇音来说,平声和去声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无论被切字是 A 类还是 B 类,在平声里第一式反切占多数,在去声里则第二式反切占多数。这可解释为:在《切韵》的基础方言里,唇音重组的语音表现以声调为条件而有不同。在平声,唇音重组各类的语音特征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在韵母上,因此造反切时只在反切下字上标出其语音特征就可以了,上字不必反映重组的类别。在去声,唇音重组各类的语音特征在韵母上表现得并不十分清楚,而在声母上表现得很明显,因此造反切的人就认为,除了用反切下字标出以外,也得用反切上字标出重组的类别,这样才能保证人们正确地

反切读出被切字的语音来。在上声和入声，第一式反切和第二式反切的比率大略在平声和去声的中间，这想必是由于唇音重组在语音上的表现也在两者中间的缘故。

牙喉音下面第一式反切无论平、上、去、入都占多数，这应该是因为牙喉音声母的发音部位随着带腭化与否就有前后的不同，致使它后面的介音能有比较稳定的音色区别。不过相对地说，第一式反切的比率最大的还是平声，最小的是去声以及入声（这一点和唇音不同），可见重组在韵母上的表现在平声最为明显。

去声的唇音重组在韵母上表现得比较模糊，这种倾向在真韵（支韵去声）里似乎走到了极端：宋跋本王韵真韵唇音 A 类有三个小韵，反切下字和 B 类小韵一样，都用疑母 B 类“义”字，只靠反切上字来作出区别，即：

	帮母	滂母	並母
A 类	臂，卑义	譬，匹义	避，婢义
B 类	贲，彼义	帔，披义	髮，皮义

这一事实应该反映出真韵 A 类韵母的语音十分接近 B 类韵母，几乎与 B 类韵母难以区别。有趣的是真韵唇音 A 类字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有 i, ei 两种反映，i 包括 A 类字和 B 类字，ei 基本上限于 B 类字，不过“臂”（帮母）、“避”、“婢”（並母）三个 A 类字作 ei，其中“臂”、“避”恰好是去声字，“婢”则是从上声按“浊上变去”的音变规律变入去声的。这在现代北京话的白话音里也留下了一点痕迹^①，即“胳膊”gēbei、“避雨”bèiyǔ。

① 参看平山久雄(1991b)。

4.2 平山久雄(1991a)把重组诸韵的介音分做[i]、[i]、[ɿ]、[ɿ]四个音值,用来说明反切下字声母的分布情况。对重组的音位解释还是采用声母腭化说。

该文以上田正(1975)拟测的《切韵》原本的反切为对象,调查重组诸韵里被切字声母跟下字声母的关系,做成了几种统计表。现把其中综合性的一张表(原文〈表4〉)转录在下面。表上的数字表示百分率,括弧内是反切的实际数目。虚线上边是第一式反切的数值,下边是第二式反切的数值。

下字 被切字	帮 A 组	见 A 组	章组	精组	知组	来组	庄组	帮 B 组	见 B 组	合计
帮 A 组	21(8) 25(7)	3(1) 11(3)	44(17) 29(8)	13(5) 7(2)		18(7) 18(5)			3(1) 7(2)	100(39) 100(28)
见 A 组	6(4) 10(1)	18(13) 30(3)	61(44) 30(3)	8(6) 20(2)	3(2)	4(3) 10(1)				100(72) 100(10)
帮 B 组			3(1) 4(1)			8(3) 8(2)		57(21) 35(9)	32(12) 46(12)	100(37) 100(26)
见 B 组			3(5) 6(2)	1(1) 6(2)	7(11) 3(1)	15(23) 15(5)		7(11) 18(6)	66(98) 52(17)	100(149) 100(33)
知组			36(38) 8(8)	8(8) 15(16)	15(16) 33(35)				8(8)	100(105)
来组		3(1)	44(17) 15(6)	15(6) 18(7)	18(7)				21(8)	100(39)
精组	1(2)	2(4)	41(69) 34(57)	34(57) 4(6)	4(6) 13(22)				4(7)	100(167)
庄组		2(1)	10(5) 2(1)	2(1) 6(3)	6(3) 24(12)	18(9)	2(1)	36(18)	100(50)	
章组		3(6)	73(167) 6(14)	6(14) 3(7)	3(7) 11(26)			4(8)	100(228)	

从表中可以看出,下字声母分布的情况因被切字声母范畴的不同而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式反切和第二式反切的情况可谓基本一样)。为了解释这些分布情况,可以给重组各韵的介音假定上述四个语音音值,而把它们和声母的关系拟测如下:

[i̯]([y̯]):牙喉音 A 类、正齿音三等、齿头音四等

[i]([y]):唇音 A 类、半舌音、舌上音

[ɪ]([ʏ]):牙喉音 B 类

[i̥]([y̥]):唇音 B 类、正齿音二等

括弧内是合口的音值。正齿音三等包括日母和羊母(喻母四等)在内。[i̯]、[y̯]表示比标准的[i]、[y]舌位更高,带轻微摩擦的音。[ɪ]、[ʏ]表示的音与本文 § 2.4 里所述相同。[i̥]、[y̥]是央高元音。上面四种音值其实是连续的,不是分散的,同一声组的介音要视环境的差异而有一定的变异幅度,例如牙喉音 A 类的介音表现为[i̯]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比较多数的情形,它可能有时候接近[i̥]。

在解释上表的反切下字声母的分布情况时,我们也考虑了《切韵》细音反切里选择下字声母的一般倾向,即:

- (1)多用与被切字属于同一声组的下字。
- (2)多用正齿音三等下字。
- (3)规避唇音下字。
- (4)规避正齿音二等下字。

上面拟测的是狭义的中古音,即《切韵》的基础方言里的情形。这种语音情况可能因方言而异,我认为唐代长安一带的方言大致如下:

[i̯]([y̯]):唇音 A 类、正齿音三等、齿头音四等

[i]([y]):牙喉音 A 类

[ɪ]([ʏ]):唇音 B 类、半舌音、舌上音

[i̥]([y̥]):牙喉音 B 类、正齿音二等

如此拟测的根据如下:

(1)朝鲜音里牙喉音 A 类字和 B 类字有区别, A 类字带有 i, B 类字则不带 i;唇音 A 类字和 B 类字没有区别, B 类字也带有 i。这种情况如果依据《切韵》的介音音值就不好解释。

(2)张守节《史记正义》〈论音例〉列举以“清浊”相对立的字组,当中“篇”、“偏”(仙韵滂母 A 类)和“穿”(仙韵合口昌母)形成一对,我认为这表示滂母 A 类的声母由于强度腭化的结果带有塞擦音的音色,近似昌母 $t\epsilon^h$ 了^①。

《广韵》卷末〈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极为纷乱,幸有唐兰(1948)一文从中把“轻清”、“重浊”成对的字组识别出来,使人可以窥见它本来的面貌,例如“平声上”第一行“轻清”是:

一“璫”二“珍”三“陈”四“椿”五“弘”六“龟”七“员”

与此成对的“重浊”该是:

二“真”三“辰”四“春”五“洪”

“珍”和“真”、“陈”和“辰”、“椿”和“春”是舌上音和正齿音三等的对比,“弘”和“洪”是登韵合口和东韵一等的对比。“轻清”之一“璫”、六“龟”、七“员”与“重浊”之一“之”、六“淳”、七“朱”各不成双,当是误脱的结果。

去声第一行“轻清”是:

一“魅”二“快”三“避”四“譬”五“臂”六“赴”七“惠”

与此成对的“重浊”该是:

一“味”二“崩”六“赋”七“卫”

我认为“轻清”之三“避”(真韵並母 A 类)与“重浊”之三

^① 参看平山久雄(1975)。

“瑞”(真韵合口常母)成对,“轻清”之五“臂”(真韵帮母 A 类)与“重浊”之四“志”(真韵章母)成对。去声第二行中我认为“轻清”之一“弊”(祭韵並母 A 类)与“重浊”之一“誓”(祭韵开口常母)成对^①。这也表示唇音 A 类的声母带着腭化塞擦音色彩,和正齿音三等相近。那么唇音 A 类的介音一定是舌位很高的,最好把它拟做[i]。

上面所介绍的个人看法,是尝试性的,恐有穿凿之处。但我认为重组作为语音现象,并不是很单纯的,可能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这一点应该说是肯定的。

五

日本对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可谓有其独特的历史,但由于地理、历史和语言上的原因,向来很少为海外学者所知。本文粗略描写了日本学者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对重组问题进行的探索,并介绍了我个人的粗浅看法。至于和中国及欧美学者的看法作比较,评论其间的同异和优劣得失,则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希望诸位同好自行参考。在这次研讨会纪念周法高教授逝世周年之际,我要表达个人的无限怀思。我曾于 1982 年有幸在东京亲自向周法高先生请益,以后周先生常赐书札,对音韵学上的问题,特别是对有关重组的问题,征求鄙见,如此直到晚年。周教授作为一代硕学不耻下问、终生追求真理的朴学精神,和那刚直坦率的风格,也将永远深

^① 参看平山久雄(1984)。

切地记在我这个域外后学的心中。

本文承林庆勋教授修改中文,并提宝贵意见,兹记感谢。

引用文献

- 刘 文 献 1973:《宾退录所载射字法里的字母诗》,《教师杂志》27,51—54 页。
- 陆 志 韦 1947:《古音说略》,《燕京学报专号之一》,北京。
- 1963:《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5,349—385 页。
- 唐 兰 1948:《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和“清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文学院第二种》,1—20 页;《均社论叢》15,1984 年,33—53 页。
- 周 法 高 1952:《三等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 上;《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1968 年,239—261 页。
- 周 祖 谟 1966:《射字法与音韵》,《问学集》(下册),中华书局,北京,663—669 页。
- 河野六郎 1937:《玉篇に現れたる反切の音韻的研究》,《河野六郎著作集 2 中国音韻学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 年,3—154 页。
- 1939:《朝鮮漢字音の一特質》,《言語研究》3;《河野六郎著作集 2 中国音韻学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 年,155—180 页。
- 1950:《中国語音韻学研究の一方——第一口蓋音化に関して》,《河野六郎著作集 2 中国音韻史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 年,227—232 页。
- 平山久雄 1966:《切韻における蒸職韻と之韻の音価》,《東洋学報》49. 1, 42—68 页。
- 1967:《中古漢語の音韻》,《中国文化叢書①言語》,大修館書店,東京,112—166 页。
- 1975:《〈史記正義・論音例〉の清濁について》,《東洋学報》56. 2—3—4,140—171 页。
- 1977:《中古音重紐の音声的表現と声調との関係》,《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3,左起 1—42 页。
- 1984:《故唐蘭教授〈論唐末以前韻學家所謂“輕重”和“清濁”〉に寄

せて》,《均社論叢》15,27—32頁。

1990:《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漢語研究》3,1—11頁。

1991a:《中古漢語における重紐韻介音の音価につい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4,左起1—41頁。

1991b:《中古唇音重紐在〈中原音韻〉齊微韻里的反映》,《中原音韻新論》,北京大学出版社,28—34頁。

1993:《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の音韻体系》,《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0,左起49—107頁。

1994:《用声母腭化因素*j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Current Trend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Osaka, 132—143頁。

橋本進吉 1927:《國語音聲史の研究(昭和二年度)》,《國語音韻史》(橋本進吉博士著作集第六冊,講義集一),岩波書店,東京,1966年,1—186頁。

灰谷寿信 1981:《前史——石塚龍麻呂から有坂秀世まで》,《中国語学》228,85—102頁。

三根谷徹 1953:《韻鏡の三四等について》,《言語研究》31,56—74頁;《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汲古書院,東京,1993年,45—62頁。

森博達 1981:《重紐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中国語学》228,109—118頁。

1983:《中古重紐韻舌齒音字の歸類》,《伊地智善繼、辻本春彦兩教授退官記念中国語学論集》,東方書店,東京;《古代の音韻と日本書紀の成立》,大修館書店,東京,315—330頁。

上田正 1957:《全本王仁昉切韻について》,《中国語学》69,7—8頁。

1975:《切韻諸本反切總覽》,均社單刊第一,均社,京都。

辻本春彦 1954:《いわゆる三等重紐の問題》,《中国語学研究会会報》24;《均社論叢》6,1978年,66—70頁。

松尾良樹 1974:《廣韻反切の類相關について》,《均社論叢》1,2—8頁。

藤堂明保 1954:《中国語の史的音韻論》,《日本中国学会報》6,左起1—24頁。

1957:《中国語音韻論》,江南書院,東京。

有坂秀世 1935:《万葉仮名雜考》,《國語研究》3.7;《國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

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557—561頁。

1936:《漢字の朝鮮音について》,《方言》6.4,6.5;《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303—326頁。

1937—1939:《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音声学協会会報》49,51,53,58;《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327—357頁。英译本:“A Critical Study on Karlgren's Medial -i Theory” translated by Rokuro Kono,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1, 1962年, 49—75頁。

1940a:《先秦音の研究と拗音的要素の問題》,《音声学協会会報》60—61;《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365—368頁。

1940b:《唇牙喉音四等に於ける合口性の弱化傾向について》,《音声学協会会報》62—63, 18—20頁;《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359—364頁。

1955:《上代音韻考》,三省堂,東京。

Chao, Y. R. (赵元任) 1941: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3—4, 203—233頁。

1997年

补注

1 切韵音系似乎在职韵牙喉音开口有C类与B类的对立。宋跋本王韵职韵开口影母有“忆、於力反”、“抑、於棘反”两个小韵,前一小韵当代表C类 ʔək ,后一小韵当代表B类 ʔek 。我曾在《切韻における蒸職韻開口牙喉音の音価》(《東洋學報》55. 2, 1972, 64—94頁)一文中作过讨论。

2 现在世界上不少学者采用的中古和上古汉语有r介音说似乎可上溯到藤堂先生。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参考著作选目)中列有藤堂明保的《中国语音韵论》一书。

3 参看将邑剑平、平山久雄《(宾退录)射字诗的音韵分析》(《中国语文》1999年4期, 295—303頁)。

中古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

齐微韵里的反映*

—

中古汉语的重组,即唇牙喉音声母之下三等字和四等字语音对立的现象,在后代的文献资料或方音中的反映并不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止摄等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里有所反映。藤堂明保(1957:187—188页)曾指出过这一点。藤堂先生说:在《中原音韵》的齐微韵里,中古止摄、蟹摄和臻摄入声的唇音三等字多作/-wəj/韵母,唇音四等字则多作/-jəj/韵母,例如“糜”(支韵明母三等)、“鄙”(旨韵帮母三等)分别是/mwəj/(平声阳)、/pwəj/(上声)，“弥”(支韵明母四等)、“比”(旨韵帮母四等)分别是/mjəj/(平声阳)、/pjəj/(上声),这反映着中古汉语重组的区别。但他同时承认,这条对应规律例外相当多,如“秘”(至韵帮母三等)是/pjəj/(去声)，“卑”(支韵帮母四等)是/pwəj/(平声

* 本文是向周德清诞辰7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江西高安)提交的论文。由平山久雄(1977)里的第六章〈止摄唇音重组の《中原音韻》への反映〉改写而成。

阴)等。

如上面的例字所示,这条对应规律的例外可分甲、乙两种:

甲种例外:三等字而作 $/-jəj/$ 。

乙种例外:四等字而作 $/-wəj/$ 。

二

2.1 因为齐微韵所收的中古止摄、蟹摄和臻摄入声唇音字中,止摄字占多数,所以我们先要观察止摄唇音字中甲、乙两种例外出现的情况。现把齐微韵里所有止摄唇音字按其拟测音值排列,做成下表^①。《中原音韵》的版本用的是服部四郎、藤堂明保(1958)所影印的铁琴铜剑楼本,音值则是赵荫棠(1936)第三章〈原著注音〉所拟,不过赵氏的 $-i$ (藤堂氏 $/-jəj/$)今写做 $-i$, $-ei$ (藤堂氏 $/-wəj/$)今写做 $-ei$ 。表中所载字后用小字注其中古音类,如“妣”字等后面注“脂上帮 A”以表示“脂部上声(即旨韵)帮母 A类”。中古重组四等叫 A类,重组三等叫 B类。字左上角记 \square 号的属甲种例外,记 \circ 号的属乙种例外,还有记 \times 号的是声母或声调不符合对应规律的字,例如“鼻”字作“去声作平声阳”不符合中古和《中原音韵》之间声调的对应规律。

^① 据平山久雄(1977)〈表五〉。

声调		韵母	-i	-ei
		声母		
平声阴	p-			碑跛支平帮B 悲脂平帮B ○卑支平帮A
	p ^h -		疵脂平旁A	披支平旁B 丕脂平旁B ×邳脂平並B
平声阳	p ^h -		脾支平並A 比毗脂平並A □疲支平並B ×□黑支平帮B	皮支平並B
	m-		弥泚支平明A	糜靡支平明B 眉湄楣媚麤脂平明B
去声作平声阳	p-		×鼻脂去並A	
上声	p-		妣比匕脂上帮A	彼支上帮B 鄙脂上帮B
	p ^h -			詬脂上旁B ×否×痞×圯脂上並B ×○秕脂上帮A
	m-		弭支上明A	美脂上明B
去声	p-		界庇脂去帮A 比脂去並A □贲支去帮B □秘脂去帮B 筓(枇)脂去並A	波支去帮B 髮支去並B 被支去並B 帔支去旁B 备脂去並B ○婢支上並A ○臂支去帮A ○避支去並A
	p ^h -			×譬脂去帮B
	m-			媚魅脂去明B ○寐脂去明A

2.2 表中甲种例外有4个字,即“疲”、“黑”、“贲”、“秘”。对这些字我们只能看做是所属语言层次不同。我们可以假定,以历时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至少是由两个层次构成的。一个为口语层次,在那里中古止摄唇音重组三等(B类)作-ei,唇音重组四等(A类)作-i;另一个为文言层次,这本来是从别的方言中借过来的,在那里中古止摄唇音重组三等字和四等字一样都作-i。属甲种例外的4个字都像是文言词或半文言词,口语

里不很常用,因此它们属于文言层次是比较自然的。

2.3 表中乙种例外共有 6 个字,即“卑”、“秕”、“婢”、“臂”、“避”、“寐”。其中对“卑”、“秕”、“寐”3 个字我们可以拟测它们的成因如下:

“卑”读 pei,很可能是忌讳改音的结果。它要是读 pi(阴平)的话就要犯忌讳,所以才读成了 pei。说得更严密一点,要是假定现在被忌讳的那个字眼来历很久,在中古时期已经存在,而且在中古和“卑”字同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后来为了回避和它同音,“卑”字从 A 类改读为 B 类,以后则按照止摄唇音 B 类字的演变规律,在《中原音韵》就读为 pei 了^①。关于忌讳改音的现象,请参看李荣(1965)第三章〈回避同音字〉。

“秕”读 p^hei,声母也是对应规律的例外,应该另有“本字”。《广韵》脂部上声(旨韵)滂母 B 类“匹鄙切”小韵有“秭”,与此音相合,当是本字。

“寐”读 mei,很可能来自 B 类的又读;在越南汉字音,止摄唇音 A 类字声母读做 t-,ny-,j-等舌音,B 类字则保持 p-,b-,m-等唇音,这两条规律极少例外,而“寐”在越南却读 mi。此亦表示“寐”曾有 B 类的又读,只不过中古的韵书没有收录它罢了。关于这一点,有坂秀世(1937-1939:343 页)已作过论述。

① 我们可以举一个与此完全平行的例子。日本所传古钞本《文选集注》卷五十六陆机《挽歌诗三首》第二首“妍姿永夷泯”里“泯”字注引《音决》云:“泯,避讳,亡巾反。又泯之去声。他皆放此。”按:《广韵》“泯”和“民”同音,属真韵明母 A 类,但《音决》注家的意思是为了避唐太宗讳,要临时读为“亡巾反”,即读为真韵明母 B 类。狩野充德(1976:432 页)指出了这一点。狩野氏认为,《音决》为 7 世纪后半叶长江下游一带文选学者集团里的一个成员所撰。

2.4 从乙种例外中除去上述 3 个字,剩下的“婢”、“臂”、“避” 3 个字恰好都属去声(包括《广韵》的上声全浊字后来变入去声的),而且都属支部(纸韵全浊和真韵)。3 个字为数虽不算多,但这些字都是代表比较常用的词语的,并且出现在一定的音韵条件之下,因此这些字作 -ei 应该意味着(作为止摄唇音 A 类字作 -i 这条规律的附则)一条局部的对应规律在起作用,即:

在《中原音韵》基础方言的口语层次里,中古的支部去声(包括上声全浊)唇音 A 类字和 B 类字一样为 -ei。

支部去声字的这个情况和平声字、上声字不同,也和脂部字不同。我们看看《切韵》,那里支部去声(真韵)唇音的重组反切有一种特殊情形,即被切字为 A 类的反切和被切字为 B 类的反切同样地用牙音疑母 B 类字“义”作反切下字,专靠反切上字来表示重组的类别,即如下所示(依《王三》)。

	帮母	滂母	並母	明母
被切字 A 类	臂,卑义	譬,匹义	避,婢义	
被切字 B 类	贲,彼义	披,披义	髮,皮义	靡,靡奇

被切字为 A 类的反切里面上字“卑”、“匹”、“婢”同属 A 类,被切字为 B 类的反切里面上字“彼”、“披”、“皮”、“靡”同属 B 类。我认为《中原音韵》里“一条局部的对应规律”应该是和《切韵》里这个特殊现象密切相关的。在《切韵》的阶段,支部去声 A 类字和 B 类字虽然保持区别,但 A 类字韵母的发音已变得几乎和 B 类字的韵母一样,只是在声母上 A 类字带有较强的腭化, B 类字则不带腭化(或只带较弱的腭化),所以切 A 类字的时候也用 B 类字“义”来代表其韵母,而拿 A 类字作上字来表示其声母带腭化^{补注 1}。在《切

韵》以后不很久，支部和脂部还保持区别的时期，支部去声唇音 A 类字因语音已和 B 类字接近（只靠声母的腭化来区别），竟变为 B 类。这样在《中原音韵》的口语层次中它们就和 B 类字一样变做 pei、p^hei 了。

三

蟹摄祭部唇音只有 A 类字，没有 B 类字。这些 A 类字出现在《中原音韵》齐微韵去声里，它们的音值如下：

“蔽”、“毙”：pi “弊”、“幣”：pei “袂”：mei

由此可知，5 字中有 3 字作 -ei，这和支部去声 A 类的情况相同，可惜祭部只有去声，无法推断它们作 -ei 究竟以去声为条件与否。虽然如此，祭部唇音 A 类的对应情况和齐部显然不同。齐部去声（包括上声全浊）唇音字在《中原音韵》作 -i，即：

“闭”、“嬖”、“陛”：pi “谜”：mi

虽然字数不多，但在这里很可能反映着中古祭部和齐部的不同。

四

臻摄入声质韵唇音 A、B 两类字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音值如下：

A 类 “必”、“毕”、“蹕”、“筓”：pi（入声作上声）

“匹”：p^hi（入声作上声）

“蜜”：mi（入声作去声）

B类 “笔”:pei (入声作上声)

“密”:mei (入声作去声)

正如藤堂先生说,这里也反映着中古重组的区别。

五

藤堂明保(1957:187页)说,中古唇音重组的区别在现代北京话里也有一些迹象。不过这说法只能适用于止摄。止摄唇音重组字在《中原音韵》齐微韵口语层次里的对应规律包括其“附则”(参看本文§2.4)在内,都可以适用于北京话,即止摄唇音重组字北京读-ei的除“卑”以及支部去声A类字“臂”、“避”的口语读法(在“胳膊”gēbei、“避雨”bèiyǔ中)以外都是B类字,不过B类字读-i的比《中原音韵》更多。换言之,我们在北京话里也能看到中古止摄唇音重组区别的迹象,只是不如《中原音韵》里那样清楚了^{补注2}。

如上所述,《中原音韵》齐微韵里反映着中古唇音重组的对立以及支部和脂部的区别,还可能反映着祭部和齐部的区别。虽然本文不打算去讨论这些反映的具体情况对构拟有关诸部的中古音值能提供什么样的线索,但我相信这些事实作为《中原音韵》在汉语音韵史上重要价值的一小部分,应该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

引用文献

李 荣 1965:《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2;《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107—118页。

赵 荫 棠 1936:《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上海,1956年重印。

- 服部四郎、藤堂明保 1958:《中原音韻の研究・校本篇》,江南書院,東京。
- 平山久雄 1977:《中古音重紐における音声的表現と声調との関係》,《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3,左起 1—42 頁。
- 狩野充徳 1976:《文選集注所引音決撰者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中国文学論集:小尾博士退休記念》,第一学習社,東京,427—457 頁。
- 藤堂明保 1957:《中国語音韻論》,江南書院,東京。
- 有坂秀世 1937—1939:《カー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音声学協会会報》49, 51, 53, 58;《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増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 年,327—357 頁。

1991 年

补 注

- 1 对这一段里所述反切上字的选择问题,拙文《重组问题在日本》(本书 25 页)解释得更详细一点。
- 2 蟹摄祭韵 A 类“袂”今北京读 mèi,也可算保留着《中原音韵》里的读音。

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 硬腭音韵尾

提要 关于中古汉语，部分学者提倡用唇化舌根音韵尾 $-w\eta, -wk$ 来代替通、江二摄的单纯舌根音韵尾 $-\eta, -k$ 。也有学者主张用硬腭音韵尾 $-n, -c$ 来代替梗摄的 $-\eta, -k$ 。本文介绍、评论这两种韵尾说，并据外国译音等材料讨论 $-n, -c$ 逐步从 $-\eta, -k$ 分化出来的过程和原因。

一 唇化舌根音韵尾说

1.1 有些日本学者为中古汉语拟测唇化(圆唇)舌根音韵尾 $/-w\eta/ /-wk/$ ，这源自赖惟勤(1953)提出的对上古汉语的同样看法。因此先要把赖氏有关上古汉语韵尾的观点介绍一下：

一般认为带舌根音韵尾的上古韵部比带其他韵尾的几乎多出一倍，例如带舌前音韵尾的有祭、元、微、文、脂、真六部，带舌根音韵尾的则有鱼、阳、之、蒸、佳、耕、侯、东、幽、中、宵，一共十一部。过去为侯部以下五部拟测圆唇的主要元音 $*u, *o$ 等，来对待这一不平衡状态。不过这个办法不很高明，因为这些圆唇元音只和舌根音韵尾 $*-g, *-k, *-ŋ$ 结合，这个办法是不自然的。如果给这些韵部假定一种带圆唇作用的舌根音韵尾 $*-gw, *-qw, *-nw$ ，上述几部

的音值就可改拟如〈表一〉(*a, *ə, *e 各代表音值相近的元音之类):

〈表一〉

	*-d *-t	*-n	*-g *-k	*-ŋ	*-ɣw *-qɣw	*-nw
*a	祭	元	鱼	阳	侯	东
*ə	微	文	之	蒸	幽	中
*e	脂	真	佳	耕	宵	

这样不但主要元音和韵尾的结合得到平衡,而且向来为侯部以下五部拟测圆唇元音的各种根据(如来自这些韵部的中古韵母多带圆唇元音)也可以从圆唇韵尾的同化作用得到解释。这些唇化舌根音韵尾可写做*-ɣw等,但其实际音值或许是*-gw等,或许是小舌音*-g等,不易确定;小舌音容易带圆唇,以便让发音部位尽量靠后。

以上是赖说的要点。我认为不妨把唇化舌根音韵尾记做*-wg等;当然其成阻部位很可能受唇化的影响而比单纯的舌根音韵尾*-g等靠后,位于后软腭到小舌的范围。

王力(1958)把上古的觉部(幽部入声)拟做*-əuk,把药部(宵部入声)拟做*-auk,但这似乎是复合元音*əu,*au加上韵尾*-k;Pulleyblank(1963)则沿着王氏的办法,拟*əw,*aw两种复合的主要元音,后面可以带上舌根音和喉音韵尾。虽然他们二位的着眼点和赖说有共同之处,但在系统化方面并无所获,因为这些复合元音仍然只和少数特定的韵尾结合^{补注1}。

李方桂(1971)除 *g, *k, *ng 外还假定了 *gw, *kw, *ngw, 用来把幽部拟做 *əgw, *əkʷ, 把宵部拟做 *agw, *akw。侯部与东部仍用主要元音 *u, 韵尾是单纯的 *g, *k, *ng。此书〈参考著作选目〉载有赖文, 李说很可能受其影响。李氏所以能采用此说, 当和他假定唇化舌根音声母 *kw-, *khw-, *gw-, *ngw- 等有关。我却认为这种声母和韵尾之间的对称关系并不是我们能采用唇化舌根音韵尾说的必要条件; 声母系统和韵尾系统各自能区别的发音部位不一定完全相同, 例如有些官话方言声母没有卷舌辅音, 韵尾却有卷舌的 -r, 像太原方言、成都方言^①。

后来 Pulleyblank(1977—1978)也采用唇化舌根音韵尾说, 为冬部、东部拟测韵尾 * -ŋw, 为幽部入声、侯部入声拟测韵尾 * -kw。

1.2 三根谷彻(1956)把这种看法应用到中古汉语上。中古汉语的江、觉韵^②, 高本汉把它拟为 ɔŋ/k^③。在高氏的拟音中 ɔ 只在江、觉韵里出现, 它的地位是孤立的。三根谷氏在赖说、Forrest(1948)^④以及越南语南部(西贡)方言^⑤的启发之下, 把江、觉韵拟做 /auŋ//auk/; 这样不但能拯救江、觉韵的孤立, 也可以把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解释成比较整齐紧凑的格局了。Pulleyblank

① 据《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中〈方音音系简介〉, 这两个方言没有卷舌声母, 但有韵母 ɔ, ɔ 可解释为 /ɔr/。

② 本文列举平声韵目以赅相配的上、去声韵。入声韵目以顿号隔开, 附于平声韵目后。

③ 入声韵母的音值只记韵尾, 以 / 号隔开, 附于舒声音值之后。

④ 该书 153—155 页把江、觉韵的语音音值拟为 auŋ/k。

⑤ 西贡有 /-ŋ// -k/ 和 /-ŋm// -kp/ 的对立, 如韵母 on/ɔŋ/ : ong/ɔŋm/。参看三根谷彻(1956:73 页)。

(1984)对他的早期中古汉语(Early Middle Chinese, 即《切韵》音系)和晚期中古汉语(Late Middle Chinese, 即唐末等韵图的音系)都假定 $-w\eta, -wk$, 这是韵尾 $-w$ 和 $-\eta, -k$ 的结合体, 分布在通、江两摄, 与三根谷氏的看法相近。

我在讨论中古音的几篇文章里一向遵用三根谷氏的音位解释, 只作了几点修改。关于唇化舌根音韵尾, 我就把它写做 $/-w\eta/$ $/-wk/$; 这里的 w 不过表示唇化的区别特征, 并不是独立的音位。现按我的音位音值^①(phonemic reconstructed value)把中古汉语里带唇化与非唇化两种舌根音韵尾的韵母排列成〈表二〉, 并附上其语音音值^②(phonetic reconstructed value), 作为本文讨论的基础:

〈表二〉

开口	合口	齐齿	撮口
/ɬŋ/[ɬŋ]登(德)	/uɬŋ/[uɬŋ]登(德)	/iɬŋ/[iɬŋ]蒸(职)	
/ɬwŋ/[ɬwŋ]东(屋)		/iɬwŋ/[iɬwŋ]东(屋)	
/aŋ/[aŋ]唐(铎)	/uaŋ/[uaŋ]唐(铎)	/iaŋ/[iaŋ]阳(药)	/iuaŋ/[yaŋ]阳(药)
/awŋ/[oŋ]冬(沃)		/iawŋ/[ioŋ]钟(烛)	
/aŋ/[aŋ]庚(陌)	/uaŋ/[uaŋ]庚(陌)	/iaŋ/[iaŋ]庚(陌) [ieŋ]清(昔)	/iuaŋ/[yaŋ]庚(陌) [yeŋ]清(昔)
/awŋ/[auŋ]江(觉)			
/eŋ/[eŋ]耕(麦)	/ueŋ/[ueŋ]耕(麦)		
/eŋ/[eŋ]青(锡)	/ueŋ/[ueŋ]青(锡)	/ieŋ/[iɛŋ]蒸(职)	/iuek/[yɛk]职

① 据平山久雄(1967:156—157页)。原文韵尾 $/-w\eta/$ 写做 $/-u\eta/$ 。

② 据平山久雄(1967:146—148页)所记, 加以部分修改。

对〈表二〉中的音值要作几点说明：

(一) 表上只记舒声(平、上、去声)的音值，入声可由此类推。

(二) 庚、陌韵三等和清、昔韵都是/iaŋ//iak/、/iuaŋ//iuak/，但两者实际上并不冲突：庚、陌韵三等没有舌齿音，唇音和牙喉音属于重组 B 类，语音音值当为 [iaŋ/k][yaŋ/k]；清、昔韵则有舌齿音，唇音和牙喉音属于重组 A 类，语音音值当为 [ieŋ/k][yeŋ/k]。顺便要说明的是：我们把重组看做是声母带否腭化因素/j/的对立^①，如支韵“奇”(三等即 B 类)/gie^ʔ/、“祇”(四等即 A 类)/gjie^ʔ/，又如庚韵三等“卿”/k^hiaŋ^ʔ/、清韵“轻”/k^hjian^ʔ/。

(三) 蒸、职韵开口有 /iΛŋ//iΛk/、/ieŋ//iek/ 两种音值，前者出现在牙喉音、舌齿音(正齿音二等除外)，后者则出现在唇音和正齿音二等，两者几乎形成互补关系，只在影母下有对立，即“忆”/ʔiΛk/、“抑”/ʔiek/。蒸韵无合口，职韵仅喉音有合口，即/iuek/^②。

(四) 介音/i//iu/的语音表现[i][y]是牙喉音(有重组时是 B 类)以及正齿音二等下面的，舌齿音(正齿音二等除外)以及重组 A 类下面得把介音的音值改写成[i][y]。

1.3 对东、屋韵的韵尾是 /-wŋ// -wk/ 的拟测，敦煌《毛诗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材料。

敦煌发现的《毛诗音》S. 2729、S. 3383 两种残卷里东、屋韵三

① 据三根谷彻(1953)。这里说的是音位层次。在语音层次，重组两类的区别在声母、介音以及主要元音上面都能有相应的表现。

② 关于中古汉语蒸、职韵的拟音，参看平山久雄(1972)。《刊谬补缺切韵》职韵有“忆，於力反”与“抑，於棘反”的对立。

等的反切一般用开口的上字,例如“蠡,支崧”(S. 2729:11 行)、“鞠,己六”(S. 2729:18 行)等。《毛诗音》里上字的开合照例和被切字一致:被切字开口,上字也是开口;被切字合口,上字也是合口^①。这“开合一致原则”的实际作用当是:合口字的声母自然带有唇化,开口字的声母则不带唇化,因而造反切时有意把上字的声母选得和被切字同样地带或不带唇化,那么念反切时就会很顺口。敦煌《毛诗音》里东、屋韵三等的反切照例用开口上字,这就意味着东、屋韵三等字的声母没带唇化,那么与其给它拟圆唇的主要元音,不如拟唇化韵尾 /-wŋ// -wk/ 来说明这一点更合适:韵尾的圆唇性多少使主要元音带上圆唇,但介音 /i/ 会阻挡圆唇作用影响到声母上。东、屋韵一等则照例用合口的上字,这是因为一等没有介音 /i/, 韵尾的圆唇作用能一直传到声母上面。

二 硬腭音韵尾说

2.1 也有学者为中古汉语假定两类舌根音韵尾,但这不是 -ŋ, -k 与 -wŋ, -wk, 而是 -ŋ, -k 与 -ŋ̄, -k̄ 的对立。赖惟勤(1956)认为:上古汉语的 *-nw 与 *-ŋ 在中古变为 -ŋ 与 -ŋ̄(入声仿此), -ŋ 出现在通摄、江摄和宕摄, -ŋ̄ 则出现在梗摄和曾摄;这两组韵摄连主要元音也不同,只有江韵和庚韵二等主要元音都一样是 a, 单靠韵尾来对立;虽然为此而增加一个韵尾 -ŋ̄ 和增加一个元音 o 相比,好像没有什么得失,但假定 -ŋ̄ 就更容易说明有些现代

① 关于敦煌《毛诗音》及其反切的结构特点,参看平山久雄(1990)。

方言里梗、曾二摄的韵尾都变成了 -n, 和臻摄没有区别。关于 -ŋ 的实际音值, 赖文没有说明, 大概可理解为从软腭最前部至硬腭的鼻塞音。

河野六郎(1964—1967)也假定中古汉语除了 -ng, -k 以外还有 -ng', -k', 说明这是 palatal 即硬腭音。两类韵尾出现的范围也和赖说相同, 也只在江、觉韵 ang, ak 和庚、陌韵二等 ang', ak' 之间形成最小对立。

Hashimoto(1978^①:182—222 页)在 -ŋ, -k 之外还拟测硬腭音韵尾(palatal endings) -ɲ, -c, 让它们和声母 ɲ- (日母) 配对。它出现的范围只限于梗摄, 曾摄则归属于 -ŋ, -k 一边。这是根据越南译音的情况设想的, 那里只有梗摄字带有硬腭塞音韵尾 -ɲ, -c (即 -ɲ, -t̚)。他还用日本汉音、朝鲜译音、汉藏对音等材料, 来试图证实这一看法。

Pulleyblank(1984)对他的早期中古汉语与晚期中古汉语都假定韵尾 -jŋ, -jk, 它们是韵尾 -j 和 -ŋ, -k 的结合体, 也只出现在梗摄诸韵。

2.2 我认为上述诸家假定 -ɲ, -c (或 -ŋ', -k'; -jŋ, -jk 等) 的根据, 即梗摄(与曾摄)的韵尾在各种资料中所表现出来的硬腭性质, 是可以作为唐代逐渐进行的语音演变的结果来作出解释的, 这样对某些材料(如越南音和日本汉音)互相参差的地方也能解释得更好一些。对于狭义的中古汉语(即《切韵》音系)则假定有 /-ŋ/ /-k/ 与 /-wŋ/ /-wk/ 两套音位就会足够的。

① 为 1965 年提出的博士论文。

三 梗摄和曾摄的舌根音韵尾发展为 硬腭音韵尾的过程

3.1 如上所述,对于狭义的中古汉语,并且就音位层次来讲,我不赞同拟测硬腭音韵尾的看法,但到唐代某一时期以后,我认为假定硬腭音韵尾 $/-\eta/$ 或 $/-c/$ 是很合适,而且是必要的。不过作为语音的问题来讲, $/-\eta/$ 或 $/-k/$ 的发音部位好像在某些比较局限的条件下很早就开始前移,进而又扩大了前移的范围和程度,终于发展成独立的韵尾 $/-\eta/$ 或 $/-c/$ 了。我们可以从外国译音以及诗文韵部分合的情况,来追踪这一发展过程。

下面〈表三〉是有关外国译音的对照表,即对通摄、江摄、宕摄、梗摄和曾摄,列出了其所属韵母的译音。

对此表的内容,先作如下几项说明:

(一) 日本吴音和汉音的形式是我从 Numoto (1993) 中《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和音分韵表》(吴音)、《长承本蒙求分韵表》(汉音)所载单字音归纳出来的^①。将原文的片假名和表音用的汉字转写成罗马字(如“火”表示 kwa), y 表示半元音[j]。在《类聚名义抄》的字音中, u 表示汉语的韵尾 $-\eta$ 时往往在旁边加 ν 号来注明鼻音,今把这种 u 转写为 $\bar{u}^{\text{补注}2}$ 。

① 现行日本字典所记吴音、汉音往往是经过近代日本学者按韵学理论修订的。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要用古代典籍的抄本上用假名所注的字音。这种资料中, Numoto (1993) 所依据的两种分别都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前者有仁治二年(1241年)跋文,后者则加注于长承三年(1134年)。

(二) 朝鲜译音采用河野六郎(1964—1967:498—503页)所载韵母对应表里 b 层(即朝鲜译音的主要层次)的对应形式。e 是朝鲜文·, u 是朝鲜文—。下文所引单字的朝鲜音则采自该书所附字音表。入声只记收音, 它可加在舒声的元音后面, 如庚韵二等 eiŋ 里的 ei 加 k 即得 eik。该对照表把梗摄庚、陌韵三等开口 yœŋ/k 列为 c 层(b 层是空格), 今订为 b 层。该表也把曾摄一等登、德韵 b 层的形式定为 eiŋ/k, eŋ/k, 但字表上合乎这两种对应形式的字极少, 今将占多数的 uŋ/k(原属 d 层)看做 b 层的对应形式^①。为了统一写法, 原文的 -ng 改写为 -ŋ。y 表示半元音 [j]。

(三) 越南译音采用王力(1948)第五章《汉越语的韵母》所记各韵对应形式的语音标记。入声只记收音。

(四) 宕、梗、曾摄各韵只记开口的对应形式。这些韵里合口形式或是与开口没有区别, 或是与开口平行(例如唐韵合口日本汉音是 uau, 和开口 au 平行)。因此, 观察韵尾的对应规律可把合口形式略去。

(五) 属于同一韵的字以声母为条件而有不同反映时, 则录牙喉音(喻母四等除外)下面的形式。例如钟韵的日本汉音唇音是 ou(如“封”hou), 舌齿音和喻母四等是 iyou(如“从”shiyou), 这里就采录牙喉音的形式 uwiyou(如“恭”kuwiyou)。牙喉音下面如果出现两种形式, 则选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 参看下面 § 3.2 开头所举梗摄二等入声吴音的情况。

^① 河野氏认为 b 层反映的是和《慧琳音义》同时代的唐代长安音, a 层比此更早, d 层则反映古官话阶段, c 层在 b 层与 d 层之间。

〈表三〉

摄	等	韵	日本吴音		日本汉音		朝鲜音	越南音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通	一	东屋 冬沃	uū	oku	ou	oku	oŋ/k	oŋ/k
	三	东屋	uū	iku	iu	iku	uŋ/k	uŋ/k
		钟烛	uū	oku	uwiyou	uwiyouku	oŋ/k	uŋ/k
江	二	江觉	aū	aku	au	aku	aŋ/k	aŋ/k
宕	一	唐铎	aū	aku	au	aku	aŋ/k	aŋ/k
	三	阳药	aū	yaku	iyau	iyaku	aŋ/k	uəŋ/k
梗	二	庚陌 耕麦	iyaū	iyaku	au	aku	ɐiŋ/k	aŋ/ɬ
	三	庚陌	iyaū	iyaku	ei	eki	yəŋ/k	iŋ/ɬ
	四	清昔	iyaū	iyaku	ei	eki	yəŋ/k	iŋ/ɬ
	‘四’	青锡	iyaū	iyaku	ei	eki	yəŋ/k	iŋ/ɬ
曾	一	登德	oū	oku	ou	oku	uŋ/k	əŋ/k
	三	蒸职	oū	oku	iyou	iyoku	uŋ/k	əŋ/k

3.2 从上表看，/-ŋ// -k/ 发音部位前移的倾向在日本吴音^①的基础汉语方言中似未产生。吴音把梗摄二等开口译做 *iyaū*、*iyaku*，如“更”*kiyaū*、“行”*giyaū*、“猛”*miyaū*、“客”*kiyaku*、“百”*hiyaku*，即译成带 *iy* 的细音（少数入声字不带 *iy*，如“额”*gaku*、“迫”*haku*），我看这未必反映出 /-ŋ// -k/ 的前移。吴音把二等主要元音一般译做 *e*，如“家”（麻韵）*ke*、“解”（佳韵）*ge*、“间”（山韵）*ken*，“交”（肴韵）*keu*、“减”（咸韵）*gemu*，这意味着在吴音的基础方言中二等元音有些变窄，近乎 [e]，但在梗摄里韵尾 /-ŋ// -k/ 控制了元音窄化，只变到 [æ]，日本人就把它听成 *ya*

① 吴音基于8世纪初以前传到日本来的汉语字音，其来历尚不明确。本来称做“和音”，稍后才有“吴音”的名称，因此其基础是否吴地之音，还有待研究。

(前面再加 i 不过是假名拼法上的方便), 遂与梗摄三、四等没有区别。由此可见, 梗摄二等的韵尾 /-ŋ/-k/ 还保持着比较明显的后舌性质。

吴音把“外转系”三、四等诸韵一般译做带 e 的音节, 如“面”(仙韵)men、“设”(薛韵)sechi、“天”(宵韵)eu、“阎”(盐韵)emu 等, 只有蟹摄三、四等 ei、ai 相杂, 如齐韵“迷”mei、“米”mai。梗摄三、四等则常带着 a, 如“兵”(庚韵)hiyaū、“名”(清韵)miyaū、“形”(青韵)kiyaū、“逆”(陌韵)giyaku、“益”(昔韵)yaku、“历”(锡韵)riyaku。这就表明, “外转系”三、四等主要元音一般近乎[ε], 在梗摄则近乎[æ], 由此亦可见 /-ŋ/-k/ 的发音部位还比较靠后。

曾摄三等入声职韵牙喉音的吴音是 oku, 如“蕨”koku、“极”goku, 但舌齿音多数是 iki, 如“食”ziki、“色”shiki、“力”riki。这是因为职韵的介音 i 在舌齿音下面吸收了主要元音[ə], 给韵尾 /-k/ 的语音表现添上了腭化色彩。这应该是因为入声是短音的缘故; 参看蒸韵舌齿音吴音是 iyoū, 如“证”shiyōū、“承”ziyoū, 看不出 /-ŋ/ 语音的腭化。

3.3 按音理来讲, /-ŋ/-k/ 的发音部位应该是受前舌主要元音的同化而开始前移的, 前舌元音越是偏窄, 就越容易使 /-ŋ/-k/ 的语音前移。这么想来, 青、锡韵 /eŋ/ek/ 的韵尾应该最先开始前移了。恰好六朝齐梁陈隋时期青韵独用的趋势符合这一推测。据周祖谟(1982), 齐梁陈隋的韵文里带 /a/ 的三等韵一般和带 /e/ 的‘四’等韵^①通押, 构成一个韵部, 即仙先、盐添、祭齐、宵萧、

① 韵图上只出现在四等的诸韵, 记做‘四’等韵。

菓怙、薛屑都是不分的。只有梗摄‘四’等青韵，独用的趋势比较明显，与三等庚韵和清韵相押较少。入声‘四’等锡韵的情形也有相似的地方。这可理解为：庚、陌韵和清、昔韵的主要元音 /a/ 都仍是 [æ]，青、锡韵的主要元音是 [ɛ]，两者差别较大，不好押韵。其他韵摄的三等和‘四’等，主要元音都近似 [ɛ]，主要靠介音的有无来区别，因而可以自由通押。当时庚、陌韵和清、昔韵的 /a/ 仍是 [æ]，这当与 /-ŋ// -k/ 仍有较明显的后舌性有关。不过 /-ŋ// -k/ 已不能对偏窄的 /e/ 发生作用了。青、锡韵韵尾的发音部位可能已被挪到硬腭而成 [-ŋ] [-c] 了。

按照我们对中古音的音位解释，庚、陌韵三等和清、昔韵都是 /iaŋ//iak/，两者的分界是在声母上，如前所述。这似乎表明了 /-ŋ// -k/ 前移的范围到了《切韵》音系就稍微扩大了一些：/iaŋ//iak/ 在重组四等和舌齿音之下已从 [iæŋ/k] 变为 [iɛŋ/c]，而重组三等和庄组之下仍保持 [iæŋ/k] 未变，因而《切韵》的编者根据“赏知音”的观点让它们分属为两韵。

3.4 日本汉音^①把梗摄三、四等庚、陌韵和清、昔韵以及青、锡韵都译做 ei, eki, 这就表明在汉音所反映的唐代中期北方音里，这三套韵母的韵尾多少已带上了硬腭色彩，因此用 -i、-ki 来摹拟。当时这些韵的音值大略可拟为：庚、陌韵三等 [iɛŋ/c]，清、昔韵 [iɛŋ/c]，青、锡韵 [ɛŋ/c]（合口仿此）；可见庚、陌韵三等的主要元音也受介音的同化而变窄。这些韵的主要元音都是 [ɛ]，韵

^① 汉音是8、9世纪从中国长安、洛阳一带学过来的字音，当时称做“正音”，后来也叫“汉音”。

尾/-ŋ// -k/的语音受其同化而偏前了。这也意味着/-ŋ// -k/已不再积极地主张它们的后舌性,而顺从元音的舌位可作硬腭音出现了。

日本汉音把梗摄二等译做 au, aku。这就表示梗摄二等仍是 [aŋ][ak], 因其主要元音较宽, 韵尾的语音就不十分靠前, 可用 -u, -ku 来摹拟。

3.5 朝鲜译音反映出/-ŋ// -k/ 的腭化比日本汉音的基础音系更进一步发展, 已形成新的韵尾为/-ɲ// -c/的阶段。朝鲜译音把梗摄二等庚、陌韵和耕、麦韵(此二组当时当已无别)译做 ɐiŋ/k^①。这可解释为: 庚韵二等的韵尾已越过主要元音/a/的舌位所能同化的范围(大约到硬腭后部)而更靠前, 硬腭性就成为它固有的特征, 于是它已变成 /-ɲ// -c/ 了^②。/-ɲ// -c/ 的舌位和元音 [i] 相近, 成阻阶段就容易带上类似 [i] 的过渡音。

二等庚、陌韵和耕、麦韵的合口是 oiŋ, oik, 也反映着韵尾已变成 /-ɲ// -c/的情况。

三等庚、陌韵和三四等清、昔韵以及‘四’等青、锡韵开合口^③都译做 yəŋ, yək, 这里的 ə 当表示近似 [ɛ] 的元音, 因为 ə 通常表示汉语的 ä(即 [ɛ])(河野六郎 1964—1967:510 页), 例如:

① 朝鲜语 ɐ 的古代音值如何是一个问题, 不属本文所能讨论的范围。不过从朝鲜音把止摄开口齿头音译做 ɐ 的事实来看, 它似乎也能表示一种 [ə] 音, 那么 ɐiŋ/k 里的 ɐ 所摹拟的可能也是比 [ɛ] 偏窄的元音。

② 我们对音位的基本看法是: 如果有两种语音, 分布上形成互补关系, 并且从构音方面能说明有一种音由于环境不同而被同化为两种, 那么它们就可以解释为一个音位的两种语音变体; 否则尽管有互补关系, 也应看做是两个不同的音位。

③ 陌韵三等合口字极少, 找不到例字。

“魁”(祭韵三等开口)kəi,“艺”(祭韵四等开口)yəi,“乾”(仙韵三等开口)kən,“遣”(仙韵四等开口)kyən,“卷”(仙韵三等合口)kwən,“绢”(仙韵四等合口)kyən,“占”(盐韵)cyəm,“检”(盐韵三等)kəm。

yəŋ 代表的汉语语音当是 [iɛŋ][iɛɲ][yɛŋ][yɛɲ] 等韵母。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由上例可知，在 ə 前面牙喉音三等开口一般不加 y，合口则加 w，四等开合口才都加 y。庚、陌韵三等 ə 前开合口却都加 y，这情况和四等相同，如“京”kyəŋ(开口)，“逆”yək(开口)，“兄”hyəŋ,“永”yəŋ(合口)。这可解释为：由于韵尾 /-ŋ/ /-c/ 的影响，梗摄三、四等的 [ɛ] 比其他韵摄的 [ɛ] 偏窄，使介音 [i][y] 也随着偏前，接近四等的 [i][y] 了。

朝鲜译音多把曾摄一等登、德韵开口译做 uŋ/k，例如：

“肯”kuŋ,“灯”tuŋ,“僧”suŋ,“朋”puŋ,“黑”huuk,“得”tuuk,“则”cuuk,“墨”muuk。

朝鲜译音里 u 一般用在主要元音较窄的(即内转系)牙喉音开口三等，例如：

“羁”kui(支韵)，“喜”hui(之韵)，“祈”kui(微韵)；“银”wun(真韵)，“斤”kun(欣韵)，“乙”ur(质韵)，“訖”kuw(迄韵)；“金”kuw(侵韵)，“吸”huw(缉韵)；“兴”huŋ(蒸韵)，“极”kuw(职韵)^①。

① 此外 u 用在一等开口痕、没韵，例如“根”kun,“斡”hur(痕韵 un, en 相间)，此 un 可能是摹拟近乎 [ɪn] 的汉语语音，主要元音 ə 受韵尾 -n 的影响而偏前偏窄了。汉藏对音资料常把“根”译做 kin(罗常培 1933:54 页，高田时雄 1988:376-377 页)，可供参考。

河野六郎(1964—1967:510—512页)据此认为 ω 在古代朝鲜语可能是近似[e]的元音。我认为它甚至可能是近似[ɪ]的元音,如此就更容易理解上述开口三等的对音情况了。那么在朝鲜译音的基础汉语音系中,登、德韵的主要元音就是偏前的近似[e][ɪ]的元音,这只能解释为受到韵尾同化的影响,所以其韵尾已变为/-ɲ// -c/了。此项变化的原因应该是:中古登、德韵[əŋ/k]里的[-ŋ][-k]本来没有像唐、铎韵[ɑŋ/k]里那样靠后,因此比较容易向梗摄看齐而变为/-ɲ// -c/。曾摄三等蒸、职韵的韵尾也应该是同样的。登韵开口从中古到这一阶段的演变途径大略可拟为(德韵开口仿此):

[əŋ] > [əɲ] > [ə^hɲ] > [eɲ] (或 [ɪɲ])

登韵合口字为数不多,oiŋ, uŋ 不定,如“肱”koŋ, “弘”hoŋ, “蕤”huŋ。德韵合口字更少,只有“国”kuk, “或”、“惑”hok。其中oiŋ 当代表韵尾变做 /-ɲ/ 的阶段^{补注3}。

3.6 日本“新汉音”(也叫“天台汉音”)反映出梗摄和部分曾摄的韵尾已变为/-ɲ// -c/的情形。在日本佛教天台宗里传下来的《法华忏法》与《例时作法》,相传是圆仁(慈觉大师,838—847入唐)传回日本的,诵读时用一种特殊的读音,与一般通行的汉音有所不同。此外天台宗、真言宗^①里传授的《金刚界私记》与《胎藏界私记》所注也是同样的读音。饭田利行(1955)给这种特殊的汉音起名为“新汉音”,并把这些资料^②中的注音按汉语的声、韵母整

① 日本天台宗的开祖是最澄(804—805年入唐),真言宗的开祖是空海(804—806年入唐)。

② 《法华忏法》、《例时作法》据昭和十三年(1938年)编纂的本子,《金刚界私记》、《胎藏界私记》据文政四年(1821年)刊本。

理出来。虽然字数不多,但梗、曾两摄的情况却足以使人产生兴趣(录自饭田利行 1955:178—179 页、188—189 页):

梗摄二等庚、耕韵、陌麦韵:“行”kei,“猛”bai,“白”hai, haki,
“百”haki

三等庚、陌韵:“明”bei,“惊”kei,“命”bei,“竟”kei;“逆”geki

三等清、昔韵:“名”bei,“情”sei,“净”sei;“释”se^①,seki

‘四’等青、锡韵:“令”ri,“顶”tei

曾摄一等登、德韵:“僧”shi;“国”kuweki,“或”kuweki,“惑”
kuweki, keki

三等蒸、职韵:“证”shi,“胜”shi,“乘”shi,“应”i;“极”ki,“即”
seki,“色”seki,“食”shiki,shi,“亿”niku,iku,itsu,
“忆”iku,“臆”iku

奥村三雄(1956)收录《例时作法》、《法华忏法》文龟二年(1502年)本所记的字音,也算新汉音,其特色基本和饭田氏所录相同,不过字数稍多;曾摄一等登、德韵开口饭田书中只有“僧”shi一字,此则有“恒”kou,“等”tou,“增”sou;“黑”koku,“德”toku,“则”soku等几字,都译做ou,oku。合口只有两个人声字,即“惑”kuweki,keki,“国”kuweki,keki,与饭田氏所录相同^{补注4}。

梗摄的韵尾舒声用-i,入声用-ki,这里就反映着韵尾的腭

① 龟井孝(1993:1613页)介绍日本天台宗里“释迦”念 seikya 的特殊读法(已见于12世纪的《悉昙要诀》),认为“释”读 sei 很可能是 seki 受到日语口语中所发生的 -ki>-i 音变(例如 kakite>kaite“写”)的结果。那么此“释”se 可能反映 sei 再讹做 see(假名只写做 se)的形式。向来日本学者珍视新汉音“白”读 hai,以为是现代北方音 bái 的嚆矢,但龟井氏认为这恐怕也是同样的例子(即 haki>hai)。下文“极”读 ki 可能也反映 kiki>kii(假名只写做 ki)的音变。

化。“行”读 kei 表示梗摄二等的主要元音在 /-ɲ// -c/ 的影响下变成了 [ɛ]，但这似乎只限于在牙喉音之下。曾摄一等合口入声（舒声无例字）的元音作 e，韵尾作 -ki，反映了其韵尾已变做 /-c/，遂使主要元音偏前的情形。曾摄一等开口仍然译做 ou, oku，表示其韵尾仍是 /-ŋ// -k/。为什么只有合口变 /-ɲ// -c/，开口未变？这可解释为：曾摄一等登、德韵合口 /uΛŋ// uΛk/ 和通摄一等东、屋韵 /Λwŋ// Λwk/ 在语音上应该是相近的，都近似 [oŋ/k]，容易混同；为了明确两种韵母的区别，人们就逐渐把登、德韵合口的韵尾读得靠前，终于使它变成了 /-ɲ// -c/。登、德韵开口没有这种条件，因而韵尾可以不前移。饭田氏的材料中“僧”读 shi，虽然是孤例，但也能引人注意，因为它似乎表示曾摄一等开口也有 /-ɲ// -c/ 的读法，主要元音 /Λ/ 的语音受 /-ɲ// -c/ 的同化而偏前偏窄，接近 [ɪ]，如同朝鲜译音以及下一节所述汉藏对音里那样^①。这里也许就透露了更“俗”的一种读法。

曾摄三等韵尾的情况难以推断，可能已变做 /-ɲ// -c/，但影母下面多译做 -ku（奥村氏的材料亦同），这就使我们难下结论。

3.7 敦煌发现的汉藏对音资料中也能看到与朝鲜译音、日本新汉音相类的情况，即梗摄二等主要元音译做 e，曾摄一等主要元音译做 i 等，参看罗常培（1933：56 页、64 页）、高田时雄（1988：166—168 页、396—411 页）。不过这些资料反映的是西北方音，若以此而论标准音，则不太合适。幸亏还有 823 年建

^① 饭田利行（1955：128 页）早注意到“僧”字的新汉音形式和汉藏对音、朝鲜译音近似。

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碑上记载唐朝与吐蕃之间盟约的内容，并用藏文记录唐朝的官名和人名，这应该是基于当时的标准音，尽管或许也难免带点方音特色^①。事实上，该碑所载泰韵开口写做 a'i, a'e，豪韵写做 a'u，鱼韵一律写做 u，这些不同于敦煌对音资料的一般情形。据罗常培(1933:185-186页)、高田时雄(1988:396-411页)可知，唐蕃会盟碑也把梗摄二、三、四等的元音写做 e，把曾摄一、三等的元音写做 i。现据高田时雄(1988)，将所有的对音实例抄录如下(圆括弧内是出现的次数，方括弧表示模糊不清)：

梗摄二等：“柵”cheg

三等(庚陌韵)：“兵”peng，“京”keng(3)，“景”keng，“卿”keng，“庆”keng(3)

三等(清昔韵)：“贞”ceng，“清”tseng，“正”jeng(3)，“圣”shing, sheng, zheng，“成”sheng，“城”shing，“颖”ywang

‘四’等：“鼎”teng，“青”tsheng(3)

曾摄一等：“僧”sing；“德”tig“得”ti□

三等：“丞”shing, shing，“陵”ling

虽然字数不多，但9世纪初叶长安一带梗、曾两摄语音面貌之一斑由此可见。至于和日本新汉音不相合的地方，则可假定为新汉音代表当时佛教寺院里通行的较为保守的读音。唐蕃会盟碑的对音里鱼韵字译做-u，这意味着鱼韵已并到虞韵里，而新汉音仍有

^① 高田时雄(1988:35-36页)有此看法。

鱼、虞的区别，和一般的汉音一样。这也可算是新汉音比较保守、也比较“雅正”的证据。

3.8 越南译音在两个方面反映 $/-ɲ//-/c/$ 已经出现。一是它用 $-ŋ, -t$ 来描写梗摄的韵尾；二是梗摄三、四等译做 $iŋ, iɛt$ ，这只有在假定有 $/-ɲ//-/c/$ 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释：主要元音受 $/-ɲ//-/c/$ 的同化作用更加变窄，整个韵母就变成 $[iɛɲ/c][iɛɲ/c]$ 了。这一点反映了比朝鲜译音、日本新汉音等更往前发展了的语音状态。不过，越南译音对曾摄的表现却是保守的，它把曾摄韵尾一律译做 $-ŋ/-k$ ，而且主要元音也无前移的证据；一等合口也做 $oAng[wɑŋ/k]$ ，如“弘” $hoAng^2$ ，“或”、“惑” $hoAc^6$ （但“国” $quoc^5$ ）。可见曾摄的韵尾仍然还是 $/-ŋ//-/k/$ 。

越南译音里这种“先进”与“保守”的共处现象，可以在其基础方言中寻找原因。朝鲜译音、日本新汉音的基础自然是当时的北方标准音。关于越南译音的基础，三根谷彻(1972:164—165页)赞同 Maspéro(1912)的看法，认为是唐末在交州的官学所教授的一种标准语音，和北方标准音不完全相同，例如次浊平声北方归属于阳调，这里却归属于阴调。那么我们也不妨假定： $/-ɲ//-/c/$ 只出现于梗摄，且它在梗摄三、四等韵母里与介音 $/i/$ 前后相助，使主要元音变得特窄，这些当是越南译音基础方言的一个特色。

四 硬腭音韵尾产生的原因

4.1 以上所述硬腭音韵尾的产生与发展，是和江、觉韵韵尾

唇化成分的弱化密切相关的。据周祖谟(1982:9页、15—16页),江韵在六朝刘宋时代的韵文里和通摄诸韵通用,梁代和北齐大部分仍和冬韵字、钟韵字合用,到北周陈隋之间,却大多和阳韵字、唐韵字合用了。入声觉韵的情况大略与此平行。从韵部归属的变化可以窥测:江、觉韵/awŋ//awk/,因其主要元音是前舌的,韵尾的唇化成分就开始弱化,其语音逐渐从 [°owŋ/k] 变为 [a^wŋ/k] 了。日本吴音已经反映了江、觉韵的圆唇性相当弱化的状态(参看〈表三〉)^①。敦煌毛诗音在这一点上倒是保守的,它切江、觉韵字依然用合口上字,如“降,怀江”(S. 2729, 21行)、“较,瓜岳”(同, 73行)。这应该是一种远隔同化(remote assimilation)所致:念声母时脑子里已有韵尾的形象,使嘴唇先靠拢一下,给声母带来唇化。9世纪初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也有“开合一致原则”,江、觉韵的反切却只用开口上字^②。可见/-wŋ//wk/的同化作用在《慧琳音义》的时代有所弱化,已没有力量使江、觉韵字的声母带上唇化了。

随着江、觉韵韵尾圆唇成分的弱化,庚、陌韵二等 /aŋ//ak/ 为保持和江、觉韵之间的距离,让韵尾 /-ŋ//k/ 的发音部位逐渐靠前,其前移的程度开始是在适应前舌元音 /a/ 舌位的范围之内,因此/-ŋ//k/ 的语音仍可记为 [-ŋ/-k]; 后来就越过此范围,变成了[-ŋ/-c], 这样就不能算是 /-ŋ//k/ 的语音变体了。

① 向来认为江、觉韵的吴音是 ou, oku, 其实不然。Numoto(1993)吴音字表所载江、觉韵一般作 au, aku, 只有舌上音和正齿音二等字里有作 ou, oku 的。

② 参看黄淬伯(1931)、上田正(1987)里的江、觉韵反切表。

4.2 按照我们的音位解释(参看〈表二〉),中古音里只靠韵尾是否带唇化来区别的韵组除了江、觉韵和庚、陌韵二等以外,还有:

- (1)东、屋韵一等和登、德韵。
- (2)冬、沃韵和唐、铎韵。
- (3)东、屋韵三等和蒸、职韵。
- (4)钟、烛韵和阳、药韵。

通摄诸韵因为主要元音是后舌的,容易接受韵尾唇化成分的同化,所以其主要元音的语音表现到唐代仍带较多的圆唇性质。特别是冬、沃和钟、烛的/a/ 表现为 [o], 这样就容易和宕摄诸韵区别。不过(1)组里登、德韵的合口和唇音,听觉上应该和东、屋韵相近。因此登、德韵的韵尾也就变成 /-ɲ// -c/, 以便保持语音上的距离。如上所述,日本新汉音的基础音系里登、德韵只有合口变成了 /-ɲ// -c/。

9 世纪初叶的北方标准音系里通、江、宕、梗、曾诸摄的音位音值可拟如〈表四〉(曾摄一等采用朝鲜译音以及唐蕃会盟碑基础音系里的音值)。此时随着不少韵母发生合并,主要元音系统也有变动,如三、四等的 /e//Δ/ 合并为 /ə/, ‘四’等的 /e/ 并到 /ia/, 二等的 /ɐ/ 并到 /a/ 等。宕摄诸韵以及钟、烛韵可有 A、B 两种拟音,现将“拟音 B”放在方括弧中。其他体例和〈表二〉相同:

〈表四〉

开口	合口	齐齿	撮口
/ɛŋ/登(德)	/uɛŋ/登(德)	/iɛŋ/蒸(职)	/iuɛŋ/蒸(职)
/əwŋ/东(屋)冬(沃)		/iəwŋ/东(屋)	/iuəwŋ/钟(烛)
[/aŋ/唐(铎)]	[/uaŋ/唐(铎)]	[/iaŋ/阳(药)]	[/iuəŋ/阳(药)]
/awŋ/唐(铎)	/uawŋ/唐(铎)	/iawŋ/阳(药) [/iawŋ/钟(烛)]	/iuawŋ/阳(药)
/aŋ/庚(陌)耕(麦)	/uaŋ/庚(陌)耕(麦)	/iaŋ/庚(陌)清(昔) 青(锡)	/iuəŋ/庚(陌) 清(昔)青(锡)
/awŋ/江(觉)			

宕摄诸韵(唐、铎韵与阳、药韵)的/-ŋ// -k/,在梗摄里产生/-ŋ// -c/以后,也没有像曾摄那样变为/-ŋ// -c/,因为主要元音/a/让/-ŋ// -k/保持比较靠后的发音部位。于是宕摄的韵尾就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归到/-wŋ// -wk/一边来,这就是拟音A;二是保持/-ŋ// -k/不变,这就是拟音B。钟、烛韵的地位因此也有不同。宕摄开口入声在《中原音韵》、现代北京(白话音)和其他一些方言里变做-au,-iau,表示这些方言的人声曾经经过了拟音A的状态。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唐代北方也曾有过合乎拟音B的方言。两种方言都会存在,但内部都包含着缺陷:拟音A的系统里舌根音韵尾只有唇化的,没有非唇化的,并且合口介音和唇化舌根音韵尾在一个韵母中共存,这在汉语里要算例外;拟音B虽然能避开这些缺点,但/-wŋ// -wk/和/-ŋ// -k/对于主要元音形成互补关系,因此这两套韵尾的区别是多余的。我认为无论A或B,都是音位系统演变的过渡时期的产物,早晚会演变到更合理、更稳定的系统。对于这一历史课题的答案就是官话音系,那里/-ŋ// -wŋ/

都为 /-ŋ/ 所吸收、统一(入声韵尾则消失或变喉塞音),出现了非常整齐的韵母系统。经过宋、金、元三代完成的这一过程,也和主要元音、介音的演变密切相关,需要另文详加描述^{补注5}。

引用文献

- 黄 淬 伯 1931:《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北京—上海。
- 李 方 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9-1·2;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 罗 常 培 1933:《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上海。
- 王 力 1948:《汉越语研究》,《岭南学报》9-1;《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290—406页;《王力文集》第1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460—587页。
- 1958:《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北京。
- 周 祖 谟 1982:《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语言研究》2,6—17页。
- 奥村三雄 1956:《日本汉字音の体系》,《訓點語と訓點資料》6,11—42頁。
- 飯田利行 1955:《日本に残存せる中国近世音の研究》,飯田博士著書刊行會,東京。
- 高田时雄 1988:《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国語史の研究》,創文社,東京。
- 龟 井 孝 1993:《日本語の歴史》,龜井孝、河野六郎、千野榮一編《言語学大辞典》第二卷,三省堂,東京,1588—1634頁。
- 河野六郎 1964—1967:《朝鮮漢字音の研究》,《朝鮮学报》31—34,41—44;《河野六郎著作集2 中国音韻学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295—512頁,同書別冊《資料音韻表》79—322頁。
- 赖 惟 勤 1953:《上古中国語の喉音韻尾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3;《中国音韻論集 賴惟勤著作集 I》汲古書院,東京,1989,139—154頁。
- 1956:《中古中国語の喉音韻尾》,《中文学会会報》7;《中国音韻論

集 頼惟勤著作集 I》，222—227 頁。

平山久雄 1967:《中古漢語の音韻》，《中国文化叢書①言語》，大修館書店，東京，112—166 頁。

1972:《切韻における蒸職韻開口牙喉音の音価》，《東洋學報》55—2, 64—94 頁。

1990:《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8, 1—11 頁。

三根谷彻 1953:《韻鏡の三四等について》，《言語研究》22—23;《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汲古書院，東京，45—62 頁；

1956:《中古漢語の韻母の体系——切韻の性格——》，《言語研究》31;《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67—83 頁。

1972:《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洋文庫，東京;《中古漢語と越南漢字音》，211—536 頁。

上田正 1987:《慧琳反切總覽》，汲古書院，東京。

Forrest, R. A. D. 1948: "The Chinese Languag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Hashimoto, M. J. (橋本万太郎) 1978: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Vol. 1, Vol. 2,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Maspéro, H. 1912: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2, 1—127 頁。

Numoto, K. (沼本克明) 1993: "Tables of Go'on and Kan'on Readings", "Studies in Sino-Japanese", edited by Tsukishima H. (筑島裕), "Acta Asiatica" 65, the Toho Gakkai, Tokyo, 85—130 頁。

Pulleyblank, E. G. 196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10, 200—221 頁。

1977—1978: "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3, 180—206 頁。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文字改

革出版社,北京,1989年。

1998年

补注

1 周法高(1969,参看本书101页)将幽、觉、中、宵、药、侯、屋、东各部的主要元音拟测为a,ə,e后面带w的“复合元音”,范围比王氏广得多,但这些复合元音仍然只和舌根音韵尾相结合。

2 关于日语借音中与中古汉语的-ŋ尾对应的u和i都曾带有鼻化的问题,请参看平山久雄《中古汉语的鼻音韵尾在日本汉字音中的反映》(收于《李荣先生纪念文集》,即出)。

3 “蕤”huŋ、“国”kuk中的u可能是描写汉语的[y]或[ɥ]的,因为汉语的/uəŋ//uəc/由于韵尾腭化特征的同化作用可能作为[yŋ/c]、[ɥŋ/c]来实现。

4 沼本克明《日本漢字音の歴史的研究》(汲古書院,東京,1997年)所收《新漢音の分紐分韻表》(411—457页)将11—17世纪七种抄本中采录的新汉音排列成表,依此可以再补“获”(陌韵合口)kuweki,kuwaki、“或”(德韵合口)kuweki等例;“僧”出现5次,却都读sou。该著(378—400页)又说,在空海(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遍照金刚性灵集》两书的几种古抄本中“泓澄”(“泓”为耕韵合口,“澄”为庚韵二等开口)一词照例都被注音为waitai。

5 关于入声韵尾-wk和-c,我以为与其认为后来都被-k吸收了,不如认为一旦变做-uʔ和-iʔ(-k则变为单纯的-ʔ)后,随着入声的消失而变成了-u,-i。这样我们可以圆满地说明《中原音韵》以及现代北方话(白话音)中屋韵三等字为-iou,铎韵字为-au,觉韵字、药韵字为-au,-iau,陌韵二等字、麦韵字为-ai,德韵字为-ei等的现象。

用声母腭化因素 *j 代替

上古汉语的介音 *r*

——对上古舌齿音声母演变的一种设想

—

1.1 李方桂(1971:21—27页)给上古音系假定了两种介音 *r 和 *j。李先生充分地利用介音 *r 以及一系列唇化舌根辅音 *kw 等,把上古主要元音减少到五个,以求解决上古元音过多的问题。介音 *r 对于说明上古音系如何演变成中古音系也很有帮助:它一方面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中古卷舌辅音 tʂ 等(即庄组)、t 等(即知组)是从上古的 *tsr 等、*tr 等变来的;另一方面也能说明中古二等韵母的来源,即介音 *r 也对主要元音发挥影响,产生了一类主要元音^①。

* 本文系在第 26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1993 年 9 月,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上宣读的论文。

① 藤堂明保(1957)已经用 *r 来说明中古庄组与知组的来源,但未将它应用到中古二等的来源上。他拟测的 *r 又似介音,又似声母的卷舌因素,不很清楚。不过李方桂(1971)《参考著作选目》载有藤堂先生这本著作,李先生的 *r 介音说可能也受过其影响。

因为在共时上和历时上都有如此长处，*r 介音说为许多学者所采纳。不过，它的前提是将中古汉语知组声母的音值拟为卷舌塞音 t (知母)、tʰ (彻母)、d (澄母)。原来 Karlgren(1915—1926)把知组拟做舌面前(palatal)塞音 ʈ (知母)、ʈʰ (彻母)、ɖ (澄母)，而罗常培(1931)把它改拟为卷舌塞音，获得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似成定案。不过我认为罗说还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并不如 Karlgren 说妥当。果真如此，上古的 *r 介音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罗先生把知组拟为卷舌塞音，其主要依据在于：从西晋开始的各种梵字母的对音资料(特别是隋、唐、北宋时期的资料)中，用汉语的知组字对梵语的卷舌塞音 t, tʰ, d, dh, ṇ; 佛典中音译专名时的情况也与此一致。罗先生据此推断，从 6 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汉语的知、彻、澄三母也读做卷舌塞音。依我看，对音的这种情况只能表示，知组在当时的汉语音系中音色最近似梵语的卷舌塞音；两者的发音部位未必是一致的。即使知组是非卷舌的舌面前塞音，其听觉的印象也应当和卷舌塞音接近，比如我们用舌面前部与齿龈之间成阻的 [ʈ] 来试发 [ʈa]①，就会知道，在辅音除阻时发出的音色和卷舌的 [ta] 十分相近^{补注1}。因此我认为知组的舌面音

① Karlgren(1915—1926)汉译本 33 页译者注(一)批评 Karlgren 以知组为舌面音(腭音)的看法，说是这种辅音遇到没有介音的二等韵母就感觉很难读，“虽然在音理上不是不可能，不过读起来终究有点不自然罢了”。如果把 palatal 这一术语严格地解做前腭辅音的意思，即高氏所谓“舌面对齿龈跟前硬腭都发生作用”(汉译本 184 页。据法语原文于“齿龈”前补“对”字)的 t₂, d₂ 之类的音，这话确实是对的。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包括高氏所谓“舌面对齿龈发生作用，而且向着硬腭抬上去”(同上)的 t₁, d₁ 之类，我觉得发 [t₁a] 之类的音节并没有困难。下文我主张中古知组不是卷舌音，而是舌面前音，就是这种 t₁, d₁ 的意思。

说可以和卷舌音说同样地说明上述的对音情况。

我认为知组的舌面音说比卷舌音说妥当,是基于以下几项原因。

1.2 中古时期的韵书、音义等资料中的反切,其上字的韵母、下字的声母和被切字的声、韵母之间各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搭配关系^①。例如下字和被切字或多或少倾向于声母的发音部位互相一致,如帮组字作为反切下字多用来切同属帮组的被切字等等。平山久雄(1991)曾调查了部分三、四等韵的被切字声母和下字声母之间的搭配关系,做成了几张统计表。统计的对象是三、四等韵中有关重组(包含重组二类的双方或一方)的一些韵,即支、脂、祭、真、仙、宵、幽、庚_三、清、侵、盐诸韵(以平声兼赅上、去、入声),以上田正(1975)所构拟原本《切韵》的反切为材料。这些韵都可拟测为含有前舌主要元音。现将其中分声组(只有来母独立)统计的一张表(原26页〈表四〉)转录于下(对原表格式稍加简化)。表中“帮A”、“见A”表示帮组、见组的重组四等字,“帮B”、“见B”表示帮组、见组的重组三等字。见组除牙音外包括喉音,但羊母(喻母四等)使归章组;章组还包括日母在内。表中的数字表示某组被切字用某组下字的百分率,“计”栏中括弧内记被切字总数。

下字声组 被切字声组	帮 A	见 A	章	精	知	来	庄	帮 B	见 B	计(例数)
帮 A	22	6	37	10	1	18			4	100(67)
见 A	6	20	57	10	2	5				100(82)

^① 参看陆志韦(1963)。

续表

章		3	73	6	3	11			4	100(228)
精	1	2	41	34	4	13			4	100(167)
知			36	8	15	33			8	100(105)
来		3	44	15	18				21	100(39)
庄		2	10	2	6	24	18	2	36	100(50)
帮 B		2	2		2	8	2	48	38	100(63)
见 B			4	2	7	15		9	63	100(182)

从表中可以看到,帮 A 组、见 A 组除了用同组的下字用得较多以外,章组下字用得最多。这可以解释为:章组 tɕ 等和帮 A 组 pj 等、见 A 组 kj^① 等一样都带有腭化色彩;在腭化的影响之下,章组字的介音^②也同样是前舌性很强的 [i],连主要元音也同样地偏前、偏窄,因而用章组字较适于切帮 A 组字、见 A 组字。若论其韵母的音色,章组字明显地站在重组 A 类字这一边。章组被切字大多用章组下字,很少用 A 类下字,不过是因为 A 类字除了

① 我采用三根谷彻(1953)的看法,认为重组在音位的层次上是声母腭化与非腭化的对立,即四等(A类)声母含有腭化因素/j/,三等(B类)声母不含有腭化因素/j/,韵母则是相同的,例如“必”/pjiet/;“笔”/piet/。如此解释就可以避开在重组诸韵里舌齿音字韵母该属重组哪一类的难题,也可以说明知组字与来母字在反切下字的系联上对重组二类表示同样程度的亲密关系。在语音的层次上则是:重组二类在声母上、介音上、主要元音上多少都有差异,因为音节中一个音位的替换会影响其他所有音位的语音表现;例如北京话的“软”/ruan[±]/,“卵”/luan[±]/的语音(据我观察的一位北京人的发音)除了声母有 [z]₁[l] 的区别以外,介音、主要元音都有些不同:前者的[u]较后者的相对不圆,前者的[a]较后者的相对靠前,甚至韵尾[n]在前者是齿间音,在后者则是舌尖前音。

② 本文所云“介音”,多数场合指齐齿呼的介音/i/,其语音表现因环境而有所不同,即[i̯][i̯][i̯]等。撮口呼的介音/ü/(/iu/)亦可类推。

切 A 类字以外一般很少用作下字的缘故。庄组则与章组相反，明显地属于重组 B 类这一边：庄组被切字少用章组下字，而是用见 B 组下字用得最多，其介音、主要元音应当与 B 类字相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庄组的卷舌成分会使介音多少偏央，近似 [ɨ] 或 [ɨ̄]，也会使主要元音偏央、偏宽；这种音色应当是和 B 类的非腭化声母给韵母带来的语音特征相近。

表中还可以看到，知组的情况介乎章组与庄组之间：知组被切字较多采用章组下字，同时也采用一些见 B 组下字，此外来母下字也用得较多；而来母作为被切字除了常采用章组下字以外则较多采用见 B 组下字，作为下字则切 A 类字和切 B 类字的比率几乎一样多，由此可以看出来母具有中间状态的性质。

如果知组的音值是卷舌塞音，那么被切字和下字的搭配上知组应该与庄组一样地显示出近似重组 B 类的性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对知组卷舌音说的一个有力的反证。有人会问，知组果真是舌面塞音，那为什么它不和章组一样表示近似 A 类的性质？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要是知组声母后的介音像 A 类字里那样是舌位很高的 [ɨ̄]，那么声母除阻后会带上擦音的音色，这样就容易和章组混淆了。为避免这种塞擦音化，知组后面介音的舌位不能很高。来母后的介音也一样，是因为 [ɨ̄] 和 [ɨ̄] 构音方式有所矛盾：[ɨ̄] 要求气流从舌头的正中流出，两边要封闭，[ɨ̄] 则需要气流从舌头的两边流出，正中要封闭^①。因此 [ɨ̄] 后的介音

① 中国有些方言(如江西临川)l 在 i 之前曾变成 d，这应该是 [ɨ̄] 与 [ɨ̄] 构音上的这种矛盾所引起的。

舌位多少要偏低，以便从 [j] 容易过渡。

1.3 《切韵》系韵书中存在一些用端组上字来切知组被切字的“类隔”现象。这种类隔反切中用端母切知母的较多，在《王三》^①中共有 9 例，如“桩，都江反”“戇，丁降反”“牴，丁私反”等。其他则用透母切彻母的有 2 例，用定母切澄母的有 4 例。此外用泥母切娘母的有 10 例，因为牵涉到泥、娘两母有无区别的问题，这里暂略去不论。

我们要注意的，知、端两母之间类隔 9 例中有 6 例用“丁”为上字。若从知组舌面音说来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丁”/teŋ/ 的前舌元音给声母添上一点腭化色彩，使它的语音有点近似知母。但若根据知组卷舌音说，这种现象就无法解释了。《王三》端母一等反切 56 例中用“丁”的有 13 例，端母‘四’等反切 18 例中用“丁”的有 5 例。可见上述类隔反切中“丁”字的比率算是相当突出的。

有些学者不承认类隔，凡是用端组上字的一概都认为被切字也是端组^②。这确实是一个办法。根据这种看法，上面所谓类隔的被切字在《切韵》时代是端组，以后才发展为知组。《集韵》把这些类隔反切的端组上字一般都换成知组字，如“都江”、“丁降”、“丁私”各改为“株江”、“陟降”、“张尼”。这些类隔反切的被切字在现代方言中一般也都反映知组的读法^③。那么中间的变化是如何来

① 《王三》即宋濂跋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据李荣（1957）单字音表所载。

② 李荣（1956）、邵荣芬（1982）等采取这一办法。

③ 只有一个反切其上字没有换成知组字，即《王三》“獭，他辖”，《集韵》“獭，迷刮”，“他”、“迷”都仍是透母字。现代官话也把“獭”读成 tǎ，也反映透母的读法。

的？如果用舌面音说，可以解释为：二等主要元音以及三等介音中的前舌因素使得端组声母发生腭化而变为知组了。而用卷舌音说，端组发生卷舌化而变知组的原因就不好解释了。

1.4 陆志韦(1947:13—15页)也主张知组舌面腭化音说。作为其论据之一，陆先生提到下面一个事实(14页)：

古官话把支脂之韵系的照开口字归入支思韵。它的音值已经近乎今音的 tʂɿ，惟独知开口永远不卷舌化。直到《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照跟知分别得十分清楚。那时候的知又清清楚楚的是 tʂei，不是 tʂɿ，更不是 ti。知的卷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历史。

让我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中古的知组在古官话即《中原音韵》的音系中一般与章组合并，音值可拟为 tʂ 等^①，只有止摄开口知组与章组不同音，知组字属于齐微韵，其音值当为 tʂei 等，章组字则属支思韵，而与庄组字同音，当为 tʂɿ 等。要是采用知组舌面音说，这情况是不难理解的：章组 tʂei 等变成了 tʂɿ 等，与庄组合并以后，知组字从 ti 变到了 tʂei，来填补章组字卷舌化后的空缺。如果止摄开口知组的中古音是 ti 等的话，它在古官话里就算是变成了平舌的塞擦音 tʂei 等，然后到现代官话再变回到卷舌的 tʂɿ 等，这是何等的迂曲和累赘。我认为陆先生这一看法是令人首肯的。

1.5 日译汉音将东_三、钟、鱼、虞、阳、尤等韵里的舌齿音字都做细音，包括知组字在内，如东_三韵“仲”、“忠”tiu，鱼韵“箸”、

^① 我赞同把《中原音韵》里章、知组的音值拟为 tʂ 等的说法，这样就和庄组 tʂ 等音色较近，适合于构成同一系列的音位。不过 tʂ 既然是从中古的章组 tʂ 吸收知组 tʂ 而来的，因此也不影响我们玩味陆文这一段的意思。

“褚”tiyo, 虞韵“柱”tiu, 阳韵“张”、“仗”tiyau 等均如此^①。舌齿音里只有庄组字译做洪音, 如东_三韵“崇”suu, 鱼韵“初”、“庶”so, 虞韵“数”suu, 阳韵“庄”、“霜”sau 等。朝鲜译音也有同样的对比, 知组如东_三韵“中”tiung、“忠”t^hiung, 鱼韵“著”、“除”tiə, 虞韵“株”、“柱”tiu, 阳韵“张”、“长”tiang, 尤韵“肘”tiu、“抽”t^hiu, 庄组如东_三韵“崇”cong, 鱼韵“锄”、“所”so, 虞韵“刍”c^hu、“数”su, 阳韵“装”cang、“床”sang, 尤韵“愁”c^hu、“搜”su 等^②。这就表示介音 i 的语音表现在庄组字里弱化(或中舌化)较甚, 知组字里则不至于如此。从知组舌面音说来看, 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采取知组卷舌音说, 知、庄两组之间所存在的这种不同, 就应该是不好解释的了^{补注2}。

二

2.1 李方桂(1971:6-7 页)说:

就切韵音系的声母分配情形来看, 知彻澄娘等母跟照_二穿_二床_二审_二等卷舌音很相似, 都可以在二等韵母前出现, 也

^① 日本汉音的例字采自筑岛裕(1990)《韻分類索引》(201-217 页)。那里所录的是日本长承三年(1134 年)于《蒙求》抄本上用墨笔所加的字音(此外还有用朱笔的字音, 时代更早, 但数量较少), 原是用一种古体的片假名写的, 今转写成罗马字。近代日本的字典所记汉字读法有不少是经过后人改动甚至妄造的, 因此将日本汉字音用作音韵史的资料时就得依靠古代抄本上的字音。长承本《蒙求》是现存最古的汉音资料之一。

^② 朝鲜字音的例字采自河野六郎(1979)附录《资料音韻表》, 它根据的是现存最古(16 世纪末)的一些字音资料, 如《孝经谚解》、《训蒙字会》、《千字文》等。原用朝鲜文字, 现依河野六郎(1979)的转写法换成罗马字。

可以在三等韵母前出现。但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照_三穿_三床_三审_三日等母只能三等韵母前出现。如果知彻澄等母是舌面前音的话,我们看得出来为什么跟同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的分配这样的不一致。

这里说的是音位结合上的系统性。语言在这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但这系统性往往也不是完全的,例如现代汉语的唇音声母 p, p^h, m 都能和介音 i 相结合, f 则不能。这一不规则是什么缘故?要是说 f 是擦音,所以和塞音 p, p^h, m 分配不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古的知组是塞音,所以和塞擦音(以及擦音)章组分配不同。我们常遇到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是语音的历时发展中所形成的。

给上古音系拟测介音 *r, 是基于将中古庄、知两组拟为卷舌音的说法。如果把知组的音值改做舌面前音,那么就得说明为什么介音 *r 只对前面的 *ts 等发挥作用,使它卷舌化,发展为中古的庄组,而没有对前面的 *t 等发挥同样的作用。也许可以这样推测:*r 曾经一度把前面的 *t 等卷舌化,使它变为 *t̥ 等,而 *t̥ 等后来再变为中古的 ʈ 等;*ts 等没有与此同样地变为中古的 tɕ 等,可能是因为上古的 *t 等已在介音 *j 的前面变成 *tɕ 等的缘故。

我认为干脆把介音 *r 取消了为好。用声母的腭化因素 *j 来代替它,倒可以圆满地说明从上古到中古的一些语音发展。*j 在这里不过是辅音音位的一个区别特征,记号上把它分析出来是为了醒目起见;李著原来所说的介音 *j 应该改写为 *i。*tj 即 t̥[t̥], *tsj 即 ts̥[tɕ]。*tɕ 表示 [tɕ]。

	李方桂		平山	
	上古	中古	上古	中古
精组一、四等	*ts	> ts	*ts	> ts
精组三等	*tsj	> tsj	*tsi	> tsi
庄组二等	*tsr	> tʂ	*tsj	> tʂ
庄组三等	*tsrj	> tʂj	*tsji	> tʂi
端组一、四等	*t	> t	*t	> t
章组三等	*tj	> tʂj	*tji	> tʂi
知组二等	*tr	> tʃ	*tj	> tʃ
知组三等	*trj	> tʃj	*tji	> tʃi

2.2 读者也许怀疑,腭化的 *tsj 怎么能发展为卷舌的 tʂ? 我看这是比较容易说明的。舌面前塞擦音 [t_ɕ]、擦音 [ɕ] 等,如果舌位像现代北京话里那样靠前的话,其摩擦就不能是太强的^①。要想加强其摩擦成分,以便和舌面前塞音区别开来,就应该把发音部位往后挪移。北京话的 j, q, x 舌位最为靠前,舌尖甚至顶到下齿背^②;日语 ち chi, シ shi 的舌位比之靠后一点,舌面最前部和齿龈接触或接近,舌尖只是下垂,口腔前部形成很小的空洞,摩擦比汉语的 j, q, x 稍微显著;英文 ch [tʃ], sh [ʃ] 则更是靠后,舌头往后退缩,口腔前部的空洞更大,因此带有一种湿润的音色,摩擦也更为显著。这样就很接近卷舌音了。近年来,在年轻一代人的日语里,常能听到一种稍微带点英文 ch, sh 色彩的 chi, shi

① 带有明显摩擦(strident)的擦音,其摩擦的来源除主要的以外还有次要的(Jakobson et al. 1952; § 2.322);如 [f] 除了在唇齿接触之处以外,气流冲到上唇背也发生摩擦;[s][ɕ] 除了在舌面前部和齿龈之间以外,气流冲到下齿背也发生摩擦。如果 [ɕ] 的舌位靠前,像北京话里那样,气流不能冲到下齿背,摩擦就不会太强。

② 参看周殿福等(1963:28-29页)。

音^①，我认为那不会是英文的影响（在日本一般人听英语的机会极少），而是为了强调摩擦，使舌头稍稍后退的缘故。

如此看来，[tɕ]等和[tʂ]等中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发音、音色都是连续的。特别是旁边有别的塞音或擦音要带起[tɕ][ɕ]的音色，甚至要变为[tɕ][ɕ]时，本来的[tɕ][ɕ]等便为新的侵入者所排斥，不得不往后挪移，加强其擦音成分，来保证和它们在听觉上的距离。

从中古汉语到现代官话之间，曾经一度也发生过这一类的音变，即章组（包括知组）的卷舌化。中古汉语的章组 tɕ 吸收了知组三等 ʃ 之后，便逐步变为《中原音韵》的 tʃ，和庄组 tʂ 形成了互补关系，因为 tʃ 只出现在介音 i 之前，tʂ 则不出现在介音 i 之前（当时庄组三等的 i 已经失落）。tʃ 随后也使后面的 i 失落，因而也就变成了 tʂ，于是章组字就变得和庄组字同音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大概是和此时牙喉音开始腭化有关。牙喉音 k 等在 i 前面发生腭化，变成了 tɕ 等，作为音位性质的变化似乎是到清代才完成的，但作为语音上的趋向则应该更早就开始存在了。止摄开口中，章组字已在《中原音韵》里和庄组字合并，变成了 tʂɿ 等，知组则未合并，保持了 tʃi 等音值。这就表示：止摄开口章组字为知组字要变塞擦音的趋向所排斥，很早就变到了卷舌音。而后止摄开口知组字从《中原音韵》的 tʃi 等，随着一般 tʃ 等声母的卷舌化，又变

①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日本语音学者川上肇(1987,9页)把古代日语的シ音拟做[ʃi]，并加以说明(大意)：这个[ʃ]不表示英语的 sh 或德语的 sch，而表示现代日本旧人类语シ里的，或是汉语“西”“希”里的辅音。川上先生说的“旧人类语”指的是老派日语，想必包括他自己(也包括我)在内，其シ音比较接近北京话的[ʃi]（其实也有差异，如上述）；由此看来他好像也认为新派日语的シ音稍微带点英文 sh 的音色。

到了现代官话的 tʂ 等。

庄组从上古的 *tsj 等变到了中古的 tʂ 等，那一次的卷舌化也可看做是被章组 *tʃi 等要变 tʃi 等的趋向推动而发生的。虽说如此，上古到中古之间的卷舌化，与中古到现代之间的卷舌化相比，有一点是不同的：中古以后的卷舌化是在音系中已具备卷舌音的情形下发生的，卷舌辅音这个音类已经存在，卷舌化不过是往这个音类的合流，而上古到中古之间所发生的卷舌化则是卷舌辅音在汉语中的创始，是 *tsji 等为 *tʃi 等的塞擦化所逼迫而开辟了一块新的发音领域。这就好比唐代轻唇音的出现，那不也是汉语中一种新的发音方式的开拓吗？

2.3 上面的说法中有一个问题，即和庄组二等 *tsj 等直接对立的知组二等 *tj 等一直到中古仍保持着塞音的性质，那为什么庄组二等 *tsj 等和庄组三等 *tsji 等一样地变为卷舌音了呢？对此或许可以这样回答：虽然 *tj 等没有变为塞擦音，但舌面前音 [tʃ] 等不免多少带点塞擦音色，因此也可以使与之对立的 *tsj 等加强摩擦，往卷舌的方向变化。不过我怀疑上古音很可能只有 *tsji 等，缺少 *tsj 等，中古的庄组二等是和庄组三等一样从上古的 *tsji 等来的。何以见得？中古的所谓内转系诸摄，即通、止、遇、臻、宕、曾、流、深诸摄，没有二等韵，庄组声母只和三等韵母结合，即只出现在介音 i 之前。所谓外转系诸摄，即江、蟹、山、效、果、假、梗、咸诸摄，庄组声母除了和三等韵母结合以外还和二等韵母结合，但二等和三等之间很少形成直接对立的字组 (minimal pairs)，少数直接对立的字组也不包含常用字在内。例如山摄开口，庄组小韵在二等删韵 (包括平、上、去、入，下同) 有 8 个，山韵有

9个,而三等仙韵则只有3个,且与二等直接对立的就只有“剿”(入声初母)、“楸”(入声生母)两个小韵^①,都是冷僻字,而且二等韵里都有又读。甚至在假摄、效摄,庄组只出现于二等,三等没有庄组字。江摄江韵本来是和通摄三等钟韵相配的二等,而庄组也只出现在江韵,钟韵则没有庄组字。鉴于这种分布情形我们可以拟测,庄组本来都是由上古音*tsjɿ等来的,因此变卷舌后也都带着介音i,内转诸摄因其主要元音较关,把介音i保留到中古时期了。外转诸摄则因元音较开,卷舌音后面的介音i就失落了,只在个别的字里(由于方言的影响或其他原因)保留到了中古时期。内转诸摄中只有果摄和宕摄的主要元音是开音ɑ,而宕摄阳韵庄组字保留了介音i,其原因尚待解释,可能和ɑ的偏后性质有关。

如果按照中古的庄组是从上古的*tsr等变来的说法,内转系诸韵的庄组只在介音*j前出现,这就意味着上古不少韵部里只有*tsrj等,没有与此对立的*tsr等。例如之部阴声,有像“士”*dzrjəgx这样的音节,没有像*dzrəgx^②这样的音节。*tsrj等在发音上应该比*tsr等更为费劲,所以这种分布特征就有点不自然、不好理解了。

三

3.1 如果用声母腭化因素*j来代替介音*r,那么除了庄组和知组的来源问题以外,用介音*r来说明的其他一些问题应该怎

① 根据邵荣芬(1982)第七章《宋濂跋本刊谬补缺切韵音节表》。

② 李方桂(1971:38页)。

样处理？

首先要说明中古二等韵的来源问题。李方桂(1971:23页)用介音 *r 来说明二等元音的来源：

介音 r 使后面的较高元音下降，如 *i>ε 或 a, *ə>ε 或 a, *u>ä 等，也可以使后面的低元音上升一点，如 a(后低元音)>a(前较高)或 e(央较高)等。因此我们可以说，介音 r 有一种中央化的作用 centralization。

要是拿我拟定的 *j 来代替 *r，那么高元音 *i, *u 前用 *j 就只好说明元音的下降了。不过上古的主要元音不一定要拟前高或后高元音，如 Karlgren(1957)、董同龢(1948)的元音系统都没有 *i，只有 *u，王力(1958)、周法高(1969)则没有 *i, *u，这一点我个人所拟也是一样。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把我对上古韵母音值的整个设想写出来，只想把支部阴声开口与侯部入声(屋部)的音值和董、王、李、周四家作如下一个对照^①。

	董同龢	王力	李方桂	周法高	平山
二等	佳 eg	e, ēk	rig	reɣ	jau
支部阴声开口 三等	支 jeg	ĭe, ĭēk	jig	jieɣ	iau
四等	齐 ieg	ie, iēk	ig	eɣ	au
一等	屋 ūk	ök	uk	ewk	awk
侯部入声 二等	觉 uk	eök	ruk	rewk	jawk
三等	烛 juk	ĭwök	juk	jewk	iawk

① 四家的音值采自周法高(1969:27-35页)所载诸家拟音对照表。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被拟测的元音系统缺少高元音是很不自然的。我认为既然介音与韵尾有 *i, *u, 那么主要元音系统不必再具备 *i, *u。高元音并不比中高的[e][ə]等易发, 因为高元音要把舌头抬得很高, 并保持一段时间。汉语的音节较长, 整个韵母(或介音加主要元音)要一直保持最高舌位是相当吃力的(特别是圆唇的[u]), 不如用[ie][iə][ei][əi][uo][uə][ou][əu]等复合元音来代替倒是省力。对拟测的音值用现成的类型论来加以规范, 我看这办法只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

3.2 假定介音为 *r 还有一种功能, 就是可以用它来说明中古的来母和舌根音以及其他声母之间的谐声关系。本来 Jaxontov (1960) 提出假定介音 *l 的说法, 为的就是要以此解决来母与其他声母通谐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他用含有介音 *l 的组合如 *kl, *pl 等, 来说明这种特殊的谐声关系, 同时也说明了二等韵母的来源, 以及二等韵少有来母字等现象。李方桂(1971:15, 24 页)把介音 *l 改为 *r, 但也承认高本汉假定的复辅音 *kl 等(只限于舌根音与 l 的结合), 例如“各” *klak > kāk; “格” *krak > kək。Baxter(1992:262-267 页)则沿着 Jaxontov 所开辟的道路, 用所假定的 *kr, *pr 等组合来说明来母和各种声母的通谐现象, 例如“蓝” *g-ram > lam, “监” *kram > kæm。

若用 *j 来代替 *r, 当然不能如此单纯地说明这些问题。对此我宁愿再继续研究, 但也觉得并非没有办法。例如把“监”拟做 *kljam(*kl 是复辅音声母)也可以说明 *l 的消失: 腭化的[l]音是有点难发的(参看本文 § 1.2 末尾所述[l]与[i]构音上的矛盾), 要是[l]给腭化因素[j]的舌位让路, 那就自己也会变成[j]了。

3.3 其次是三、四等介音的区别问题。李方桂(1971)把发展为中古三等(包括重组三等)的上古韵母拟做带有介音 *j, 而把发展为中古重组四等的上古韵母拟做带有介音加元音 *ji。Baxter (1992:269—290 页)利用介音 *r, 把前者拟做带有 *rj, 把后者拟做带有 *j。我则把前者拟做带有 *i, 把后者拟做带有 *ji。这样表面上看来似与李方桂相同, 其实我的 *i 是介音, 就等于李方桂的 *j, 我的 *j 不过是声母的腭化因素, 例如真部“珉”(三等) *mien, “民”(四等) *mjien。这等于说: 上古音不但舌尖声母有非腭化与腭化的对立, 如 *t: *tj, *ts: *tsj 等, 而且连唇音、舌根音、喉音声母也有同样的对立。

3.4 最后要说一下中古羊母(喻母四等)的来源问题。李方桂(1971:13—14 页)除了介音 *r 外还拟了声母 *r 作为羊母的主要来源。这个 *r 是“应当很近似英文(美文也许更对点儿)ladder 或者 latter 中间的舌尖闪音”。我们取消介音 *r 也可以把与此不同音质的声母 *r 留存下来。但这种闪音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毕竟是孤立的, 最好还是不用它, 另找途径。我赞同 Baxter(1992:202 页)用 *j 来代替它(即代替高本汉的 *d)的办法。不过我把它记做 *y, 以便和声母腭化因素 *j 作出区别。*y 只有在介音 *i 之前出现, 而拿 *yi- 和 *tji-, *dji- 等比较起来, *yi- 的语音就会等于 *tji- 等辅音除阻后的音渡(off-glide); 反过来说, 若把发 *yi- 时的舌面稍稍再抬高一点, 就会成为 *tji- 等, 两者的关系是和 *s 的舌尖稍微升起就会成 *ts, 或 *x、*ɣ 的舌根稍微升高就会成 *k 等完全平行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 羊母和舌尖塞音多具有的谐声关系是由 *yi- 和 *tji- 等之间的语音共性作媒介的。

邪母在谐声上和羊母以及舌尖塞音的牵扯比较多,李方桂(1971:14页)因而认为声母 *r 后面带 *j 时就变成了中古邪母。我则照着高本汉的说法把邪母拟测为 *zi-。*zi- 因为是带音的,发音较松,摩擦不太清晰,语音上和羊母相当接近,所以能和羊母以及舌尖塞音互相谐音。还有船母也和羊母的谐声较多,我认为船母的上古音是 *zji-。这个 *zji- 没有和 *tsji, *sji 等一样地变为中古的卷舌音,是因为它是带音的,发音较松,摩擦成分较弱,同时也没有其他音位要把它赶走,即不像 *tji- 等和 *ʃi-^①分别要夺取 *tsji- 等和 *sji- 的地位那样。

除此以外,羊、邪、船三母之间因为在历史上有着相当错综的关系,如方言性的分歧、在特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变等,以致谐声上通转得更多。

羊母字还有跟舌根音谐声的,李方桂(1971:14页)认为是从 *grj- 变来的。我却认为是从 *ɣji- 来的。中古的匣母缺少四等,*ɣji- 正可以填补其空缺。

引用文献

- 董同龢 1948:《上古音韵表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1—249页。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9—1·2;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李 荣 1956:《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

① 我赞同 Baxter(1992:202页)把中古审母的主要来源拟为 *hj, 不过我把它写做 *ɣ。

- 陆志韦 1947:《古音说略》,《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十;《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
- 1963:《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5, 349—385页。
- 罗常培 1931:《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 121—157页;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北京,1963年,22—53页。
- 邵荣芬 1982:《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王力 1958:《汉语史稿》(上册,修订本),科学出版社,北京。
- 周殿福等 1963:周殿福、吴宗济编著《普通话发音图谱》,商务印书馆,北京。
- 周法高 1969:《论上古音》,《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中国音韵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25—94页。
- 川上 蓁 1987:《音便の音声》,《国学院雑誌》89.8, 1—13页。
- 河野六郎 1964—1967:《朝鮮漢字音の研究》,《朝鮮學報》31—34, 41—44;《河野六郎著作集2 中国音韻學論文集》,平凡社,東京,1979, 295—512页,同書別冊《資料音韻表》79—322页。
- 平山久雄 1991:《中古漢語における重紐韻介音の音価につい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14,左起1—41页。
- 三根谷彻 1953:《韻鏡の三四等について》,《言語研究》22—23, 56—74页。
- 上田正 1975:《切韻諸本反切總覽》,均社,京都。
- 藤堂明保 1957:《中国語音韻論》,江南書院,東京。
- 筑岛裕(编) 1990:《長承本蒙求》,汲古書院,東京。
- Baxter, W.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 Jakobson, R. et al. 1952: R. Jakobson, C. G. M. Fant, M. Halle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M. I. T. Press.
- Jaxontov, S. E. 1960: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汉译本:《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谢·叶·雅洪托夫著,唐作藩、胡双宝选编《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2—52页。

Karlgren, B. (高本汉) 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E. J. Brill, Leiden. 汉译本: 高本汉著,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长沙, 1940年;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95年。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29.

1994年

补 注

1 根据我们模拟发音时的听觉来检验拟音上的问题, 也许会使人觉得不够科学, 认为这种方法容易陷于主观。不过我认为, 如果慎重对待的话, 听觉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人的耳朵古今不会两样), 不能一概漠视之。

2 拙文《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1998年)注26(本书78页注①)云: “Numoto(1993)吴音字表所载江、觉韵(1993: 88页)一般作 au, aku, 只有舌上音和正齿音二等字里有作 ou, oku 的。”该表所载舌上音6字(江韵字2, 觉韵字4)中读 ou, oku 的有3字(江韵字、觉韵字各1), 正齿音二等4字(江韵字1, 觉韵字3)中读 ou, oku 的有2字(江韵字、觉韵字各1)。这种情况好像支持舌上音为卷舌音的说法。嘴唇轻微合拢的动作作为卷舌辅音的附属成分会抑制韵母圆唇性的弱化趋向。

其实, 有关江韵1字是“撞”tou, 可能受了“童”(东韵)的影响, 觉韵1字则是“浊”diyoku, 韵母似乎代表烛韵(如果代表觉韵应该读 doku), 要视为对应上的例外。因此我认为这些未必可作为对知组腭化音说的反证。

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

—

按照中古音与现代音的对应规律,“昆明”、“昆弟”、“昆虫”等的“昆”字应该读 gūn 才是,因为“昆”字在《广韵》是“古浑切”,属臻摄一等合口平声魂韵见母,而一等见母按对应规律应读 g-[k-]。但事实是它却读成 kūn,与“乾坤”的“坤”字同音;“坤”字在《广韵》是“苦昆切”,属魂韵溪母,它读 k-[k^h-]是合乎规律的。

不但是“昆”字,与它同属“古浑切”小韵的“崑”、“崑”、“崑”、“琨”、“鸬”、“鸬”、“鯤”等字,现代也都读做 kūn,一概成为音韵对应规律的例外。这一例外音变究竟由于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这是避讳改音的结果,是为同一小韵中的“崑”字所排斥而改变其读音的。“崑”(及其异体“禕”字)就是在衣服最里面的“内裤”,《广韵》注解云:褻衣。由此可以想象:“昆”等字若按其见

* 本文是在 1995 年 11 月于远藤光晓君主持的汉语史研究会(青山学院大学 东京)上的报告《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 ——一个忌讳改音的例子》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报告时及以后,不少同行学者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资料,使本文的内容得以改进。特在此表示谢忱。

母的本音念出来,就会使人联想到那一个稊字,感到不快或滑稽;例如《庄子》开头“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一行,其中“鲲”字若按本音念的话,岂非太可笑?于是人们就把这些字的不送气声母改读为同部位的送气声母,即读成“坤”字的音了。如果“古浑切”小韵没有“辉”字,我们今天就会把“昆明”、“昆山”说成 Gūnmíng、Gūnshān 的。

避讳改音这个现象,在汉语里并不罕见。最出名的例子是“鸟”字。“鸟”在《广韵》是“都了切”,是筱韵端母,按音变规律现代应读 diǎo,但事实却读 niǎo,这是因为后来同音字里产生了谈话时一定要回避的一个词 dǎo,所以人们就把“鸟”字的清音端母改为同部位的鼻音泥母了^①。李荣(1965)第三节〈回避同音字〉举例说明避讳改音,所述很精彩,可以参看。

我以前用日文写过平山久雄(1992)一文,其中尽量地搜集现代方言中以及过去文献中避讳改音的实例,一共搜集到二十多个例子,有些是改声母,有些是改韵母,还有些是改声调的;其中改声母的居多,大约占全部避讳改音的三分之二,几乎都是在同一发音部位的范围之内改换声母,如不送气音改为送气音(或相反)、浊音改为清音、非鼻音改为鼻音(或相反)、塞音改为塞擦音等。我当时还不知“昆”等字念 kūn 也是避讳改声母的结果,所以该文中没有提到这个例子。

有一个问题,即:如果说“辉”字作为回避的对象,那为什么它本来有那么多的同音字呢?我认为避讳改音是一种社会风气的产

^① 参看单周尧(1992)。

物,人们可能对某字与稷字同音本不大在乎,后来就变得敏感了。在这一点上,“父”字的情况与“辉”字相似。《广韵》上声麌韵奉母“扶雨切”小韵除“父”以外还有“釜”、“腐”、“辅”等字。这些按对应规律现代应读 fù,事实是只有“父”服从对应规律,其他同音字则皆读 fǔ。这应该是因为人们逐渐把这些字不敢读得与“父”同音,于是为了回避,把声母改成非母或敷母了^①。上声奉母与非、敷母之别,在现代音里表现为声调的不同,前者按“浊上变去”的规律变为去声,后者则保持上声未变。

二

还有一个问题,即:现在连“辉”、“裨”字都念 kūn,这是为什么呢?要是“昆”等字念溪母出于回避“辉”字,那么“辉”本身似无改读的道理,它应该按规律念 gūn 才是。这似乎也不是“自我回避”的结果。自我回避就是自己回避自己而改音,即被忌讳的字本身要说出来时,更换其一部分音素来冲淡一点粗鲁的味道,如英文的叹词 God! 有时说成 Dod! 那样。“辉”似乎未尝用于骂人话或其他社会交际的场合中,所以不见得曾有自我回避的必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昆”等字在改读声母的时候,“辉”这个词应该还活在口语中,这样才能作为同音字回避的对象。因此可以假定曾有一个阶段,那时“昆”等字都变读为溪母,只有“辉”字仍读见母。但后来“辉”这个词在口语中废用,被“内裤”或其他的

^① 参看平山久雄(1992:9页)。

说法代替了³¹¹，结果它就成了一个文言词了。不过作为文言词，“晖”在诗词、文章中都是罕见的，所以人们读书时偶尔遇到它，就不知怎么读，于是查《广韵》或其他韵书，看到它与“昆”等很多读 kūn 的字同属一个小韵，就把它读成 kūn 了。

或者也可能是：依据《集韵》，“晖”字的异体还有“幌”、“裊”，《祖堂集》即作“裊”^①，五代人高镳《中华古今注》^②、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亦同，似乎唐宋以来民间多把这个字写成“昆”声。那么，可能是这一词在口语中废用以后，人们就按偏旁把“幌”、“裊”字读成 kūn^③，后来也影响到“晖”、“裊”的读音了。

不管怎样，现代连“晖”字都读 kūn，这应该是学者从未道出“昆”等字念溪母出于避讳的主要原因。

三

在过去的文献资料中“昆”等字的情况是：《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中州音韵》、《韵略易通》、《韵学集成》、《四声通解》、《交泰韵》、《韵略汇通》、《五方元音》（年希尧修订本）、《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类音》等韵书和韵图中，《广韵》“古浑切”小韵字都与“坤”字不同音。《老乞大》、

① 作“浴裊”一见于中文出版社影印本 311 页下段，作“腰裊”两见于同书 104 页上段。

② 据影宋咸淳本《百川学海》（中国书店，北京）甲集所收。

③ 李荣（1965：112 页）指出，“读半边字”即读偏旁带来的误读现象，一般只限于口语里不常用的字。换言之，它只能发生在人们通过文字学习的词语上。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朴通事》中不见“古浑切”小韵字，无由观察 16 世纪初用朝鲜文描写当时口语音的情况。

现存最早确实反映“昆”等字读溪母的资料似乎是《韵学大成》^①。此书刊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有万历六年(1578 年)濮阳涑自序，于卷一〈六“榛文”〉“昆，瓜温切”小韵下列“崑”、“琨”、“鯤”、“裨”、“晖”、“禕”，其中“昆”、“崑”二字又重见于同部“坤，枯温切”小韵下，注“又瓜温切”，可见二字当时有见母、溪母两种读音。想来回避“晖”字而改读的现象是从“昆”、“崑”二字开始出现，其原因当为《广韵》“古浑切”小韵中此二字在人们口里说出或念出的机会较多的缘故。

《西儒耳目资》与《音韵正讹》也是较早反映“昆”等字读溪母的材料。刊于天启六年(1626 年)的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其〈列音韵谱〉“第四十八撮 uen 三字孙母之二十一”中，“昆”、“琨”、“崑”、“鯤”、“鸕”、“禕”等字皆于“格温 kuen”下与“克温 k^huen”下重收。《音韵正讹》^②则系宣城孙耀所辑、吴思本所订的方言韵书，刊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反映安徽宣城的一种吴语^③。此书〈平声阴音第七〉中标目字“坤”下的同音字有“昆”、“崑”、“琨”、“鯤”、“鸕”、“鶻”，可见这些字已读成溪母。“裨”则于〈平声阴音第七〉另成一个标目，注云“妇人内衣”(“媵”即“妇”)，同音字只有“鶻”(此字与“坤”下重见)，可知“裨”是仍读见母的。这正好可以证明我们于第二节中假定的“昆”等字已变溪母而“禕”仍读见母的阶段

① 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② 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③ 参看孟庆惠(1988:318—319 页)。

确曾存在过。

张元善所编《合并字学篇韵便览》，自序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收有顺天人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据陆志韦（1947）中排印，同书〈臻摄第十九合口篇〉见母平声一栏有“禊”字，与溪母平声“坤”相对。“禊”当是“裊”字之误^{补注2}。我认为这可能表示“昆”等字除“裊”以外都已变读溪母，因为如果“昆”、“鯤”等仍读见母，那么徐孝应该从这些字中选一个标目字即可，何必特地采用“裊”呢？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等韵图经》反映的17世纪初年官话也与《音韵正讹》相同，只有“裊”字仍读见母^{补注3}。

刊于康熙十年（1671年）的《正字通》^①辰集日部“昆”音“公昏切”，注解中则云“俗音坤”。直到序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李氏音鉴》，“古浑切”小韵字都应该已变读为溪母，因为同书卷六〈五声图〉“三十个”（代表不送气的k-）中与上声“滚，古稳切”相配的阴平是“○，孤温切”，“○”表示有音无字；“十八空”（代表送气音k^h）里有“坤，枯温切”，“昆”等字都应该与此同音。

上引《西儒耳目资》、《音韵正讹》、《正字通》里的有关记载均系古屋昭弘先生告诉我的。他还说：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所刊《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中“净白”（“净”即“末”史弘肇的妻子）云^②：“刘伯伯在此，老妇越发忙了，老妇在此，这里穿裊子忙里。”

① 此书基于张自烈《字汇辩》。《字汇辩》成稿于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以前。参看古屋昭弘（1993）。

② 据《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所收影印本。俞为民（1985）文误将“裊子”排印为“裤子”。

古屋先生说：此正与《音韵正讹》“裨”下的注释相符；看来“裨”作为“妇人内衣”很可能还活在明代某些地方的口语中。这话很中肯。不过，“裨”似不一定专用于妇人的，这里也许有方言的不同；《金瓶梅词话》里“裨”字作“裨带”一见（八十二回），作“裨裤”两见（七十三回、一百回），其中两处是妇人的，一处却是男人的，即“只见几个汉子，都蓬头精腿，裨裤兜裆，脚上黄泥”云云（一百回）。反正“裨”当时常谓妇人最里面穿的小衣，那就有点和“布衣切”一词相近，更容易叫人回避了。

四

至于现代方言里的情形，“昆”等字除北京话外多数现代方言也都读溪母。在《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所载 20 处方言中，“昆”、“崑”（“古浑切”小韵只收此二字。295 页）读不送气见母的只有温州一处，即温州“昆”有 $kaŋ^{明平}$ 、 $k^h aŋ^{明平}$ 二音，“崑”有 $ky^{明平}$ （文言音）、 $kaŋ^{明平}$ （白话音）二音，另外还注有 $k^h aŋ^{明平}$ （白话音）一音。二字在其他方言都读成送气溪母。高本汉（1915—1926）汉译本《方言字汇》（620 页）云：“昆”客、闽、沪跟官话（除掉风台） k^h- 。那么高本汉搜集的材料中只有安徽风台一处是读见母的。赵元任（1939：111 页）则云：“昆”、“崑” $k^h uən^{明平}$ ，宁波按见母读 $kuəŋ^{明平}$ 。黄锡凌（1941：左起 15 页）将“昆”等“古浑切”小韵字包括“裨”字都记做 $gwen^{明平}$ 音，与“坤” $kwen^{明平}$ 不同；这完全没经过改音，倒值得珍视。

苏州（郊区）方言的情况最使人感兴趣。叶祥苓（1988：179

页)〈苏州同音字表〉kuən^{阴平}下只有“裨”一字,注云:苏州郊区短裤说短裨、侏裨,字或作“裨”。其他《广韵》“古浑切”小韵字中“昆”、“崑”二字见于k^huən^{阴平}下,与“坤”同音。这是丁锋先生提醒给我的。厦门方言也似有类似情况。罗常培(1930:192页、99页)里,“裨”有二音,一为kun^{阴平},另一为kɿ^{阴平},均读见母,但后者是白话音。“昆”、“崑”则是k^hun^{阴平},读溪母,与“坤”同音。这些正与《音韵正讹》里的情况相同,可算是第二节里假定的那一阶段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为我们证明那一阶段并非虚设。

引用文献

- 黄锡凌 1941:《粤音韵汇》,中华书局,上海;中华书局,香港,1954年。
- 陆志韦 1947:《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燕京学报》32;《汉语音韵论文集》第一集(崇文书店,香港,1971年),187—217页。
- 李荣 1965:《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2;《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107—118页。
- 罗常培 1930:《厦门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一,北京;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年。
- 孟庆惠 1988:《皖南铜太方言与吴语的关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吴语研究室编《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315—321页。
- 单周尧 1992:《“鸟”字古音试论》,《中国语文》4,294—296页。
- 叶祥苓 1988:《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 俞为民 1985:《明成化本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校注》,《艺术研究》3,111—190页。
- 赵元任 1939:《钟祥方言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五,商务印书馆,长沙。
- 古屋昭弘 1993:《張自烈と〈字匯辯〉——〈正字通〉の成書過程》,《東洋學報》74.3—4,97—124頁。
- 平山久雄 1992:《中国語における避諱改詞と避諱改音》,《未名》(神戸大学

文学部中文研究会)10,1—22 頁。

- Karlgren, B. (高本汉)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E. J. Brill, Leiden. 汉译本: 高本汉著,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长沙, 1940 年;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95 年。
-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1989 年。
- 《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文物出版社, 1979 年。
- 《祖堂集》: 柳田圣山主编《禅学丛书之四》, 中文出版社, 京都, 1974 年再版。

1995 年

补 注

1 “晖”一词被“内裤”、“小衣”等取代,其原因可能也与避讳的心理有关,因为取代者本属一种委婉说法。

2 《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1988 年)所收陆志韦(1947)中正作“裊”(71 页)。该文附注①(84 页)云:“编校者按:本文承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郭力同志根据北京图书馆藏《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校勘。”

3 以《合并字学集韵》(影印在《罕见韵书丛编》上册,长城文化出版公司,香港,1995 年)检验,就知道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实情。该书平声十九昏韵见母“孤温切”小韵首字为“裊”,下面列有《广韵》“古浑切”小韵字如“昆”、“琨”、“鸬”、“鷓”、“鯤”、“菟”、“鋤”等(包括其异体字)以及其他若干冷僻字。不过,其中“昆”、“琨”、“鸬”、“鋤”又见于溪母“枯村切”小韵(首字为“坤”)。“崑”则只见于“枯村切”下。“昆”字在“孤温切”下的注释是“兄也,后也,又姓”,抄袭了传统韵书,在“枯村切”下的注释则是“昆弟”,简明扼要。由此可以推测:在其基础音系中“裊”字只有见母一音,读法稳定;其他《广韵》“古浑切”小韵字作为正规的文言音读见母,作为白话音以及一般通俗的文言音则读溪母,见母的读法并不活在实际口语中;因此编者认为采用“裊”作“孤温切”小韵的首字较为妥当。

关于《合并字学集韵》,参看郭力《古清入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归

调——兼论明代以后北京话中古清入字的归调变化》(《语言学论丛》19, 1997年, 74—89页)74页里的概括:

《合并字学集韵》, 明徐孝著, 张元善校刊。初刊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共十卷, 是《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一书中的韵书, 与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互为体用, 相辅相成。

关于该书中的注释可作识别文、白异读的根据, 我受了郭文(84—85页)的启发。

日僧安然《悉曇藏》里 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

一 序说

1.1 9世纪的日本和尚安然(Annen)所撰《悉曇藏》(Shitanzoo)卷五〈字母翻音〉之二〈定异音〉的开头,有这么一段关于当时日本所传汉语声调的记载^①:

诸翻音^②中所注平上去入,据检古今,难可以为轨模。何者?如陆法言《切韵》序云:“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③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若尔风音难定,孰为楷式?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轻无重;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414页。标点不尽依之。

② 这里所谓翻音,指的是于梵文字母的汉字对音下面所注的反切。

③ “去”原作“平”,今据《切韵》〈序〉改。下文所引《悉曇藏》卷一〈序〉中“秦陇则去为人”亦同。

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舛^①。

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大原，终学长安，声势太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突呼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

元庆之初，聪^②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此两法师共说吴音、汉音。且如“摩”字、“那”字、“泥”字、“若”字、“玄”字、“迴”字等类，吴似和音，汉似正音。汉士不能呼吴，吴士不能呼汉。又如“母”字、“不”字等类，吴如开唇而更聚，汉如开唇而直散。但聪和上说云：“前三家音巨唐无矣。”

同书卷一〈序〉中则概括上述一段的内容说^③：

① “舛”原作“升”，今据《大日本佛教全书》本、1672年刊本、1789年刊本（参看本文§2.2）改。

② “聪”原作“总”，今据《大日本佛教全书》本、1672年刊本、1789年刊本（参看本文§2.2）改。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366页。

二〈定异音〉。则述秦陇则去为入，梁益则平似去。我国旧来二家，或无上去之轻重，或无平去之轻重。新来二家，或上去轻重稍近，或平上、平去相涉。

1.2 《悉曇藏》里这些记载，是拟测唐代声调（包括调类和调值）时很重要的资料，很早便引起日本学者们的注意。国外也有周祖谟（1958b）、Mei, Zulin（1970）等分析研究。现在我想藉为王力教授颂寿的机会，介绍一下日本学者对这份资料的研究情况，附带说一些我个人的意见。但因我能力有限，要做到有系统的介绍是很困难的。本篇所述，只不过是点滴的说明罢了。还有一点我深为遗憾的是，本篇只能写到有关调类的问题为止，调值的讨论只好待他日再说了^{补注1}。

二 安然和他的《悉曇藏》

2.1 《悉曇藏》的著者安然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日本天台宗和悉曇学的历史上是个很有名的学者，可是向来没有可靠的传记。桥本进吉（Hashimoto Shinkichi）^①以此为憾，于是搜尽有关安然的各种资料，加以严格的批判与谨慎的考核，写成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考证论文，即桥本进吉（1918），至今被视为定论。

据他的考定，安然生于841年（日本承和八年），是最澄（谥传

^① 桥本进吉（1882—1945）：日本著名的语言学者，曾任东京大学国语学（即日本语学）教授。他可称是现代日本语学的奠基人，尤长音韵史研究，又重视文献的校订与考证，以严密的学风出名。

教大师)^①的同族,859年在延历寺跟圆仁(谥慈觉大师)^②受戒,做了正式的佛僧。以后就按照当时的规定,在那里修行十二年。877年他和延历寺三个和尚要入唐求法,政府就下令供给他们到九州的驿马,但不知何故,他们渡唐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也许在路上归于失败。可是因为有这计划,他才得以跟道海、长意和湛契传习胎藏法、金刚界法等密教大法,作为入唐学习的基础。以后几年他还跟遍昭传受各种密法,掌握了密教的奥秘。这四位老师都是圆仁的高足。同时在悉昙方面,他跟长意和湛契传受圆仁在唐学来的读法,又跟齐谗传受空海(谥弘法大师)^③和圆珍(谥智证大师)^④在唐学来的读法,这样他就把日本所传的不同悉昙口音(中天音、南天音、北天音等)和学说网罗无遗了。884年他跟遍昭受传法灌顶,政府就承认他任元庆寺传法阿闍梨。此后他一直专心从事教授和著述,殁于889年和903年之间。

安然一生写了不少的书,传名的将近一百部。自然密教方面的占多数,也有显教方面的,也有关于悉昙和佛书目录的。就现有的几部来看,他的著作不但引证赅博,汇集众说,而且纠正异同,辨别是非,富有系统性;由此可知他是头脑明晰、有见解的一位学匠。

① 最澄(767—822):日本天台宗的开祖,804—805年入唐。在平安京(现京都)北的比睿山上创建了延历寺,作为中心道场。

② 圆仁(794—864):最澄的弟子,838—847年入唐,854年任天台座主(延历寺的首长)。他在教理和教团的组织方面都为日本天台宗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③ 空海(774—835):即遍照金刚。日本真言宗的开祖,804—806年入唐。著作有《遍照发挥性灵集》、《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

④ 圆珍(814—891):跟最澄的高足义真学习,853—858年入唐,868年任天台座主。

他生前并不怎么特别闻名于世，死后才通过这些著作获得了声望。

2.2 以上是桥本进吉(1918)的提要。《悉曇藏》在安然的著作中属于早期，在880年(日本元庆四年)写成，要献给当时的天皇看的。一共分八卷，即：卷一〈梵文本源〉、卷二〈悉曇韵纽〉、卷三〈章藻具阙〉、卷四〈编录正字〉、卷五〈字母翻音〉、卷六〈字义入门〉、卷七〈字义解释〉、卷八〈正录章段〉。各卷分三节，一共二十四节，分别对梵文字母的字体、排列、音韵、与字母附会的意义等问题，先介绍各家的学说，尔后叙述自己的看法，一向被认为是可作典据的悉曇学名著。现存最早的抄本有942年《东寺金刚藏本》(零本，存卷八)、1085年《横川楞严院本》，俱影印在《大日本佛教全书》第30册《悉曇具书》里面。刊本最早的有1672年本，还有1789年本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所收是根据1794年刊本排印的。

三 旧来二家

3.1 上引《悉曇藏》卷五〈定异音〉的一段共描述“表”、“金”、“正法师”(以下简称“正”)、“聪法师”(以下简称“聪”)四人带到日本来的汉语声调系统。前二人就是〈序〉里所谓“旧来二家”，后二人则是〈序〉里所谓“新来二家”，这是可以肯定的。关于“旧来二家”，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在他的《汉字三音考》^①里有所论述，现

① 《汉字三音考》：本居宣长著，1785年刊行，是研讨日本所传三种汉字音(吴音、汉音和唐音)的著作。下面翻成中文的一段见于〈博士ヲ置テ字音ヲ正サレシ事〉一章的自注中，影印本47页。本居宣长(1730—1801)：日本近代著名的学者，在研究日本古代的语言、文学和思想方面颇有成就。

在翻译如下(原文为日语文言。〔 〕内是我附上的说明,下皆仿此):

或说〔净严《悉昙三密钞》^①卷上〕云:先有金礼信者,来对马岛,始传吴音。次有表信公者,来筑紫国〔今九州福冈县〕传汉音。世上以此为日本吴音与汉音之始。金、表二家之音,元庆时某书〔即《悉昙藏》〕亦有记载,故非无稽之说。然今考其事,二人似乎未曾始传吴音与汉音。其年代虽不易考定,但相传二人是从奈良时代〔710—784年〕末年到延历〔782—806年〕、弘仁〔810—824年〕之间至吾邦者。同书亦云:“承和〔834—848年〕之末正法师来,元庆〔877—885年〕之初聪法师来,此两法师共说吴音、汉音”;而称此为“新来二家”,称彼金、表为“旧来二家”。此四家各为传唐朝当时之音者。既如此,以金、表各认为吴音与汉音之始祖,此必定为谬传而已。且说表信公,渠非神护景云〔767—770年〕时之音博士袁晋卿之讹传乎?“表”、“袁”形近,“晋”、“信”音近〔日本音均读 shin〕,“卿”、“公”义近。果真如此,某书作“表”,应为后人将“袁”字抄误者。晋卿之事迹,空海《性灵集》亦述云:“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由此可见,渠为以正音出名者。

根据本居这个说法,后人多把“旧来二家”中的“表”看做是“袁”的讹误,说他就是袁晋卿。马渊和夫(Mabuchi Kazuo, 1962:336页)还举一个事实,要证实本居的拟测:在《悉昙藏》1085年抄本中,“表”作“袁”(即“袁”),而在右旁小书“表”字;马

① 《悉昙三密钞》:三卷,1682年刊行,是日本近代悉昙学的代表著作。

渊氏说,这足以证明“表”本来作“袁”。但其实不见得,我们就影印本来来看^①,在同一行“我日本国元传二音”里的“元”字作“无”,也在右旁小书“元”字。可见行间小字是校对的结果,是订正错字的。影印本字太细,辨不出正文和行间小字是否同出一人之手。如果是同出一手的话,我们应该认为,抄写这本子的人自己以为“袁”错“表”对,马渊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当然“袁”容易讹成“表”^{卍卍},可是“表”讹成“袁”也是可能的,因为姓“表”的不多,很容易使人误会是“袁”的讹字。既有这种情况,安然写定的原本作“表”还是作“袁”,是难以下结论的问题。不过袁晋卿是在日本曾发挥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作为“旧来二家”之一,是很自然的。本居的着眼可称独到,可惜难以证明而已。

3.2 让我们顺便来看一看袁晋卿是什么样的人。《续日本纪》^②宝龟九年(778年)十二月十八日条云:

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

天平七年[735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

可知他本汉人,生在715年左右,是跟着日本遣唐使来日本的。他到日本以后,大概跟做音博士的汉人学会《文选》、《尔雅》音,后来他自己也任音博士了。据《续日本纪》的记载,他在神护景云元年(767年)已经是音博士^③,神护景云三年(769年)任日向守

① 《大日本佛教全书》第30册,85页。

② 《续日本纪》:日本古代敕撰的编年体史书,四十卷,成书于797年。是所谓《六国史》之二,继承《日本书纪》,记载697年至791年的记录。

③ 《续日本纪》神护景云元年二月七日条云:“幸大学释奠,座主直讲从八位下麻田连真净授六位下,音博士从五位下袁晋卿从五位上”,可证。

(日向国——今宫崎县——长官),宝龟九年(778年)任玄蕃头(治部省玄蕃寮的长官,掌管佛寺、僧尼和外宾等事),延历四年(785年)任安房守(安房国——今千叶县——长官)。哪一年任大学头(式部省大学寮的长官),史上没有记载。本居所引空海《性灵集》的文句见于《遍照发挥性灵集》卷四〈为藤真川举净丰启〉^①,是为了推举净村宿祢净丰做官,称赞他父亲晋卿(净丰为晋卿的第九男)的功绩的。“净村”和“清村”音、义皆通,都念 kiyomura。

“音博士”这个官名初见于《日本书纪》^②持统天皇五年(691年)九月四日条:

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萨弘恪,书博士百济末士善信,银人廿两。

《养老律令·职员令》^③式部省大学寮条规定教员和学生的名额说:

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四百人,音博士二人(原注:掌教音),书博士二人,算博士二人,算生三十人。

《养老律令·学令》则云:

凡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讲义。

《令集解》^④解释此“先读经文”引《令释》云:

① 《遍照发挥性灵集》256—258页。此文写于816年。

② 《日本书纪》:日本古代敕撰的编年体史书,三十卷,成书于720年。是所谓《六国史》之首,记载上古至697年的记录。

③ 《养老律令》:日本古代的法令,于养老二年(718年)制定,内容基本上承袭大宝元年(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

④ 《令集解》:《养老律令》的注释汇编,成书于868年以前。被汇集的注释中《令释》撰于787—791年之间,《古记》则撰于738年前后。

读文，谓白读也。唐令读文与此异也。唐令无音博士。

接着又引《古记》云：

学生先读经文，谓读经音也。次读《文选》、《尔雅》音，然后讲义。其《文选》、《尔雅》音，亦任意耳。

可能袁晋卿来日本时经音已有根柢，就是《文选》、《尔雅》音没有学好。

伴信友(Ban Nobutomo)推测^①，袁晋卿来日本是出于吉备真备(Kibi no Makibi, 695—775年)的计划。吉备是日本8世纪很出名的官僚。《续日本纪》宝龟六年(775年)十月二日条把他的经历介绍得很扼要：

前右大臣正二位勳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灵龟二年〔716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惟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735年〕归朝，授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先是，大学释典，其仪未备。大臣依稽礼典，器物始修，礼容可观。

关于“该涉众艺”的内容，《扶桑略记》^②天平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条说：

留学之间，历十九年，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笮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

① 《假字の本末》451页。《假字の本末》：伴信友(1773—1846)著，考证日本古代假名等文字的起源和真伪。

② 《扶桑略记》：僧皇圆(?—1169)所撰编年体史书，收录上古至1094年的记录，是将古书旧记数十种中的材料抄录而编制成的。

业，涉穷众艺。

吉备真备是与袁晋卿同时，也就是跟着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回日本的，并且他对“汉音”很有造诣，回国后不久即就任大学助（大学寮的次官）。因此，袁晋卿之来日本，及任音博士，都出于吉备的推荐，这样推测并不是没有道理。那时日本政府以中国北方的标准音“汉音”为“正音”（日本汉音起源于此），要拿它来代替日本人已经习惯的汉字读法“和音”^①（日本吴音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诵两京之音韵”的袁晋卿，自然受到政府的欢迎。

3.3 关于“金”的问题，本居宣长所引《悉昙三密钞》里的一段，其原文如下^②：

我日本国元传吴、汉二音。初金礼信来留对马国，传于吴音，举国学之，因名曰对马音。次表信公来筑博多，传于汉音，是曰唐音。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元庆之初聪法师来，此二法师俱说吴、汉两音。

此文乃基于《悉昙藏》而润色的。润色的地方本居说是谬传，这说法则基于文雄(Monnoo)《三音正讹》的意见^③：

《悉昙藏》及十二例云：“我朝古来有‘金’、‘表’二家”。
《三密钞》云：“有金礼信者来对马传吴音，曰对马音。次表信

① 作为日本字音之一种，这时还没有“吴音”的称呼。可参阅前引《悉昙藏》卷五〈定异音〉“吴似和音，汉如正音”。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731页。周祖谟(1958b)已引用这一段。

③ 林史典(1979:137-139页)。下引《三音正讹》的一段见于卷上〈吴音〉。文雄(1700-1763)：日本近代的学僧，精通音韵和历数，尤以《韵镜》研究闻名。

公来筑之博多传汉音，谓之唐音。断曰：未知所据。”《续日本后纪》^①仁明天皇天长十年〔833年〕夏四月〔八日〕，新罗人金礼真〔日本字音“信”、“真”同音 shin〕贯附左京五条，盖此人也。延历十一年〔792年〕斥吴音、肇汉音，亦见于国史，后三十许年有金礼信，岂得曰创吴音哉！尔后有表信公，亦胡权舆汉音，为不稽矣而已。

关于金礼真，《续日本后纪》只说他是“投化新罗人”，不说明他的经历，因此他到底是不是《悉曇藏》里的“金”，是很难说的。但无论如何“金”是新罗人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因为姓金的人，见于《日本书纪》者四十六名，见于《续日本纪》者四十名，几乎全是新罗人^②。新罗国积极吸收唐朝的文化，到唐朝的交通也比较方便，所以一位新罗人到唐朝去学好汉语以后，再到日本来把它传授，是很有可能的事。

四 新来二家

4.1 关于新来二家“正法师”和“聪法师”，我们幸运地有材料可以拟定是谁。为叙述的方便，先从“聪”说起。桥本进吉（1920）拟定“聪”就是智聪。在这篇论文里桥本极尽能事地考证智聪的经历。他生在821年，841年受戒为僧，本名叫丰智。853年陪着圆珍渡唐^③。8

① 《续日本后纪》：《六国史》之四，20卷，成书于869年，记载833年至850年的记录。

② 《日本书纪索引》〈人名〉34—36页。《续日本纪索引》〈人名〉69—70页。

③ 圆珍有《行历抄》、《在唐日录》等记录，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28册，就此可以窥见他在唐朝的行程和经历。

月他们在福州上岸,854年2月上天台山,9月从天台山到越州,855年2月离开越州,5月到了潼关,这时丰智“权改名智聪,事由不能记之”^①。此后丰智和智聪这两个名字均不见于文献,他的行迹就不能追寻了。圆珍则到了长安,在那里住了半年,855年11月赴洛阳;翌年正月离洛阳,6月到台州停留两年,858年6月由台州回到了日本。可是智聪似乎没有和圆珍一起回国。

圆珍回国后四年,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亲王为了求佛法渡海到唐国。他862年9月到明州,翌年迁越州,864年12月动身去往长安。这时的扈从里就有智聪^②。亲王从日本出发时的随从里不见他,他一定是在唐朝迎接了亲王。由此亦可知:丰智改名为智聪虽然出于暂时的需要,但他以后还继续用这个名字。亲王865年5月到了长安,就诸师质问佛法,仍不能满意,866年正月离开长安,打算经过广州,动身前往印度。随从们大多从福州回日本,“但智聪法师尚住大唐不来”^③。

再过十年,我们就看到智聪回国的消息。《三代实录》^④元庆元年(877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条云:

是日令大宰府量赐唐人骆汉中并从二人衣粮。入唐求法

① 圆珍所抄写《胎藏旧图样批记》卷末识语,全文是:

大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了。珍在越记。

比丘丰智与余缙,此人至潼关权改名智聪(原注:事由不能记之)。珍记。

② 《大唐五家传》〈头陀亲王入唐略记〉164页。〈头陀亲王入唐略记〉是陪着高岳亲王入唐的伊势兴房回国后据他的记录写成的。

③ 《大唐五家传》〈头陀亲王入唐略记〉165页。“住”原作“往”,〈考证〉云:“住”坎?亲王动身后不久就在南海客死了。

④ 《三代实录》:《六国史》之六,成书于901年,记载857年至877年的记录。

僧智聪，在彼二十余载，今年还此。汉中随智聪来。

算来他这时的年龄是五十五岁。《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①里也载有关于他回国的故事：

〔圆珍和尚〕亦尝语诸僧云：“嗟乎！留学和尚圆载，归朝之间，漂没于沧海之中，悲哉不归骸于父母之国，空终身于鲛鱼之乡，命也如何！”再三感咽，涕泗涟如。其后入唐沙门智聪归朝，语云：“智聪初随留学和尚圆载，乘商人李延孝船过海，俄遭恶风，舳舻破散，圆载和尚及延孝等一时溺死。时破舟之间，有一小板，智聪僥得著乘之，须臾东风迅烈，浮炉西飞，一夜之中漂著大唐温州之岸。其后亦乘他船，来归本朝。”于是计圆载和尚没溺之日，正是和尚悲泣之时也。天下莫不叹异。

《悉曇藏》里的聪法师，是元庆之初年来日本，并且曾游历过南北的。这些记载都和智聪的经历不相矛盾。想来智聪在长安和圆珍分手，在那里住了多年，中间也到南北各地去，有接触方音的机会。

智聪的回国比《悉曇藏》的成书仅早三年，就在安然要入唐的那一年。安然是圆珍的高足遍昭受法的（遍昭本是圆仁的弟子，圆仁死后就跟圆珍学习），也曾直接受教于圆珍，他和圆珍的关系似乎比较亲密。智聪本是圆珍的从僧，回国后不久一定要来拜访圆珍，叙说别后的经过，和回国时的遭遇。就因为有这样的缘分，安然有了机会和智聪相识请教。那时正值安然的人唐计划归于失败，可是他必定还愿意渡海，因此可以想见，他多么热衷于向在唐

^① 《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三善清行撰，902年写成。

朝住过多年的智聪吸收关于彼土语音的最新知识。

以上是桥本进吉(1920)的概要。桥本还附上一句说:“《悉曇藏》刊本在〈序〉里‘新来二家’的右边注上‘惟正、智聪’^①,这一注文恐怕不出自安然之手,但由此可见,将聪法师拟为智聪,是古人早已有之的了。”

4.2 至于正法师,《悉曇藏》刊本的旁注以为是惟正,如上面所介绍。惟正是圆仁入唐时的从僧。桥本进吉(1920)说:根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②,他们的行程不是“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而是按太原、长安、洛阳的次序走的,因此把正法师拟为惟正,似乎稍有容疑之处;虽然如此,惟正回国的承和十四年(847年),恰值承和末年,因此这个拟测大概还是正确的;纵使正法师不是惟正,由“习”、“听”、“学”的字面看来,也不会是中国人。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屡见惟正的名字。他生于813年^③,838年随着圆仁渡唐,是一直陪着圆仁走的^{注3}。圆仁在838年7月到扬州;839年2月由扬州出发,6月到登州赤山法华院(是新罗人住持的寺院)住;840年2月离开赤山,4月25日到五台山;7月6日离五台山,7月13日到太原府;7月26日离太原,8月22日到长安。他们在长安修行五年,遭遇武宗毁佛,于是845年5月16

① 我看到的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1672年刊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1789年刊本均如此。两本在“旧来二家”的右边则只注“表、金”。

②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圆仁回日本后据他的日记写成的旅行记录。

③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二年(842年)五月二十六日条所载牒文写他年三十,次年同月同日所载牒文写他年三十一,可证。

日离开长安,6月1日到洛阳,6月8日到郑州,8月末又到赤山;847年3月又离开赤山,9月回到了日本。洛阳只不过是他们匆忙路过的地方。我想《悉曇藏》所举三个都会里,洛阳可能是扬州之误,太原也许是包括五台山而说的。要是这样假设,正法师和惟正行程上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安然于859年在延历寺跟惟正的主僧圆仁受戒,以后的十二年在那里修行,后来在准备渡唐的前后跟圆仁的高足们受大法、学悉曇,在这期间安然想必有过机会直接跟惟正学习他带来的汉语发音。据小野胜年(Ono Shoonen,1964:169页)说,东大寺图书馆所藏从方《百法显幽抄》卷第一末尾有这样的识语:

巨唐会昌三年十月廿一日上都资圣寺写毕,惟正记。

贞观十四年二月廿五日听闻毕,比丘令秀。传法师前入唐求法惟正大和尚,传受比丘喜静谨记。

日本贞观十四年是872年,可知此时惟正还健在。

五 术语的涵义

5.1 要了解《悉曇藏》里所描述四家声调的内容,应该先把“轻·重”、“内·外”、“怒声”、“唇·舌”、“著力”等术语的涵义解释清楚。可惜这些术语多是费解的,有的简直摸不着头绪。

“轻”、“重”倒是较易理解。《悉曇藏》里的“轻”、“重”,就等于今天所谓“阴调”和“阳调”的分别,即由声母的“清”、“浊”所引起的调值变体(variants);“轻”是阴调,“重”是阳调。这一点无论日本国内国外各家的看法都很一致,这里不用多谈了。有坂秀世

(Arisaka Hideyo, 1936)是最早提出这个解释的^①。朝山信弥(Asayama Shinya, 1941)则分析《作文大体》^②(东山御文库本)的记载,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该书第六〈翻音〉条云:

凡文字必有反音(原注:反音义同于翻音),反音必有二字。故略颂曰:平上去入者依下字,轻重清浊者依上字。平声之轻者“东”,重者“同”。入声之轻者“德”,重者“独”。皆依翻音上、下字得其轻重清浊之义也。爰只举平入二声者,上声之重涉于去声,去声之轻涉于上声,递难分别故也。

这里提到的平、入二声之轻、重都带有例字,属轻的“东”、“德”都是清声母字,属浊的“同”、“独”都是浊声母字,就可以为上述对《悉曇藏》里“轻”、“重”的解释作很好的印证。

安然描述“正”的平声说:“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马渊和夫(1962)和赖惟勤(Rai Tsutomu, 1968)都认为,这里“轻之重”谓次阴调,就是以次清声母起头的音节所呈现的调值变体。我看这解释比较稳妥。至于产生次阴调的一般原因大概是:次清声母的送气成分和元音之间会发生一种类似f的过渡音,它可以使调值变得低沉一些^③。

① 有坂秀世(1908—1952):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因病弱,他只能进行十多年的学术活动,却在一般音位论、日语音韵史、汉语音韵史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有坂秀世(1944)的《第二部》收录关于汉语音韵史的论文七篇,这些文章为日本人研究汉语音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② 《作文大体》:一种汉诗作法入门,藤原宗忠(1062—1141)撰,有东山御文库本(12世纪以前的抄本)、观智院本(13世纪中叶的抄本)等。

③ 据赵元任(1928)《第四表·声调表》,吴江黎里的去声和入声、吴江盛泽的上声和去声、嘉兴的上声具有次阴调,调值都比与此相配的全阴调低一些。

5.2 关于怒声,有坂秀世(1936)解释为次浊音。有坂对怒声的解释如下:

安然在《悉曇藏》卷二〈方音〉一节里把梵语的毗声(塞音)分做三类:不送气和送气的清音为“柔声”,不送气和送气的浊音为“怒声”,鼻音为“非柔怒声”。这样我们知道怒声本来是梵语浊塞口音声母的总称。后来,在唐代中叶以后的长安,随着汉语的次浊鼻音 *m, n, ŋ* 等变做 *mb, nd, ŋg* 等,悉曇字母对音里就拿汉语的次浊音来代表梵语的不送气浊塞口音了。可以推测,因为有了这种对音习惯,就有人把汉语的次浊音也叫做怒声。

根据有坂的解释,“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以下简称 A 句)就是“表”的平声次浊字和全浊字一样归属阳平的意思。

上述有坂(1936)对“怒声”的看法,Mei, Zulin(梅祖麟 1970)也曾作过介绍。梅氏接着说明 A 句道:

We know that Sanskrit voiced initials were transliterated by Middle Chinese nasal initials. And since the dialect described here is Kan-on, Annen probably intended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whereas the nasal and lateral initials belong to the *yin* group for the rising and entering tones, these initials belong to the *yang* group for the level tone.

我看这个解释很对(不过他认为“表”的人声分阴阳是个问题,参看本文 § 6.1)。我估计 A 句可能另外有个背景,就是当时的汉语也许有平声次浊字归阴调的(如越南汉字音),或构成一个独立调值(即次阳调)的方言,因此安然有意要写明“表”则

非如此^①。

为什么没有把全浊声母也叫“怒声”？这一点有坂没有讲清楚。估计他以为那是因为在当时的长安方言全浊声母的带音性已经弱化的缘故。

除了上述 A 句以外，《悉昙藏》卷五〈定异音〉那一段里“怒声”一词还出现在三处：

B 句：“〔正〕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

C 句：“〔聪〕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

D 句：“〔正〕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有坂(1936)着重于分析“表”的声调系统，不提 B、C、D 句是怎么讲的。仿佛 B、C 句可以这样理解：“金”的平声有次阳调，而“正”、“聪”的平声次阴调恰与此相似。D 句谓“亦怒声也”，是依据 C 句而说的。因此 D 句的意思应该是：“聪”的去声有一种调值变体“著力”，也和“金”的平声次阳调相似。但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安然在描述“金”的声调时没有提到平声有次阳调呢？这只能看做他的疏忽或省略而已。如果要替安然申辩，就可以这样说：“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只谓调值的范围(如平声较低等)，不谓调类的分合；因为下文 B、C 句里有“金怒声”，读者自然就能了解“金”有平声次阳调，所以这里就不必提到它了。

赖惟勤(1968)认为“金”的全浊声母仍保持带音性质，次浊声

^① 安然除了四家的声调情况以外似乎对其他一些汉语方言的声调也有若干知识。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说明的“内”、“外”的用法得到例证。

母则保持鼻音性质,这样他把“金怒声”里的“怒声”解做是全浊音。他把B、C句解为:“正”、“聪”的平声次阴调调值恰与“金”的平声全浊字的调值相近。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写“金平声之重”而写“金怒声”呢?他说那是因为“金”的平声全浊字调值虽然与其他平声字调值稍有差异,可是没有异到能构成一个独立调值(阳平)的程度(“金”的平声是否分阴阳的问题,请参看本文§6.2)。无论把“金怒声”解为平声次阳调,还是把它解为平声全浊字的字调,毕竟都是一种假设,缺乏十分客观的根据。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可断定哪一种解释妥当,或两种解释都有问题。

5.3 关于“内”、“外”,先看赖惟勤(1958)的看法。《悉昙藏》卷二〈方音〉里云^①:

今检反音,皆以口声为证定之。言口声者即是口处发响之声。细检口处,且有四十。汉吴、本借、纽双、同异、叶并₊;通落、清浊、轻重、大小、内外_{二+};怒柔、缓急、平直、开大、指突_{三+};鸣绝、抽投、返角、咬吹、弹转_{四+}。

赖氏把这里的“大小”和“内外”看做互相关联的观念,正如“清浊”和“轻重”互相关联一样,把“大小”解为口腔开度的大小,换言之即元音舌位的高低,而把“内外”解为由元音的高低不同所引起的调值差异。他以广州话里高阴入和中阴入的分化条件作为例证:包含短元音的音节属于高阴入,包含长元音的音节属于中阴入,而前者的音节多半来自等韵图上注“内转”的各摄,后者则多半来自注“外转”的各摄^②。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4卷,382页。今据《大日本佛教全书》第30册(30页)校改。

② 向来各家讨论“内转”、“外转”时往往对韵图上的标记加以改订。这里也把原作外转的臻摄订为内转,把原作内转的宕摄和果摄订为外转。

中古汉语外转各摄的韵部,它们的主要元音是较低的,可以叫做 a 系;内转各摄的主要元音则是较高的,可以叫做非 a 系。赖氏认为中古时期(包括唐代)“内”、“外”这对术语的基本涵义是指韵母上发音重点的前后不同:若是韵母的末尾发得较重,那就是“内”;若是韵母的起头发得较重,那就是“外”。这种重点位置的不同可以通过元音的高低(或长短)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韵尾的强弱不同表现出来(外转的韵尾容易弱化),有时也可以通过声调的高低不同表现出来,因而会产生“内”、“外”的几种特殊涵义,《悉昙藏》里“内”、“外”的涵义就是其一。这个涵义一定是在唐朝产生的,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有入声分“内”、“外”两调的方言。

“内”、“外”的基本涵义如何,我现在不准备去讨论。只就《悉昙藏》里“内”、“外”的意义讲,我认为赖氏的解释是合理的^①。似乎只有入声才能分“内”、“外”两调,我看这应该和入声韵尾-p,-t,-k的性质有关系。因为发这些不带音韵尾的时候,几乎与发音器官关闭同时,声带不再颤动,就没有声音可听,所以入声韵母的长

① 周法高(1968)也指出,现代广州话里上阴入和中阴入的分化基于元音长短的不同,而元音的长短则与韵图的内转、外转有密切的关系。Mei, Zulin(1970)引述周法高的看法说:

For the *yin-ju*, developed from voiceless initials, the tone is *hsia yin-ju* (the lower of the upper entering tone) if the final belongs to *wai-chuan*, and *shang yin-ju* (the upper of the [upper] entering tone) if the final belongs to *nei-chuan*. This theory throws some light upon lines 8-9: 入声径止,无内无外。What these lines say is that in Piao's dialect, the entering tone is short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ei* (short vowel) and *wai* (long vowel) is neutralized.

这基本上和我们的看法相同,只是我认为在“表”的语音系统中元音的长短尚未形成音位的对立,不过在声学上(phonetically)随着舌位的高低有长短元音的不同罢了。

短是跟着元音(包括介音)的长短走的。这种韵母的长短不同可以作为调值分化的条件^①。至于舒声韵尾-i,-u,-m,-n,-ŋ等,因为它们都是带音的,始终都有声音可听,而且汉语里一般的现象似乎是元音的长短和韵尾的长短呈现互补的关系,所以只要声母、声调等条件相同,舒声韵母的长短基本上都是一样,不管介音和主要元音的长短如何。试比较现代北京话里的两个韵母ən和an:ən是ə短n长,可写做[ənʹ];an是a长n短,可写做[aʹn];可是整体韵母的长短可以说是一样的。假定北京话里还保存-t韵尾的话,那么ət[at]和at[aʹt]之间在听觉方面一定有长短的不同了。

5.4 关于“著力”,至今没有可以十分肯定的解释。赖惟勤(1968)说:这可能是次阳调之谓,因为次浊鼻音变成了mb,nd等半鼻音,就容易令人感觉是用力的。但依我看,次浊鼻音变来的半鼻音或带音声母应该还是比较软的^②,并不见得用力。我认为与其把它解做次阳调,不如解做次阴调顺当一些。次清声母可以说是容易给人以用力的印象的。那么同是一个次阴调,从调值方面看是“轻之重”,从声母方面来看是“著力”,两者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可是这样解释恐怕也难免有望文生义的嫌疑,因此我想对于“著力”的涵义宁可置之不论,并不积极提倡这种看法。

“〔金〕唇舌之间亦有差舛”,这里的“唇”、“舌”也无法解释。无

① 韵母的长短怎么能引起调值的分化,是尚待阐明的问题,我只想在这里举出一种可能性。假定有一种入声,它的调值起初是55(相对长音)和5(相对短音),两者基本上是一个调值;后来55因为要节省保持高音的生理负荷而变为53,5则不变,结果会形成两种不同的入声调值。

② 现代厦门话有由次浊鼻音变来的[b][g],罗常培(1930)说这些声母破裂的力量很弱,比英文的b音、g音软得多。这一事实可以供我们参考。

论作声母讲,或作韵尾讲,唇音和舌音怎么能和声调的现象发生关系,这一点是难以作出合理的说明的。因此,向来也没有人提出肯定的解释。

六 调类的分合

6.1 根据《悉曇藏》卷五〈定异音〉的描述,四家的声调系统中调类^①的数目,次阴调、次阳调、“著力”等不算,各为如下:

表: 5(阴平、阳平、上、去、入)

金: 6(阴平、阳平、阴上、阳上、去、入)

正、聪: 8(平、上、去、入各分阴阳)

关于“旧来二家”的调类,卷一〈序〉里则说“或无上去之轻重,或无平去之轻重”,不说“无入之轻重”,那么他们的入声似乎也有阴阳之区别。可是安然在卷五〈定异音〉直到描写“正”的时候才说“入有轻重,重低轻昂”,又好像他们是没有这个区别的。这一矛盾应该怎么解决?我想第一个办法是认为〈定异音〉对“表”的描述拘泥于每声用八个字的格式,顾不得写上有这个区别。第二个办法则与此相反,认为〈序〉中的概括讲究顺口(如说“或无上去入之轻重”则嫌别扭),把入声不分阴阳的事搁在一边没有说。到底哪一个办法对,是不容易决定的,我则偏向于第二个,因为

^① 严格地说,调类应当是音位论的范畴,相当于调位(toneme)。大概在唐代,声母清浊的音位对立还没有废除,声调阴阳的分别只不过是一个调位的两种声学变体(phonetic variants)。因此把那时代的阴、阳二调各称为调类是有问题的。虽然如此,本篇为叙述的方便,按照一般的习惯,仍采用通俗的说法。

〈序〉里的概括很可能只讲大体的情形,没有和正文同样的周全性和精密性。〈定异音〉对“表”的描写虽受字数和修辞方面的限制,但也不妨在“上中重音,与去不分”之后再补充写一下入声的情况。

6.2 〈序〉里“或无上去之轻重”正与“表”的情况相合,“或无平去之轻重”就应该是“金”的情况,那么“金”的平声就不分阴阳吗^①?可是〈定异音〉却说“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似乎“金”的平声还是和“表”的一样,是分阴阳的。这又是一个矛盾。上面已说过:“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可能只说调值的范围,不说调类的分合。虽然如此,〈定异音〉接着说:“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这里的平声,与其把它解做“表”的平声,不如解做“金”的平声(或“表”、“金”两人的平声)顺当,那么“金”的平声应该有阴阳之别了。也许“金”的阴平和阳平其调值比“表”的稍微接近,讲得笼统一些就可以说是没有轻重的。

七 “表”、“聪”的声调系统和 现代官话声调系统的关系

7.1 有坂秀世(1936)认为,“表”的方言就是现代官话(北方话)的祖先,或与官话的祖先极接近的一个方言,因为“表”的声调系统平、上、去声调类的分法完全和官话里的分法一样:平声分阴阳,次浊字归阳平;上声只有阴调,由全浊字构成的阳调归入去声;去声不分阴阳。有坂氏说,官话是宋、金、元以来在首都所处的“东北地方”

① 赖惟勤(1968)根据〈序〉里的这一句认为“金”的平声是基本上不分阴阳的。

发达起来的标准语,它逐渐扩大了势力,终于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域。他推测,“表”大概代表着当时“东北”某一地方的声调系统。他说的“东北”,可以说是以开封和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平原。他认为“正”、“聪”二人所带来的则是洛阳、长安等“西北地方”的声调系统。

马渊和夫(1962)在把“表”断为袁晋卿的前提下批评有坂的看法。他说袁晋卿既然很年轻已学得《文选》、《尔雅》音^①,不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又因为是随着日本遣唐使来日本的,他似乎本来居住在长安;即使他的故乡在偏僻的地方,他一定也学会了长安读书阶级的标准读音。

7.2 我打算从另外一个角度批评有坂氏的看法。我想“表”以外的三家里面也有可以作官话声调系统的祖先的。三家之中最显然有这资格的是“聪”。“聪”是“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可知“聪”的阳上、阴去和阳去调值相当接近,只有微妙的差异。要是这三个调值类似的调类发生合并的话,那么“聪”的平、上、去调类的分法就变得基本上和“表”相同了。

但这并不是我首先提倡的,赖惟勤(1954)早提出过同样的看法。他说,“表”的声调系统可能出自像“聪”的那样,阴去、阳去和阳上三个调类的调值非常接近的系统。这里我不想去讨论“金”、“正”有没有同样作官话之祖的资格;目前只要能指出“表”以外至少有一家具备这资格就够了。作为官话声调系统的母胎,“表”和

^① 如此将《续日本纪》里的“学得《文选》、《尔雅》音”(参看本文§3.2)解做袁晋卿来日本以前的事,恐怕有问题。但他来日本时已有学问的根柢,是可以肯定的。

“聪”的分别只在“已然”和“将然”，或“显在”和“潜在”的不同。我们应当知道有这分别，但也不可忽视“潜在”的可能性。

安然介绍聪法师曾“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这话大概是根据智聪跟他谈过的经历写的。其中“久住长安”若不虚夸，智聪学会的汉语发音自然是和长安音有密切关系的一种标准音。既然我们也能在有坂氏说的“西北地方”里找到官话声调系统的祖型，就不必把“表”的系统硬归为“东北地方”的方音了。

7.3 如赖惟勤(1954)所说，“聪”的系统可以看做是“表”的母胎，可是从时代来说，“聪”比“表”晚，这似乎有点不合理。但我看这并不足为奇。我们不能认为唐代长安、洛阳等北方中心地域的声调到处都是统一的。在这地域内部，阴去、阳去和阳上的合并，有的方言(或次方言)发生得较早，有的方言发生得较晚，中间相隔一百多年，这样的情形并不是不可能的。

一个大城市的语音往往在某些特点上分成几派。例如现代北京话里的韵母儿化规律似乎有几种变异。详细的情况这里不谈。就拿 er 和 eir, enr, ir(“子儿”、“汁儿”等的韵母)的分合来说，现在最标准的是分的，但也有不分的一派^①，好像还有一、二声分，三、四声不分的一派^②。还有 ar 和 air, anr, 北京话是不分的，可是不少北方人却有区别。我觉得《悉曇藏》里四家调类的不同，也许可以和北京话以及与它接近的方言里儿化分歧的情况相比。何况唐代的北方有长安和洛阳两个中心，那一带的语音分歧也许更为复杂。

① 张洵如(1949)认为两者同音，放在〈小人辰儿〉里。

② 参看 Hartman(1944), Rygaloff(1955)。

聪法师说“前三家音巨唐无矣”，这话当然是夸张的。不用说唐朝全土，就是北方也不见得这样。李涪《刊误》〈切韵〉条认为，“很”和“恨”，“辩”和“弁”，“舅”和“旧”，“皓”和“号”，都应该是同音字，可知他认为标准的语音系统中，全浊上声和“表”一样，已经变为去声了^①。智聪和李涪大致上可以说是同时代人，而他们的调类就不相一致。李涪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云云，可知他的标准是洛阳音。可是我们不能据此推想，当时的长安音则都像“聪”那样分八个调类。长安音本身可能也有内部的分歧。比《悉昙藏》早 70 年的慧琳《一切经音义》(810 年成书)，是向来被认为代表秦音的。周法高(1948)指出，这里有一部分音注反映浊上变去的变化。那么在慧琳的时代，长安音内部已经有这变化的趋势了。

我认为一个地域的语音变化的情况像一条大河的水流，总的方向虽然是一定的，可是除了主流之外还有各种支流，它们流下去的速度和方向并不一样，当然主流可以吸收支流，但支流有时也可以削减主流的势力，终于会变成新的主流。《悉昙藏》里声调记载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它告诉我们官话声调系统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好像也有过这种复杂的局面。

1981 年 6 月

写此文时承詹伯慧教授鼓励，并修改中文，在此谨志谢意。

引用文献

罗常培 1930:《厦门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

^① 关于对李涪和他的《刊误》〈切韵〉条的考证，参看罗常培(1956)、周法高(1948)、周祖谟(1958a)等。

一,北京;科学出版社,北京,1956年。

1956:《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北京。

张洵如 1949:《北平音系小辑编》,开明书店,上海。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北京。

周法高 1948:《玄应反切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359—444页;《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1968年,153—238页。

1968:《论切韵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89—112页;《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崇基书店,香港,1968年,1—24页。

周祖谟 1958a:《切韵与吴音》,《语言学论丛》2;周祖谟《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66年,474—482页。

1958b:《关于唐代方言四声读法之一些资料》,《语言学论丛》2;周祖谟《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66年,494—500页。

赖惟勤 1954:《丹陽方言と日本漢字音との声調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5,65—80頁。

1958:《中古中国語の内・外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11,左起31—59頁。

1968:《呉音と漢音の声調》,水田紀久、賴惟勤編《中国文化叢書》⑨《日本漢学》(大修館書店,東京),58—66頁。

林史典 1979:《漢字三音考(解説)》,《勉誠社文庫》67《漢字三音考・地名字音轉用例》,勉誠社,東京,127—143頁。

马渊和夫 1962:《日本韻学史の研究》I,日本學術振興会,東京。

桥本进吉 1918:《安然和尚事蹟考》,《史学雜誌》29.8;《橋本進吉博士著作集》第12册《傳記・典籍研究》(岩波書店,1972年),38—108頁。

1920:《入唐僧智聰と悉曇藏の聰法師》,《密教研究》4;《橋本進吉博士著作集》第12册《傳記・典籍研究》(岩波書店,1972年),123—133頁。

小野胜年 19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第一卷,鈴木學術財團,東京。

有坂秀世 1936:《悉曇藏所傳の四声について》,《音声学協會会報》41;《国語音韻史の研究》增補新版,三省堂,東京,1957年,591—599頁。

1944:《国語音韻史の研究》,明世堂書店,東京。

- 朝山信弥 1941:《古代漢音における四声の輕重について》,《国語・国文》11. 11, 1-14 頁。
- Hartman, L. M. 1944: “The Segmental Phonemes of the Peiping Dialect”, “Laguage” 20. 1, 28-42 頁。
- Mei, Zulin (梅祖麟)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86-110 頁。
- Rygaloff, A. 1955: “la phonologie du Pekinois”, “T’oung Pao” 43. 3/4, 183-264 頁。
- 《遍照發揮性靈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1《三教指歸・性靈集》, 岩波書店, 東京, 1965 年, 149-471 頁。
-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30 冊《悉曇具書》: 佛書刊行会, 東京, 1936 年。
-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28 冊《智證大師全集第四》: 佛書刊行会, 東京, 1933 年。
-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4 卷: 大正一切經刊行会, 東京, 1931 年。
- 《扶桑略記》:《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 12 卷, 国史大系刊行会, 東京, 1932 年。
- 《漢字三音考》(影印本):《勉誠社文庫》67《漢字三音考・地名字音轉用例》, 勉誠社, 東京, 1979 年, 1-126 頁。
- 《假字の本末》:《伴信友全集》第 3 卷, 国書刊行会, 東京, 1907 年, 385-490 頁。
- 《令集解》(第一卷): 国書刊行会, 東京, 1912 年。
- 《日本書紀》:《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68, 岩波書店, 東京, 1967 年、1965 年。
- 《日本書紀索引》:《六国史索引一》, 吉川弘文館, 東京, 1969 年。
-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13 冊, 佛書刊行会, 東京, 169-282 頁。
- 《入唐五家傳》:《大日本佛教全書》113, 佛書刊行会, 東京, 156-168 頁。
- 《三代實録》:《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 4 卷, 国史大系刊行会, 東京, 1934 年。
- 《三音正訛》: 東京大学圖書館所藏 1752 年刊本。
- 《胎藏舊圖樣批記》:《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28 冊, 佛書刊行会, 東京, 1933 年, 1283-1289 頁。

- 《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28 冊,佛書刊行會,東京,1933 年,1364—1380 頁。
- 《悉曇三密鈔》:《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4 卷: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東京,1931 年,715—810 頁。
- 《悉曇藏》:《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84 卷: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東京,1931 年,365—462 頁;《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30 冊,1—214 頁。
- 《續日本後紀》:《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3 卷,國史大系刊行會,東京,1934 年。
- 《續日本紀》:《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 卷,國史大系刊行會,東京,1935 年。
- 《續日本紀索引》:《六國史索引二》,吉川弘文館,東京,1967 年。
- 《養老律令》:《日本思想大系》3《律令》,岩波書店,東京,1976 年。
- 《作文大体》:貴重圖書刊行會,京都,1934 年。

1987 年

补 注

1 关于调值问题请参看拙文《日僧安然〈悉曇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调值问题》(2002 年)。

2 东京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无名氏《文选注》残卷,存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等部分,里面“袁”字凡见十四次,其中七次讹作“表”(一次讹作“素”),参看罗国威笺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巴蜀书社,成都,2000 年)。

3 只有 842 年 7 月 21 日至 10 月 13 日惟正到楚州去取本国书信,不在圆仁身边。

中古汉语的清入声与北京话 声调的对应规律*

—

中古汉语的入声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规律,对于全浊字和次浊字是很清楚的:中古全浊入声字在北京话里照例变为阳平(少数文言字变去声),次浊入声字照例变为去声,都很少例外。但对于全清和次清的人声字,向来认为没有明显的对应规律可循,因为它们中间变做北京四个声调的都有,而且都有相当的数量,也看不出它们的分化规律。

5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由于偶然的机缘要探讨清入声字的演变规律,结果以为摸到了些头绪,写成了一篇文章,即平山久雄(1960),至今快三十年了。这篇论文现在看起来写得太幼稚、啰唆,但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还是如此,只不过有部分的改动。因此我想把这篇旧文的内容重新叙述一遍,算是我现时的看法,请

* 本文基于1989年9月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演用的讲稿,又经过了修订和整理。

学者批评指教。

二

2.1 陆志韦(1948:132页)说:“(为探索清入声的演变规律)最好的办法,不如从口语出发。”受此启发,我当时把《方言调查字表》和《古今字音对照手册》里收录的清入声字粗略地分成口语字(即在北京话里口语味儿较浓的)和文言字(即在北京话里书面语味儿较浓的)两类,分别观察其演变情况,就知道文言字读阳平和读去声的较多,读阴平和读上声的较少。换言之,清入声字在北京读阴平和读上声的都以口语字为主。英国学者 Forrest (1950:447页)也指出来,清入声口语字倾向于作阴平和上声,和文言字作明显的对比。据此我先这样假定:在北京话固有的口语层次(叫A层)中,清入声字变入了阴平和上声,现在北京口语里读阳平和读去声的清入声字,是从文言层次里借进来的。

关于A层的字读阴平还是读上声,可以看出有以下三条比较明显的倾向,我们称之为通例①、通例②、通例③:

通例①:主要作动词用的(简称“动词性口语字”)大多读阴平。请比较〈表一〉(见下页)“甲一”和“乙一”,比率为75比7。

通例②:主要用作名词而经常带轻声词尾的(“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多读阴平。比较〈表一〉“甲二”和“乙二”,比率为14比5。这里名词的范围定得宽一点,包括数词、姓氏和量词(下项亦同)。

通例③:主要用作名词而不带轻声词尾的(“不带轻声词尾的

名词性口语字”)多读上声。比较〈表一〉“乙三”和“甲三”,比率为 31 比 11。这一类字有的经常带“儿”尾,如“色儿”、“家雀儿”,可见清入声消失时“儿”已失去轻声词尾的资格,变成韵尾了。

主要作形容词用的口语字(“形容词性的口语字”)为数不多,也没有明显的倾向。比较〈表一〉“甲四”和“乙四”,比率为 5 比 3。

清入声文言字里也有一些作阴平和上声的,作阴平的比作上声的相对多一些,参看〈表一〉“甲六”和“乙六”,比率为 39 比 15。

陈刚(1988:249 页)指出:“古清入声字之本义为动词的,大部分读阴平”,和通例①正相吻合^{补注1}。陈文接着又说:“基本义为名词的,大部分读上声”,这却只适合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

口语字和文言字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线,〈表一〉中的分类自然会有商榷的余地,若请别人重新分类可能会有不同,但也不会影响大局的。还有一点读者会怀疑:给一个“字”以一定的词性,这认定工作是那么容易的吗?当然一个字往往兼有不同词类的用法,但一般情况还是其中一种词类的用法占优势,据此可以认定词性。只有个别的字难以下结论,例如“滴”字,它当动词和当名词(包括量词)两种用法的频率好像几乎一样多,〈表一〉认为它是动词性字恐怕有点武断,但这种情况毕竟较少,也不会影响大局的。

〈表一〉北京读阴平和上声的清入声字

(据《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81 年新版。圆括弧内是原注,方括弧内是平山所注。此外还有一些原注,今从略。)

甲 读阴平(共 149 字)

甲一 动词性口语字(共 75 字):发、搭、答(答应)、套[套拉]、塌、扎(捆扎)、
 喱、擦、撒(撒手)、刮、插、杀、煞(煞住)、夹、掐、押、压、刷、剃、挖、蛰、割、搁、磕、

喝、拨、泼、脱、託、托、撮、缩、捉、戳、说、豁、薅、憋、撇、瞥、贴、接、揭、隔 jiē、切、歇、噎、劈(劈断)、缺、约 yuē、织、吃[吃饭]、逼、劈、滴、踢、剔、激、吸、扑、出、哭、铜(铜碗、铜子)、焯、掰、拍、塞 sāi、侧 zhāi(侧歪)、摘、拆、塞 sēi、剥 bāo、着(着凉)、削 xiāo、约 yāo(约一约有多重)。

甲二 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共 14 字): 褙[褙裤]、鸭[鸭子]、鸽[鸽子]、胳[胳膊、胳臂]、钵[钵子]、作[作坊]、桌[桌子]、蝎[蝎子]、楔[楔子]、虱[虱子]、叔[叔叔]、穀[穀穗]、窟[窟窿]、屋[屋子]^{补注2}。

甲三 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共 11 字): 八、郭[姓]、薛[姓]、汁、只、七、漆、戚[姓]、一、藕、粥。

甲四 形容词性口语字(共 5 字): 瞎、结(结实)、湿、秃、黑。

甲五 其他口语字(共 4 字): 鸪[老鸪, 实读轻声]、瞌[瞌睡]、涿[涿县]、膝[膝盖]。

甲六 文言字(共 39 字): 刷、匝、铄、剥 bō、悦、挽、侷、拙、卓、绰、崢、鳖、帖(妥帖)、阙(阙失)、削 xuē(剥削)、失、霹(霹雳)、积、击、息、熄、悉、蟋、惜、析、浙、晰、皙、壹、揖、仆(仆倒)、督、突、忽、惚、屈、诘、曲(曲折)、戊。

甲七 方言字(共 1 字): 瀑。

乙 读上声(共 62 字):

乙一 动词性口语字(共 7 字): 撒(撒种)、眨(眨眼)、瘡、啾、嘱[嘱咐]、得 dǔi、给 gěi(给你)。

乙二 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共 5 字): 蹶[蹶子]、劈[劈柴]、谷[谷子]、骰[骰子]、饺[饺子]。

乙三 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共 31 字): 法、发、塔、獭、甲、尺 chě(工尺)、葛[姓]、索、撇(撇捺)、帖(请帖)、铁、血 xiě、雪、尺 chǐ、笔、匹、癖、脊、乙、幅、骨、曲(歌曲)、百、柏、色 shǎi、北、郝、脚、角 jiǎo、雀 qiǎo、宿 xiǔ(一宿, 一夜)。

乙四 形容词性口语字(共 3 字): 渴、恶(恶心)、窄 zhǎi。

乙五 其他口语字(共 1 字): 鹊 qiǎo[喜鹊, 实读轻声]。

乙六 文言字(共 15 字): 胛、岬、给 jǐ(供给)、戟、乞、卜、璞、朴、笃、瞩、属(连属)、汨(汨没)、穀、谷、鹁。

乙七 方言字(无)。

2.2 上面提到的三条通例是以词类为声调的分化条件的。词类属于语法范畴,不能直接作为声调演变的条件。因此要解释上面三条通例的历时论上的含义的时候,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能够把词类条件变换成语音条件?对于这个问题,通例②和③给我们提供解决的头绪。通例②和③都说的是名词性口语字,带不带轻声词尾是分歧的条件,这条件倒可以说是语音上的。通例①下的字也有少数带轻声词素的,如“答(答应)”、“侧(侧歪)”,这些实与通例②下的字同类,都可以看做是清入声口语字在轻声字前面变入阴平这一变化的反映。那么其他的动词性口语字虽然不在自己词干内部包含着轻声词尾,但可推测,它们在日常谈话中后面带轻声音节的频率比较多,所以大多变为阴平。照今天的用法,这些动词在后面加轻声词素表示时态等附加意义的机会相当多,如加“了”、“着”、“得”、“过”等。就此我们假定,从前北京话里清入声将要消失的时候也基本如此。

三

美国学者 Stimson(1962:382 页)发展了上述 Forrest 的看法,根据入声字的声调把北京话分成 A、B、C、D 四个层次,清入声字读上声的算是 A 层,他认为这就是北京话固有的口语层次;读阴平的算是 B 层,是最早的借用层次,早已渗入口语里面了。C、D 两层则是再以后借过来的文言层次。但如本文 § 2.1 中所述,口语作阴平的字和作上声的字之间能看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条件,我认为不如把他的 A、B 两层并为一个层次,就是本文的 A 层。

读者也许还要发问：你刚才归纳通例的材料都是在北京话变阴平和变上声的口语字，而一概把变阳平的和变去声的视为属文言层次，可是清入声来的口语词念阳平和念去声的都相当多，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口语词如“急”jí、“折”zhé、“节”jié、“觉”jué、“得”dé、“涩”sè、“阔”kuò、“刻”kè、“客”kè、“作”zuò、“轧”yà等，所以你认为这种假设是不是不太切合实际？对于这个疑问，我的答复是这样的：

北京话韵母有文、白两种对应形式的一些入声韵摄里，即从前以-k收声的一部分入声韵里，要是有一个清入声字的韵母属于白话的对应形式，那么它的声调就几乎一定是阴平或上声^①。比方上面举例中“觉”、“得”、“刻”、“客”四字，韵母都是文言的对应形式，如果它们的读法属于白话层次的话，就应该读做(除声调)*jiao, *dei, *kei, *qie^②才合乎白话的对应规律，但事实却不这样读，这就是它们读阳平或去声原属文言层次的明证了。照索绪尔的说法，上举那些字从共时论的观点来看是口语字，从历时论的观点来看则是文言字。文言音的主层(§ 7.1 所称C层)被借进北京话里

① 相反不一定对。有些今读阴平或上声的清入声口语字，韵母却在文言音一边，即，甲一：擱 gē、託 tuō、托 tuō、约 yuē；甲二：膊 gē、作 zuō、叔 shū；乙三：索 suǒ；乙四：恶 ě。我认为这些字或是意味着北京话的口语层次(A层)本身又含有文、白两种对应形式，或是意味着文、白对立的条件有时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认定是文是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举9字中有7字(即“叔”、“约”以外)是宕摄一等字；《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宕摄一等铎韵开口字今读白话音-ao韵母的除“郝”(晓母)1字外都是浊音字，即“薄”、“落”、“烙”、“酪”、“凿”、“鹤”。也许应该看做：铎韵开口只有浊音声母下才分文、白两读，清声母下则不管文、白，都一律是-o, -uo, -e。

② 俞敏(1983:38页)说：“客”字在“来客了”里头念 qiě。……这个音青年们已经不用了，东北还保留着。

来以后大概已有好几百年,其间文言音相当广泛地渗透到口语里面,是很自然的。Stimson(1962:382页)、陈刚(1988:249页)也都注意到:北京话带复韵母(以-i,-u收尾)的清入声字,它们的声调照例是阴平或上声^①。这和上述的看法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清入声字应该认为是“假入声字”,它们的今音并不是从清入声变来的。上述举例中的“作”、“轧”便是其例^{补注3}。“作”《广韵》有三音,即暮韵精母臧祚切、个韵精母则个切、铎韵精母则落切,字义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北京读 zuò 正符合去声个韵一读,“作坊”的“作”读 zuō 才是入声铎韵一读来的。“轧”在济南、扬州、成都等地^②都念去声,《广韵》去声禡韵疑母“吾驾切”小韵有“研”字,注云“碾研”,这应该是现代“轧”的本字。

四

4.1 说到这里应该介绍暗示清入声演变规律的另一线索,那就是“一”、“七”、“八”、“不”四字的特殊变调。北京话里“一”、“七”、“八”本调是阴平,“不”本调是去声,在去声前面都变阳平,“一”还在阴平、阳平、上声前面变去声。北京话里有这类特殊变调的只限于这四个字,恰恰都是以前的清入声字(“不”语源上是“弗”,也是清入声字),这现象不会是偶然的,只有作如下解释才能

① 陈刚(1988:254页附注15)举三个例外,即“石竹(zhòu)子”、“冷风朔(shào)”、“亲叔伯(bái)”。此外可以再补一个,即“壳”qiào(觉韵溪母)。

② 济南音据张兆钰、高文达(1958),扬州音据王年芳(1959),成都音据甄尚灵(1958)。

理解：

在过去的北京话里清入声消失的时候，其演变规律看字组^①里下一字的声调如何而有所不同，结果在清入声消失后一段时期，以前的清入声字都有了变调，其变调规律和现在“一”字的变调相同（只有单念时读上声这一点与现代的“一”不同，原因后详），但这种变调毕竟是一种不规则现象，因为只有以前的清入声字才起变调，人们非得一个一个地记住哪些字变调，哪些字不变调，听话时辨认变调的语词也要费点脑筋，因此为免除这些麻烦，变调逐渐趋于废除，于是以前的清入声字就开始向一般字看齐，无论在字组里的什么地方，在哪一声调之前，都采取一个固定的声调。只有上述四个字，因为极常用的缘故，才保存了原有的变调。其中“七”、“八”两字常用的程度稍差，只保留去声前的变调，现在连这都是任意的了。常用的词在语音、语法上能禁受不规则性，这是各种语言所共同的特点，比方英语动词有不规则形态变化的只限于比较常用的动词，这是因为常用的词有不规则的地方也可以死记，而这种不规则的形态往往是以前的规则形态遗留下来的痕迹。

4.2 北京话里有少数双音节口语词，其前字的破读可解释为从前的清入声变调在那里固定了下来，如“作料”zuóliào、“隔壁儿”jièbǐr，请参看俞敏（1983：33页、40页）^②。

① 两个以上的音节紧密结合的单位叫做“字组”（一个字单说，也算一个字组）。现在汉语学里说字组，多是描写方言变调的时候，因为字组往往作为变调的基本单位。

② 这类词的后字多读轻声，可见在清入声将要消失的时候，现在的轻声字有的已经是轻声（因而有规律Ⅱ，参看§5.1），有的还保持原调，至少还保持去声和非去声的分别。金有景（1982）从本调为上声的轻声字前面上声字变调和不变调的不同（如“老虎”对“耳朵”）入手，也指出北京话里的轻声字有新旧的差别。

Forrest(1948:186 页)谈及北京话里的清入声演变规律说:一个字在句中频繁出现的位置可能曾影响它采取某一固定的声调。这个想法很中肯,可惜后来为他自己所放弃,同书第3版(1973)竟删去了这一段。据 Forrest(1950:444 页)说,那是因为他认为清入声的演变条件的性质不应该和浊入声的完全两样。但他这样说没有充分的理由。根据 A 层里入声的演变方式,我们应该拟测,北京话的入声曾经分为阴入、阳入两调(阳入变为阳平和去声^①)。既然分做两个独立的声调,那么它们的演变可以按照不同性质的条件,何况它们不一定是同时消失的呢?看现代方言的情况,阳入的消失有时是早于阴入的^{补注4}。

五

5.1 综合上面提出的两种线索,即三项通例以及“一”、“七”、“八”、“不”四字的特殊变调,北京话口语层次中清入声曾舒化时的演变规律可拟如下(字组里的最后一个非轻声音节叫“末位”,其他位置叫“非末位”。单字单念时也算“末位”)。

规律 I:在字组的末位(称为“环境 I”),变入了上声。

规律 II:在字组的非末位而在轻声前面(称为“环境 II”),变入了阴平。

规律 III:在字组的非末位而在阴平、阳平、上声前面(称为“环

^① 一个阴入调怎么能按照声母全浊和次浊的不同而分做阳平和去声,本文不去讨论。我想这是有办法说明的^{补注5}。

境Ⅲ”),变入了去声。

规律Ⅳ:在字组的非末位而在去声前面(称为“环境Ⅳ”),变入了阳平。

为什么同一个清入声(即阴入)依所处环境不同而变入了不同的舒声调?大概阳入早变阳平(全浊)和去声(次浊),促调只剩下一个阴入,因此阴入可以适应环境而采取不同的音高和升降形式,只保持稍短的特点,后来丧失了这个特点,各归入了调值相近的舒声调。去声开头是高音,清入声在环境Ⅳ中变入升调的阳平是很自然的。阳平和上声开头较低,再假定从前阴平的开头也没有今音那么高,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环境Ⅲ中清入声变为去声了。

在环境Ⅰ中清入声变上声,是因为清入声从唐宋以来就和上声构成一个调位(toneme)^①,就是说,它和上声同调,只是短促,所以一直随着上声调值的演变(我认为从高音域的升调变为低音域的升调或凹调)变过来,再失去短促性,就归入上声了。在环境Ⅱ中清入声的调值似乎与环境Ⅰ中稍有不同,所以归入阴平了。如上拟测,以前的阴平没有现在那么高,它可能和上声相近。现代东北方言的阴平一般比北京低,特别是旅大、营口等地的阴平是312,和上声213接近(宋学1963:113页);我想东北方言的这种情况很能说明北京口语里清入声曾舒化时的语音条件。

5.2 按照上面四条规律演变的结果,以前的清入声字就依字组里的环境如何而采取不同的声调,这就无异乎是变调。如上面

① 参看平山久雄(1978)补注⁶。

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变调逐渐被废除,每个字的字调都被一个出现频率最大的声调统一了。这是由于类推的心理作用。在日常谈话中,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处于环境Ⅱ中的频率最大,所以用阴平统一了变调;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处于环境Ⅰ中的频率最大,所以用上声统一了变调。动词性口语字用阴平统一变调应该也是因为它带轻声词素,处于环境Ⅱ中的频率最大的缘故。我开始提出的三条通例就可以以此来说明了。

形容词性口语字作阴平的有5字(〈表一〉甲四),其中除“结实”的“结”本身带轻声词素以外,其他4字都爱 and “了”结合,如“眼睛瞎了”、“衣服都淋湿了”、“笔尖秃了”、“天黑了”之类,这个特性容易使人们选阴平为固定调;此外“瞎”、“秃”两字也许受过名词“瞎子”、“秃子”的感染。形容词性口语字变上声的有3字(〈表一〉乙四),其中“窄”字和“了”结合的机会不多,所以它采取了上声不足为怪。“渴”的用例中带“了”的相对频率好像也没有上面4字那么多。“恶心”则可合并作为通例②的例外看待。

5.3 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当时口语中每一类字甚至每个字在各种环境中出现的频率,上面所说的频率大小不过是一种假设,只是照现代汉语里对各类字用法的印象来看似乎不太违背情理罢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常用模式来说明现实。模式就是由一系列的假设来构成的理论性的框架,用来解释事实,随着科学的进步可以修订。关于清入声演变规律的上述看法也就是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这样假定似乎能给清入声的演变带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我怕上面所拟的四种环境也许把事实概括得过于单纯了,实际情况恐怕更复杂一些,比方三字组的第一字和第二字虽然同在

“非末位”，但对清入声演变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①。如果这种细节将来能被阐明的话，我们的解释当然也会有所修改的。

六

现在要讨论三项通例的例外。通例①例外很少，动词性口语字只有7字读做上声。这些大多有办法说明其作例外的原因，例如“给”gěi是“假入声字”，因为很多官话方言都把这个词读做上声。还如“得”děi，这个词不能带“了”、“着”等轻声词尾，难怪它读做上声。对其他字作例外的原因，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叙述^{补注7}。

通例②例外较多，大约是合例字的三分之一（全体的约四分之一）。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也许名词比动词更容易受方言的影响。名词是事物的名称，可以跟事物一起传播，例如“谷子”是农村的庄稼以及从农村运来的一种粮食，它读gǔzi可能是把乡音带进来的。那个方言中清入声字在轻声前面也变为上声了。第二是类推，有些字带不带“子”尾两可（两种形式也会有消长），不带“子”尾时的读法会影响带“子”尾时的读法。

通例③的例外也较多，这些例外字应该是方言的借用。清入声文言字北京读阴平的虽没有读阳平的和读去声的那么多，但毕竟达到一定数量（参看〈表一〉甲六）。因此可以设想，有一种类

^① 平山久雄(1961)曾把“语调素”(相当于字组)里重音的位置和清入声的演变方式结合起来，对平山久雄(1960)里提出的演变规律有所修改，但我现在觉得那未免穿凿，不如仍旧。

似北京话但清入声在环境 I 中也变阴平的方言,它曾对北京话发挥了一些影响,北京话从那里吸取了若干文言字的读法,同时也吸取了若干口语词的读法。“粥”字读阴平,韵母是-ou,表示口语的对应形式,当是其例。数词“一”、“七”、“八”单念时都读阴平,大概也是其例。数词在商业等交际场面中使用的机会较多,容易受外地方言的影响。

附带要说“不”字单念时读去声的原因。我想这大概是句调的影响:“不”字单用只限于在“不!”这个感叹句中,因此会受感叹句调的影响变为下降的去声了。

七

7.1 以上讨论了清入声在北京白话音里的演变以及一些附属问题。最后要简单地分析一下清入声在文言音里的演变方式。清入声文言字的声调分布也是错综的,往往在相同的音韵条件之下某字读阴平,某字读阳平,某字读去声,找不出规律,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北京话里的文言音来源并不单一,是由几个来自不同时期的语言层次构成的。

根据前人的统计,再加上个人的观察,我认为北京话除了固有的白话音层次 A 以外还有 B、C、D、E 四个文言音层次(B 兼文、白两种,反正都是借用的层次)。每一层次中入声演变的规律可拟如〈表二〉。表上全清声母分全清 I (塞音和塞擦音,但影母除外)和全清 II (擦音),影母独立。

〈表二〉 北京话各语言层次中入声的演变规律

声母 层次	全清			次清	次浊	全浊
	I	II	影			
A	上声(字组末位)				去声	阳平
B	阴平				去声	阳平
C	阳平	去声				阳平
D	阳平		去声			阳平
E	去声					

各层命名的次序是这样拟定的:口语层次应该放最先,叫A层;B层的演变方式接近A层,故次之;C层字数最多,是最占优势的文言层次,故次之;D层的内容接近C层,故次之;E层可谓独树一帜,应放最后。在两个以上的层次演变方式相同的地方,就不能分辨某一个字属于其中哪一层次,除非韵母的文白两种对应形式能够提供信息。

7.2 四个借用层次的原籍到底是何时何地的方言,它们被借进北京话里来的时代和先后次序怎样,这些问题目前是不能解决的^{补注⁸}。各层的基础方言不一定能在现代的方言中找到其后代,可能它给北京话提供文言音以后几百年之间就消灭了^①。但是,北京话从元代以来作为首都的语言,一直在受五方杂处的影响,也随着朝代的更替换过大批人口,所以它的来历很曲折,历时构造会很复杂,这一点近来有俞敏(1984)、林焘(1987)等学者阐发,可以

① 我认为C层的基础方言里入声并没有按照如〈表二〉所示的规律已经舒化;那里入声很可能是分阴阳的,它作为北京话的阳入声被借进来,后来随着北京话里阳入声的演变而舒化了。这个看法待另文^{补注⁹}详作说明。

说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因此,把北京话根据入声的演变方式分析成好几个层次的看法,我想现在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当然分层的细节会有修改的余地。

俞敏(1983:31页)说:“过去有些老先生喜欢在北京音里念出个人声来,做不到就把一切入声字都念成去声。”白涤洲(1931:14页)也说:“大抵读书音都念成去声,甚至于还故意念得短一点,企图能合于所谓入声。”那么E层可能就是这种人工读音的遗留,并不是来自确定的基础方言。

文言字一般容易受到字形的影响而读错,即“读半边字”。入声字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铍”字读 shū 并不一定属于B层,可能受过“杀”字的影响。其他不很常用的清入声字里可能也有通过人工的办法而定其声调的,如死读反切、依照韵书上的同音字的读法等。那么这些字也就无所谓属于哪一层次了。

引用文献

- 白 涤 洲 1931:《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2.2,1—42页。
- 陈 刚 1988:《古清入声字在北京话里的演变情况》,《中国语言学报》3,245—255页。
- 金 有 景 1982:《北京话“上声+轻声”的变调规律》,《语海新探》1,山东教育出版社,251—297页。
- 林 焘 1987:《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3,161—169页。
- 陆 志 韦 1948:《国语入声演变小注》,《燕京学报》34;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8年,128—134页。
- 宋 学 1963:《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2,104—114页。
- 王 年 芳 1959:《扬州方言》,《方言和普通话丛刊》2,中华书局,1—38页。
- 俞 敏 1983:《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30—40

页。

1984:《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方言》4,103—139页。

张兆钰、高文达 1958:《济南音和北京音的比较》,《方言和普通话丛刊》1,中华书局,1—38页。

甄尚灵 1958:《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1—30页。

平山久雄 1960:《中古入声と北京語声調との対応通則》,《日本中国学会報》12,139—156页。

1961:《北京語に於ける清入声舒声化の条件について》(上)(下),《中国語学》114,9—12页;116,6—10页。

1978:《中原音韻入派三声の音韻史的背景》,《東洋文化》58,77—100页;王吉尧译《中原音韻入派三声の音韻史背景》,《音韵学研究通讯》12,1988年,36—47页。

Forrest, R. A. D. 1948: “The Chinese Languag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the 3rd editi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Glasgow, 1973.

1950: “The Ju-sheng Tone in Pek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3, Pt. 2, 443—447页。

Stimson, H. M. 1962: “Ancient Chinese -p, -t, -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 4, 376—384页。

《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北京,1955年;修订本:1964年。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科学出版社,北京,新一版: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

1990年 原题为《中古汉语的清入声在北京话里的对应规律》

补 注

1 如本书九《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1995年)162页注①中介绍,丁声树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清入声动词多数读成阴平的现象了。

2 有一位曾从北京来日本住过一年的小朋友,他常叫我“平山伯伯

bāibai”；这里的“伯”bāi也可以加入此类。

3 “错”也可以加在此列，因为据《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重排本（37页），“错”字的读法无论南北在多数方言里都似乎是从去声个韵清母来的（《广韵》、《集韵》均未收此音）。

4 这一点也可以从明末的北京话里得到印证。郭力《古清入字在〈合并字学集韵〉中的归调——兼论明代以后北京话中古清入字的归调变化》（《语言学论丛》19, 1997年, 74—89页）介绍徐孝在《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引证》里将浊入声认定为长音，清入声认定为短音的话，并解释说：“在他头脑里仍保留着清入读短音的印象，清入变为舒声应当是为时不久的事情，是在浊入舒化之后才开始的。”（85页，“舒化”原作“清化”，当误）。

5 本书《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1995年）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种看法。

6 平山久雄（1978）根据合音词“婶”（<“叔母”）、“怎”（<“作么”）拟测清入声曾经有一段时期与上声同属一种调位，来窥测《中原音韵》里清入声派作上声的音韵史背景。俞敏《北京话本字劄记》（《方言》1988. 2, 152—154页）〈古人声[p]尾的遗迹〉一节所举的几个人声字中声母属清的有“哈”、“掐”、“眨”、“鲮”4字，其中“哈”、“眨”、“鲮”3字在包含-p遗迹的复音词“哈巴”hǎba、“眨巴”zhǎba（或 zhǎme）、“鲮□鱼”tǎmeyú中都念上声，只有“掐”在“掐巴”qiǎba中也念阴平。这3字的情况正符合上述拙文的拟测。这是清入声舒化的一种特殊事例，其舒化时期当早于一般清入声字的舒化。

7 “撒”读上声可算是“假入声字”。《广韵》马韵二等生母有“灑”，义为“灑水也”，当是本字。它现在念 sǎ，不念 shā，该受了“撒”（曷韵心母）sā的影响。

“眨”读上声该受了“眨巴”zhǎba（或 zhǎme）的影响，参看补注6。

“囁”则可视作通例②的例外。

那么，纯粹要算通例①的例外的就只有“瘡”、“啁”二字。

8 合乎B层演变规律（以及白话音韵母的对应规律）的方言从河北省冀州市、新河县、南皮县、沧县一带延伸到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这一地域的方言似乎是B层的来源。参看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2000年）、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济

南,2001年)。

9 即本书九《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1995年)。

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 入声的情况

本文要讨论的是北京话文言音基础方言里有关入声的各种情况。当某方言的音系作为读书音影响北京话时,该音系中是否存在入声?它是不是分阴入和阳入?要是该音系里已经没有人声,其舒化的条件和程序又应该是怎样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拟测。这自然也牵涉到对当时北京话入声状况的拟测。

北京话里文白异读的情况较少,有文、白两种读法的大多是古人声字,例如“剥削”,念 bōxuē 是文言音,“剥皮”、“削铅笔”各念 bāo,xiāo,这是白话音。即使一个字只有一种读法,但在可有文白异读的韵摄里面,这一种读法或属白话音一类,或属文言音一类,例如“药”念 yào 是白话音,文言音应该是 *yuè,这读法可能曾经存在过,但已为白话音所吸收了;与此相反,“跃”念 yuè 是文言音,白话音应该是 *yào,但“跃”字很少用在口语中,白话音也就缺少了存在的基础。

一般地说,白话音表示说当地方言的人们世世代代一脉相承

的语音形式；文言音则是本来属于另外一个方言的，由于这个方言文化地位较高，所以它的语音形式被借过来作为规范的读音了^①。那么，北京话的白话音本来也是北京话固有的语音形式，当然它是随着北京话内部所发生的各种音变而变过来的；文言音则是从北京话外面借进来的，而且一定有它的基础方言，哪怕这个方言也许现在找不到它的后代，早已消亡了。

北京话主要是古入声字有文白异读，那是因为文言音的基础方言里古入声字的声、韵、调（特别是韵和调）跟北京话有所不同，而其他字的读法一般都没有不同。

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上面所说的北京话就是现代北京话的核心部分的祖先的意思，它本来可能是外地的方言，后来随着人们的迁徙而进入到北京来的，就像京剧本来是安徽的地方戏那样。如此而言，北京文言音的基础方言甚至也可能是那时被取代的老北京话。

二

为讨论本文的主题，先要说明古入声字在北京文言音里是怎么个变法，和白话音里的演变规律有什么不同。对此问题，我在平

^① 也有学者认为：北京话倒有相反的情况，即文言音多属北京话固有的语言层次，白话音却多是借来的。我不能赞同这一看法，因为白话音是在基本词汇中占优势的，而基本词汇是构成一个方言的核心之一。如果说当时北京人借用另一种方言的语音形式作为他们的白话音，那就等于说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方言，采用了那一外来方言；假如是这样，现代北京话就得算是那一外来方言的后代了。关于这一点，参看本节最后一段所述。

山久雄(1990)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先把该文的内容简单地介绍一下:

2.1 全浊入声字今北京变为阳平,次浊入声字今北京变为去声,都有规律。清入声字则今北京变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间似无明显的规律。但若从文、白以及词类、构词特征的角度去观察,就能看出一些条理。

2.2 清入声文言字读阳平的和读去声的居多,口语字读阴平的和读上声的居多。换言之,清入声字读阴平的和读上声的都以口语字为主。据此可以假定,在北京话固有的口语层次(称为A层)中,清入声字变入了阴平和上声。关于读阴平还是读上声,可以总结出以下三条通例:

① 主要作动词用的字大多读阴平^①,如“发”、“塌”、“擦”、“插”、“杀”、“掐”、“搁”、“喝”、“脱”、“说”、“贴”、“接”、“切”、“吃”、“出”、“哭”、“歇”、“拍”、“摘”。

② 主要作名词用而经常带轻声词尾的字多读阴平,如“褡褡”、“鸭子”、“鸽子”、“胳膊”、“桌子”、“蝎子”、“虱子”、“叔叔”、“轂辘”、“窟窿”、“屋子”。

① 我在原文§2.1介绍陈刚(1988)指出:“古清入字之本义为动词的,大部分读阴平”,“基本义为名词的,大部分读上声”。最近读严学窘(1993),发现其65-66页介绍了丁声树先生1975年所讲的关于《汉语大字典》审音方针的意见,其中有一段云:

入声字的读音,常用字主要向北京人调查,看他们读什么音。把调查的结果归纳一下,看有什么规律,不要主观地定个规律去套。一般的清声母中,用作动词的常归入阴平,如“杀、背(揸)、塞、劈、哭、出、答、折、楔、吃”等,是不是这样,还得用北京人的实际读音来检验。清声母也有个别例外变成阳平的,如“福、得、德”,“背”作名词时读去声,劈柴的“劈”读上声。

可知丁声树先生也很早就注意到清入声动词多读成阴平了。

③ 主要作名词用而不带轻声词尾的字多读上声，如“法”、“塔”、“索”、“铁”、“血”xiě、“雪”、“笔”、“骨”、“百”、“色”shǎi、“北”、“脚”、“角”jiǎo、“雀”qiǎo。

2.3 今读阳平、去声的清入声字中也有重要的口语词，如“急”、“折”(zhé)、“节”、“觉”、“得”(以上读阳平)、“涩”、“阔”、“刻”、“客”、“作”、“轧”(以上读去声)。对此又如何解释？

2.3.1 北京话韵母有文白两种对应形式的入声韵摄里，即通、江、宕、梗、曾诸摄的入声韵里，要是一个清入声字的韵母属于口语的对应形式，它的声调就一定是阴平或上声，如“剥”bāo、“黑”hēi、“摘”zhāi、“角”jiǎo、“雀”qiǎo、“百”bǎi等。可见那些读阳平或去声的常用字本来还是文言，后来才变成口语词了。

2.3.2 还有“假入声字”，例如“作”，《广韵》有三音，即去声暮韵精母“造也”、去声个韵精母“造也”、入声铎韵精母“为也，起也，……”；北京读 zuò 符合去声个韵一读。“作坊”的 zuō 才是从入声铎韵来的。

2.4 由上面三条通例可以推测，清入声曾在字组的最后一个音节(称为末位)变入了上声，在字组的非末位而在轻声前变入了阴平。此外根据“一”、“不”的特殊变调以及一些复音词里的特殊读法(如“作料”zuóliào)可以拟测：清入声在去声前变入了阳平，在阴平、阳平、上声前则变入了去声。

2.5 作为这些分歧发展的结果，以前的清入声字发生了相当复杂的变调现象。为减轻记忆的负担，这种变调应该逐渐趋于淘汰了。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由于在字组末位的机会多，就以上声为它固定的声调(通例③由此而来)。带轻声词尾的名词则自然以阴

平为它固定的声调(通例②由此而来)。动词以阴平为固定的声调,想必是因为动词带轻声词尾的机会较多的缘故(通例①由此而来)。

2.6 清入声也有一些今读阴平的文言字,如“剥”bō、“削”xuē、“拙”、“失”。这些当视为构成另一个层次,称做B层。B层也包含少数口语词,如“粥”、“一”(单念)。

2.7 清入声文言字读成阳平和去声的最多,其规律是:全清塞音(影母除外)、塞擦音读阳平,次清音和全清擦音以及影母读去声。这一层称做C层。C层就是北京文言音的主要层次。

2.8 还有一些清入声文言字,今调不合B、C两层的规律。根据其特点,分析为D层和E层。D层只以全清擦音变入阳平这一点区别于C层。E层的人声字不管清浊都变入了去声。这可能来自一种人工读音,即读书人有意把古人声字一律读成去声的结果^①。

2.9 每一层次中入声包括浊入的演变规律可拟如〈表一〉。清浊、送气不送气等声母特征用罗马字的记号来表示,其定义如下:

T:表示不送气的清塞音、塞擦音(即全清塞音、塞擦音,但影母除外)。不送气辅音经常带有紧喉成分,所以用底线来标之。下文要假定带紧喉的擦音,也写做S。

T:表示送气的清塞音、塞擦音(即次清音)。

① 现在我认为:虽然也会有这种人工成分,但E层内部似乎相当复杂,需要慎重分析。例如本文〈表二〉右上角 T 读去声一栏48字属于E层,但(1)其中有6字今声母念送气音(如帮母“迫”念 pò),声母应看做 T 来处理;此外有(2)“假入声字”,如“作”;(3)可能受字形影响而念去声的,如“桎”、“窒”;(4)可能受字义影响而读去声的,如“各”gè 会受过“个”的影响。远藤光晓(1991:注26,20-21页)指出,属E层的字多带高元音 i, u 等,这一点也需要考虑。

S: 表示清擦音(即全清擦音, 包括全清非母、次清敷母)。

Q: 表示喉塞音(即全清影母)。

D: 表示浊塞音、塞擦音(即全浊塞音、塞擦音)。

Z: 表示浊擦音(即全浊擦音, 包括奉母、船母)。

N: 表示浊鼻音、边音以及喻母(即次浊音)。

〈表一〉

层次 \ 声母	全清			次清	次浊	全浊	
	<u>T</u>	S	Q	T	N	D	Z
A	上声(字组末位)、阴平				去声	阳平	
B	阴平				去声	阳平	
C	阳平	去声					阳平
D	阳平		去声				阳平
E	去声						

三

为了更具体地观察古入声字派入北京各调的情况, 现用陈汉清、邓希敏(1988) § 4. 3. 1 〈古入声的演变〉(222—245页)所列的材料, 对古入声字今读各调的字数按声母清浊作了统计, 即〈表二〉。每一栏中字数下面的括弧内记有百分率, 如全清 T 阴平一栏(22), 表示该栏字数 57 占全清 T 总字数 261 的 22%; 字数后面记有例字以及所属层次, 如该栏 AB 表示这 57 字非属 A 层即属 B 层。

〈表二〉

今调 古清浊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全清	塞、塞擦音 T 57 AB (22) 八接割郭	123 CD (47) 博得即国	33 A (13) 北角窄葛
	擦音 S 40 AB (28) 塞杀说忽	20 D (14) 昔肋福拂	10 A (7) 雪色血法	75 CE (52) 飒室赫腹	
	影母 Q 13 AB (27) 鸭一约屋		3 A (6) 乙恶	32 CDE (67) 邑厄忆益	
次清	塞、塞擦音 T 53 AB (31) 贴切拍窟	4 (2) 察毅	18 A (11) 匹塔尺渴	95 CDE (56) 粕错策泣	
全浊	塞、塞擦音 D 3 (2) 跌展	127 ABCD (85) 拔叠贼局		20 E (13) 弼秩寂偃	
	擦音 Z 1 (1) 夕	90 ABCD (76) 舌食学匣	2 (2) 蜀	20 E (18) 复术穴颞	
次浊	鼻、边音等 N 8 (3) 摸勒曰	6 (2) 膜颞	3 (1) 抹辱	242 ABCDE (93) 莫诺日月	

四

C层就是北京文言音里最占优势的重要层次，所以本文主要分析C层里的情况。这一层的演变方式很奇特，T和D、Z在一起变阳平，T、S、Q和N在一起又变去声。要说明这一分歧发展，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将其称为“第一假说”和“第二假说”。下面介绍这两种假说，并附〈北京A、C两层基础方言入声演变过程示意图〉，以便与下文各项相对照。

4.1 第一假说可分下面七项来说明。A层、C层的基础方言

各称为 A 方言、C 方言。

① A 方言曾分阴入和阳入。T、T、S、Q 属阴入，D、Z、N 属阳入。

② 在入声下面，A 方言的 D 清化为 T，Z 清化为带紧喉的擦音 S。

③ C 方言则不分阴入和阳入，只有一个人声。

④ 在入声下面，C 方言的 D、Z 清化规律和 A 方言相同。结果产生了 S 与 S 的音位对立。

⑤ 在这种情况下，C 方言的语音形式作为文言音借进 A 方言里来。这时 C 方言的入声作为 A 方言的阳入被借进来了。这应该是 C 方言的入声和 A 方言的阳入调值相近的缘故。

⑥ 后来，A 方言的阳入在非紧喉声母 T、S、N 下失去了喉塞韵尾，舒化为去声；在 Q 下也舒化为去声，这是因为喉塞韵尾受喉塞声母 Q 的异化作用而失落了的结果；阳入在紧喉声母 T、S 下则保持喉塞韵尾，没有舒化。这是声母 T、S 的紧喉作用保护了喉塞韵尾的缘故。Q 则声门关闭的力量很强，所以对喉塞韵尾发挥异化作用，使之失落。

⑦ 后来，阳入在声母 T、S 下也失去了喉塞韵尾，舒化为阳平。同时 S 失去紧喉成分，并入了 S。到这一阶段，调值最接近阳入的已不是去声，而是阳平了。

4.2 第二假说亦可分下面七项来说明。

① A 方言和 C 方言的入声都分阴入、全阳入和次阳入三调。T、T、S、Q 属阴入（C 方言里 Q 可能属次阳入，参看下面⑦），D、Z 属全阳入，N 属次阳入。全阳入和阳平同属一个调位，次阳入和去声同属一个调位（入声以带喉塞韵尾区别于舒声）。

② 在入声下面，A 方言和 C 方言的 D 均清化为全清 T，Z 则均清化为非紧喉的 S。

③ A 方言和 C 方言的全阳入均舒化为阳平，次阳入均舒化为去声。

④ 后来，C 方言的阴入在非紧喉声母 T、S 下失去了喉塞韵尾，舒化为去声；在紧喉声母 T 下仍保持喉塞韵尾，没有舒化。关于 Q 下的情况，参看下面⑦。

⑤ 再后来，C 方言的阴入在紧喉声母 T 下也失去了喉塞韵尾，舒化为阳平。

（顺便说明一下：D 方言里 S 的语音应该带点紧喉，即语音上近似 S，因此阴入在 S 下面也和 T 下面一样地舒化为阳平。D 方言里入声的演变方式除此以外都与 C 方言相同。）

⑥ 在这种情况下，C 方言的语音形式作为文言音借进 A 方言里来。这时 C 方言的阳平和去声各作为 A 方言的阳平和去声被借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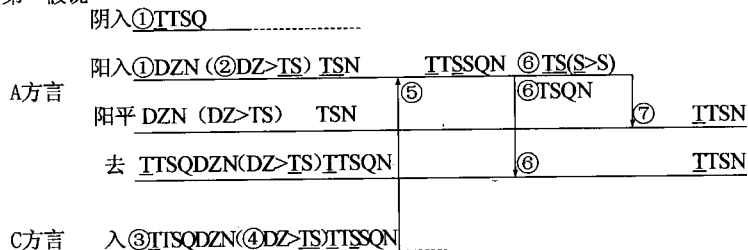
⑦ C 方言里的 Q 可能本属阴入，而在阶段④阴入于 Q 下变为去声，原因与在第一假说⑥中所拟相同。不过 Q 也可能本来和 N 一起与去声同属一个调位，因而在阶段③里已舒化为去声了。我是偏向于这一看法的。《中原音韵》把多数影母入声字和次浊入声字一同作为“入声作去声”，可以参考。这应该是因为影母的喉塞音发生弱化，也失去了紧喉成分，于是变成了纯元音起头的音，这样就和次浊音一样，算是“乐音”的缘故。

4.3 〈北京 A、C 两层基础方言入声演变过程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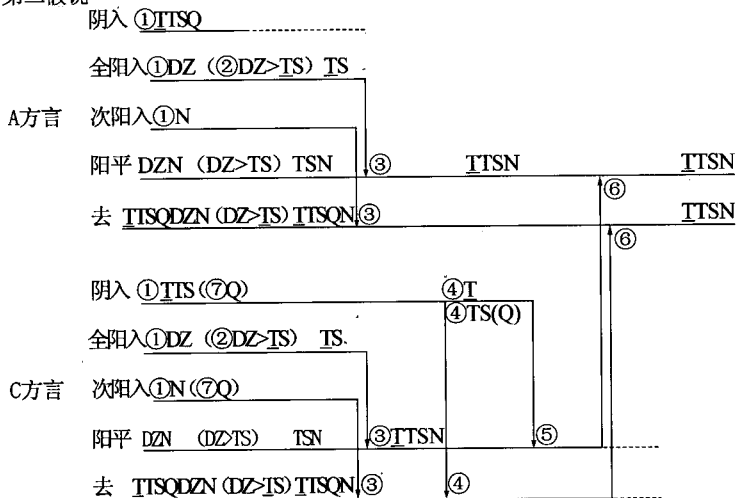
注：声母各范畴的略号参看 § 2.9；①②等数字相当于 § 4.1

(第一假说)、§ 4.2(第二假说)里的各项的号码; A 方言的阴入在阶段①后的演变从略。

第一假说



第二假说



五

现在对两种假说作一下比较：

5.1 第一假说的短处是要假定 A 方言和 C 方言擦音都曾有过紧喉 \underline{S} 和非紧喉 \bar{S} 的区别、对立。这种对立并非不会有，据方进（1966），方村话里有不送气擦音 f, s, ξ, ϵ 和送气擦音 $f^h, s^h, \xi^h, \epsilon^h$ 的对立，这很可能是紧喉与非紧喉的对立。可是这种情况在汉语中毕竟是少有的，也似乎是音变的过渡时期的产物。第二假说不用假定如此罕见的对立。因此我偏向于采取第二假说。

第二假说假定 A 方言、C 方言都曾有过次阳入，而次阳入在现代方言里也是罕见的。不过，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措施中全浊作阳平，次浊作去声的情形来看，阳入分全、次两调的方言在过去是可能存在的^{3注1}。

5.2 两种假说各自对 C 方言的时、地问题提供线索。

根据第一假说，C 方言被借入的时代应该较早，因为那时期的 A 方言还有阳入声，后来它一半舒化为去声，另一半再过一段时间后才舒化为阳平。具体时期若说是清初，就嫌太晚。说是明初，也许还可以。论地点，C 方言可以是离北京较远的方言，比如南京话。

根据第二假说，C 方言被借入的时代应该较晚，可能是明末清初，因为那时 A 方言、C 方言都已经没有人声了（A 方言的阴入大概也已经舒化了）。C 方言的地点则应该是离 A 方言不甚远的，因为次浊入声变为去声是 A、C 两方言所共同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在地理上分布的范围从现代方言来看似乎仅限于华北和东北地域。

顺便要提一下:《中原音韵》里古通、江、宕、梗、曾各摄入声字也有文、白异读的现象,例如宕摄开口入声一等字分入萧豪韵和歌戈韵,其音值是 -au 和 -o,前者可谓是白话音,后者可谓是文言音,这情况和现代北京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原音韵》里“入声作某声”的条件不管文、白都基本相同,北京话里入声的分化条件则依文、白而大有不同,如本文所述。因此北京话的文言音不会是《中原音韵》文言音的直接后代。至于 C 方言和《中原音韵》文言音的基础方言之间有何等关系,前者能否算是后者的直接后代,那就得另作研究了。

引用文献

- 陈 刚 1988:《古人声字在北京话里的演变情况》,《中国语言学报》3,245—255 页。
- 陈汉清、邓希敏 1988:《〈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的计算机处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方 进 1966:《芜湖县方村话记音》,《中国语文》2,137—146。
- 严学宥 1993:《八十自述》,《语言研究》增刊,1—101 页。
- 平山久雄 1990:《中古汉语的清入声在北京话里的对应规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72—79 页。
- 远藤光晓 1991:《河北省、遼寧省、山東省に於ける声調の地理分布と変遷》,《开篇》8,8—33 頁。

1995 年

补 注

- 1 关于在《中原音韵》的基础音系中入声真的已消失与否,学者之间存

在不同的看法。我则偏向于入声字仍以喉塞韵尾别于阳平、上声、去声的看法，因而拟测入声可能曾有过如此分为三调的情况。

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提要 研究汉语声调的历史,古代调类(tone class)的构拟是比较容易的,但古代调值(tone value)的构拟就相当困难了。本文提倡用内部构拟(internal reconstruction)的方法,希望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以厦门话的变调作材料,试图运用上述方法构拟发生变调以前的厦门话古调值。文中并且指出,其他若干闽南方言,也可以认为曾有过和厦门话古调值相同或相似的古调值。不但如此,属于其他大方言区的方言中,也有不少可以认定曾有过与此相类的调值系统。笔者认为这种类似可能是汉祖语的调值系统各自独立地经过相似变化的结果。

一 序论

1.1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我们可以假定汉祖语的声调也就是与这平、上、去、入对应的四种,因为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声调系统几乎都可以由这四种演绎出来。但无论是中古汉语还是汉祖语,这四种调类的调值就不容易知道了。作为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出现过若干很有价值的论文,如金田一春彦(1951)、赖

* 本文是把平山久雄(1974) § 1~ § 3 的内容译成中文而成,只有 § 6 的内容为这次新加。在此感谢王士元、桥本万太郎两位教授的勉励,也感谢刘文献先生改正我中文的不足之处。

惟勤(1951)、水谷真成(1968)、Mei(1970)等,不过它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录加以分析,对象也多以唐代晚期北方(以长安为中心)的声调调值为主。

要是拿现代方言的声调调值作材料,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试拟汉祖语的声调调值,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开始阶段,应该先拿范围较小的方言群作对象,拟测它们祖方言的调值,然后再就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祖方言调值进行比较,拟测出更古阶段的调值来。这样做下去,我们是有希望逐步接近汉祖语的调值的。近二十年来有很多方言声调的记录公诸于世,能进行这种尝试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逐渐成熟了。

1.2 在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除了单纯的方言间的比较构拟之外,还得用内部比较构拟的方法。现代汉语中的许多方言是有变调现象的。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方言里各调类的调值,不管在句子或词组里出现的位置如何,原先几乎都是一样的;后来由于位置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结果产生了变调。根据这一假设来比较一个方言内部的基本和变调调值,就可以拟测出该方言发生变调以前各调类的调值来。这种构拟所得的调值,我们叫做该方言的古调值。一个方言内部的调值分歧既然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我们就能够分析这种条件发挥的声学作用,来解释该方言发生调值变化的声学原因。这种解释甚至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调值变化的一般原因。这是内部比较方法的最大优点。当然内部比较和方言间的比较这两种构拟方法应适当地配合起来,最好让它们发挥互补互证的作用。

本文的主题是以厦门话的变调作材料,用内部比较方法来构拟厦门话的古调值。

二 厦门话的变调

2.1 厦门话的七个调类都有两个调值。关于这一现象,董同龢(1957:242页)有这样的描写:

凡单独出现,在轻声字前,在句尾,在主语之末,在表时地的副词之末,在名词或动词的系列之中各名词或动词之尾的,同是一个调值;在别的字的前面而不属上述各种情形的,又是另一个调值。因为前一种包含单独出现的情形,我们暂时称之为“本调”(basic form),后一种就称之为“变调”(sandhi form)。

他所谓的“本调”,我们在这里称为“基本调值”;所谓的“变调”,我们称为“替换调值”。一个句子里表现基本调值的音节,它所占的位置,我们可以叫它为“末位”。因为在中间不停顿而且彼此接合得较紧的连续音节中,表现基本调值的音节总是占最后的一席(轻声音节不算),它跟后面的音节接合得较松^①,或者它后面就是停顿。单音节词单独说出来时也可以算是占了末位。至于在句中表现替换调值的位置,我们可以叫它做“非末位”。

厦门话的两种调值,可参考〈第一表〉。其中 Bodman 描写的

^① 关于这一点,董同龢(1960:731页)对闽南话“变调”和“本调”各出现的环境解释说:“凡用‘变调’的是和后面的成分接合比较紧凑的,凡用‘本调’的是和后面的接合比较松弛或者后面就是停顿。”我就采用了董氏这一看法。

调值不用数字,今改成“5度制”。阴入的两种替换调值 5 和 54 是出现的环境不同,前者是以 -p、-t、-k 收尾时的调值,后者是以 -ʔ 收尾时的调值。董氏描写的两种阳平替换调值则是派别的不同:有一派是 11-,另一派是 33-。中古汉语的上声,如果在一个方言中全浊合为阳去(或去声),而其余仍为上声,那么即使没有与它相对立的阳上,本文也仍把这上声称为阴上。

〈第一表〉厦门话声调调值,据 Bodman(1955:3,38 页)、董同龢(1957:243-244 页)

调类	调值资料	基本调值		替换调值	
		Bodman	董	Bodman	董
阴平		55	44	} 33-	33-
阳平		24	24		11-or33-
阴上		42	53	55-	55-
阴去		21	11	43-	51-
阳去		33	33	22-	11-
阴入		<u>32</u>	<u>32</u>	5-, <u>54</u> -	4-,53-
阳入		5	4	2-	1-,11-

2.2 关于厦门话变调规律的描写,最为著名的有 Bodman's tone circle(Bodman1955:41 页)。后来 Wang(1967)分析了厦门话基本调值的辨异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把 Bodman's circle 改写成连锁形式,如〈第二表〉和〈第三表〉。他还指出,这种连锁

这个描写看来似乎平淡无奇,尤其“阳平→阳去”的替换越出规律之外,可说是缺点。但依我看来,王说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三表〉“阴上→阴平”的替换,[+High, -Falling]其实不仅能指阴平一调,阳平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虽然有像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厦门话的变调可以说大致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规律是怎样成立的呢?这就是个饶有趣味的题目了。下文我们打算先拟测厦门话的古调值,然后再对从古调值变到现在的基本和替换两种调值的过程加以说明。如此,这个问题相信也自然能得到一个回答的。

三 厦门话古调值的构拟

3.1 构拟得来的古调值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自然是要能尽量简单地说明它是如何演变成了现在的情形。我们在这个前提下,先试拟厦门话古调值如〈第五表〉。

〈第五表〉 厦门话古调值初案

阴平	阳平	阴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44	*24	*55	*42	*22	*4	*23

〈第五表〉上五个舒声调中有三个都是平调,这显然是不均衡的,应该想办法调整一下。〈第一表〉里董氏描写的厦门阳去替换调值 11-,其实是“尾或略降”(董同龢 1957:243 页)的。此外,台湾各方言阳去替换调值也多为降调(王育德 1957:29-30 页,董同龢 1967:17 页,Cheng 1968:22-24 页,Chang 1972:45-47 页),晋江话阳去的基本调值则跟阴去合并,成了 31(参看〈第十表〉)。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把厦门话古调值里的阳去改拟为 *31。

*31离阴去*42太近,于是阴去改拟为*53。两调有这样并行的古调值,这从历史观点来看是极自然的。另外剩下的两个平调彼此离得也太近,可以把阴平改拟为*33。阳平古调值也应该再低一点才更合适,因为董同龢(1957)描写的厦门话里,有一派人的阳平替换调值不跟阴平合并,而跟阳去合并为11-。为说明这一点,阳平古调值就得改拟为*13。Chang(1972)描写的台湾上枫话阳平基本调值为13,也支持了这个改拟。阳平原来是阴平所分化的阳调,是浊声母对韵母开端音高的低化作用所造成的。这样看来,阴平*33和阳平*13之间的高度关系也可以说是极自然的^①。

3.2 关于韵尾的性质,入声和舒声有对补关系,所以根据音位学的观点,可以认为入声是和舒声中的某调构成一个声位(toneme)。我们看看厦门话阴入古调值变到现在的基本和替换调值的推移情形,就可以发现那是和阴上的变化最类似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厦门话古调值系统里阴入和阴上构成一个声位,因而可以把阴入改拟为*5。阳入的古调值和阳平同样是低升调,我们认为它们也构成一个声位,可以把阳入改拟为*13。这样改拟下来,对董同龢(1957)所描写的阳入替换调值1-,11-也就更容易说明了。

3.3 总括上述的讨论,我们所构拟的厦门话古调值,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第六表〉。

^① 古调值时期相对的阴调和阳调是否已分为独立的两个声位,对此本文一律不论,暂时只用阴平、阳平等名称来称呼它们。

〈第六表〉厦门话古调值结论

阴平	阳平	阴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33	*13	*55	*53	*31	*5	*13

四 厦门话古调值如何变成了现在的基本和替换两种调值

4.1 我们可以先假定：在厦门话古调值时期，相当于今天厦门话末位的音节（以下简称末位音节），因为和后面的音节接合得较松（或者甚至后面就是停顿），所以在它的末尾，像声带的松弛、呼气量的减少等发音运动的弱化较为显著。根据这一假定，可以作以下的拟测：

阴上 *55 居末位音节的时候，不容易把最高音维持到末尾，结果发生了 *55 > *54 > *42 的变化，而以此为开端，阴去、阳去、阴平也跟着发生了循环性的变化，如〈第七表〉所示。舒声中只有阳平没受到上述变化的牵连，它不过是为了减少发低音的生理负荷把开头稍微提高罢了。

阴入、阳入也没有直接加入这一循环。但我们要注意，它们的变化若分别跟阴上、阳平的变化相比，就可发现是颇相类似的，请看〈第七表〉。阳入变 *24 后再变为 *4，是因为在短调中表现升调较为困难的缘故。阴入变 *54 后再变为 32，而没有和阴上并行地变为 *42，一方面还是短调的关系，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拉开跟阳入之间的距离而把开头的音高弄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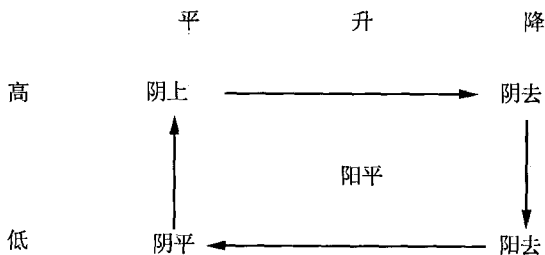
〈第七表〉厦门话古调值到现在基本调值的变化

阴上	*55	>	*54	>	42
----	-----	---	-----	---	----

阴去	*53	>	*42	>	21
阳去	*31	>	*22	>	33
阴平	*33	>	*44	>	55
阳平	*13	>	*24		24
阴入	*5	>	*54	>	<u>32</u>
阳入	*13	>	*24	> *4	5

随着上述的调值变化,舒声里构成阴上、阴去、阳去、阴平各调的辨异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如〈第八表〉所示。只有构成阳平的辨异特征仍旧没变。

〈第八表〉厦门话古调值到现在基本调值辨异特征的变化



4.2 上边拟测的是末位音节上的变化。此外还有相当于今天厦门话非末位的音节。这类音节因为和后面的音节接合得较紧,音节末尾发音运动的弱化较不显著,所以阴上古调值没变降调,其他几调的循环变化也就无从发生。如此,非末位音节上调值的变化是不多的,如〈第九表〉所示。阴入替换调值在韵尾是喉塞音-ʔ的条件下变为54-(董同稣是 53-,这可解释为由 *54-变来),这大概是声门关闭前所伴随的声带较粗的颤动带来的。要是我们把阳去替换调值看做是在音位上占着

低降调的地位,那么在非末位音节上阴上、阴去、阳去、阴平各调就可看成是只起过语音性质的变化,没有起过音位性质的变化了。

〈第九表〉 厦门话古调值到现在替换调值的变化

阴上	*55				55-
阴去	*53	>			43-
阳去	*31	>			22-
阴平	*33				} 33-
阳平	*13	>	*24	>	
阴入	*5	>			5-, <u>54-</u>
阳入	*13	>			2-

如上所说,构成舒声调值(除阳平)的辨异特征只有在末位音节上发生过递变,如〈第八表〉所示;在非末位音节上则没起过什么变化。从共时论的观点,把末位音节的调值(即单字调)当做基本形态,如此描写所得的结果,就是〈第四表〉的变调规律。

五 其他三个闽南方言的变调和古调值

5.1 三个方言的变调。董同龢(1960)所描写的龙溪、晋江、揭阳三个闽南方言也有变调。两种调值出现的条件也和厦门话里相同,可以说是跟末位和非末位的不同有密切关系。调值的具体内容参看〈第十表〉。

如果以厦门话古调值为根据,那么我们对这三个方言变调的产生也就容易得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因此我们不妨说,这三个方言的古调值分别都和厦门话的古调值一样。惟一的

同是晋江话和揭阳话的古调值具有独立的阳上调。下面让我们分别说明一下这三个方言古调值变到现在的基本和替换两种调值的情形。

〈第十表〉龙溪、晋江、揭阳三个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调值 调类	龙溪		晋 江		揭 阳	
	基本	替换	基本	替换	基本	替换
阴平	24	}33-	44	44-	44	33-
阳平	212		24	11-	55	11-
阴上	53	35-	55	35-	42	35-
阳上			33	11-	13	11-
阴去	31	41-	}31	55-	212	32-
阳去	33	11-		11-	22	11-
阴入	<u>31</u>	4-, <u>53-</u>	<u>53</u>	5-, <u>53-</u>	<u>31</u>	4-
阳入	<u>13</u>	1-	<u>35</u>	1-	4	1-

5.2 龙溪话。要是假定龙溪话古调值与厦门话古调值是一致的,那么从龙溪话古调值演变到现在的基本调值的过程也该和厦门话里的变化颇相接近。但龙溪话里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随着阳去*31 > *22 > 33的变化(这跟厦门话一样,参看〈第七表〉),阴平*33变为*24,没像厦门话里那样变为55。由于有这特点,阳平*13也就没能变为*24,只变为*212,这样才能保证和阴平24之间的距离。因为阳平维持了低音,所以和阳平构成一个声位的阳入也维持了原来的调值*13。阴去在龙溪话里只降到31,没像厦门话里那样再变为21或11,是因为要保证和阳平212之间

的距离的缘故。

龙溪话古调值变到现在的替换调值,情形也和厦门话颇为相似。惟一较大的不同是阴上*55在这里变为35-。对这一点的解释,我们留到下面讨论晋江话调值变化时再说。

5.3 晋江话。晋江话的古调值也可以假定和厦门话的古调值相同,除了它有独立的阳上调。阳上的古调值是不易拟测的,现在暂拟为*22。这样虽和阴平*33过于接近,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只好这样办。

关于晋江话的古调值如何演变到现在的基本和替换两种调值,可参看〈第十一表〉。

〈第十一表〉 晋江话古调值变到现在两种调值的情形

调类	古调值	基本调值	替换调值
阴平	*33	>44	>44-
阳平	*13	>24	>11-
阴上	*55	55	>35-
阳上	*22	>33	>11-
阴去	*53	} >31	>55-
阳去	*31		>11-
阴入	*5	> <u>53</u>	>5-, <u>53</u> -
阳入	* <u>13</u>	> <u>35</u>	>1-

跟古调值比较起来,现在的基本调值差异较小,替换调值差异反而较大,这是晋江话的特色。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基本调值和古调值差异较小,是因这方言的阴上在末位音节上保持了它原有的高平调,没有变做高降调,所以也没有引起与此相关的几个舒声调

的调值变化。

在非末位音节上,低音域的阳平、阳上、阳去合为 11-,阳入也跟着变为 1-。这大概是非末位音节发音较弱的缘故。这种阳调的合并董同龢(1957)描写的一派厦门话里也能看到,参看〈第一表〉。此外晋江话里还起了阴上 *55 > 35-,阴去 *53 > 55-的变化。这可能是受到后面末位音节较强发音的影响,非末位音节音强的顶点往后挪移,落在音节的较后部分,使音节前部的发音较松,因此先起了阴上 *55 > 35-的变化(龙溪话里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音节后部发音较紧,所以后来阴去 *53 变为 55-,填补了阴上变升调后的空缺(这一变化龙溪话里未见)。

从以上对晋江话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调值分化的条件虽然相同,同是末位和非末位的区别,但这一条件所发挥的声学作用却不一定相同,这还要看各方言的“个性”。

5.4 揭阳话。揭阳话也有阳上。我们可以假定揭阳话的古调值和晋江话的古调值一样。根据这个古调值,我们也就能较简单地说明现在的基本和替换两种调值是怎样变来的。揭阳古调值在末位音节上变为基本调值的情形可拟如〈第十二表〉。

〈第十二表〉揭阳古调值变为现在基本调值的情形

阴上	*55	>	*53	>	42
阴去	*53	>	*31	>	212
阳去	*31	>	*22		22
阴平	*33	>	*44		44
阳上	*22	>	*13		13
阳平	*13	>	*35	>	55

阴入	*5	>	* <u>53</u>	>	<u>31</u>
阳入	* <u>13</u>	>	* <u>35</u>	>	4

〈第十二表〉和〈第七表〉相似的地方不少,但也有若干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如此解释:这些不同主要是揭阳话里的阳上所引起的。揭阳话里随着阳去*31>22的变化,阳上*22变成13,阳平*13也经由*35变成了55。这样一来,阴平*33变成44以后就不能再变55,阳去变成22以后也不能再变33。阴去*53成了*31以后(经*21)再变212,这大概是为保持和阳去22之间的距离。

从揭阳话古调值变到现在的替换调值的过程基本上是和晋江话(〈第十一表〉)一致的。较显著的不同只有一点,就是揭阳话里的阴去没产生过*53>55的变化^①。

六 与其他大方言区拟得的调值系统之比较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属于闽语以外大方言区的方言中,也有不少可以认定它们曾有过和厦门话古调值相似的调值系统。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6.1 桃源客家话古调值。我曾在平山久雄(1972)中对李富才(1959)所报告的桃源客家话的变调加以分析,作了古调值构拟

^① 原论文(即平山久雄1974)此后还讨论了潮州、福州、隆都等处闽方言的变调,拟出闽南闽北祖调值如下:

阴平*33、阳平*13、阴上*55、阳上*243、阴去*53、阳去*342、阴入*13

阴上和阳上调值后面的'号表示音节带有紧喉作用。

的尝试,其结论如〈第十三表〉。

〈第十三表〉桃源客家话古调值。平山久雄(1972:218页)

阴平	阳平	阴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33	*13	*53	*354	*243	*53	*13

从〈第十三表〉可以看出来,桃源客家话的古调值和厦门话古调值相似的地方很多。这两个古调值相比较,就可以推知前者的阴上、阴入很可能是从类似后者的*55、*5变来,同时后者的阴去、阳去也可能是从类似前者的升降调变来。

6.2 北京话—天津话祖调值。北京话和天津话同属北方官话,一般的语言特征相差不多,但它们的声调调值差得比较远,如〈第十四表〉所示。

〈第十四表〉北京话和天津话的声调调值,据《河北方言概况》

	阴平	阳平	阴上	去声
北京	55	35	214	51
天津	11	45	24	51

如果把它们共同的祖方言调值(简称“北京话—天津话祖调值”)拟为阴平*33、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那么就可以理解这两个方言之间调值的不同。阴平*33在北京话里变高,在天津话里却变低了。这大概和阳平在天津话里几乎成了高平调^①这一点有关;因为这样,阴平就成了和阳平对立的低平调,为使差别明显,把调值弄低了。北京话里因为阴上在系统上占了低平调的地位,所以阴平变了高音,而阳平也就不能再变高了。

① 黄绮(1958:7页)认为天津话上声在城里一般是稍微向上扬的45,在河东和西郊则是高平调55。

我们可以推测,上述祖调值里的阳平*35是由*13变来的,因为它本来是从*33分化的阳调。离北京不远的定兴话、涞水话的调值都是:阴平 44、阳平 13、阴上 323、去声 412(《河北方言概况》63页)。这里的阳平似乎保存了它“本来的”调值。

由上可知,北京话一天津话祖调值是和厦门话古调值很相似的。除了前者没有阴阳去的分别以外,惟一的不同是阴上的调值。这个差异如何去说明,可能见仁见智。这里只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阴上本来是*24,它在前者变*214、在后者就升为*55了。

6.3 和唐末北方调值的比较。由在日本留传的一派佛教音乐“声明”的节奏归纳所得的唐末北方(以长安为中心)方言调值的轮廓是:阴平*31、阳平*21、阴上*34、去声*14、入声*5(赖惟勤1959:35页^①)。从另外一些日本所传的文献归纳起来,结果也是差不多的(金田一春彦1951, Mei1970)。

厦门话古调值和北京话一天津话祖调值颇为相似,但两者和唐末北方话调值相比,则有较大的不同。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个问题已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这里我只想把个人的推测简单地说一下:唐末北方话调值是较接近汉祖语的,而厦门古调值和北京话一天津话祖调值的相似,乃是两者由汉祖语的调值经过类似途径变化下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古汉语(或者汉祖语)的声母、韵母变到现在的各方言时,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比方浊声母的清化(清化的内容虽然不一定相同)、轻唇音的产生、鼻音声母的口音化、重纽的消失、同摄内同等韵母的合并等等,这

① 这篇论文里所载的调值是把赖惟勤(1951)所得的结论用5度制来改写的。

些变化有的几乎广被全国,有的虽不然,却也波及非常广大的地区,还有的是在离得很远的方言中似乎各自独立地发生。所以说厦门话和北京话等过去在声调调值的变化上曾有很多类似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

引用文献

- 董同龢 1957:《厦门方言的音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9上,231—253页。
- 1960:《四个闽南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页。
- 1967:《记台湾的一种闽南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四》。
- 黄 绮 1958:《天津人容易学好普通话》,《方言与普通话集刊》2,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8页。
- 李 富 才 1959:《粤东桃源话的特殊变调规律》,《中国语文》8,377—379页。
- 王 育 德 1957:《台湾语常用语汇》,永和语学社,东京。
- 金田一春彦 1951:《日本四声古義》,寺川喜四男、金田一春彦、稻垣正幸編《国語アクセント論叢》,法政大学出版局,東京,627—703页。
- 平山久雄 1972:《客家桃源方言声調調値の内的再構》,《中国の言語と文学》,鳥居久靖教授華甲記念會,天理,209—228页。
- 1974:《中国語閩南閩北祖方言の声調調値》,《東京大学文学部研究報告》5〈文学哲学論文集〉,左起193—248页。
- 水谷真成 1968:《梵語音を表わす漢字における声調の機能——声調史研究の一資料》,《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二十周年記念論文集》561—584页。
- 赖 惟 勤 1951:《漢音の声明とその声調》,《言語研究》17—18,1—46页。
- 1959:《諸天漢語讀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12,左起23—58页。
- Bodman, Nicholas 1955: “Spoken Amoy Hokkien” Vol. I, The Government Federation of Malaya, Kuala Lumpur.

- Chang, Yü-hung 1972: "Tone System in Shangfeng; a Southern Min Dialect", "Unicorn" 9, 41-54 页。
- Cheng, Robert: 1968: "Tone Sandhi in Taiwanese", "Linguistics" 41, 19-42 页。
- Mei, Zulin(梅祖麟)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86-110 页。
- Wang, William S-Y(王士元)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 2, 93-105 页。

1975 年

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 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

提要 本文将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按其声调调值的特点分成八群,采用作者对调值变化规律的看法,先给每一群方言拟测它们共同的祖调值,然后通过比较这八种祖调值,拟测全部江淮方言共同的大祖调值,即江淮祖调值。江淮祖调值还能说明江淮方言以外不少北方方言的声调调值,因此也可以当做北方方言祖调值的初案。拿它和在日本留传的佛教音乐“声明”的曲调中反映的唐代北方调值相比,两者显得格外近似。

一 序论

1.1 拙文《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即平山久雄1983)对调值变化的看法

作为本文对江淮方言的声调调值进行历时分析的前提,我先要介绍一下平山久雄(1983)所论对于声调调值如何发生历时变化的一些基本看法。

这篇拙文根据德国神父 Giet(1939)所描写的资料介绍了以济宁市为中心的山东省西南部一带方言的两字组变调概况:这一带方言的两字组若是后字为轻声一般就分做前字变调的和前字不变调的两种格式。例如同是由阴平和阴平来的轻声构成的两字组,

“今天”、“春天”、“山东”、“法律”、“东风”等的调值是 13-1,即前字不变调,“工夫”、“亲戚”、“衣裳”、“菊花”、“先生”等的调值是 11-4,即前字变调。现将各调类的基本调值(单字调)与轻声前面的变调调值对照如〈表一〉。表中去声的调值 411 只出现在后字为轻声的不变调前字。不管前字变不变调,轻声的音高由前字的调值来决定:前字为 11 或 411 则为 4,否则为 1。

〈表一〉山东西南方言的基本调值和轻声前变调调值

调值 调类	基本调值	轻声前 变调调值
阴平	13	11
阳平	51	44
上声	44	24
去声	412,411	51

拙文假定此方言原先没有变调,只有一种“山东西南古调值”^①系统,后来由于发音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调值的分歧,这分歧就带来了变调。以此为前提,拟测了山东西南古调值的内容,这基本上和现在的轻声前变调调值相同,即阴平为低平调(*11),阳平为高平调(*55),上声为升调(*24),去声为降调(*51)。从这个古调值变到现在基本调值的过程可拟如〈表二〉:

〈表二〉山东西南古调值到现在基本调值的演变

阳平 *55(高平调) > *53 > 51(高降调)

^① 用内部比较(internal reconstruction)的方法构拟的调值我们叫做该方言的“古调值”,用方言间比较的方法构拟的则叫该类方言的“祖调值”。

去声	*51(降调)	>	*41	>	412(低降调)
阴平	*11(低平调)	>	*112	>	13(低升调)
上声	*24(升调)	>	*34	>	44(高平调)

拙文对〈表二〉的说明可代表我对调值变化原因的主要看法,现把原文录在下面(平山久雄 1983:68—69 页):

让我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调值变化。先从阳平说起。阳平的古调值拟为高平调。要发高平调时,就需要把高音维持到底,这会使人觉得比较吃力。随着音节后半发音运动渐弱(包括呼气量减少、声带弛缓等)的趋势,高平调的末尾自然地要降下来。因此我认为,高平调 55 经过 553 (或 54)渐变 53,来减少所需的发声劳力,这种变化是很容易设想的。53 又可以变做 51,以便显示其“降”的特性。我想从 55 到 51 的变化可以拿世界各种语言的历史上最常见的 [ki] 变 [tɕi] (或 [tʃi]) 的现象来比较。[k] 在 [i] 前先变 [c] 来适应 [i] 的舌位,这一段就相当于从 55 到 53 的变化;而后 [c] 再变 [tɕ] (或 [tʃ]) 来显示 [c] 含有的塞擦音色,这一段就相当于从 53 到 51 的变化。高平调变降的现象还可以说是和音节末的辅音一般容易弱化甚至失落的趋势同出一根的。

去声古调值的变化是被阳平的变化推动的。随着阳平转高降调的趋势,去声就往低里降,获得了低降调的地位,来保持和阳平之间的距离。412 末尾稍升的部分可以这样解释:发低降调时需要把声音用力地压下去,可是到

音节末尾声带和喉头肌肉松弛的时候就压不住了,会产生这种尾巴。这种尾巴虽然从音位的观点看是个多余的东西,但作为低降调的一种标志,辨认声调时能起一定的作用。

阴平古调值的变化和上述阳平、去声的变化没有关联之处,可是论其变化的原因却和阳平相似。发低平调时则需要把低音维持到底,这也会使人觉得比较吃力。在音节后半随着音势渐弱,低平调容易带上尾升的趋势,因此 11 可以通过 112(或 12)逐渐变为 13,我认为这也是较容易设想的变化类型。

至于上声古调值的变化我认为有被动和主动两种原因。上述阴平的变化推动了上声往高里变,以便保持距离,这是被动的一面。主动的一面则是:如果 *24 经过 *34 变得更高,就会增加发高音的难度,可是声音越高响度(sonority)越大,有利于提高语音传达的效率,*34(或 *35)又可以变 44(或 55)来填补以前的 *55 变 51 后产生的高平调空格。

这里讲的是山东西南古调值到现在的基本调值的演变。可是在轻声前面的音节没有发生这一系列变化,而基本上保持了古调值的面貌,只是阴平 *55 变做 44,这就是山东西南方言轻声前变调调值的来历。从历时论的角度来讲,此方言的轻声前变调调值是少变的,基本调值倒是多变的。

为什么轻声前面变化如此微小,我认为此方言的轻声音节曾与前字贴合得很紧,使前字后半音势弱化的程度较小,因此在轻声前面阳平没有变降,阴平也没有变升,去声和上声就不会发生牵连

的调值变化。至于轻声前面不变调的另一类两字组,我认为它们的后字在古调值时期虽然没带重音,可是还没有弱化成轻声,与前字贴合得较松,因此它们的前字和一般带重音的音节一样地发生了上述一系列的调值变化。

拙文又从方言间的比较方面印证了上面所拟的古调值。如 Giet(1939:22-23 页)已指出,天津方言的声调调值和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调值十分相似。山东西南方言的南边也有单字调值和天津方言相同或相似的方言,我们名之为“天津式方言”。这种天津式方言从山东省最南部起一直延伸到江苏省西北部、安徽省中北部以及河南省东南角一带。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些天津式方言的单字调基本上还停留在和山东西南古调值一样的调值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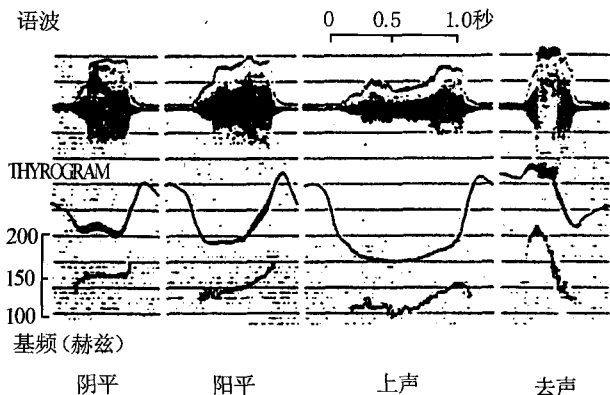
1.2 两点补充说明

对于上述拙文中有关调值变化原因的看法,我在这里要作两点补充的说明。

拙文对山东西南古调值如何变到现在基本调值的说明当中,也涉及低音调逐渐变高音调的问题。我认为低音调(低平调、低升调等)容易变中音调(中平调、中升调等),因为这样能减少发低音所费的劳力(生理运作力度),同时也能提高音节的响度。提高响度的要求又可以把中音调变为高音调(高平调、高升调等)。现在我想可以再补充一个原因。Kakita & Hiki(1976)使用一种特殊的仪器 thyrometer^① 测量了喉头在发音时的升降运动,证实喉头的

① 这仪器的原理是这样的:将小镜子贴在喉骨前面的皮肤上,把光束射到上面,反射的光就随着喉头的升降而变方向;设法把这方向的变化换成电压的大小,就可以记录喉头的升降。

升降往往是和声音的高低互相牵连的。他们对汉语的四声(是一个男性台湾人说的标准语四声)也做了实验,结果如该文 Fig. 7 所示(照原样引在下面)。图上所谓 thyrogram 就是用 thyrometer 描绘出来的代表喉头升降运动的曲线。



从图中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在发一个音节时,不管它的声调有什么样的调值,喉头似乎都预先放得相当高,然后往调值开头的音高所要求的位置挪移。由此可以推测,喉头升降运动的这个特性容易把调值开头的低音逐渐提高,能使它变到次高的程度。要是一个调位的调值从低音调或从中音调变到以次高音起头的 44 或 45,这样在调值系统中获得了高平调的地位,那么它就可以再变 55,以便更明显地表示其高而平的特性,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响度,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设想。

以上是要补充的第一点。第二点则是关于高降调变低降调的原因。在山东西南古调值中去声拟为 *51,它后来变为 412,拙文

认为这是由阳平*55转51的变化推动而成的。对于低降调和高降调并存的方言,如果其高降调可以拟测为由高平调转来,那一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看法来说明低降调的来历。可是有时低降调缺少相对的高降调,但它似乎也是从高降调变来的。例如据《河北方言概况》(62页),河北省静海方言的调值是:阴平33,阳平55,上声212,去声31,是类似天津式方言的调值系统。这一方言的去声与天津方言的去声42和山东西南方言(变调调值)的去声51相比,最好假设它是从高降调51、42等变来的。拙文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是节省发开头高音的生理负荷所致(平山久雄1983:79页附注11)。这解释虽然不错,但恐怕也不够周全。现在我认为高降调末尾的低音部分会影响开头的高音,使它逐渐地降落下来,以便缩小音高挪移的幅度。这过程可算是逆行同化(regressive assimilation)的表现。同样,35变45,45变55的过程应该也有逆行同化的一面。一般同化音变的实例中,逆行同化比顺行同化(progressive assimilation)要占优势,这应该亦可适用于调值方面。

我仍认为高平调转高降调推动原有的高降调变为低降调的一面是应该重视的,但如上所说,高降调变低降调不一定要以高平调变高降调为条件。不但如此,前一种变化(包括趋向)还可以使后一种变化更容易实现。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两种变化会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一面。

二 江淮方言的分类与祖调值构拟

2.1 徐州式方言

我们把北方方言中的江淮方言按其声调调值的特点分成八群,其中第一群为“徐州式方言”。平山久雄(1983)曾管它叫做“天津式方言”,现在根据选择当地方言之一为代表的原则改了名称。本文给徐州式方言下的定义是:阳平为高平调;上声为升调或曲折升调;去声为降调;阴平或平或降,或为曲折调,种类较多,但都是较低的;入声可有可无。

本文所引安徽省方言的声调调值根据《安徽省方言概况》里的〈声调表〉(114—119页),江苏省方言则根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里的〈第一区声调表〉(2页)和〈第四区声调表〉(27页),但〈第一区声调表〉只收几个代表方言的调值,其他地点可以参看该书〈方言地图〉中各调类(除入声)的调值分布图(第十九图至第二十二图),引用时把字母式的符号改写成5度制数字;入声只有〈古入声今调类图〉(第二十三图),该图不载调值,引用时只好用x来标明入声的存在。

我们将此二书的材料分类的结果,徐州式方言在安徽省包括《安徽省方言概况》所称阜宿方言区^①23处里的22处(皖南的宁国1处是例外),肥芜方言区34处里的7处,在江苏省包括《江苏

^① 安徽省阜宿方言区的多数方言和江苏省第四区方言没有入声,因而一般认为是属华北方言,不属江淮方言,但本文把这两区方言和江淮方言一起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从声调调值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些方言和江淮方言是连续而渐变的。

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所称第四区 8 处的全部和第一区 28 处里的泗洪 1 处，一共 38 处方言。为节省篇幅，从中选 10 处方言的调值，列在〈表三〉^①里。表中“纬·经”表示该地的北纬和东经，例如霍山的“312·162”表示霍山在北纬 31 度 20 分和 31 度 29 分之间，在东经 116 度 20 分和 116 度 29 分之间。排列地点的顺序就按这两种数字的大小。“安”、“江”分别代表安徽省和江苏省。这种表式也适用以下各表。

〈表三〉徐州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霍山	安	312·162	212	55	24	53	5
合肥市	安	315·171	212	55	34	42	4
凤台	安	324·164	11	55	24	53	
蚌埠市	安	325·172	212	55	24	53	
凤阳	安	325·173	21	55	213	53	
亳县	安	335·154	213	55	24	53	
徐州市	江	341·171	313	55	35	51	
新沂	江	342·182	213	54	24	52	
沛县	江	344·165	212	55	35	52	
赣榆	江	344·190	213	55	24	42	

我们可以给这群徐州式方言假定一个共同的祖调值系统而拟测各调类的祖调值。

阳平的祖调值当拟为*55。徐州式方言除了新沂 1 处外都保存了这一祖调值。新沂的 54 可以看做是往山东西南式的阳平调

^① 其实〈表三〉代表 28 处方言，因为肥西、肥东的调值同于合肥市，金寨同于凤台，阜南、颍上、寿县、阜阳、临泉、太和、蒙城、界首、涡阳、宿县、灵璧、泗县、濉溪、肖县和砀山同于蚌埠市。此外属徐州式方言的有舒城、六安、霍丘、怀远、五河（以上安徽省）、泗洪、睢宁、宿迁、邳县、丰县（以上江苏省）。

值过渡的萌芽。上声的祖调值可拟为*213。这个调值除了凤阳1处不变外都变为单纯的升调,同时也逐步变高,为24、34、35等。去声的祖调值则可拟为*53。这一调值在有些方言已变为52、51、42等。阴平的祖调值就有点不好拟测。如把它拟做*11,也能说明徐州式方言中阴平调值的变异:要是*11开头稍微变高来节省发最低音的生理负荷,它就可以变为21;要是末尾也变高一点就可以是212、313等;要是末尾变高的程度比开头大就可以变为213、214等。虽然如此,我认为把阴平拟为*31更为合适,因为下文所提芜湖式方言的阴平祖调值当拟做*31,那么不少徐州式方言的曲折调阴平不如也看做由*31变来更为简单。*31要添升尾就变313;如开头受后面最低音的同化而变低就又成为213、212;如果只是开头变低不添升尾就成21、11。

以上所拟徐州式祖方言各调类的调值排列在下文〈表十一〉里。这一系统应该还有入声,但入声的祖调值本文一概不去讨论,表中只以*x来标之。

2.2 芜湖式方言和枞阳式方言

在安徽省内徐州式方言地域南边有一群方言(19处),它们的阳平不是高平,而是升调,其他三声的调值则与徐州式方言大同小异。江苏省里也有少数这一类的方言(4处)。我们将这群方言叫做“芜湖式方言”。从23处当中也选10处芜湖式方言的调值列在〈表四〉^①。

^① 调值全同于芜湖市者有芜湖县和巢县。此外属芜湖式方言的有宣城、郎溪、马鞍山市、南陵、广德、当涂、滁县、定远、嘉山(以上安徽省)、仪征、扬中(以上江苏省)。方进(1966)所记芜湖县方村方言就算是芜湖式方言的变异,这里的阳平和上声因调值接近而合并为24(有时312)。

〈表四〉芜湖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安庆市	安	303·170	21	35	313	52	55
宁国	安	303·185	11	45	13	53	
贵池	安	304·172	44	24	213	52	35
桐城	安	310·165	31	34	213	32	5
芜湖市	安	312·182	31	35	213	53	5
全椒	安	320·181	21	35	33	53	5
镇江	江	321·192	21	24	213	41	x
来安	安	322·182	21	35	22	42	5
淮南市	安	323·170	212	45	24	52	55
高邮	江	324·192	44	213	21	53	4

我们可以给芜湖式方言假定共同的祖调值系统,来说明调值分布的情况。芜湖式方言的阴平多是低降调,因此阴平的祖调值当拟为*31。从*31变为现在阴平调值的经过是和上述徐州式方言的情形一样的。可是徐州式方言的阴平多变曲折调,而芜湖式方言的阴平仍多降调,这一点不同应该是上声在芜湖式方言多保持曲折调的缘故。高邮和贵池两处的阴平是44,这可能是经过*11>*33,也可能是经过*212>*22>*33而变来的。阳平的祖调值可拟为*213,即与徐州式方言上声的祖调值相同,其演变的样式应该也相同:阳平*213在23处中除高邮1处外都变为单纯的升调,同时也变高,像宁国和淮南市那样变成45就很接近徐州式方言了。去声的祖调值应该是*53,和徐州式方言的祖调值相同,到现在的变化也是相同的。至于上声在芜湖式方言多数是曲折的升

调或凹调,也有少数地方是 11、22、33,或是尾略降的 21。为说明这种变异,似乎把上声的祖调值拟为 *11 比较合适,可是这样拟测在最后构拟江淮祖调值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即与阳平的拟测调值冲突,因此我想只给上声的祖调值打个问号,不强加拟测为宜。

安徽省东南部安庆市附近的枞阳等 3 处的调值系统和芜湖式方言相似,但以上声比阳平高为异,请看〈表五〉。我们将这一群方言叫做“枞阳式方言”。

〈表五〉枞阳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至德	安	300·170	31	24	45	313	33
东流	安	301·165	11	24	35	41	55
枞阳	安	304·171	21	24	45	53	55

枞阳式方言的祖调值系统当拟为:阴平*31,阳平*24,上声*35,去声*53,入声*x。至德的去声 313 较为特殊,演变的途径应该是 *53 > *41(如东流) > *412 > 313。

2.3 南京式方言、庐江式方言和阜宁式方言

江苏省的南京市、淮阴市以及这两市的周围地区,一共有 11 处方言,声调调值也和芜湖式方言相近,以去声为高平调为显著的特色。安徽省的青阳、含山与和县 3 处亦属此类。我们将这一群方言叫做“南京式方言”。南京式方言的声调调值如〈表六〉(洪泽的调值同于淮安,和县同于含山,故未列出)。

〈表六〉南京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青阳	安	303·175	31	35	324	44	5
含山	安	314·180	21	45	323	54	5
溧水	江	314·190	32	24	312	55	x
江宁	江	315·184	31	13	313	55	x
句容	江	315·191	31	24	213	55	5
江浦	江	320·183	31	24	22	44	5
南京市	江	320·184	31	13	22	44	5
六合	江	322·185	41	24	212	55	x
淮阴市	江	333·190	42	24	212	55	4
淮安	江	333·190	53	24	11	55	x
泗阳	江	334·183	31	35	213	55	x
涟水	江	334·191	31	35	213	55	4

我们也可以给它们拟测祖调值来说明现在的调值变异。阴平在南京式方言都是降调,除了中降调 31 等外间或也有高降调 53、42 等。这些高降调可能是*31 为增加响度而变高的结果,但也可能本来就是*53。我姑且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南京式方言的阴平祖调值拟为*42。阳平的祖调值可拟为*13。上声的祖调值宁可阙疑,是出于和芜湖式方言同样的情况的考虑。去声的祖调值当拟为*55,含山的去声 54 已开始向芜湖式方言过渡。

安徽省中部有庐江和无为 2 处,其方言调值和南京式方言相似,只以阳平是低平调或低降调为异,请看〈表七〉。我们把它叫做“庐江式方言”。

〈表七〉庐江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庐江	安	311·172	21	11	24	44	5
无为	安	312·175	43	21	213	55	5

庐江式方言阳平的祖调值当拟为*11,上声当拟为*213,阴平和去声的祖调值应该和南京式方言相同。

在淮阴市一带南京式方言的东边,有4处方言的调值也和南京式方言相似,但以去声作45为特色,请看〈表八〉。这群方言叫做“阜宁式方言”。

〈表八〉阜宁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建湖	江	332·194	31	213	34	45	x
阜宁	江	334·194	41	213	21	45	x
射阳	江	334·201	52	213	21	45	4
滨海	江	340·195	31	24	212	45	x

阜宁式方言去声的祖调值当拟为*45,阳平当拟为*213,阴平当拟同南京式的*42,上声则阙疑。

2.4 扬州式方言和盐城式方言

江苏省中部与东北部7处方言的调值也和南京式方言相似,但以上声是降调为异。安徽省最靠东的天长1处亦属此类。我们将这一群方言叫做“扬州式方言”。扬州式方言的调值请看〈表九〉。盱眙的调值全同宝应,没有列出。

〈表九〉扬州式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扬州市	江	322·192	31	34	42	55	4
江都	江	322·193	31	34	42	54	x
天长	安	324·185	21	24	41	55	5
宝应	江	331·192	31	35	42	55	x
沭阳	江	340·184	313	35	31	55	x
灌云	江	342·191	213	24	31	55	3
新海连	江	343·191	313	35	42	55	13

在我们给扬州式方言拟测的共同祖调值中，上声应该也是降调，我们就拟做*53。如拟做*42，就和阴平太接近了。阴平当拟为*31，阳平当拟为*24，去声则应该是*55，和南京式的祖调值相同。江苏省东北部的扬州式方言阴平已变为曲折调，这是和与它们接连的徐州式方言共同的现象。

在江苏省中部阜宁式方言的南边有 1 处盐城方言，调值和扬州式方言相近，但去声是 35，这一点却与阜宁式方言相似，请看〈表十〉。虽然我们的资料里没有别的方言与此同类，但不妨也采用“盐城式方言”的名称。我们把它的祖调值且看做和现在的盐城调值相同。

〈表十〉盐城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盐城	江	332·200	31	213	53	35	5

2.5 江淮祖调值的构拟

将上面所拟 8 种祖调值系统列在〈表十一〉，以供对照。我们

假定这些祖调值系统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大祖调值系统,而把那个系统叫做“江淮祖调值”。我们把8种下层祖调值互相比,能拟出什么样的大祖调值呢?先在〈表十一〉下边写出拟测的结论,然后在下文加以说明。

〈表十一〉下层方言的祖调值和江淮祖调值

祖调值类别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徐州式	*31	*55	*213	*53	*x
芜湖式	*31	*213	?	*53	*x
枞阳式	*31	*24	*35	*53	*x
南京式	*42	*13	?	*55	*x
庐江式	*42	*11	*213	*55	*x
阜宁式	*42	*213	?	*45	*x
扬州式	*31	*24	*53	*55	*x
盐城式	*31	*213	*53	*35	*x
江淮祖调值	*42	*11	*435	*35	*x

先从去声拟测调值的说明入手。下层祖调值系统里的去声调值共有四种,这四种调值在演变上的程序应该是*35>*45>*55>*53,因为这样假定就合乎高升调易变高平调,高平调易变高降调的音理。因此我们把江淮祖调值中的去声拟为*35。江淮祖调值中的阴平当拟为*42,这一调值在去声变*53或上声变*53的下层祖调值系统里就变为*31了。阳平则拟*11为宜:如果它的末尾添升尾就可变*13,同时开头稍稍变高就成*213,这些再可以经过*24、*35变为*55。

现在要讨论的是上声。我们对江淮祖调值系统中的上声要求的条件是:它既能说明下层祖调值系统中的上声调值*213、*35和*53,又能说明现代芜湖式方言、南京式方言和阜宁式方言当中

上声变异的情况；被拟测的调值当然不能和其他调类的拟测调值互相冲突；它如果在演变的过程中和其他调类的调值交叉的时候，应该能充分地说明不致混淆的原因。要满足这些条件不很容易，我认为最好把上声的大祖调值拟为⁵⁵435，即带紧喉作用（以“⁵⁵”标之）的曲折高升调。这里的紧喉作用可能本是发高音的手段，但它一旦作为上声的一种标志而被加强（这样也就更容易辨别出上声和去声）以后，却会拘束声带的颤动，发挥降低调值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江淮祖调值的上声⁵⁵435能逐渐变到213。要是被加强的紧喉作用坚持到音节末尾，213就会再变为11、22、21等；这或许也可以说，紧喉作用甚至使声带停止颤动，把213里的升尾割掉了。在这一低音化的过程中，上声应该先和去声，然后和阳平发生了交叉现象，即去声和阳平都往高里变，上声却降到它们的下边来了。交叉的时候，去声和阳平应该多是单纯的升调，上声则是曲折调再加显著的紧喉作用；要是阳平也是曲折调（如〈表四〉中的高邮），上声就会偏向于平调。这样两次交叉都没有造成调类的合并。从江淮祖调值到枞阳式方言和庐江式方言的祖调值之间，上声只和去声交叉了，在阜宁式方言的建湖也有同样的情形。到扬州式方言和盐城式方言的祖调值之间，上声没有加强紧喉成分，⁵⁵435就经过⁴⁵>⁵⁵再变到了⁵³；换言之，上声没有和去声交叉，而走在去声的前面变为高降调。

江淮祖调值系统应该还有人声，其调值本文不去讨论，只以“x”来标之。

就上、去两声变高平调再变降调的先后次序来看，扬州方言的变调是饶有趣味的。据王世华（1959：6页）的描写，扬州方言的单

字调是：阴平 11、阳平 35、上声 42、去声 55、入声 4；虽与〈表九〉所记的扬州调值稍有出入，但也在扬州式方言的范围，就是说，在调值变化的过程中上声走在去声的前面。据该书（6 页），扬州方言上、去两声有变调，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字组里的非末字，上声 42 替换为 4（有如入声调值），去声 55 则替换为 53。可见在变调调值的系统里上、去两声的调值几乎颠倒过来；在变化的途中去声走在上声的前面，而上声没有和阳平交叉，这种情况就类似枞阳式方言。上声变调调值的短促性可能就是紧喉所带来的。

附带也说一下福建省南平官话的调值。Chen(1981:181—188 页)将南平官话的音韵特点和一些词汇跟若干北方方言进行比较，同时也参考了《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南平官话的主层是在 15 世纪由明朝派遣镇压叛乱的江北兵士带来的。据该文（159 页），南平官话的基本调值是：阴平 33、阳平 11、上声 24、去声 35。这和庐江式方言与阜宁式方言的调值有相似之处。又据该文（159 页、189 页），南平官话在字组的非末位上有变调，变调调值是：阴平 44（阳平不变）、上声 51、去声 55（在去声前面是 51）。可见上、去两声的变调调值却与扬州式方言（基本调值）相似。

三 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拟测

3.1 江淮祖调值可拟做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

据我的看法，上面所拟定的江淮祖调值不但能说明江淮方言

声调调值,而且也能说明其他不少北方方言调值系统的来历。平山久雄(1983)所称山东西南式方言,现在我认为把它改称为“济南式方言”更合适,这类方言的调值既然是从徐州式(即天津式)方言的调值系统变来的,自然算是江淮祖调值的再进一步发展。我还认为大多数西南官话的调值系统是由济南式方言再往前变的,因此也算江淮祖调值的末裔,请看〈表十二〉。

〈表十二〉西南方言的调值系统成立的程序

	济南	钟祥	成都	汉口
上	55	> 53	53	> 42
阳平	42	> 31	31	> 213
去	31	> 214	> 13	> 35
阴平	213	> 24	> 44	> 55

表中钟祥的调值据赵元任(1939),济南、成都与汉口的调值则据《汉语方音字汇》。这4个地点也分别代表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调值系统,包括被拟测的调值系统。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也有一些具有这种西南式调值系统的方言,例见〈表十三〉A。

〈表十三〉3.1 所提调值系统类型举例

类	地点	省份	纬·经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所据
A	济源	河南	350·123	44	31	53	13	3	贺巍 1981
	获嘉	河南	352·133	33	31	53	13	3	贺巍 1979
	曲周	河北	364·145	55	42	53	212	5	《河北方言概况》
	隆尧	河北	372·144	34	31	53	21		同上
B	黄县	山东	374·203	313	44	24	53		高文达 1961
	天津市	河北	390·171	11	55	24	51		黄绮 1958
	易县	河北	392·152	33	55	215	412		《河北方言概况》

续表

C	即墨	山东	362·202	11	53	25	41	43	徐世荣 1957
	束鹿	河北	375·150	33	53	213	31		《河北方言概况》
	河间	河北	382·160	44	53	213	31		同上
	涿鹿	河北	402·151	44	42	45	31		同上
D	定县	河北	383·145	33	35	214	51		同上
	旅大市	辽宁	385·213	312	34	213	53		宋学 1963
	北京市		395·162	55	35	214	51		
	青龙	河北	402·185	44	35	213	51		《河北方言概况》
	沈阳市	辽宁	414·232	33	35	213	53		宋学 1963
E	望都	河北	384·150	45	22	214	51		《河北方言概况》
	保定市	河北	384·153	45	22	213	52		同上
	唐山市	河北	393·181	55	22	213	42		同上
	丰润	河北	394·180	55	11	314	51		同上
F	无极	河北	381·145	32	213	45	54		《河北方言概况》
	阜平	河北	384·141	33	24	55	43		· 同上
G	滦县	河北	394·181	11	11	213	55		徐世荣 1957
	昌黎	河北	394·190	32	13	213	55		《昌黎方言志》
H	洛阳	河南	343·122	44	42	54	312		任均泽 1959
	洛宁	河南	342·113	55	42	45	212		同上
I	西安	陕西	341·085	21	24	453	45		白漆洲 1954
	咸阳	陕西	342·084	11	13	51	44		同上
	华县	陕西	343·094	451	45	453	55		同上

如平山久雄(1983:73页)〈参考地图〉所示,济南式方言主要分布在山东省除掉南部、半岛地区和黄河河口附近以外的大部分地域,以及河北省东南部、河南省东北部。这些济南式方言地域北边调值分布的情况和它南边江淮方言区里的情况有平行之处。我们所谓天津式方言(〈表十三〉B),就相当于南边的徐州式方言,不过它所占的面积远不及徐州式方言那么大,而且地点是分散

的。但它们附近有一些方言,阳平为高降调,上声为升调或曲折升调(〈表十三〉C),这些可算天津式和济南式的中间阶段。北京市和周围地区的一些方言以及辽宁省里的多数方言,阳平仍在升调的阶段(〈表十三〉D),就相当于芜湖式方言。河北省中西部和中东部有一些方言,阳平为低平调(〈表十三〉E),这些就似庐江式方言,不过去声已变降调了。河北省中西部另有一些方言,阳平虽已变为升调或曲折升调,但音域在上声的下面(〈表十三〉F),这些就像枞阳式方言。最后在河北省中东部的两处(〈表十三〉G)我们遇到类似南京式的调值系统。滦县的平声不分阴阳,这大概是阴平曾作*33(<*313<*31),遂与阳平 11 合并的结果。至于类似阜宁式、扬州式和盐城式的方言,在济南式方言地域的北边(河北省西北角接近山西方言,姑且除外)似乎没有。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济南式方言地域西边的情况。洛阳方言(〈表十三〉H)虽然在平山久雄(1983)未算济南式方言,因为它的阴平是高平调,上声稍带降性,但也不妨看做济南式方言的一种变异。洛宁方言(〈表十三〉H)一面很像洛阳,但由于上声稍带升性,又类似涿鹿方言(〈表十三〉C)。再进陕西省,我们就看到关中一带多数方言的调值近似扬州式方言,或近似盐城式方言^①(〈表十三〉I)。

至于北方方言中上面没有提到的,即关中以外的西北方言、胶东方言、河北省和河南省的个别方言和个别西南官话方言等,它们的声

① 相同的调值系统分布在不相邻的两处。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两处共同地保存了较古的阶段,但也可能是由于两处都独立地发生了同样的调值变化。如果一种语音存在着共同的音变可能性,那么它完全可以在不相邻的两处独立地产生相同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观察调值分布时的基本看法。

调值能否也根据江淮祖调值得到解释？我的回答是对于其中某些方言是“能”，只是本文因篇幅关系没有提出来讨论；对于其他某些方言是“还不知道”，由于那一带方言调值分布的情况复杂，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还不便作历时的分析。这样我们目前只能说，北方方言当中相当多数方言的调值系统可以据江淮祖调值得到历时的说明；我认为在此意义上不妨把江淮祖调值当做多数北方方言共同的祖调值系统，称之为“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这“初案”究竟是否全体北方方言的真正祖调值，还有待以后逐步地进行研究了。

3.2 对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一点修改

我们无法根据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推断出多数北方方言的各种调值系统跟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这个共同的祖调值系统之间相距多少年。但可以肯定，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年代是相当古老的，不是距今只几百年的事情，因为从它到现代的各种北方方言调值，特别到济南式和西南官话式的调值系统，中间变化量比较大，需要经过很多的世代，才能把微小的变异积累成显著的不同。果如是，在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时代，全浊声母一定还没有并入清声母，因此阴平和阳平之别据音位论的观点来看还不过是一个平声调位的两个变体。这么想来去声应该也有两个变体，只是调值比较接近。于是我把去声分为阴去 *35 和阳去 *24；阳去应该也包括全浊上声在内。后来全浊声母清化以后这两个变体的差别一般就消失了，只有一些方言在轻声前面留下了阴阳去的调位对立，例如昌黎的去声单念是 55，但在轻声前面就有阴去 55 与阳去 24 的分别（《昌黎方言志》：37—39 页）。入声应该也有两个变体，现把阴入记为 *x₁，把阳入记为 *x₂。这样修改的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42	*11	*'435	*35	*24	*x ₁	*x ₂

我们的拟测在两个方面显得比较稳妥。其一是平声的调值。在传统的韵书里平声字比其他三声字都分别多出一倍,由此可以推测平声原来是无标记的(unmarked)调位,其他三声则是有标记的(marked)调位。因为无标记音位的发音比有标记音位一般更近于自然呼吸的状态,所以平声的调值最好拟做容易发音的,造成分较少的音调。我们给阴平拟测的*42就能满足这项要求;发清音声母的时候喉头的肌肉较为紧张,因此带清音声母的音节以次高音起头比较容易,随后音高渐低也合乎生理的自然。当时的浊音声母很可能像现代吴语那样带着浊气流,那么阳平的开头较低也是自然的。而且作为与阴平相配的阳调,阳平的末尾不能比阴平高,这样看来阳平为*11的拟测也是比较稳妥的(但我们并不排斥*21或*22的可能性;*11的含义就是大致低平的意思)。

其二则是全浊上声的变化。北方方言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全浊上声变入去声。就我们拟测的调值可以说明这一项变化的原因。起初全浊上声还构成阳上调值时,作为与阴上*'435相配的阳调,它的调值应该是和阳去*24很接近的,而且全浊声母的浊流基于声带的松弛,不好和上声的紧喉作用相处,因此阳上就归入阳去了。次浊声母则受了上声紧喉的影响,变为带紧喉的m,n,l等^①,次浊上声就归属了阴上,没有并入阳去。

^① 现代吴语的次浊声母归属于阴调时就是这样带紧喉的,参看赵元任(1928:28页)、李荣(1966:1页)等。

3.3 由“声明”的曲调所归纳的唐代北方汉语调值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

“声明”是佛教仪式所用的一种声乐,用以吟唱佛经或其他赞佛的词章。赖惟勤(1951)曾据日本所传一些“声明”的曲调归纳出9世纪北方汉语声调调值的轮廓。所用的材料是《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简称《戒品》)、《天台大师画赞》、《诸天汉语赞》、《九方便》、《五悔》等“声明”曲,这些多是圆仁(慈觉大师,838年至847年入唐,其间在长安资圣寺修行五年)学过来的,以后由日本天台宗的僧人口口相传,用日本汉音念唱,经12世纪的湛智写成了谱子;现行的谱子都来源于此,在每一汉字旁边用一种符号记其唱法。这种符号叫“博士”,标明开始的音高和调型。下例是《戒品》的一部分:

尔	时	释	迦	牟	尼	佛	初	坐	菩	提	树	下
r ₄	e ₄	e ₅	f ₅	f ₅	e ₃	e ₃	f ₅	r ₄	e ₄	e ₄	r ₄	e ₄
成	无	上	觉									
e ₄	e ₄	r ₄	e ₅									

例中“博士”以带数字的罗马字代之,它们代表的曲调如下:

- | | |
|-------------------------|-------------------------|
| f ₅ :从羽到徵的降调 | e ₅ :以羽起音的平调 |
| e ₄ :以徵起音的平调 | e ₃ :以角起音的平调 |
| r ₄ :从徵到羽的升调 | |

每字的唱法相传是根据那个字的声调来定的。上述几种“声明”曲中《戒品》字数最多,赖文先拿其中“定曲”(有一定节拍的部分)的1462字作为分析的对象。不过有一部分短句承担乐曲的主旋律(如例句中加底线的地方),唱法似与字调无关,还有曲中停顿

前面的字(如例句中加浪线的)往往也不管字调,一律念成 e₄。除掉这些部分后,就剩下 1036 字,对它们作统计观察字调与博士的关系,结果如〈表十四〉。此表即赖惟勤(1951:13 页)所载的统计表,只是表式稍有改动。

〈表十四〉“声明”《戒品》中“博士”的分布

博 士	平				上				去				入				计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全清	次清	全浊	次浊	
f ₅	78	22	1	4	2	1	0	0	7	0	1	0	3	0	0	0	119
e ₄	24	3	71	72	0	1	0	1	1	0	0	0	3	0	20	0	196
e ₅	10	0	1	7	22	8	1	23	0	0	4	1	143	6	50	38	314
r ₄	1	0	1	0	35	7	55	30	131	32	75	22	0	0	4	0	393
其他	7	0	0	3	0	0	0	0	2	0	1	0	0	0	0	1	14
计	120	25	74	86	59	17	56	54	141	32	81	23	149	6	74	39	1036

根据〈表十四〉的情况,赖文(16 页)归纳了六个调类群,而把调值拟测如下。所以采用“群”的说法是因为两个调类如果调值十分相近就不一定在统计的数值上反映出差异来的缘故。

阴平群(平声清):降调明显,起音较高。

阳平群(平声浊):平调,稍带降性,起音较低。

上声群(上声清、次浊):微升调,起音中等。

去声群(上声全浊、去声):升调明显,起音较低。

阴入群(入声清、次浊):平调,可能带点降性,起音较高。

阳入群(入声全浊):平调,稍带升性,起音较低。

赖文还对《戒品》以外的“声明”曲进行了同样的分析,所得的结论都与上述基本一致。拿我们的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来和赖文

所拟的唐代北方调值相比,其类似的程度是足以惊人的。由此亦可见我们的拟测并非虚假之论。

在唐代声调调值的拟测方面,金田一春彦(1951)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该文的结论大致如下(698—699页):

平声轻:降调。

平声重:低平调。

上声(轻):高平调。

去声(包括上声重):升调。

入声轻:高平短调。

入声重:低平短调。

这可以和赖文的结论互相印证,两者之间只有上声调值的参差似有实质上的意义,这大概可视为方言性的不同。关于该文的内容,作者自己曾写了提要,即金田一春彦(1980),可以参看。

此稿烦郭春贵先生改正中文,兹记感谢。

引用文献

- 白 涤 洲 1954:《关中方音调查报告》,语言学专刊第六种,中国科学院,北京。
方 进 1966:《芜湖县方村话记音》,《中国语文》2,137—146页。
高 文 达 1961:《山东黄县方音与北京语音的对应》,《方言与普通话集刊》8,33—39页。
贺 巍 1979:《获嘉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2,122—136页。
1981:《济源方言记略》,《方言》1,5—26页。
黄 绮 1958:《天津人容易学好普通话》,《方言与普通话集刊》2,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8页。
李 荣 1966:《温岭方言语音分析》,《中国语文》1,1—9页。
任 均 泽 1959:《河南方言词汇(续)》,《方言与普通话集刊》6,102—109页。

- 宋 学 1963:《辽宁语音概说》,《中国语文》2,104—114 页。
- 王世华 1959:《扬州话音系》,科学出版社,北京。
- 徐世荣 1957:《普通话语音讲话》,《文字改革》9,36—42 页。
-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北京。
- 1939:《钟祥方言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五,商务印书馆,长沙。
- 金田一春彦 1951:《日本四声古義》,寺川喜四男、金田一春彦、稻垣正幸編《国語アクセント論叢》,法政大学出版局,東京,627—703 頁。
- 1980:《日本語のアクセントから中国唐時代の四声値を推定する》,《日語教学与研究》1980.4,1—3 頁、9 頁。
- 赖惟勤 1951:《漢音の声明とその声調》,《言語研究》17—18,1—46 頁。
- 平山久雄 1983:《山東西南方言的變調及其成因》,《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21,59—81 頁。
- Chen, Chung-yu(陈重瑜) 1981: “Towards an Affiliation of the Nanping Dialect of Fuj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 2, 151—192 頁。
- Giet, P. Franz(齐德芳) 1939: “Die Töne des Südshantung-Dialekts in Wortverbindungen, an Hand von Übersichten, Regeln und Beispielsammlungen zur Veranschaulichung und Übung dargestellt”, “Beiträge zur Einführung in das Chinesische Studium” 4, Taikiachuang.
- Kakita Yuki & Hiki Shizuo 1976: “Investigation of Laryngeal Control in Speech by Use of Thyrometer”, “Journal of Acoustic Society of America” 59. 3, 669—674 頁。
- 《安徽省方言概况》: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工作组编,1962 年。
- 《昌黎方言志》: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科学出版社,北京 1960 年。
- 《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4 年。
- 《河北方言概况》: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天津,1961 年。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执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60年。

1984年

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 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

提要 本文将官话(包括晋语)方言的声调调值系统按照它从“官话祖调值”经过历时演变的类型来分类,把各种类型的分布记在地图上,观察其分布上的特色。材料取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对书中 90 多个方言认定其所属类型。根据各种类型在地理上分布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从“官话祖调值”演变的幅度来说,华北、华中平原的北缘(河北北部、东北)和南缘(江苏、安徽)比较保守,变得较小,中间地区(山东、河南)以及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则变得较大,但各地区的演变样式都有其独特之处。

—

1.1 汉语的声调调值系统的类型,既可以从共时方面来设想,也可以从历时方面来设想。例如从音位的角度来说,北京方言的调值系统可解释为由高平调(阴平 55)、低平调(上声 214, 21)、升调(阳平 35)、降调(去声 51)构成,西安方言的调值系统也可解释为由高平调(去声 44)、低平调(阴平 21)、升调(阳平 24)、降调(上声 53)构成,两个方言中每一调类的调值都不相同,但这些调值所构成的系统则一样,属于同一类型。这是共时的观点。不过,从历时论的角度来看,北京和西

安应该属于不同的历时类型,因为对同一个调类(如阴平)两地的调值有很大差距,两者应该是曾经经历过不同的历时演变过程。

本文所谓的官话,也包括晋语在内。对官话方言里区、片、小片的名称,本文基本上遵照《中国语言地图集》,也有时候沿用其他文献中的名称。

1.2 官话方言声调调值的历时类型,可以根据“官话祖调值”演变至今的不同样式来规定。我至今在几篇文章里所设定的历时类型称做“声调型”,它是由“次数”和“调类行列”构成的。下面简单地介绍这些术语的涵义以及应用上的一些原则,以便读者了解。这里对平山久雄(1997) § 2 的内容进行了删节和改订。

在说明“次数”和“调类行列”之前,先需要介绍本文所应用“环流”的看法。平山久雄(1975)认为,厦门话里曾经发生的推链式调值演变过程中,只有高平调的降调化起过主动作用,其他调值演变都是被动的。至平山久雄(1984a)认为,高降调即使不为高平调变降的趋势所逼,也可能受自身的末尾低音的影响而“主动地”变为低降调。再至平山久雄(1984b),把调值演变的过程看成从高平调出发,又终于回到高平调的一个圆环。这个圆环称为“调值变化的环流”(简称“环流”),其概要可描绘如下。有复数演变可能性的地方,就写出了复数的路径。以数字表示的调值可能包括与此相近的调值,如 55 可兼 44 之类。

$$11 > 33 > 44 > 55$$

$$55 > 53 > 51 > 31 > 11 > 13 > 35 > 55$$

$$51 > 412 > 213 > 24 > 35$$

$$412 > 313 > 33$$

环流中每一段调值演变,都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因此,若某地某时的方言发生一系列的调值变化,那么,那里面除了推链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拉链的因素,比方高降调先已主动地变为低降调,那么高平调也就更容易呈显出高降的趋势了。

这个环流不包括短促的人声在内;人声如果不丢失短促性,就不会进入环流之中。但人声调值的演变方式也有与此环流类似之处,如高平短调55可变53,低平短调11可变13等。此外,韵尾-p, -t, -k或喉塞韵尾在其关闭之初容易伴随频率较低的声带颤动(例如-p容易为[-^bp]),而这带音部分声带颤动的频率不能很高),它会把音高拉下来,使55变成53。

上述环流的想法有一个前提:按环流演变的声调,其音节的声母需要是清音或次浊音,全浊声母则已清化。某调类的调值如果以带音的全浊声母起头,那么它的开头受其浊音的牵制而难以变高,不能不停留在较低的音域中。

各调类的调值在此环流之中互相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向前移动,这应当是调值系统演变的基本情形。在这循环演变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生相邻两个调类的合并;在环流分做复数路径的地方,也可能一个调类的调值把前头另一个调类的调值赶过去,赶到前面。我们自然也可以设想环流的框架之外的一些调值变化:例如高平调55,也可变成44,以便节省发最高音的生理负荷;低降升调

312 也会丢掉尾巴变回单纯的低降调 31; 紧喉作用也会把较高的调值拉低, 可以形成逆溯环流的特殊变化。尽管如此, 我认为, 把环流视为调值演变的主要途径也就有利于认识环流之外的演变形式了。

1.3 平山久雄(1984a)实际上已应用这种环流的看法对华北、华中平原的官话方言声调调值进行了比较研究, 拟测了这些方言所共同具有的祖调值系统, 即“官话祖调值初案”(原名为“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 下文简称“祖调值”)如下:

阴平 *42	上声 *'435	阴去 *35	阴入 *x ₁
阳平 *11		阳去 *24	阳入 *x ₂

附在上声调值前的“'”号表示音节带有紧喉作用。阴去、阳去之别在大多数官话方言的单字调中已消失了, 其祖调值亦可合并为一个去声 *35。阴入与阳入的调值阙疑, 只用代码来标之。上声其实是阴上, 阳上则已并入阳去。

现以扬州、北京两处为例, 说明从祖调值到现代调值的演变:

	扬州	祖调值	北京
阴平	21 <	*31 < *42 >	*313 > *33 > 55
阳平	34 <	*12 < *11 >	*112 > *13 > 35
上声	42 < *55 < *45 <	*'435 >	*'324 > 214
去声	55 <	*35 >	*55 > *53 > 51
入声	4 <	*x	

从祖调值到扬州方言, 每一调类的调值都是随着环流变过来的。从祖调值到北京方言, 除上声以外也都如此, 只是演变的幅度比扬州稍大一点; 上声则由于其紧喉作用牵制了声带的颤动, 因而调值逐渐降低, 变到 214 了(现在这个调值低音部分仍带紧喉)。在这

低化的过程当中,上声应该和阳平交叉了,但上声为一种凹调并带紧喉,阳平则为单纯的升调,因而两者未至混淆。在多数的官话方言里,上声似乎都曾发生过这种低音化的演变。

1.4 官话祖调值系统缺少高平调。从祖调值到现在的官话各方言调值系统的演变当中,一般情况是某一调类的调值先变到高平调,而后再变成降调,而这种变化在一个方言的历史中可能是反复发生的。我们把该方言中高平调曾经发生过降调化的次数叫做“次数”。扬州方言里上声最先变到了高平调,然后变为降调;北京方言里去声最先变到了高平调,然后变为降调,而这两个方言都还没有第二个调类随后走完同样一段演变之路,因此扬州、北京的“次数”就都是“1次”。

1.5 “调类行列”则是由已发生降调化的调类构成的顺序排列。具体做法是把方言中曾经经过高平调而变为降调的调类,按其降调化的先后顺序排列起来,最后再附以现据高平调位置的调类。如果现在没有高平调,那就附0。调类以数字来表示,即1(阴平),2(阳平),3(上,即阴上),4(阳上),5(阴去),6(阳去),7(阴入),8(阳入)。官话方言没有阳上,4实际上是虚位;去声一般也无阴去、阳去之别,可用5代表;入声7、8一般也是虚位。据此,扬州的“调类行列”是“3·5”(亦可称“上·去”),北京则是“5·1”(亦可称“去·阴”)。综合起来,扬州的声调型可认为是“1次3·5型”,北京的声调型则可认为是“1次5·1型”。

根据从哪一或哪些调类开始降调化,可以把不同的调类行列归并为“系”。例如凡是以“5”起头的行列(如“5”、“5·1”、“5·2·3”等)可概括为“5系”,以“5·1”起头的行列(如“5·1”、“5·1·2”、

“5·1·3·2”等)可概括为“5·1系”。依据目前所知,官话方言都是“3系”和“5系”,“1系”、“2系”即使有,似乎也极为罕见。从祖调值来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祖调值中最接近高平调的是上声和去声。

最末一项是0的调类行列,我们称之为“0式”,例如“5·0”、“5·1·0”、“5·2·1·0”等可称为“0式”。那么“0式”以外就是“非0式”了。

1.6 在认定“次数”与“调类行列”时会发生一些问题,需要预先订定其处理原则如下:

(1) 高平调的范围:在所据方言资料中描写为55、44、54、43、45、34的调值,均可视为高平调。如果在一个方言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值出现在此范围之内,那么按照上面所列的顺序,只将其中之一认为高平调。

(2) 降调化的涵义:高平调末尾逐渐变低,变到53或42,才认为降调化发生了。要是54或43已有与此对立的高平调55或44,那么也把它看做降调。高升调偶尔也会经过升降调直接变为降调,如35>354>453等。在这种场合,变到降的部分大于升的部分,例如变到453或342,就认为降调化发生了。

(3) 合并调类的处理:在某一方言中要是存在合并调类(如阴平和阳平合并为一),而它已经过降调化,那么不管合并时期是在降调化之前还是在后(这一般是难以推测的),就给该方言的“次数”一律加2。合并之前的两个调类在“环流”上流动的先后顺序,一般可根据该方言周围地区持有那两个调类区别的方言,或根据该方言变调中区别那两个调类的情况来拟定。因此,如果在调类行列中有合并调类,那就按照如此拟测的先后顺序来排列这两个

调类,中间用-(不用·)隔开,如“1-2”。

(4)要考虑地理分布:一个方言可能被认定的声调型不止一种;例如扬州方言除了可能被认定为“1次3·5型”外还可能被认定为“4次5·2·1·3·5型”。在这种场合,要参考周围地区方言的情况来判断。扬州附近没有“次数”如此大的方言,因此我们不采用“4次”的看法。换言之,如果地理分布上没有不妥之处,就采用尽可能小的“次数”。

官话方言的声调型,一般似可按这一套原则来认定。如果遇到上述以外的特殊情况,就得个别地订出适当的办法来处理。

〈表一〉

0次	1次		2次		3次	
5 V	5·0 V0	5·1 V1	5·1·0 V10	5·1·2 V12	5·1·2·0 V120	5·1·2·3 V123
				5·1·3 V13	5·1·3·0 V130	5·1·3·2 V132
		5·2 V2	5·2·0 V20	5·2·1 V21	5·2·1·0 V210	5·2·1·3 V213
				5·2·3 V23	5·2·3·0 V230	5·2·3·1 V231
		5·3 V3	5·3·0 V30	5·3·1 V31	5·3·1·0 V310	5·3·1·2 V312
				5·3·2 V32	5·3·2·0 V320	5·3·2·1 V321
3 Ⅲ	3·0 Ⅲ0	3·5 Ⅲ5	3·5·0 Ⅲ50	3·5·1 Ⅲ51	3·5·1·0 Ⅲ510	3·5·1·2 Ⅲ512
				3·5·2 Ⅲ52	3·5·2·0 Ⅲ520	3·5·2·1 Ⅲ521

1.7 〈表一〉列举了官话方言中有可能存在的声调型的种类、系谱及其代号。对此表,分条说明如下:

(1) 表上只载“0次”至“3次”的情况,余可类推。

(2) 表上只载5系与3系,3系又只载“3·5”系。这是因为其他诸系罕见于官话方言的缘故。

(3) 代号是为了地图上标记的方便而定。它不过是将“调类行列”稍加改动而已,即改动了下列两点。

1. “调类行列”首位的阿拉伯数字改为罗马数字,以便明确行列的开头;即去声5、上声3在首位时分别改写为Ⅴ、Ⅲ。

2. “调类行列”中的隔号“·”在代号里均被省略。表示合并调类的“-”号(〈表一〉不包括出现合并调类的情况)以底线来代之,例如阴平和阳平合并的调类“2-1”在代号中改写为“21”。

(4) 声调型中的“次数”,只要从代号中调类记号的字数减一位(最末是合并调类,则减两位)即可得。换言之,“次数”等于记号中阿拉伯数字的位数(最末是合并调类,则比此少1)。故于代号上不特意标出。

1.8 下面几节补充说明与本文的基本构思有关的一些事项。

平山久雄(1998)比较德州方言、坊子方言的单字调和轻声前变调,认为这两个方言发生变调以前的“古调值”与现在的轻声前变调基本相同。该文没有采用声调型的说法,如果按声调型来描写的话,单字调系统在德州(213,42,55,21;调值的记法参看下文§2.1)、坊子(214,53,55,31)都是2次5·2·3型,而轻声前变调系统在德州(21,55,213,42)是1次5·2型,与天津等的单字调相同,在坊子(31,24,214,55)则是0次5型,与昌黎等的单字调相

同。山东省内的2次5·2·3型方言似乎大多具有类似的轻声前变调。至于轻声前变调的成因,该文认为:轻声音节跟前面的音节贴合得极紧,抑制了前面音节末尾音势渐弱的趋势,因而也控制了前面音节的高平调变为高降调;因为如此,轻声前的音节处在一般音节所发生的高平调变高降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套推链式调值变化的范围之外,所以保存了原来的调值状态。由此亦可见,这些方言的单字调系统是经过0次5型、1次5·2型而逐步发展下来的。

1.9 “官话祖调值系统”中上声被拟做⁵⁵435,这里面“⁵⁵”表示上声音节带有紧喉成分,这是为说明上声调值后来的演变而设的。从祖调值系统到现代官话各方言的调值系统,上声以外的调值都是基本顺着“环流”而变来的,只有对上声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多数方言中曾逆溯环流,从一种高升调变为低升调,甚至再变为低平调,而在这低化的过程中又与其他调类的调值相交叉(参看§1.3)。如果我们给上声的祖调值假定一种紧喉成分,这低化和交叉的现象就很容易说明:紧喉成分牵制了声带的颤动,使音高低沉下来;与其他调类交叉时,上声以紧喉音色作为自己的标志,与交叉的对方保持着区别,不至于混淆。

对此假设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种有利的凭据。据赵元任(1928:27—28页)、李荣(1966:46—47页)等可知,现代吴语的m,n,l等次浊声母分为两类:一类(大部分次浊字属此)带浊流,和全浊声母一同归属于阳调,另一类(除上声以外只有少数次浊字属此)带紧喉,和清音声母一同归属于阴调。在官话方言中,平声次浊字按音变规律应属阳平,而有少数字如“眯”、“捞”、“拈”等却多属阴平,这些字应该也来自带紧喉一类的次浊声母。在唐代后期,上声

全浊字并入了去声，次浊字却与清音字一同留在了上声。如果假定当时的上声带有紧喉成分，这一现象也就容易解释：上声次浊字的声母受到声调紧喉成分的同化，从带浊流一类变为带紧喉一类，因而得以避免并入去声了。全浊声母是带浊流的松音，与上声的紧喉成分不相协调，所以上声全浊字并入了去声。我们的祖调值系统中，上声和去声都是升调，而去声比上声音域稍低，这也利于解释唐代音韵史里面有名的“浊上变去”现象。

1.10 我们设想的环流并不包罗所有可能的调值变化。我们亦可设想环流框架之外的一些调值变化，例如紧喉作用能把较高的升调拉低，高平调 55 能变为 44 等。环流虽然代表声调调值历时演变的主要趋向，但它的周围可以产生一些“逆流”。

我们再补充一个逆流的例子：低平调如果没有可能与他调混同，就会把开头逐步提高，以便增加响度，这样 11 可变为 31。据贺巍等(1986)，河北省一些方言如迁西(55, 31, 213, 51)、永清(35, 31, 214, 51)，阳平调值是 31，我们应当认为这是 *11 开头变高的结果，不然就要把该方言的声调型认为是官话里绝无仅有的“2 系”，这样也就与周围地区的声调型不相连续了。

同样，中降调 31 也可变为 42，42 又可变为 53，但我们难以设想 42 再作 44，53 再作 55 的变化，因为如此便需要大量地增加发音能量。我们认为山东省烟台(31, 55, 214, =55)是 0 次 5-2 型，那么邻近的威海(53, 44, 312, =44)、栖霞(52, 44, 314, =44)应该也是同型，两地的阴平 53、52 当是从祖调值 *42 直接变来的。

1.11 认定声调型时可拿连读变调的情况作参考，具体事例可参看平山久雄(1997:220 页，大同等)、本文 § 2. 2(西安等、绥

德、银川)。这种做法基于一个前提:变调调值系统的声调型与单字调系统的声调型应该属于同一种“系”,只是次数不同。不过,有时候两种系统的声调型属于不同的“系”,例如扬州的单字调是1次3·5型(参看§1.5),但作为两字组的前字,上声变调为34,去声变调为53,那么前字的调值系统应该是1次5·3型了。我们据变调来认定声调型时,要注意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二

2.1 按照上述的一种历时观点,平山久雄(1984b)曾对河北省方言进行了判定声调型的尝试,把各地的声调型用代号记在地图上。后来平山久雄(1997)对北部晋语也作了同样的尝试。现将平山久雄(1984b:44页)的河北省方言声调型分布图重新改写,做成〈地图一〉,供读者参考。河北省内能看到的声调型种类较多,也较具有系统,从0次直到4次,并分化为5·1系、5·2系、5·3系,它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调值系统逐步发展的程序。〈地图一〉所据的各地调值是贺巍等(1986:246—247页)所载。该文中的调值表收录河北省以及部分山东省的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为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处,补充了一些河北省内的晋语方言以及一些山东省内的冀鲁官话方言。河北西北角的晋语(龙关、赤城、万全、张家口、怀安、宣化、怀来、天镇、涿鹿、阳原)据《河北方言概况》,河北西南角的晋语(邯郸、磁县、临漳)据贺巍(1986:47页),山东的冀鲁官话(博山、博兴、无棣、莱芜、利津、临清、寿光、青州、潍城、安丘)据钱曾怡等(1985:245页)以及《利津方言志》、《临清方言志》、《潍

将〈地图一〉上所见各种声调型按其发展程序加以分类,就成为〈表二〉。

〈表二〉

0次5型 昌黎(32,13,213,55) 乐亭(31,213,24,55)			
1次5·0型 卢龙(32,24,213,53) 永清(35,31,214,51)			
1次5·1型 北京(55,35,214,51) 保定(45,22,214,51)	1次5·2型 天津(21,45,213,53) 唐县(33,45,213,412)		1次5·3型 曲阳(33,213,55,51) 晋县(22,24,55,41)
	1次5·2-1型 行唐(55,=55,24,51)	1次5·2-3型 沧州(214,55,=55,31)	
2次5·1·0型	2次5·2·0型 高阳(33,53,214,31) 深县(33,53,214,51)		
2次5·1·2型 怀来(42,54,35,31,32)	2次5·2·1型 河间(44,53,214,31) 涿鹿(44,42,45,31,43)	2次5·2·3型 衡水(214,53,55,31) 石家庄(24,53,55,31)	
	3次5·2·1·0型	3次5·2·3·0型 丘县(33,31,53,213) 临漳(33,31,53,213,3)	
	3次5·2·1·3型 蔚县(53,31,55,312) 天镇(31,22,54,24,32) ----- 3次5·2-1·3型 龙关(52,=52,45,213,32)	3次5·2·3·1型 邢台(44,31,53,213) 曲周(55,31,53,213)	
	4次5·2-1·3·0型 磁县(31,=31,53,213)		

〈表二〉各栏记载了少数代表地点的具体调值。调值记于地名后面的括弧中,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的顺序(不记调类名称),以“,”号隔开,读者可按顺序知道是哪一调类。如果两个调类

的调值合并为一,用“=”号表示相同。下文述及方言调值系统时亦仿此。

2.2 本文所谓官话方言与《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下文称《词汇集》)所称“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相同。〈表三〉摘录了《词汇集》〈语音卷〉(即第一、第二两册)所收 93 处方言的声调调值,并给每一处方言判定了声调型(两处存疑),只有 87 歙县 1 处除外,因为这个方言一般被认为是官话之外的“徽语”。为了节省表格的篇幅,将一些方言合并于调值与此全同的方言,即将 3 承德并于 1 北京,将 24 黑河、25 齐齐哈尔、26 哈尔滨并于 29 长春,将 50 宝鸡并于 49 西安。

〈表三〉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声调型		
编号	地点	阴平	阳平	上	去(阴去)	阳去	入(阴入)	阳入	次数	调类行列	代号
1	北京	55	35	214	51				1	5·1	V1
2	天津	21	35	113	53				1	5·0	V0
4	唐山	55	22	213	52				1	5·1	V1
5	保定	45	22	214	51				1	5·1	V1
6	沧州	35	54	55	53				2	5·2·3	V23
7	石家庄	23	53	55	31				2	5·2·3	V23
8	邯郸	31	42	55	13		3		3	5·1·2·3	V123
9	平山	21		55	42		<u>13</u>		1	5·3	V3
10	张家口	42		55	213		3		3	5·2-1·3	V <u>213</u>
11	阳原	31	211	55	24		<u>32</u>		3	5·2·1·3	V213
12	大同	31	313	54	24		<u>32</u>		3	5·2·1·3	V213
13	忻州	313	31	=313	53		2		5	5·2·1-3·5·0	V2 <u>1350</u>
14	离石	224	44	423	52		4	<u>213</u>	5	5·2·1·3·5·2	V21352
15	太原	11		53	45		2	<u>54</u>	4	5·2-1·3·5	V <u>2135</u>

续表

16	临汾	21	13	51	55			4	5·2·1·3·5	V2135
17	长治	213	24	535	44	53	<u>54</u>	4	5·2·1·3·5	V2135
18	临河	213	44	213	53		4	5	5·2·1·3·5·2	V21352
19	集宁	22		53	24		<u>54</u>	4	5·2-1·3·0	V <u>2</u> 130
20	呼和浩特	33		53	35		<u>4</u>	4	5·2-1·3·0	V <u>2</u> 130
21	赤峰	55	335	213	52			1	5·1	V1
22	二连浩特	33		53	24		<u>43</u>	4	5·2-1·3·0	V <u>2</u> 130
23	海拉尔	55	35	213	52			1	5·1	V1
27	佳木斯	44	24	13	52			1	5·1	V1
28	白城	33	24	213	52			1	5·0	V0
29	长春	44	24	213	52			1	5·1	V1
30	通化	323	24	213	52			1	5·0	V0
31	沈阳	33	35	213	53			1	5·0	V0
32	丹东	312	24	214	52			1	5·0	V0
33	锦州	44	34	213	53			1	5·1	V1
34	大连	312	34	213	53			1	5·2	V2
35	烟台	31	55	214	=55			0	5-2	<u>V</u> 2
36	青岛	213	42	55	=42			2	5-2·3	<u>V</u> 23
37	利津	213	53	55	21		44	2	5·2·3	V23
38	诸城	214	53	55	31			2	5·2·3	V23
39	济南	213	42	55	21			2	5·2·3	V23
40	济宁	213	52	55	312			2	5·2·3	V23
41	商丘	24	42	54	312			2	5·2·3	V23
42	林县	22	21	53	44		3	4	5·2·1·3·5	V2135
43	原阳	35	42	33	312			2	5·2·0	V20
44	郑州	24	42	53	312			3	5·2·3·0	V230
45	灵宝	31	213	53	35			4	5·2·1·3·0	V2130
46	信阳	33	53	35	312			2	5·2·0	V20
47	白河	24	52	44	31			2	5·2·3	V23

续表

48	汉中	34	41	=34	213				2	5·2·3-1	V231
49	西安	21	24	53	44				4	5·2·1·3·5	V2135
51	绥德	213	33	=213	52		3		5	5·2·1-3·5·0	V21350
52	银川	44		53	13				3	5·2-3·1	V231
53	天水		13	53	24				4	5·2-1·3·0	V2130
54	兰州	31	53	33	24				3	5·1·2·0	V120
55	敦煌		13	53	44				4	5·2-1·3·5	V2135
56	西宁	44	24	53	213				2	5·3·1	V31
57	哈密	44		52	24				3	5·2-3·1	V231
58	乌鲁木齐	44		52	312				3	5·2-3·1	V231
59	成都	44	21	53	213				3	5·2·3·1	V231
60	南充	55	31	53	14				3	5·2·3·1	V231
61	达县	55	31	53	213				3	5·2·3·1	V231
62	汉源	55	31	53	13				3	5·2·3·1	V231
63	西昌	33	52	45	213		31		2	5·2·3	V23
64	自贡	45	31	53	14				3	5·2·3·1	V231
65	重庆	55	31	53	213				3	5·2·3·1	V231
66	昭通	44	31	53	212				3	5·2·3·1	V231
67	大理	44	31	53	213				3	5·2·3·1	V231
68	昆明	44	31	53	212				3	5·2·3·1	V231
69	蒙自	44	53	31	212				3	5·2·3·1	V231
70	遵义	55	21	53	24				3	5·2·3·1	V231
71	毕节	55	21	42	213				3	5·2·3·1	V231
72	贵阳	55	21	42	13				3	5·2·3·1	V231
73	黎平	33	213	31	53		24		?	?	?
74	柳州	44	31	53	24				3	5·2·3·1	V231
75	桂林	33	21	54	35				2	5·2·3	V23
76	吉首	55	11	53	24				?	?	?
77	常德	44	213	31	35				3	5·2·3·1	V231

续表

78	宜昌	55	12	42	35				3	5·2·3·1	V231
79	襄樊	34	52	55	31				2	5·2·3	V23
80	天门	55	13	11	44		324		3	5·2·3·1	V231
81	武汉	55	213	42	35				3	5·2·3·1	V231
82	红安	11	31	55	35	33	214		3	5·1·2·3	V123
83	安庆	31	35	213	52		55		1	5·0	V0
84	阜阳	213	55	24	51				1	5·2	V2
85	芜湖	31	35	213	55		5		0	5	V
86	合肥	31	55	35	52		5		1	5·2	V2
87	歙县	31	55	35	324	33	<u>21</u>				
88	徐州	213	55	24	51				1	5·2	V2
89	连云港	214	35	41	55		24		1	3·5	Ⅲ5
90	涟水	31	35	211	55		<u>34</u>		0	5	V
91	扬州	31	35	42	55		5		1	3·5	Ⅲ5
92	南京	31	13	22	44		5		0	5	V
93	南通	21	35	55	42	213	4	5	1	5·3	V3

我们来说明一下将〈表三〉上的一些方言判定为某声调型的根据。

○ 10 张家口 15 太原 19 集宁 20 呼和浩特 22 二连浩特

这些晋语方言里阴平和阳平合并为一,我们把两个调类在调类行列上的次序看做是“2-1”,是根据晋语中阴平、阳平尚未合并的方言,如 11 阳原、12 大同里的情况而定的。参看平山久雄(1997) § 32.4(219 页)。

○ 9 平山

平山方言阴平和阳平合并为一,我们不用拟定阴平和阳平在调类行列中的先后顺序,因为这一合并调类还停留在低音阶段,没有进入调类行列。

○ 17 长治

长治方言有阳去,现在不把它算在行列中,把声调型定为4次5·2·1·3·5型。如果把阳去也算在内,那么它是5次5·2·1·3·6·5型还是5次6·5·2·13·5型,一时难以决定了。

○ 18 临河

临河方言阴平和上声《词汇集》都记做213,但云(391页):“阴平开始时的曲折不如上声的明显。”且在连续变调中上声作为前字都变为21,阴平则不变。据此可把阴平和上声在调类行列中的次序定为1·3。

○ 42 林县

据《河南方言研究》〈调值表〉(52—55页),河南北部的方言除林县1处以外都是5·2·3系(2次或3次)。林县处于与山西省东南角交界的地方,调值与17长治较近,只是没有阳去调。据17长治以及其他山西省东南部方言均为5·2·1系的情况来看,林县很可能也是同系。我们假定林县曾经过了阴平*42、阳平*21的阶段,后来阴平又发生了*42>*32>22的变化,阳平则一直没变。根据这个看法,把林县的声调型判定为4次5·2·1·3·5型。《河南方言研究》〈调值表〉(52页)所载林县调值(42,53,31,13,3)似是4次5·3·1·2·0型。Liu(1979:36—38页)所记的林县单字调(33,213,55,35)则是2次5·2·3型,这符合河南北部方言的一般情况。

○ 49 西安 50 宝鸡 55 敦煌 45 灵宝 53 天水

西安、宝鸡、敦煌似可认为是1次3·5型,灵宝、天水亦似可认为是1次3·0型。我们却不这么看,而将这些方言认做是4次5·2·1系。其根据有二。

(一)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省南区方言中最靠西南的一群(即中原官话汾河片解州小片)，调值系统和西安、宝鸡等相近。这些方言在声调调值上和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形成一片连续的地域，不过有些地点的去声偏向于低音，如运城(31,13,53,33)、乡宁(53,214,55,11)。这种较低的去声不宜释做是从去声祖调值*35直接变来的。

(二)西安方言里上声 53 在上声前面变调为阴平 21，这一变调的成因可解释为：上声曾经有过一种低沉的调值，并带紧喉，因而发音比较吃力，所以在上声的连读中发生了异化作用，前字的紧喉成分有些变弱，前字的调值就升高，遂与阴平同调了。那么，阴平调值在从前某一阶段应该高于上声。这样的调值状态难以据 1 次 3·5 型或 1 次 3·0 型来解释。

○ 48 汉中

汉中方言阴平和上声合并为 34。现参考孙立新(1998:132 页)所载汉中调值(45,31,44,213)，把〈表三〉汉中的声调型定为 2 次 5·2·3-1 型。

○ 51 绥德

绥德方言阴平和上声合并为 213。我们把绥德的声调型定为 5 次 5·2·1-3·5·0 型，根据有二：

(一)据《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13-14 页)，绥德的阴平和上声在阴平、入声前有区别，阴平变调为 24，上声则变调为 21，由此可知阴平和上声在调类行列中的次序应该是 1-3。

(二)据《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20 页)，与绥德接邻的吴堡方言(213,33,412,51,3)阴平和上声有区别，在调类行列中

阴平在上声的前面。

○ 52 银川 57 哈密 58 乌鲁木齐

这些方言阳平和上声合并为 53 或 52。据《银川方言志》(19 页),阳平和上声在去声、轻声前有区别,阳平字仍是 53 不变,上声字则变调为 35。又据《吉木萨尔方言志》(11—12 页),吉木萨尔方言(44,51,=51,213)阳平和上声在轻声前有区别,阳平字变调为 44(与阴平同调),上声字则变调为 13。我们据此认为,这些兰银官话方言当是 3 次 5·2-3·1 型。

○ 73 黎平

〈表三〉从 59 成都至 81 武汉均属西南官话,其声调型一般是 5·2·3 系。黎平的调值显然不属此系,似是 2 次 3·5·0 型,但也不敢说定,宁可阙疑,打个问号。蒋希文(1990:164 页)〈表三〉所载贵州东南 16 个县市汉语方言的声调调值中,黎平的调值与《词汇集》基本相同,与皆属 5·2·3 系(2 次或 3 次)的其他 15 个方言显然不同。

○ 76 吉首

表面看来该方言是 3 次 5·2·3·1 型,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里有一个难点。吉首方言在阳平音节里保存全浊声母 b, d, g, dz 等。一般来说,浊音声母起头的音节是不易变成高音的。因此我们的环流设想是以全浊声母已清化为前提(参看 § 1.2)的。如果吉首方言是 3 次 5·2·3·1 型,阳平就应该带着浊音声母曾经经过了高平调的状态,这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也使人有点怀疑。吉首的阳平似乎一直停留在较低的音域中。按《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分类,吉首(即该书的乾城)属于“很像西南官话”(1444 页)的第

五区,此区 16 个方言中有 8 处在阳平里保存浊音,甚至麻阳(45, 213, 43, 24)1 处在去声里也保存浊音。

对这一问题,我的看法如下:官话 3 次 5·2·3·1 型方言里的阳平和去声从祖调值阶段正好算是转了一圈,又变回到近似祖调值的状态,这些方言应该很早就把浊音声母清化过了;湖南第五区那些方言的阳平则至今保存了浊音,阳平调值应该随之也保存了低平调,阳平以外则顺着环流而演变下来,结果表面上和周围的 3 次 5·2·3·1 型方言连成一片,无法区别了。至于去声,以浊音声母起头的去声曾独立为阳去,它也基本上保存了祖调值系统里的低升调,阴去则随着环流演变下来,变回升调,与阳去合并为同一去声了。这些第五区方言似乎本来不是官话,后来才受周围方言的影响而“官话化”了。从基本词汇看,麻阳至今也很难说是官话,因为它的基本词汇多与官话不同,如第三人称代词不用“他”,复数词尾不用“们”等,请参看该书〈极常用字表〉(1392—14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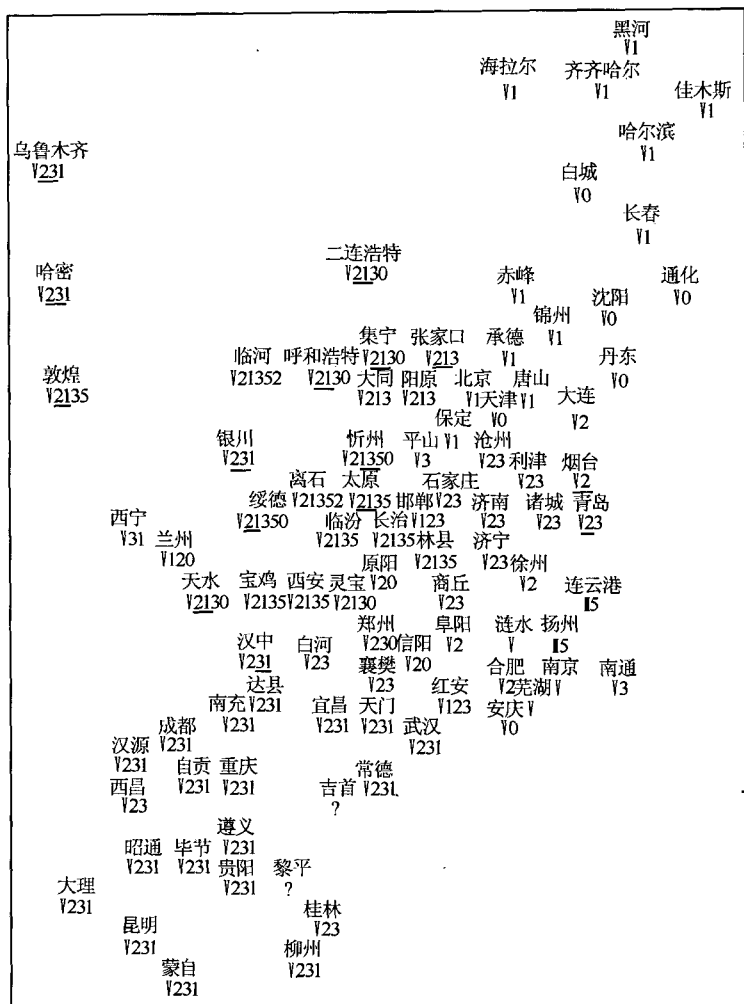
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我们对吉首的声调型表示存疑,表上只打个问号。

○ 82 红安

把红安定为 3 次 5·1·2·3 型是暂时的。这一带方言(《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第二区,同书 1569 页称是典型的“楚语”)具备阳去,也有并不短促的入声,实际上连它们也都进入环流中一起演变,会给各调类的环流过程增添复杂的因素。

2.3 根据〈表三〉所载,现把 92 处官话方言的声调型以代号记于地图上,成为〈地图二〉。为了便于制图,将乌鲁木齐和哈密的位置往东挪了许多。

〈地图二〉



若将〈表三〉、〈地图二〉上各地点的声调型按其发展程序来排列,即如〈表四〉。〈表四〉各栏所记的地名是〈表三〉上被判定为

该声调型的全部地点。

〈表四〉

	0次5型 85 芜湖 90 涟水 92 南京			0次3型
	0次5-2型 35 烟台			
1次5·0型	2 天津 28 白城 30 通化 31 沈阳 32 丹东 83 安庆			1次3·0型
1次5·1型 1 北京 3 承德 4 唐山 5 保定 21 赤峰 23 海拉尔 24 黑河 25 齐齐哈尔 26 哈尔滨 27 佳木斯 29 长春 33 锦州		1次5·2型 34 大连 84 阜阳 86 合肥 88 徐州	1次5·3型 9 平山 93 南通	1次3·5型 89 连云港 91 扬州
2次5·1·0型	2次5·2·0型	43 原阳 46 信阳	2次5·3·0型	
2次5·1·2型	2次5·2·1型	2次5·2·3型 6 沧州 7 石家庄 37 利津 38 诸城 39 济南 40 济宁 41 商丘 47 白河 63 西昌 75 桂林 79 襄樊 2次5-2·3型 36 青岛 2次5·2·3-1型 48 汉中	2次5·3·1型 56 西宁	
3次5·1·2·0型 54 兰州	3次5·2·1·0型	3次5·2·3·0型 44 郑州		
3次5·1·2·3型 8 邯郸 82 红安	3次5·2·1·3型 11 原阳 12 大同 3次5·2-1·3型 10 张家口	3次5·2·3·1型 59 成都 60 南充 61 达县 62 汉源 64 自贡 65 重庆 66 昭通 67 大理 68 昆明 69 蒙自 70 遵义 71 毕节 72 贵阳 74 柳州 77 常德 78 宜昌 80 天门 81 武汉 3次5·2-3·1型 52 银川 57 哈密 58 乌鲁木齐		
	4次5·2·1·3·0型 45 灵宝			
	4次5·2-1·3·0型 19 集宁 20 呼和浩特 22 二连浩特 53 天水			
	4次5·2·1·3·5型 16 临汾 17 长治 42 林县 49 西安 50 宝鸡			
	4次5·2-1·3·5型 15 太原 55 敦煌			
	5次5·2·1·3·5·0型			
	5次5·2-1·3·5·0型 13 忻州 51 绥德			
	5次5·2·1·3·5·2型 14 离石 18 临河			

三

3.1 本章据〈地图二〉以及〈地图一〉,并参看各地方言调值的记录,来对官话和晋语地区中各声调型的分布特征作一概括性的描写。除了〈表三〉以外,我们参看的方言材料如下: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贺巍等(1986)

山西省、内蒙古:《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平山久雄(1997)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宋学(1963)

江苏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山东省:钱曾怡等(1985)

河南省:《河南方言研究》

湖北省:《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湖南省:《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四川省:《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贵州省:蒋希文(1990)

云南省:《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张盛裕等(1986)、张盛裕(1993)

陕西省(陕南):孙立新(1998)

新疆:《中国语言地图集》B5〈新疆汉语方言声调比较表〉

下文所引载的方言调值,一般都来源于这些材料。在〈地图二〉上出现的地点不再记其调值,读者可以参看〈表三〉。

3.2 黄河下游中原地区(大约相当于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河

南东部)的方言,以2次5·2·3型方言为主,这一类的方言横跨着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的分界线,形成一片相当广大的地域。在这个地域的北边和南边,都有1次5·2型方言,如天津(据〈地图一〉)、河北文安(33,45,213,51)、江苏徐州、安徽合肥。再各往南北深入,就有1次5·0型方言,如天津(据〈地图二〉)、辽宁沈阳、安徽安庆、江苏仪征(31,24,324,53,5),以及0次5型方言如河北昌黎(32,13,213,55)、乐亭(31,213,24,55)、江苏涟水、南京。因此大致可以说,以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的2次5·2·3型为中心,声调型往南北方向呈一种对称式的分布,次数递减,以至0次。此外胶东的荣成(据《荣成方言志》:42,35,214,44)是0次5型,山东烟台等是0次5-2型,烟台要是它现在的高平调变高降的话就会一下子变成2次5-2·0型方言。

3.3 不但是1次5·0型、1次5·2型,“1次方言”一般都只见于中原地区的北边和南边。1次5·1型方言见于北京、河北保定、唐山等,1次5·3型方言见于河北平山、曲阳(33,213,55,51)等,1次3·5型方言则见于下江官话中,如江苏扬州、连云港,甚至盐城(31,213,53,35,5)是1次3·0型。

东北除了辽东半岛以外都是1次5·0型、1次5·1型的地域,这可算做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延伸。辽东半岛有1次5·2型如大连,也有2次5-2·3型如长海(312,52,213,=52)等,它与胶东半岛一些方言如青岛等相同。

总之,“0次方言”、“1次方言”只见于中原地区南北以及东边的边缘上。按调值系统的发展来说,这些方言要算是十分保守的了。

3.4 2次5·2·3型方言从山东西部往西延伸到河南中部、河北西南部。不过这一地域也有一些方言已经发展为3次5·2·3·1型,如河南洛阳市(44,42,54,21)、孟县(55,42,54,31)、河北巨鹿(44,31,53,213)、曲周(55,31,53,213)。河南郑州、河北丘县(33,31,53,213)呈过渡状态,即3次5·2·3·0型。

2次5·2·3型方言的地域从河南中部往南扩展,一直到湖北北部的西南官话,如河南驻马店市、南阳市(均为24,42,55,31)、湖北竹溪(24,42,45,213)、钟祥(24,42,54,214)。

3.5 湖北省的西南官话除了北部以外大多是3次5·2·3·1型。不但是湖北省,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西南官话大多也是此型,但其间也有少数地点是2次5·2·3型,如湖北北部诸方言、广西桂林、贵州麻江(33,31,55,13),也有3次5·2·3·0型如贵州榕江(33,21,42,35),还有云南少数地点是3次5·3·2·1型,如洱源(44,53,42,24,31)。

西南官话虽然是3次5·2·3·1型占绝对优势,但我们要考虑当中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我们对吉首方言所论述的那样,要是有一个方言里阳平因保存浊音声母而一直停留在低平调,而那浊音一直到晚些时候才变为清音的话,表面看来该方言是3次5·2·3·1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南官话除了湖南西北部那些方言以外可能还有这么一类方言。

3.6 5·2·1系方言分布的地域以晋语和陕西、甘肃、新疆一带的中原官话为主,它与5·2·3系占优势的华北、华中平原的官话形成鲜明的对比。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晋语和西北一带的中原官话(即汾河

片、关中片、秦陇片、陇中片、南疆片)以5·2·1系为主。晋语和这几片中原官话在中国西北部连接成一个广大的5·2·1系地域。这些5·2·1系方言的特色是次数都比较高,只有河北西北角的晋语次数较低,一般是3次,1次的有康保(43,=43,213,52,21),2次的有赤城、涿鹿(均44,42,45,31,43)。其他晋语以4次、5次为主,西北一带的中原官话则以4次为主。

陕南一带是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交错的地方,有趣的是在陕南的中原官话不一定是5·2·1系,西南官话不一定是5·2·3系,中原官话如安康(21,35,51,55)是4次5·2·1·3·5型,汉中(北街、西街45,21,44,213)则是2次5·2·3型,西南官话如镇巴(35,41,44,213)是2次5·2·3型,南郑(51,21,45,214)则是3次5·2·1·3型。陕南在这方面也呈现出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过渡地带的特点。

青海西宁一带的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但它却不是5·2·1系,而是5·3·1系,这该算是很独特的。

3.7 兰银官话在西北5·2·1系地区的外边,却一般属于3次5·2·3·1型,如宁夏银川、甘肃张掖(44,53,=53,31)、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属3次5·1·2·0型,似乎是孤立的。

3.8 总的来说,官话方言绝大多数是5系方言,此外只能见到少数的3系方言。5系方言中,5·2系方言最多:5·2·1系方言和5·2·3系方言呈优势的面积广阔,使中原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等构成一大片连续的地域。5·1系方言除了在东北占多数以外都比较少。5·3系方言也较少。此二系的次数都以1次为多。

3.9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即各地域除了当地优势的声调系以外,偶尔也有不同系的声调型,但其次数与优势方言相同或相近,例如河南省东南角的新县、光山县(均为 42,55,35;312)是 2 次 5·1·2 型,罗山县(42,53,35,312)是 3 次 5·1·2·0 型,与一般是 2 次 5·2·3 型的河南南部方言不同,但次数却是相同或相似的;云南有少数方言是 3 次 5·3·2·1 型,与多为 3 次 5·2·3·1 型的西南官话不同,但同样是 3 次;兰州是 3 次 5·1·2·0 型,与兰银官话多为 3 次 5·2-3·1 型不同,却也是 3 次。我们可以设想:有 A、B 两个邻近的方言,本来都是 1 次 5·0 型方言(*33,*35,*214,*51),但后来 A 方言发展为 1 次 5·2 型(*33,*55,*214,*51),B 方言发展为 1 次 5·1 型(*55,*35,*214,*51),然后 A 方言的高平调变为高降调,B 方言的高平调在 A 方言的影响下也变为高降调,那么 A 方言就发展成 2 次 5·2·1 型(*55,*53,*35,*31),B 方言便发展成 2 次 5·1·2 型(*53,*55,*35,*31)了。这样发展下去,A、B 两个方言的次数都会一样,只是 A 方言永远是 5·2 系,B 方言则永远是 5·1 系。上面指出的情况可能是由这么一种历时过程造成的。

引用文献

- 贺巍 1986:《冀鲁豫三省毗连地区的方言分界》,《方言》1,46—49 页。
 贺巍等 1986:贺巍、钱曾怡、陈淑静《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方言》4,241—252 页。
 蒋希文 1990:《黔东南汉语方言》,《方言》3,161—168 页。
 李荣 1966:《温岭方言语音分析》,《中国语文》1;《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45—54 页。

- 钱曾怡等 1985: 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4, 243—256页。
- 宋学 1963:《辽宁语音概说》,《中国语文》2,104—114页。
- 孙立新 1998:《陕南方言略说》,《方言》2,132—141页。
- 张盛裕 1993:《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中国语文》4,253—264页。
- 张盛裕等 1986: 张盛裕、张成材《陕甘宁青四省区汉语方言的分区(稿)》,《中国语文》2,93—105页。
-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清华学校研究院,北京。
- 平山久雄 1975:《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1,3—15页;《音韵学研究通讯》1981.1,19—28页。
- 1983:《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数研究》21,59—81页。
- 1984a:《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语言研究》1,185—199页。
- 1984b:《官話方言声調調値の系統分類——河北省方言を例として——》,《言語研究》86,33—53页。
- 1997:《北部晋语声调调值的系谱分类》,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内山书店,东京,211—225页。
- 1998:《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方言》1,7—13页。
- Liu, William W. (刘维汉) 1979: “Dialect Features an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Lin-xi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7.1, 29—43页。
- 《河北方言概况》: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天津, 1961年。
- 《河南方言研究》: 张启焕、陈天福、程仪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开封, 1993年。
-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著: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商务印书馆, 1948年。
-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杨时逢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六,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台北, 1974年。

- 《吉木萨尔方言志》：吉木萨尔县史志办，周磊、王燕著，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91年。
-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执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60年。
- 《利津方言志》：杨秋泽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90年。
- 《临清方言志》：张鸿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北京，1990年。
-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略称《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语文出版社，北京，1996年。
- 《荣成方言志》：王淑霞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95年。
-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太原，1993年。
- 《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陕西省志》第七十六卷，刘育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0年。
-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84年。
- 《潍坊方言志》：潍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钱曾怡、罗福腾合著，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2年。
- 《银川方言志》：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高葆泰、林涛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93年。
-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9年。
- 《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7年。

2000年

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

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

—

1.1 山东省境内不少方言具有一套“轻声前变调”，即该方言的全部或大部分调类在轻声前各采取与在单字上不同的调值。这一变调现象可为声调调值历时演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本文以德州方言和潍坊方言为例，说明我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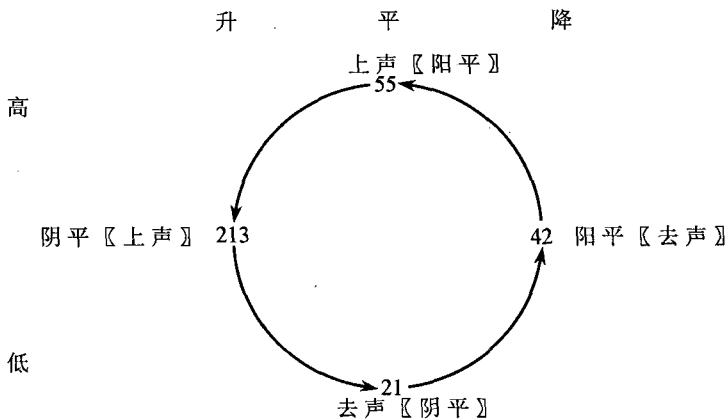
1.2 据《德州方言志》(54页)，德州方言的轻声前变调如〈表一〉：

〈表一〉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单字调值	213	42	55	21
变调调值加轻声	21-3	55-2	213-2	42-2

若用声调的“高”、“升”、“平”等特征来描述，德州方言的轻声前变调可用〈图一〉来表示。方括弧外是单字调值的调类，方括弧内是轻声前变调调值的调类：

〈图一〉



在〈图一〉中,我们把 21 看做是在调位 (toneme) 系统中占据低平调的地位,同样,语音上 (phonetically) 阴平 213 是低升调,阳平 42 是高降调,但音位上 (phonemically) 都可以看做是无关“高、低”特征的升调和降调。

〈图一〉的变调情况可以概括为:作为单字调值出现的四个调位在轻声前分别向逆时针的方向递换为毗邻的第一个调位。

1.3 对于汉语方言中的连读变调现象,我们可以假定:该方言本来没有变调,一个调类的调值不管在字组里或句子里出现的位置如何,原先都基本一样;后来因为位置的不同而走过了不同的演变之路,结果产生了所谓的变调。根据这一假设来比较一个方言内部的单字调值(基本调值)和变调调值(替换调值),就可以拟测出该方言发生变调之前的调值来。这种构拟所得的调值,我们叫做该方言的“古调值”。

从这一观点来比较德州方言的单字调值和轻声前变调调值，我们就发现：只要假定德州方言的古调值和现代的轻声前变调调值基本相同，就可以说明该方言发生轻声前变调的原因和经过。

德州方言的古调值到现代单字调值的演变情况大约可拟如〈表二〉（前带星号者为构拟的调值）：

调类	轻声前变调调值	古调值	中间阶段	单字调值
阴平	21(低平)	= *21(低平)	> *212	> 213(升)
阳平	55(高平)	= *55(高平)	> *53	> 42(降)
上声	213(升)	= *213(升)	> *324	> 55(高平)
去声	42(降)	= *42(降)	> *31	> 21(低平)

从〈表二〉所拟古调值到单字调值的演变，其原因可以说明如下：

① 阳平*55 逐渐变为降调，变到了 42。这是因为在音节末尾音势一般变弱，所以高音较难以一直维持到音节末尾的缘故。

② 去声*42 为阳平的变化所推动，逐渐往低里变，变到了 21。

③ 阴平*21 为去声的变化所推动，变到了 213。

④ 上声*213 为阴平的变化所推动，逐渐往高里变，变到了 55。

以上所述的变化除了受到推链作用以外还会受过拉链作用：比如阳平变降调后高平调就成为系统上的空缺，也就把上声吸引过来了。

这一套调值演变在轻声前面没有发生，那应该这是由于轻声

前的音节跟轻声音节结合得非常紧密,在音节末尾发音弱化的程度较小,所以阳平*55 较易把高音维持到音节末尾,因而没有变成降调,也没有推动其他调类发生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调值变化。照〈图一〉的格式来说,〈表二〉这一套调值演变就是顺时针的递变,而递变在轻声前没有发生,这就是〈图一〉上逆时针变调规律所以成立的原因,因为变调照例是以单字调值为基础来描写的。

如果上述的看法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州方言的轻声前变调中保留着比单字调值早一层的调值状态。

二

2.1 有些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保留着比德州古调值再早一层的调值状态。现就《潍坊方言志》所载潍坊市十二个地点的方言说明这一点。〈表三〉是这十二个方言轻声前变调的情况,每一调类细线左边是单字调值,右边是轻声前变调调值加轻声。表左编号为原书所附。

〈表三〉

编号	地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单字	轻声前	单字	轻声前	单字	轻声前	单字	轻声前
(一)	潍城	214	31-1	53	35-3	55	214-5	31	55-3
(二)	坊子	214	31-1	53	24-21	55	214-5	31	55-21
(三)	寒亭	213	31-1	53	24-3	55	213-4	31	544-3
(四)	昌邑	213	21-1	42	55-5	55	213-5	21	544-3

续表

(五)	高密	213	21-1	42	55-5	55	213-5	21	544-5
(六)	诸城	214	31-1	53	24-3	55	214-5	31	55-3
(七)	五莲	214	31-1	53	55-3	55	214-5	31	544-3
(八)	安丘	213	21-1	42	55-3	55	213-5	21	544-3
(九)	昌乐	213	21-1	42	55-3	55	213-4	21	544-3
(十)	临朐	213	21-1	42	55-5	55	213-5	21	544-3
(十一)	青州	213	21-1	42	445-5	55	213-5	21	55-3
(十二)	寿光	213	21-1	53	24-5	55	213-5	21	55-3

关于单字调值,这十二个方言和德州方言基本一致或相近,但(一)(二)(三)(六)(七)的去声是31,它在调位系统上不好视为低平调,而应视为低降调,那么阳平随着就算是占高降调地位,阴平也算是占低升调地位了(低平调要算虚位,高升调则只出现于变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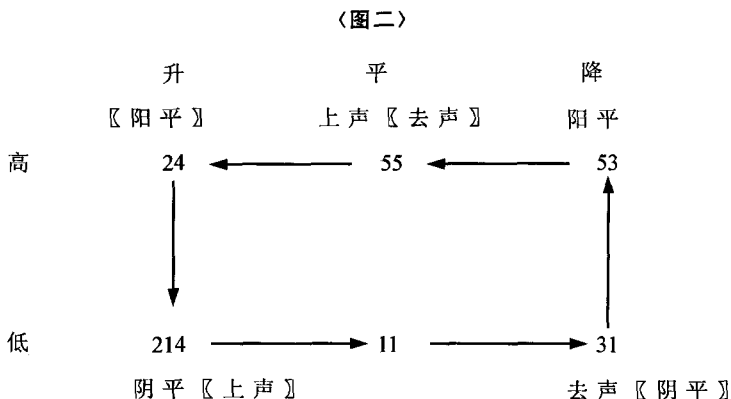
关于轻声前变调,潍坊方言和德州方言有三点不同:

① 阴平变调调值在(一)(二)(三)(六)(七)是低降调31。

② 阳平变调调值在(一)(二)(三)(六)(十一)(十二)是升调24,35,445等。

③ 去声变调调值在(一)(二)(六)(十一)(十二)是高平调55;在其他方言也是544调,和55调相近。

总之,潍坊方言中轻声前变调调值和德州方言分歧最大的地点要算是(一)(二)(六)。下面以(二)坊子代表这三处方言,根据〈图一〉的格式来描写轻声前变调如〈图二〉:



根据〈图二〉,坊子等三处的轻声前变调可概括为:作为单字调值出现的四个调位在轻声前分别向逆时针的方向递换为毗邻的第二个调位。

2.2 关于坊子方言产生变调以前的古调值,我们也可以拟测,它与现在的轻声前变调调值基本相同。若把〈图二〉的箭头倒过来,把逆时针的替换改为顺时针的递变,就能描绘出从古调值到现代单字调值的演变情形,即〈表四〉:

(表四)

调类	轻声前变调	古调值	中间阶段	单字调值
阴平	31(低降)	= *31(低降)	> *212(低平)	> 214(低升)
阳平	24(高升)	= *24(高升)	> *55(高平)	> 53(高降)
上声	214(低升)	= *214(低升)	> *35(升)	> 55(高平)
去声	55(高平)	= *55(高平)	> *53(降)	> 31(低降)

从古调值到现代单字调值的演变可分两段来解释。从古调值到“中间阶段”是第一段,从“中间阶段”到现代单字调值则是第二段。两段都可作为高平调变高降调所引起的推链式循环演变来理

解。

〈表四〉的“中间阶段”与德州古调值略同。因此，坊子方言的单字调值可谓是从德州古调值的状态再经过一次递变而成的。一种语音变化，只要曾引起该变化的语音、生理条件继续存在，就可以反复地发生。上述调值变化的条件是在音节后半语音强度的弱化（生理方面则是发音努力的缓解），这对维持高音带来困难，致使高平调的末尾趋向于下降。以此为开端的一套循环演变发生一次以后，这一语音、生理条件自然还继续存在，所以同样的循环性变化就可以再发生一次、两次、……

我并不主张上述的循环变化在轻声前面不可能发生，只认为它相对不易发生。音节后半语音强度的弱化在轻声前面也是难免的，所以声调调值在轻声前面也可以发生变化。在德州方言，从与坊子古调值相同的状态出发，调值的循环变化一般发生了两次，在轻声前面则只发生了一次。在坊子方言，从它的古调值出发，调值的循环变化一般也发生了两次，在轻声前面则一次也没有发生。

坊子的阳平变调调值 24 和上声变调调值 214 接近，所以它在潍城变为 35，在青州再变为 445，这些可算是阳平从 24 变到 55 的过渡状态。有些方言去声变调调值 55 变为 544，开始稍稍变降，这些方言除寒亭以外都是阳平变调调值已变到 55 的方言。

三

3.1 单字调值和德州、潍坊相同或相类的方言，在山东省内分布的地域很广，除了大部分南部地区和胶东半岛东部地区以外

似乎大多是这一类方言。

在这广大地域的南边,就有单字调值和德州古调值相同或相似的方言,山东省内如枣庄。这类方言的地域再往南一直延伸到安徽中部。北边则有天津方言属于此类。博山方言也算这一类的变种,因为博山的阳平仍然停留在高平调的阶段,只是上声已并入阳平了。现将若干此类方言的单字调值做成〈表五〉。

〈表五〉

地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德州古调值	*21	*55	*213	*42	
天津	21	45	213	53	
枣庄	213	55	24	42	
徐州	313	55	35	51	
合肥	212	55	24	53	4
博山	214	55	=阳平	31	

〈表五〉所载各方言调值的来源如下。天津:贺巍等(1986, 246页)〈表一〉;枣庄:《枣庄方言志》13页;徐州:《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52页;合肥:《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方言音系简介〉17页;博山:《博山方言研究》25页。

这类方言一般没有轻声前变调,它们的声调调值无论在轻声前与否都算是把德州古调值的阶段维持至今了。换言之,这类方言的声调调值无论在轻声前与否,都在坊子古调值的阶段上只经过一次循环变化。只有博山有轻声前变调,其变调情况可用〈表六〉表示(据《博山方言研究》29页〈表三〉):

〈表六〉

调种	阴平	上声	去声		
单字调值	214	55	31		
变调调值加轻声	①31 - 23	②22 - 33	③24 - 54	④214 - 55	55 - 31

〈表六〉中①和②,③和④分化的规律如下:前字阴平本来就属阴平的字组采取格式①,前字阴平来自清入声的字组采取格式②;前字上声来自阳平(包括全浊入声)的字组采取格式③,前字上声本来就属上声的字组采取格式④。由〈表六〉可见,博山方言在轻声前面没有发生调值的循环变化,仍旧停留在坊子古调值阶段。

3.2 天津市东边有一些方言,其单字调值与坊子古调值相同或相似,如昌黎。在安徽合肥那一类方言地区的南边以及东边(江苏)也有同样的方言,如句容、淮阴等。山东省内胶东的荣成也属同一类;烟台方言则算此类的变种,这里去声仍停留在高平调阶段,只是阳平已并入去声了。现将若干这一类方言的单字调值做成〈表七〉。

〈表七〉

地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坊子古调值	*31	*24	*214	*55	
昌黎	32	13	213	55	
句容	31	24	213	55	5
淮阴	42	24	212	55	4
荣成	42	35	214	44	
烟台	31	=去	214	55	

〈表七〉所载各方言调值的来源如下。昌黎:《昌黎方言志》(新版)37页;句容:《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67页;淮阴:《江苏

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80—81页；荣成：《荣成方言志》8页；烟台：《烟台方言报告》15页。

这一类方言在轻声前以外也把坊子古调值的状态一直维持到了现在。

3.3 上面提到的几个类型的方言，有的至今保存坊子古调值阶段，有的从那里经过一次或两次的循环变化。若按曾经经过循环变化的次数来对比，山东省内这几类方言的代表地点调值发展的情况可用〈表八〉来表示。

〈表八〉

	荣成	博山	枣庄	坊子	德州	X
一般音节	0	1	1	2	2	2
轻声前音节	0	0	1	0	1	2

表上的数字表示发生循环变化的次数，X在山东省内是一种设想中的方言，它的单字调值和德州、坊子等相同，只是没有轻声前变调。到目前为止，这种方言在山东方言的调查报告找不到，因此山东省内不一定实际存在，但往西出省外就可以发现，如河南商丘。据《商丘县志》(506页)，商丘方言的单字调值是：阴平 214，阳平 42，上声 55，去声 31。《商丘县志》对“连读变调”以及“轻声”的记述(507—508页、511页)都没有提到轻声前变调，〈分类词表〉(515—524页)、〈语法例句〉(524—529页)所收词语、句子的标音当中也见不到轻声前变调，因此可以认为，轻声前变调在商丘方言是不存在的。

需要解释一下，〈表八〉中五个类型并不覆盖山东方言的全部。胶东地区有些方言的声调调值难以从坊子古调值推演出来；

还有一些方言轻声前变调调值从坊子古调值阶段演变的方式有一点特殊之处,因而也难归到这五个类型之一:例如济南,据钱曾怡(1963:94页),阳平、去声的轻声前变调都是55,只是轻声在阳平后是“高轻”⁵,去声后则是“次低轻”²,由此来看,济南方言应该说是坊子和德州两个类型的中间。

四

4.1 关于山东省内的轻声前变调,还有一点需要一提:并非所有的非轻声词素与轻声词素的组合一律都要变调。例如《德州方言志》轻声前变调的描写(54页)中,对每一调类的变调都附有“少数不变”的注语,如阴平加轻声,“桌子”、“天上”、“抽打”的前字都要变调,读成21,“铁匠”的前字则不变调,仍读213;《潍坊方言志》(一)潍城的轻声前变调(25页)中,前字阳平和去声一律都要变调,前字阴平和上声则各分变调的与不变调的两类。这种分歧在山东方言是很普遍的。Giet(1939:12-13页、1950:70-72页)曾就以济宁市为中心的“山东西南方言”,对轻声前面的音节变调与否的规律从构词法的角度作过相当详细的描述。

我认为这一分歧现象意味着现在的轻声词素历时上分为新旧两层:使前字发生变调的轻声词素属于旧层,其他轻声词素则属于新层。在山东方言里产生轻声前变调的时期,旧层的词素已是轻声,且与前字结合得十分紧密;新层的词素尚未失去它本来的声调,只是不带重音,和前字结合得也较松,因而使前字发生与单字同样的调值变化;或者新层的词素已失去本来的声调,只是读得没

有旧层的词素那么轻,与前字结合得也较松,遂使前字发生与单字相同的调值变化。

关于这一点,临清方言里轻声的情况颇有参考价值:据《临清方言志》(25—29页),临清的轻读音节可分“次轻声”、“轻声”、“零音节”三种:次轻声是“不管本调如何,都读成一种较轻较短的22调,韵母大致保持原貌”(25页),“它前面的一个音节要遵从重读音节连读变调的规律,不同于轻声前的变调”(25—26页);轻声则是“比次轻声更轻更短,音高根据前字的调值有高低的不同,韵母含混”(26—27页),“轻声的显著特点是,它前面的一个重读音节都要相应变调,变调规律不同于两个重读音节的连读变调”(27页);而“使用频率很高的部分轻声字,声音上进一步弱化,就成为零音节。就是说,声母、韵母都不复存在,只能从前一音节的声调变化上感觉到音节的‘存在’,有时还伴随有前一音节的相对延长”(27页)。看来,临清方言的轻声词素属于上面拟测的“旧层”,次轻声词素则属于“新层”,它们虽然都失去了原有的调类区别,在这意义上都可算“轻声”,但后者读得没有前者那么轻。临清方言轻声前变调产生的时候,可能已有如此两种“轻声”,也可能次轻声尚未失去它本来的声调,还不算一种“轻声”。

4.2 很多山东方言除了轻声前变调以外也有变调现象,例如德州方言前字阳平在去声前变调为55(与上声同调)。本文不把这些“非轻声前变调”作为历时分析的对象。不过,本文所拟古调值对说明“非轻声前变调”的成因也会有用处,下面举一个例子。

山东方言除了南部地域以外大多也有与北京相同的“上上变调”,即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就变调为阳平。这一变调现

象根据上声和阳平现有的调值就不好说明,例如在德州,55-55为什么要变调为42-55呢?前字高平在高平前为什么要变降调?这是难以理解的。根据坊子古调值中有关调类的调值来看,“上上变调”产生的原因就容易解释了。发出像上声*214这一类调值中的低音部分需要对喉部加以特殊的调节(如绷紧声带、拉下喉头、控制呼气量等),才能使声音沉到足够的低度,所以发*214应当是比较吃力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两个上声连读时前一上声受到后一上声的异化作用而稍稍变高,遂与阳平*24难以区别,终于合并了。郑锦全(1966:107页)从北京、沈阳、西安、成都四个官话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归纳出一条通则,即“低调跟低调在一处,在有连调变化的方言里,会变为高升调”。本文所拟山东方言以及北京方言“上上变调”的成因,可谓是这条通则的一个特殊表现。北京方言的上声214、阳平35还算近似“上上变调”产生时的调值状态,山东方言的单字调值则变得够远了,但“上上变调”作为形态音位的规则,不管有关调类现实的调值如何,也仍然在发挥作用。

引用文献

- 贺巍等 1986:贺巍、钱曾怡、陈淑静《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方言》4,241-252页。
- 钱曾怡 1963:《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山东大学学报》4,86-97页。
- 郑锦全 1966:《官话方言的声调征性跟连调变化》,《大陆杂志》33.1,102-108页。
- Giet, P. Franz(齐德芳) 1939: “Die Töne des Südshantung-Dialekts in Wortverbindungen, an Hand von Übersichten, Regeln und Beispielsammlungen zur Veranschaulichung und Übung dargestellt”, “Beiträge zur Einführung in das Chinesische Studium” 4, Taikiachuang.

- 《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
- 《昌黎方言志》(新一版):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 《德州方言志》:曹延杰著,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语文出版社,北京,1991年。
-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语文出版社,北京,1995年。
-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60年。
- 《临清方言志》:张鸿魁著,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中国展望出版社,北京,1990年。
- 《荣成方言志》:王淑霞著,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语文出版社,北京,1995年。
- 《商丘县志》:商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
- 《潍坊方言志》:潍坊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钱曾怡、罗福腾合著,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潍坊市新闻出版局,潍坊,1992年。
- 《烟台方言报告》:钱曾怡等著,齐鲁书社,济南,1982年。
- 《枣庄方言志》:王希文编著,枣庄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山东省出版管理处枣庄出版管理办公室出版,1986年。

1998年

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 的类型及其成因

—

1.1 本文所谓“上上变调”其实是“上上相连前字变调”，就是两个上声字相连时在前字上发生的连读变调现象。北京话里的“上上变调”是前字变调为阳平，北京以外的许多官话方言和部分晋语方言也有同样的变调现象。另一些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两个上声字相连前字的变调却与阴平相同。还有少数官话方言中，两个上声字相连前字变调为去声。此外还有不少方言中，两个上声字相连前字虽然也发生变调，但其变调后的调值不同于该方言中任何调类的调值，独树一帜。

如上所述，“上上变调”可分为四种类型：

A型：前字变为阴平。

B型：前字变为阳平。

C型：前字变为去声。

Y型：前字的变调不与其他任何调类的调值相同。

此外前字不变调(即没有“上上变调”)的情况可称O型。

亓海峰等(1998)亦据北方话近二百个方言的情况将“上上变调”分为与本文 A 型、B 型、C 型、Y 型相当的四种类型。

在阴平和阳平合并为一的方言中,如果上声在上声前变调为这惟一平声调类的话,那么只好把它称为 AB 型。从历时的观点来看,AB 型包含三种情况:一是该方言本来有 A 型的“上上变调”,在变调形成之后阴平才与阳平合并;二是该方言本来有 B 型的“上上变调”,在变调形成之后阳平才与阴平合并;三是该方言阴平和阳平合并之后(或许在中古平声未曾分成阴平、阳平的状态之下)发生了“上上变调”。这三种情况应该加以区别,但本文只作为一种 AB 型来看待。同样,我们还可以设想 AC 型、BC 型两种“上上变调”。

1.2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划定“上上变调”的范围。有些方言中上声字在上声以外的字前面也发生与上声字前面相同的变调。例如山东诸城,上声 55 在上声和阴平 214 前都变调为阳平 53;再如河北唐山,上声 213 不但在上声前,而且在其他所有调类前也都变调为 21^①。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处理原则是:上声除上声前以外还在另外一个调类前发生同样变调的情况也算“上上变调”,再多就不算了。据此,诸城算有“上上变调”(B 型),唐山则不算有“上上变调”(即 O 型)。

有些方言中除了上声字以外其他调类的字也在上声前发生相同的变调。例如河南林县,上声 53 在上声前变调为 21,阴平 22

① 这些方言的材料取自《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参看本文〈调值表〉附录。

在上声和阴去前也变调为 21。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处理原则也是:除了上声字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调类的字在上声前发生同样变调的话也算“上上变调”。据此林县算是有“上上变调”(Y 型)。

连读变调可分为调位性的和非调位性的两种^①。如果变调后的变调调值和变调前的基本调值之间存在着调位上的不同,那就是调位性变调。如果变调不影响调位的区别特征,只表现在音调上有所不同,那就是非调位性变调。“上上变调”中 A 型、B 型、C 型都是调位性变调,Y 型则能包括调位性的和非调位性的两种。从共时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只有调位性变调才值得重视,不过从历时论的观点来看,非调位性变调也很重要,因为一种连读变调处于萌芽状态时,它先作为不涉及调位实质的语音现象来出现,后来才发展为调位的不同。而且,一般文献在连读变调的记载中对这两种变调不分,我们一时也难以分辨。因此,本文将对 Y 型中的调位性和非调位性两种变调不加区别,同样看待。

1.3 本文讨论“上上变调”的主要材料是《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下文简称《词汇集》)所载的 93 个方言的音系描写。下面的〈调值表〉是把这 93 个方言按其“上上变调”的类型加以分类,并标记各调类的调值而做成的。“编号”是《词汇集》音系描写中的号码。O 型方言只录了 10 处,作为“样本”。〈类型分布图〉则是这 93 个方言“上上变调”类型的分布图。由此可以粗略观察到“上上变调”在官话和晋语方言中的分布情形。

① 参看石锋(1986:66—67页)。

〈调值表〉

类型	编号 地点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阴入)	阳入	上上 变调	备 考
A	45 灵宝	31	213	53	35				
A	49 西安	21	24	53	44				
A	50 宝鸡	21	24	53	44				
B	1 北京	55	35	214	51				
B	2 天津	21	35	113	53				
B	3 承德	55	35	214	51				
B	8 邯郸	31	42	55	13	3			
B	12 大同	31	313	54	24	32			
B	21 赤峰	55	335	213	52				
B	29 长春	44	24	213	52				
B	30 通化	323	24	213	52				
B	31 沈阳	33	35	213	53				
B	38 诸城	214	53	55	31				阴平前亦同
B	39 济南	213	42	55	21				
B	40 济宁	213	52	55	312				
B	42 林县	22	21	53	44	3			阴平在上、 去前亦同
B	44 郑州	24	42	53	312				
B	54 兰州	31	53	33	24				
B	90 涟水	31	35	211	55	34			
B	92 南京	31	13	22	44	5			阴平前亦同
AB	15 太原	11		53	45	2	54		阳入前亦同
AB	19 集宁	22		53	24	54			
AB	20 呼和浩特	33		53	35	4			
AB	55 敦煌	13		53	44				
BC	35 烟台	31	55	214	=55				
Y	5 保定	45	22	214	51			35	阳平前亦同
Y	13 忻州	313	31	=313	53	2		33	阴平在上 声前亦同
Y	14 离石	224	44	423	52	4	213	24	

续表

Y	22 二连浩特	33		53	24	43		22	
Y	23 海拉尔	55	35	213	52			24	
Y	32 丹东	312	24	214	52			25	阴平前亦同
Y	33 锦州	44	34'	213	53			24	
Y	51 绥德	213	33	=213	52	3		24	阴平在阴、 上、入前亦同
Y	85 芜湖	31	35	213	55	5		24	阴平前亦同
O	4 唐山	55	22	213	52				
O	7 石家庄	23	53	55	31				
O	10 张家口	42		55	213	3			
O	26 哈尔滨	44	24	213	52				
O	34 大连	312	34	213	53				
O	52 银川	44	53		13				
O	65 重庆	55	31	53	213				
O	81 武汉	55	213	42	35				
O	86 合肥	31	55	35	52	5			
O	88 徐州	213	55	24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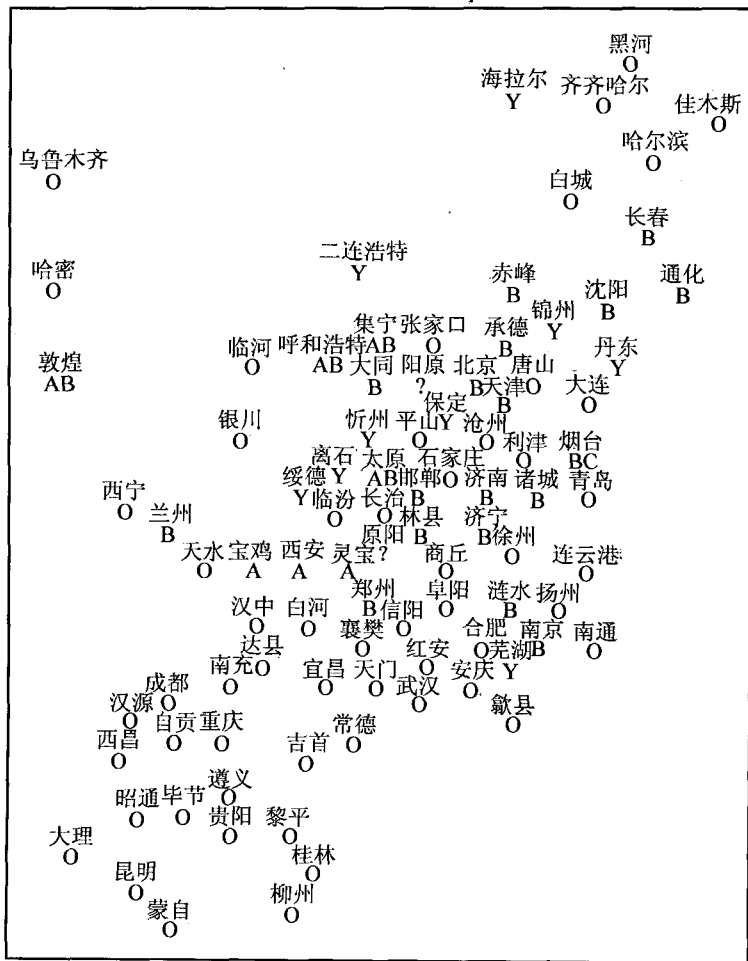
据《词汇集》的记载，西昌也有 B 型的“上上变调”，但所举例子都是叠字组，因此当 O 型看待。〈类型分布图〉阳原、原阳两处用 ? 表示存疑，这是因为《词汇集》对该两方言音系的记载注有“双音节连读变调表(暂缺)”的缘故。哈尔滨据《词汇集》是 O 型，据尹世超(1995:18 页)则是 B 型。东北地区 O 型方言中可能还有实为 B 型的。C 型不见于〈类型分布图〉，只有烟台是 BC 型。

二

2.1 下面我们讨论 B 型“上上变调”产生的历时原因。对此问题，我已在平山久雄(1998) § 4.2 中简要地叙述过自己的看法。

现在要对那一段的内容加以扩大,写得更详细、具体一些,然后讨论其他类型“上上变调”的成因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类型分布图)



如〈调值表〉所示,具有B型“上上变调”的方言,它们的声调调值并不一定相同或相类似,例如北京的声调调值,和承德以及东北各地相比,可谓大致相同或相似;和天津相比,除阴平相差较大以外各调类的调值还有类似之处;但和邯郸、大同、济南等相比,各调类的调值都有很大差距。这一情况一向给“上上变调”的统一解释带来困难。

常说“上上变调”是一种逆异化作用的结果。这话不错,不过产生异化的因素是什么呢?异化一般是在发音比较费力的语音之间才会发生的,例如印欧语里吐气辅音、r辅音、唇化音等在一个词语中重复出现时就有异化的例子^①。汉语中异化的实例多与唇音有关,如北方口语中“暖和”nuǎnhuo一词说成 nǎnghuo,一般都认为这是两个合口介音之间发生了异化的结果(前字韵尾 n 变 ng 则是受后字声母 h[x]同化的结果);又如“尾巴”wěiba 说成 yība,这应该是 *miǎi⁺pa^ʔ > *ŋiǎi⁺pa^ʔ (此据苏州方言 ni^{阴上}po^{阴平}^②可证) > i⁺pa 这样演变的结果,那么词尾“巴”的声母 p 对词根“尾”的声母 m 发挥了异化作用,使它变成 ŋ,后来这个 ŋ 按北方话一般的音变规律变成了零声母(苏州细音 ŋ 则变为 n)^③。

嘴唇合拢或闭合的动作需要调动嘴唇以及两颊的各种肌肉,跟舌头的动作比起来费力得多,因此唇音的连读容易产生异化现象。如此看来,异化就是使语句的发音容易、省力的一种手

① 例如拉丁语 peregrinus“生人、外人”后来变成了 pelegrinus(英文 pilgrim 由此而来),这是 r 音之间的异化。其他例词请参看布龙菲尔德(1980)434 页、482 页。

②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85 页。

③ 这是我多年以来对“尾巴”yība 一词所持的解释。

段。

2.2 根据上述对异化作用产生条件的观察,我们可以对一些方言如北京、天津等的B型“上上变调”,说明在它的上声调值中是什么因素引起了异化。这就是低音成分。就拿北京方言为例,北京方言的上声是214,当中低而较平的一段可以说是主要的部分,升尾则是附着的冗余特征,后面有上声以外的字紧接的时候,上声的升尾就消失,变成半上声21。一般来说,发低音时需要对照喉部的肌肉加以特殊的调节如绷紧声带、拉下喉头等(可简称为“紧喉”),才能使声音低沉到足够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发北京的上声是比较费力的,那么无怪乎两个上声字相连要发生异化。异化使前字的紧喉变弱,弱化在前字后半(即靠近后字的部分)尤甚,前字的调值因而就变成了升调,音域也多少变高,那么前字214(21)受异化之后接近阳平35,遂与阳平合流,其演变过程是极自然的。

北京方言发生“上上变调”大概已有数百年,当时各调类的调值不一定和现代完全相同,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北京的调值来推断B类“上上变调”曾经发生的条件,即:上声应该含有低音成分(具体调形是低平调、低升调、低降调、低降升调都可以),而阳平应该是音域比上声多少偏高的升调。

天津方言的上声是113,阳平是35,也符合发生“上上变调”所需的音高条件。不过,天津的阳平在各种文献中多描写为45^①,更

① 如《河北方言概况》(62页)、李行健等(1985:76页)、贺巍等(1986:246页)、石锋(1986:66页)所载。

接近高平调,这可以看做是变调规律成立以后的变化。

有些 Y 型方言中,前字变调也是升调,只是比阳平稍低而已。〈调值表〉中海拉尔、锦州、芜湖便是其例,北京可能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丹东的上声变调,收尾比阳平更高,这可能是后来的演变。保定的阳平是低平调,难怪上声的变调没有与之合并。像保定那样,阳平调值低于上声的方言中看不到 B 型的“上上变调”,这可以说是一般性原则,除了两调之间的高低关系由于后来的演变而颠倒以外^①。

2.3 本文认为北京的“上上变调”是由于低音之间的异化作用而引起的。其实郑锦全(1966)早已提出过同样的看法。郑文通过分析声调调值的征性(distinctive features)归纳出,北京话的“上上变调”不外乎是“一高”即低音特征之间的异化现象。不过本文与郑文相比有两点不同,即:一,郑文把低音异化看做特征符号的替换,本文则着重它在发音生理上的作用;二,郑文把低音异化看做产生变调的共时规则,本文则把它看做产生变调的历时原因。北京的调值系统虽然离“上上变调”发生时的状态不太远,但其“上上变调”已成为形态音位的规则,并不需要后字含有现实的低音作为共时的动机。上声在由上声变来的轻声词素前面也变调为阳平,如“小姐”、“早起”,可见“上上变调”已是一种脱离共时动机的替换规则。

^① 下文 § 3.1 所列的邯郸、大同等 8 个方言除兰州以外都可算是上声、阳平的高低关系由后来的调值演变而致颠倒的例子。

三

3.1 上述对“上上变调”成因的看法,按照现有的调值,只能适用于〈调值表〉上 17 个 B 型方言的一半,即北京、天津、承德、赤峰、长春、通化、沈阳,以及涟水、南京 9 处。对另外一半,即邯郸、大同、诸城、济南、济宁、林县、郑州、兰州 8 处则不适用,因为根据现有的调值情况,难以说明这些方言发生“上上变调”的原因在于异化。例如济南方言,两个上声字相连而成的 55-55 发出来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无须把前字读为阳平 42。如果两个音节中一直维持高音有些费力的话,那么可以有别的办法,如把前字或后字读成稍低的 33,或者把后字读成降调 53 等。若把 55-55 读成 42-55,就需要把刚降下的声音再次提高,反而会使喉部肌肉的调节更加麻烦、费力。

对于以上 8 处中的济南、诸城、济宁、郑州,我们只要假定其声调调值是从近似天津方言的状态变来的,就仍可以把它们的“上上变调”解释为低音间异化的结果。如天津的阳平 35 经过 45、55,变为高降调 53,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推链式的调值演变,结果出现诸城、济南的调值系统。以济南为例,如〈图一〉:

〈图一〉对济南方言声调演变史的拟测

	天津				济南		
阳平	35	>	*55	>	*53	>	42
去声	53	>	*31	>			21
阴平	21	>	*212	>			213
上声	113	>	*35	>			55

我认为高平调比较容易变为高降调,因为把高音维持到音节末尾是比较费力的。随着音节末尾发音松弛的趋势,音高也容易降下。诸城的调值系统与济南基本相同,不用解释。济宁、郑州的去声 312,应该是由 *31 变出来的。因为被用力压低的声音随着音节末尾发音的松弛而霎时升高,就会产生升尾。

我们可以拟测,这些方言曾经处在与天津相同的调值阶段,那时由于异化作用产生了 B 型“上上变调”,而这一种变调规律一旦成为形态音位上的调类替换规则,就不管相关调类的调值后来怎么变,也一直仍旧保留至今了。

3.2 上述对济南等 4 处的 B 型“上上变调”成因的看法,可以从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得到印证。很多山东方言具有轻声前变调,即该方言的全部或大部分调类在轻声前采取与单字调不同的调值。如平山久雄(1998)所述,某些山东方言如德州的轻声前变调调值与天津方言的单字调相近,单字调则与天津有较大的差距,不过它们的单字调可以解释为:从天津单字调的状态经历了高平调变高降调这一变化引起的一次推链式循环演变而成立的。轻声前面所以能保留较早的调值状态,那是因为轻声音节与前面的音节结合得极为紧密,扼制了前面音节末尾音势的弱化,所以轻声前音节的高平调不至于变成高降。其他某些山东方言如坊子的轻声前变调调值与昌黎方言的单字调(阴平 32,阳平 13,上声 213,去声 55)^①相近,可以解释为保存了比天津再早一层的调值状态。济南方言的单字调跟德州、坊子都基本相同,那么〈图一〉所

① 据《昌黎方言志》37 页。

拟的济南方言调值演变假说,可以说因轻声前变调而得到有力的支持。郑州方言没有轻声前变调,那应该是因为该方言轻声前音节也经历了和其他音节相同的调值演变的缘故。〈调值表〉上烟台1处是BC型,烟台方言的调值系统可解释为由类似昌黎的阶段变来,那一阶段(只是阳平稍微变高)中发生了B型“上上变调”,阳平的调值后来也继续升高,遂与去声合并,就呈现出BC型的外貌了。

3.3 对8处中剩下的邯郸、大同、林县、兰州4处的B型“上上变调”,我认为也可以用低音间异化的观点来作解释,只是这些方言的调值至今演变的情况与前4处方言有所不同而已。若要具体讲述这一点,就需要把我对声调调值演变的整套看法介绍出来,然后加以阐释,但为篇幅所限,不能如愿。读者如果参看平山久雄(1984,1991,1997)等文章,就可以了解到我对这些方言的调值演变史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一种连读变调的成因不一定只是一种,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方言中能带来相同的连读变调。B型“上上变调”除了低音间异化以外也可能由别的原因发生。例如,假定有一个方言的上声是*53,阳平是*55,那么*53-53可以变成*55-53,这样就能使音高推移的曲线变得单纯,易于发音,结果也是B型的“上上变调”。但至少在其〈调值表〉上所列方言的范围之内,我认为只考虑低音间异化这一原因就够了。

四

4.1 关于A型“上上变调”的成因,也可以根据低音间异化

的观点作出解释。

我认为〈调值表〉上灵宝、西安、宝鸡 3 个 A 型方言似乎都没有保存该方言发生“上上变调”时期的调值状态。于是我查遍了近年来出版的天津市和河北省各地的市志、县志里面的方言部分^①，结果发现了 1 处有 A 型“上上变调”的方言，即《雄县志》(554 页)所载的雄县方言。此外陈淑静(1998:58—61 页)所记录的北京市平谷方言变调也是 A 型。这两个方言幸而还保留着 A 型“上上变调”成立时期的调值状态。平谷、雄县的声调调值如〈图二〉：

〈图二〉两个 A 型方言的声调调值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平谷	35	55	214	51
雄县	45	53	213	31

平谷的声调调值与北京相比，阴平和阳平的调值正好相反。因此，在这一方言里上声的连读曾发生低音间异化的时候，前字上声合流的调类应该是阴平，而不会是阳平，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县的情况与平谷相同，只是阴平从 *35 变到 45 了。

4.2 〈调值表〉上 3 个 A 型方言都是关中及邻接地区的方言，声调调值也互相类似，与平谷、雄县都有很大差距，但它们 A 型“上上变调”的成因很可能也是一样的。例如灵宝的声调调值可解释为由与平谷相同的调值状态出发，经过三次的高平变高降所引起的推链式变化而形成，如〈图三〉：

^① 在此调查过程中曾得到太田斋先生的帮助，兹记感谢。

〈图三〉对灵宝调值演变史的拟测

阴平	*35	>	*55	>	*53	>	*42	>	31
阳平	*55	>	*53	>	*31	>	*312	>	213
上声	*214	>	*35	>	*55	>	*54	>	53
去声	*51	>	*31	>	*313	>	*213	>	35

那么灵宝的 A 型“上上变调”应该也是在与平谷相同的调值状态之下产生的。西安和宝鸡的 A 型亦同^①。这两个方言的调值系统都与灵宝基本相同,但有一点差异,就是去声已由高升调变为高平调了。《词汇集》(1081 页)描写西安方言说:“两字都是上声,前字调值有时由 53 变为 21。”据此西安的“上上变调”规律仿佛是已经“弱化”了,不过据《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所载的西安话来看,两个上声字构成的词汇按规律变调的仍然居多。

〈调值表〉上 4 个 AB 型方言,无论它们本来是 B 型还是 A 型,或者本来就是 AB 型,我认为都在“上上变调”成立之后经历了大幅度的声调调值变化。Y 型方言中忻州、离石、呼和浩特亦同。本文不能具体介绍我对这些方言声调调值演变史的看法,读者如感兴趣,除了上面 § 3.3 所举的三篇拙文以外,〈图三〉或许有点

^① 这三个方言的 A 型“上上变调”可能有另一种解释。例如灵宝的“上上变调”是 53-53→31-53;两个 *53 连续的时候,前一个 *53 可能变得较低而为 *42,这个 *42 后来和阴平 31 合并了(参看 § 5.1 中对天津方言的变调 2. 的解释)。这也是一种异化现象,为的是要回避开头声音高尖顶峰的连续。不过我不采取这一种看法,是鉴于万荣的情况。万荣方言也属关中方言的一个支派。据《万荣方言词典》(引论 5 页),万荣的调值是:阴平 51,阳平 24,上声 55,去声 33,也有 A 型的“上上变调”。上述的解释难以说明这一方言,因为上声在这里不是降调,而是高平调。万荣的 A 型变调应该也是在〈图三〉最左边的调值阶段中产生的,不过后来的调值演变与〈图三〉所拟有所不同而已(去声 33 当是从 *313 变来的)。那么,其他关中方言 A 型“上上变调”的成因也应该与此相同。

参考价值。

4.3 在〈调值表〉上看不到 C 型方言。我们在天津市、河北省的地方志里找到了黄骅(《黄骅县志》490 页)和栾城(《栾城县志》883 页)两个 C 型方言,其调值如〈图四〉:

〈图四〉两个 C 型方言的声调调值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黄骅	24	44	45	31
栾城	213	33	55	31

根据这两个方言现有的调值,难以说明 C 型“上上变调”产生的原因。这恐怕也是因为变调成立以后声调调值发生了变化。以黄骅为例,如果假定它的声调调值经历了如〈图五〉的演变过程,就能把 C 型“上上变调”解释为低音间异化的产物。去声由 *35 变为 *55,再变为 *53,最后变为 31,这都是调值末尾的音高对开头发挥了同化作用的结果。栾城调值的演变亦可拟为与〈图五〉基本相同,只是栾城的上声已从 *45 变到 55,阴平和阳平则分别保持 *213 和 *33 的阶段。〈图五〉作为演变的出发点所记的调值系统与平山久雄(1984)所拟“官话方言祖调值初案”有些类似之处。

〈图五〉对黄骅方言调值演变史的拟调

阴平	*31	>	*312	>	*213	>	24
阳平	*11	>	*22	>	*33	>	44
上声	*213	>	*35	>	*45	>	45
去声	*35	>	*55	>	*53	>	31

五

5.1 除了“上上变调”以外,凡是同一调类的字相连的时候,

常有前字变调的现象。这种同调相连变调的现象,有的可以根据低音间异化的观点加以解释,有的则不能。郑锦全(1966:105页)在分析西安方言的声调征性时,把该方言两个阴平 21 相连时前一阴平变调为阳平 24 的现象,描写成下列一条替换规则,这也是低音间的异化:

[—高]→[+高+升]/——[—高]

我们再以天津方言为例,说明一下同调字相连的变调情况。据《词汇集》(26页),天津方言的两字组除了“上上变调”以外还有两种同调相连的连读变调^①:

1. 两字都是阴平,前字调值由 21 变为 113,即与上声同调。
2. 两字都是去声,前字调值由 53 变为 21,即与阴平同调。

上述第 1 条可以解释为低音间异化的结果:前字阴平末尾发低音的喉部调节由于异化作用而变弱,以致声音暂时提高,前字阴平遂与上声合并。第 2 条则难以解释为低音间的异化。我推测阴平调值曾经是 *42,与去声比较接近,那时前字去声 *53 因读得较弱、较低,遂与阴平 *42 合并。这也算异化现象,但不是低音间的异化,而是高尖顶峰之间的异化。

5.2 以上所论是一种尝试,试图根据低音间异化的观点来说明官话和晋语“上上变调”的成因。对其中某些方言,如 § 3.3 里邯郸等 4 个方言,本文没有具体说明“上上变调”成立以后调值演变的情况。再如 § 4.3〈图五〉里对黄骅方言调值演变史的拟测,在把我对调值演变规律的整套看法说明以前,也许难以令人轻易

① 李行健等(1985)、石锋(1986)所载亦与此相同。

首肯。在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算是尚未完工的作品,是一个初步的报告。

不过,我借这个机会要强调的是:声调调值是随着时间而起变化的,因此需要考虑声调调值的历时演变,这样汉语的连读变调现象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亓海峰等(1998)也指出从声调调值历时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变调现象的必要性。至于声调调值按照什么样的规律来演变,本文主要只取了一种看法,即高平调变高降调引起一系列推链式的循环性调值变化,而这种循环性变化在一个方言的历史中可以反复出现。我的这一看法如果能引起学者的注意,并作为学界研讨调值演变时的一个参考材料,那我将会感到满意。

引用文献

- 布龙菲尔德 1980: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L.)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钱晋华校《语言论》,商务印书馆,北京。
- 陈淑静 1998:《平谷方言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
- 贺巍等 1986:贺巍、钱曾怡、陈淑静《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241—2512页。
- 李行健等 1985:《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76—80页。
- 亓海峰等 1998:亓海峰、石锋《关于北方话连读变调的类型》,《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343—347页。
- 石锋 1986:《天津方言双字组声调分析》,《语言研究》1;石锋编著《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66—83页。
- 尹世超 1995:《哈尔滨方言词典引论》,《方言》1,17—25页。
- 郑锦全 1966:《官话方言的声调征性跟连调变化》,《大陆杂志》33.4,102—108页。
- 平山久雄 1984:《江淮方言祖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语言研究》1,185—199页。

1991:《汉语声调起源窥探》,《语言研究》20,145—151页。

1997:《北部晋语声调调值的系谱分类》,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内山书店,东京,211—225页。

1998:《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方言》1,7—13页。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语文出版社,北京,1995年。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语文出版社,北京,1996年。

《河北方言概况》: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天津,1961年。

《万荣方言词典》:吴建生、赵宏因编纂,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1997年。

《昌黎方言志》新1版: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黄骅县志》:黄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杨庆礼主编,海潮出版社,北京,1990年。

《栾城县志》:河北省栾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华出版社,北京,1995年。

《雄县志》:雄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李凤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

1999年

再论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

1.1 我曾在美国《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即平山久雄(1975)。这篇论文根据厦门话的单字调(基本调值)和变调(替换调值)，拟测厦门话里发生变调之前的“古调值”，然后描述了从古调值系统到现代两种调值的演变过程，即(括弧内是该调位的辨别特征)：

基本调值		古调值		替换调值	
55(高平)	<	*44	<	阴平*33(低平)	33(低平)
24(升)	<	*24	<	阳平*13(低升)	> 33=阴平
42(高降)	<	*54	<	阴上*55(高平)	55(高平)
21(低降)	<	*42	<	阴去*53(高降)	> 43(高降)
33(低平)	<	*22	<	阳去*31(低降)	> 22(低降)
<u>32</u> (低降)	<	* <u>54</u>	<	阴入*5(高平)	> 5, <u>54</u> (高平)
5(高平)	<	*4<*24	<	阳入*13(低升)	> 2(低平)

根据以上拟测可知，厦门话的基本调值多经演变，而替换调值反而少变，比较忠实地保存了古调值的面貌。

为什么基本调值是多变的呢？它是在字组的最后一个音节（末位音节）上出现的，这类音节由于和后面的音节结合得较松，或者后面没有别的音节，所以在它的后半部分发音运动之弱化（声带松弛、呼气量减少等）比较显著。因此古调值系统里的高平调阴上*55在末位音节上难以把高音维持到底，逐渐变成了高降调，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一套连锁性的循环变化：

原来高降调的阴去变成了低降调，原来低降调的阳去变成了低平调，原来低平调的阴平变成了高平调。

阳平则与此连锁无关，整个调值稍微升高而已。

阴入的变化与阴上大略平行，它从高平促调变为低降促调了。阳入的变化则与阳平平行，不过它经过*24再往上升，变为高平促调，这是由于促音难以表现出升调的缘故。

替换调值比较少变，这是因为后来产生替换调值的环境，即非末位音节（字组末位以外的音节），与后面的音节结合得较紧，音节后半部发音的松弛比较小，结果阴上得以在这里保持高平，没变降调，所以也没引起其他调位的连锁变化。

1.2 这篇论文幸蒙同行学者们的注意，也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人曾问我：厦门古调值构拟的根据究竟何在？我的回答是：将古调值系统假定如此，即可较合理地说明它后来之所以分成两种系统，而形成现在的基本调值与替换调值的原因和经过——拟测的根据不外乎此。这是一种科学的假设，科学理论一般都是这样构成的，例如地动说本来也是一种假设，天文上各种现象藉此才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所以伽利略遭受教会的批评时，心底也未曾改变自己的见解。

二

2.1 平山久雄(1975)还用董同龢(1960)的资料讨论龙溪、晋江、揭阳三个方言的基本和替换调值,试图证明这些都可以从厦门话古调值推导出来,就是说,这三个方言的古调值基本上都与厦门古调值相同,只是晋江话和揭阳话古调值多一个阳上*22而已。现在从“声调调值变化的环流”的观点来看,这一段里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

据董同龢(1960),这三个方言的基本和替换调值如〈表一〉:

〈表一〉龙溪、晋江、揭阳方言的声调调值

地点	龙溪		晋江		揭阳	
调类 \ 调值	基本调	替换调	基本调	替换调	基本调	替换调
阴平	24	33	44	44	44	33
阳平	212	33	24	11	55	11
阴上	53	35	55	35	42	35
阳上			33	11	13	11
阴去	31	41	31	55	212	32
阳去	33	11	31	11	22	11
阴入	<u>31</u>	<u>4,53</u>	<u>53</u>	<u>5,53</u>	<u>31</u>	4
阳入	<u>13</u>	1	<u>35</u>	1	4	1

2.2 这三个方言阴上的替换调值都是 35,平山久雄(1975: 9—11 页)认为那是从*55 变来的,现在我据“声调调值变化的环

流”的看法认为,不如把它看做是反映着比厦门古调值*55更古的调值*35。这个*35在晋江话里的末位音节变到55,在龙溪话、揭阳话里的末位音节则再进一步变为53了。

晋江话的阴去替换调值55,平山久雄(1975:11页)认为是从*53变来的,这还是牵强的,现在我认为也不如看做是保存了比厦门古调值*53更古的调值*55为妥。

如此看来,若论厦门和龙溪、晋江三个方言所共通的祖调值,即可姑且拟之为: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33	*13	*35	*11	*55	*31	*5	*1

我觉得这里一些调类(如阴平、阳平、阳上)的调值还有研究余地,因此只算暂订的拟测。

揭阳地点离这三处稍远,应该先和潮阳、汕头等靠近的方言相比较,来构拟它们的祖调值,所以上面的祖调值里没把揭阳话算在内。不过揭阳话的调值也可将就从那里推导出来;其演变特色是阳平的基本调值经过*35变为55,阴去的基本调值经过*31>*312变为212。

三

3.1 有一个闽方言,它的单字调和我们所拟的厦门古调值十分近似。那就是尤溪话。下面〈表二〉转载了陈章太、李如龙(1991)中李如龙〈尤溪县内的方言〉(305页)〈尤溪县内七种方言声调对照表〉。

〈表二〉尤溪县内七种方言的声调对照表

古四声	古清浊	例字	城关 6调	西洋 6调	洋中 7调	汤川 6调	中仙 7调	新桥 5调	街面 7调
平	清	三风 瓜鸡	阴平 33	阴平 33	阴平 24	阴平 44	阴平 33	阴平 33	阴平 33
	浊	零雷 头肠	阳平 12	阳平 13	阳平 33	阳平 13	阳平 12	阳平 24	阳平 24
上	清	九胆 水鼠	上声 55	上声 44	上声 35	上声 21	上声 213	上声 54	上声 55
	浊	五蚊 稻肾	阳去 31	阳去 41	阳去 21	阳去 41	阳去 31	阳去 21	阳去 31(连读 变阴平)
去	清	兔菜 四肺	阴去 53	阴去 54	阴去 52	阴去 53	阴去 45	阴去 41	阴去 31 (连读变 上声)
	浊	二雁 豆胃	阴去 53		阴去 52				阴去 53
入	清	八鸭 血雪	入声 24	入声 34	阴入 5	入声 5	入声 5	阴入 23	阴入 5
		北谷 拍骨	入声 24		阴入 5	入声 5	入声 5		阴入 5
	浊	六鹿 十直	(阴平)	入声 34	阴入 34	(阴平)	阴入 23	(阴平)	阴入 3
		月麦 石箸	(阴平)		阴入 34	(阳去)			

表上七个方言中城关、西洋、新桥和街面的舒声调值都很像厦门古调值,只是新桥的上声开始稍稍下降,西洋的阴去还保留着一点原来高平的面貌,街面的阴去则已并入阳去了。街面话阴阳去 31 有变调,阴去变同上声 55 是保留了从前的调值状态,阳去变

同阴平 33 则经过了和厦门阳去的基本调值一样的演变。

晋江话的基本调值已和厦门古调值相当近似，现在挨近闽南话地区的一种闽语中还能看到更似厦门古调值的调值系统，这按理说对我们的构拟并不算很重要：虽然这种方言的存在很有意思，但即便它没有也无所谓，因为构拟不外乎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被构拟的情况并不一定得现实存在。不过我们能发现这样的方言也许在情理上能替人消除一点光靠理论构拟古调值而引起的不安感。

3.2 我们顺便看一下尤溪和厦门中间一些方言的调值情况。据陈章太、李如龙(1991)中陈章太〈大田县内的方言〉(269页)，尤溪南边的大田话属于闽南话，基本调值近似厦门话，只是以阳上 55，阴阳去并为去声 31，阴平为中平 33 为主要差异。不过它的变调调值却与厦门话、晋江话等都大相径庭，需要另文分析。

据陈章太(1989:16页)〈表二〉，大田东南永春话的基本调值、变调调值都和厦门话基本相同，即(括弧内记变调调值)：阴平 44(22)、阳平 24(22)、上声 53(44)、阴去 21(53)、阳去 22(21)、阴入 32(44)、阳入 44(21)。

据张振兴(1982)，大田西南漳平(永福)话的基本调值是：阴平 24、阳平 11、阴上 31、阴去 21、阳去 53、阴入 55(白读)、55(文读)、阳入 53，除入声以外近似龙溪话，最大的差异是阳去为 53，但这也可以从龙溪的 33 推导出来： $*33 > *55 > 53$ ，这一演变逼使阴上 *53 变为 31 了。变调调值则阴平、阳平、阴去、阴入(白读)一样是 33(阴上、阴去前是 55)，阴入(文读)是 33(阴上、阴去前是 55)，阴上、阳去是 21，阳入是 21；33、33 在阴上、阴去之前作 55、55 意味着

阴上、阴去的基本调值都曾有过以高音 5 开头的时期,这个高音把前面的 33、33 拉高了。

引用文献

陈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语文出版社,北京。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董同龢 1960:《四个闽南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 729—1042 页。

平山久雄 1975:《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 1, 3—15 页;《音韵学研究通讯》1981. 1, 19—28 页。

张振兴 1982:《漳平(永福)方言的单字调》,《方言》4, 264—275 页。

1996 年

汉语声调起源窥探

1.1 对于声调的调值如何发生历时演变的理论,我通过一系列的论文逐渐形成了以下所列的看法:

(1) 高平调容易变高降调。随着音节后半发音运动的逐渐减弱(呼吸量减少、声带弛缓等),高平调的末尾自然要降下来。因此高平调 55(或 44)会经过 554(或 443)逐渐变为 53(或 42),然后再变到 51(或 41)。反之,高降调变到高平调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小的,因为这样就要增添把高音维持到底的生理负荷,不适合音节后半发音趋弱的环境。

(2) 高降调的开头可以逐渐变为低音,它就会变为中降调或低降调,甚至变为低平调。这种音变是由降调末尾的低音发挥同化作用(regressive assimilation)所致。

(3) 降调末尾可以添上升尾。要发降调末尾的低音,往往要把音高用力压下去,可是在音节末尾随着声带和喉头肌肉的松弛就压不住了,以致声音一时提高,添上升尾。

(4) 低平调易变中平调,中平调又易变高平调。为减少把低

音维持到底的生理负荷,低平调可以逐渐变为中平调;中平调又可逐渐变高平调,因为声音越高,响度(sonority)越大,就越有利于提高语音传达的功率。

(5) 低平调易变升调,升调又易变高平调。因为要减少把低音维持到底的力气,低平调也可以添上升尾;以此为媒介,低平调也可变低升调。低升调又可变高升调,以便节省发开头低音的生理负荷,同时能增强响度。高升调的开头可以受末尾高音的同化作用而变高,如此高升调也是会归高平调的。

1.2 综合上述几项调值演变的可能性,就可以描绘出一种圆环,即一个调位的调值从高平调出发,经过降调、低平调(或低凹调)、升调(或中平调),最后又回到高平调。我们可名之为“调值变化的环流”(简称“环流”),其具体内容如〈表一〉。有复数的演变可能性,就写出了复数的路径。表上的数字能代表相近的调值,如55兼表44之类。

〈表一〉调值变化的环流

				11>	33>	44>	55
55>	53>	51>	31>	11>	13>	35>	55
		51>	412>	213>	24>	35	
			412>	313>	33		

上文所叙“环流”,毕竟是个假设,尚待慎重检验。但我看它对于一个方言内部的变调现象和不同方言之间的调值变异,往往有相当强的说明能力,因此我认为这个看法起码反映真实的一面,可以暂拿它用作汉语声调调值演变史的线索,看看它能引出什么样的结论,那些结论到底有没有不甚合理的地方。当然上述的“环

流”并不包罗所有可能的调值演变类型,它不过是其中的主要趋向罢了。

在平山久雄(1984)里,虽然还没用上“环流”的名称,但事实上已经适用“环流”的观念对华北、华中平原官话方言的声调调值进行了比较,拟测出它们所共通的祖调值系统,即“官话祖调值初案”(原文称“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下文简称“官话祖调值”),如〈表二〉:

〈表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

阴平	*42	上声	*435	阴去	*35	阴入	*x ₁
阳平	*11			阳去	*24	阳入	*x ₂

附在上声调值前面的“*”号表示全体调值带着紧喉作用。阴去、阳去之分在大多数官话方言里早已消失了,可并为一个去声*35。阴入和阳入的调值阙疑,用代码标示。上声其实是阴上,阳上已并入阳去里了。

二

2.1 平山久雄(1986)则讨论上古汉语的声调调值,其结论如下^①:

平声:偏高的平调或微降调,可记为*44或*43。

① 下面所记的调值和 Karlgren(1960)拟测的上古调值相似,其根据却有不同。Karlgrén 先据平、上、去的字义(关于去声,再加上现代北京话的调值)推测中古调值,而后拟测为上古调值和中古调值相同。照他的看法,现代北京话基本上还保持上古调值。照我的看法则是:北京调值就是上古调值经过大幅度演变的结果,平声(阴平)和去声顺着“环流”打一个圈子又接近了原来的面貌,上声(下文要订为*213)则一时升为中古的*435以后再沉下来作为现代的214了。

上声:升调,可记为*35。

去声:低降调,可记为*31。

入声:低降促调,可记为*31。

这些调值都是声母为清音时的阴调,声母为浊音时的阳调应该比它多少低一些。

上面拟测上古调值的方法是:一面从“官话祖调值”出发,再往上溯回“环流”,一面试图能圆满解释《诗经》里异调字通押频率的大小。异调字通押的频率主要根据高田时雄(1974)所载表 A,今作为〈表三〉引载于下面,是从张日升(1968)的统计表里除掉有关阳声诸部和歌部的数值,只保留歌部以外的阴声诸部的数值而做的,因为阳声和歌部没有入声,不适合于加起来观察整个平、上、去、入四声之间的通押频率。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平声和上声,平声和去声,上声和去声,去声和入声之间,通押的频率大致相似,平声和入声,上声和入声之间则通押极少,形成明显的对比。这些数值能证验前人观察的结果,如董同龢(1954:188页)说(1)平、上、去多兼叶;(2)去与入多兼叶;(3)平、上与入兼叶的极少。

〈表三〉《诗经》中同调字和异调字通押的次数(歌部以外的阴声诸部)①

平	695			
上	207	825		
去	155	124	252	
入	10	39	154	696
	平	上	去	入

① 〈表三〉的读法例如:平声字与平声字押韵一共 695 次,与上声字押韵一共 207 次。次数的算法例如:〈关雎〉一章“鳩”、“洲”、“逌”押韵,平声与平声相押 3 次。

为了说明这些通押频率的差别,过去多数学者赞同的看法是:给阴声诸部的平、上、去声假定浊辅音韵尾*-b, *-d, *-g,再假定上古去声和入声调值相同,这样就可以推演起来说:相配的平、上、去三声是异调同尾,去、入二声是同调异尾(部位相同,只有清浊有异),因此都比较容易通押;相配的平、上声和入声之间则异调异尾,难以通押。

2.2 有些学者认为,上古音里取消元音性韵尾*-i, *-u, 拿*-b, *-d, *-g来代替它们,这种看法违背语音的自然,从而要另找途径。赖惟勤(1957)假定,上古的入声韵尾*-p, *-t, *-k, *-q在关闭之前带有一种元音性的“音渡”成分,即它们分别为*- $\bar{y}p$, *- $\bar{i}t$, *- $\bar{u}k$, *- $\bar{u}q$,而阴声韵尾则仍可拟做元音性的*-i, *- \bar{u} , *-u^①。他指出,这样也和假定浊塞韵尾的办法一样地能说明上古各声调之间的通用关系。

赖文注意到入声韵尾前面的音渡,我认为这是很中肯的,但如果把这种音渡视为类似元音或半元音的比较明显的成分,那就会有问题,因为入声韵尾若有这种明显的音渡,就违反发音的经济原则(如从低元音过渡到-t,如果-t本身不含有腭化因素,中间就不需要发一个明显的[i]或[j]音),又显得不很自然了。因此平山久雄(1986)假定,阴声韵尾*-i, *- \bar{u} , *-u的实际语音在去

① 赖惟勤(1953)曾拟测上古有两套喉音韵尾,即除了一般承认的*- \bar{p} , *-k, *-g之外还拟出*-Nw, *-qw, -Gw,前一套分配在之、蒸、佳、耕、鱼、阳诸部,后一套则分配在幽、中、宵、侯、东诸部。后来赖惟勤(1957)把后一套写做*- $\bar{u}N$, *- $\bar{u}q$, *- $\bar{u}G$ (后来又用*- \bar{u} 来代替*- $\bar{u}G$)。李方柱(1971)的拟测则相当于后一套的韵尾,写做*-ngw, *-kw, *-gw。

声下面就显得偏低而模糊(即更加有过渡性),如²i在平声、上声是[-i],在去声是过渡性很强的[-e],这个[-e]就可以和入声韵尾²t前面的音渡十分近似。请注意,入声韵尾的持阻阶段并没有任何可听的声音,古人听辨入声韵尾的不同想必也靠前面音渡的特色。我假定这种音渡就类似元音韵尾在去声下面呈现的音色^①。

为什么元音韵尾的语音在去声下面表现得低而模糊?该文认为那是由于它的调值是低降调²31,末尾带有紧喉作用,以便发出低音。现代方言里发出低音时有时也采用紧喉的办法,来减少声带颤动的频率,北京话的上声便是其例。这种紧喉作用会使元音变低,因为紧喉往往带着喉头的下降,舌骨跟着也被拉下,结果元音就变得低一些,偏后一些。我在日本观察过一位讲福建福清县高山东瀚话老华侨的发音,他的阴去可以记做231,后半部分带有明显的紧喉,同时元音也比他调多少偏宽一点^②。

① 入声字和去声字的通押一直继续到南北朝末期,只是魏晋以后就局限于以²t收尾的入声字。但如果为说明这一事实而给对方的去声韵母拟一个²d韵尾,那就会在共时平面上出问题,因为这种浊塞韵尾²d在当时的音位系统中是孤立的,并且与平声、上声的²i韵尾形成互补关系。我难以想象这种音系会现实地存在。要是让我们来解释这一通押现象,我们就假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韵尾²t变做带腭化的,是一种²t(这样就便于和²k作出区别),那么就可以推测,这种腭化的²t在其成阻阶段带有近似[-i]的音渡,结果可以和去声的²i通押;大概这时期入声仍和去声调值相近,并且去声韵尾恐怕也仍发得较宽。

② 这里举东瀚话的去声作例子,并不是因为它恰是去声的缘故。这一方言的阴去是一种低降调,我认为这并不是保存了上古的去声调值,而是从上古调值出发,顺着“环流”打一个圈子回到了原处。

三

3.1 上面介绍的平山久雄(1986)里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其前提是上古音里已经有声调。但是,如果把拟在去声调值末尾的紧喉成分看做是韵尾的一个区别特征,即假定上古音系中能充当韵尾的音位有带紧喉、不带紧喉的对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取消平声和去声的区别了。如果用底线来表示紧喉音位,那么后代的去声来自*IMVE(I:声母,M:介音,V:主要元音,E:韵尾)这一类型的音节,后代的平声则来自*IMVE(即韵尾不带紧喉)这一类型的音节。这样拟测就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即可以说明中古音系里为什么以-p,-t,-k收尾的音节只有一个入声,其他的音节才分平、上、去三个声调。入声韵尾-p,-t,-k是内破裂音(implosives),这种内破裂辅音往往带着一种紧喉成分,以便截断声音。Iwata et al.(1979,1981)对于广东方言和闽南方言的入声韵尾的看法证实了这一点。要是我们假定上古的*-p,*-t,*-k也带着这种紧喉成分,那么就可以说:以这些内破裂辅音收尾的只能是*IMVE,而不能是*IMVE,因而后世只有一个人声。

那么后世的上声从何而来?我认为上声来自*IMVE这一类型的音节,即主要元音带着紧喉成分。也可以看做是介音带着紧喉,但为了避开承认带紧喉的零介音(虽然不能不承认带紧喉的零韵尾),不想采取这一看法。主要元音和韵尾都由紧喉音位来充当的音节是不存在的,即没有*IMVE这一类型的音节。这可以说明

是异化的结果。

3.2 上古音还没有声调,上述这个说法是从音位论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上古没有声调音位(即调位)的意思,我们并不否认声调作为伴随特征已经存在。我们宁可拟测,*IMVE、*IMVE、*IMVE三种类型的音节各具有独特的音调:由于紧喉作用拉下音高的结果,三种音节类型的音调应该各与平山久雄(1986)拟测的平声调值、上声调值、去声调值(参看本文§2.1)相近,*IMVE中以内破裂辅音收尾的音节应该也和在那里拟测的入声调值相近,是短促的。不过*IMVE的音调与其看做*35,不如看做*24或*213似乎更妥当一些,因为主要元音的紧喉性会把调值的前半以至中心部分压下得相当低沉。

那么到什么时代才发生带音位功能的声调呢?这是难以确定的问题,很可能中间有过相当长一段模棱的时期。即使语言学家亲身观察,也不容易判定带音位功能的是声调的对立还是韵尾、主要元音紧喉与否的对立,似乎这两种解释都能成立,这种状态我把它叫做“模棱”。现代吴语里声母的清浊和声调的阴阳之间有时好像也有这种模棱状态。在5世纪末,沈约他们提倡四声,但也不一定给我们当时已经有声调音位的保证,因为四声说或许不过是从表面的语音现象着眼的。在金田一春彦(1951)、赖惟勤(1951)等拟测的唐代后期北方的调值系统里,以及在我们所拟测的“官话祖调值”里,去声已经变为升调,这种音调就不能看做是紧喉韵尾的影响,据此可以确定唐代已经有声调音位了。

四

4.1 我们为中古上声的来源拟测了带紧喉作用的主要元音，这对说明中古以及上古和中古之间的一种现象也有好处。

我们拟测“官话祖调值”里的上声带着紧喉作用，那是因为从那个调值系统到现代各种官话方言调值的演变当中，上声往往逆着“环流”，从较高的升调变到较低的升调或凹调，而在这一过程中曾和去声（有时还和阳平）发生交叉的缘故。为要说明上声的这种特殊行迹，我认为最好给上声祖调值拟个紧喉成分。这个成分可能本是发高音的手段，但后来被加强了，这样就便于使上声保持和去声之间的区别。这种强度的紧喉却拘束了声带的迅速颤动，发挥了降低调值的作用。这是平山久雄（1984：192—193页）的看法。

4.2 但是，伴随上声调值的紧喉特征似乎在中古以前已经长期存在。平山久雄（1989）推断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里面所谓“急气言之”即表示该字当读做上声，“缓气言之”即表示该字当读做去声^①。

^① 魏建功先生在1945年给周祖谟先生的信中（据周祖谟1966：428—433所引）解释“急气言之”、“缓气言之”的涵义认为：去声最“缓”，上声最“急”，平声、入声则比去声为“急”，比上声为“缓”。我的解释与此相似，只是不采取如此相对的看法。最明显指点我们“急气言”表示上声的例子是：《淮南子》〈说山训〉“牛车绝犛”下注云“犛读近藹，急舌言乃得也”（“急舌”姑视为与“急气”同）；《淮南子》〈说林训〉“不发户犛”下注云“犛，户限，楚人谓之犛。犛读似鄰，急气言乃得之”。《广韵》上声軫韵“犛”下注云：“门限也，又牛车绝犛”，可见上面《淮南子》的两个“犛”字本作“犛”，读上声，后来讹成了“犛”。如此，上举二项高诱注当谓：将去声“藹”、平声“鄰”各变读为上声，即可得“犛”字之音。《广韵》没有和“犛”同音的常用字，大概高诱的时代也一样，所以高诱不得不先举异调的“藹”字、“鄰”字，然后用“急气言”指示把它改读为上声。

“急气”和唐代《元和韵谱》“上声厉而举”里“厉”的意思有所相通，都可以解释为对紧喉特征的形容，就是说：如果元音带着强度紧喉的话，声带也紧迫僵化，就需要把呼气用力地从声门里挤出来，这样才能发出元音，这种挤出气流的动作可以说成“急气”，并且能给人以“厉”的印象。在这两种资料的中间，南北朝陈人释智匠《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卷45所引）解释六朝俗谣《上声歌》说：“上声歌者，因上声促柱得名。”关于“促柱”，《文选》（卷四）吕向注云：“急弦也”。“急弦”就是乐器上被拉紧的弦以及从那里发出来的急促的音调。这样上声又可以和“急”、“厉”连接起来了。上声的紧喉成分在高诱在世的3世纪初年已经很显著，那么与其把这特征看做是去声调值接近了上声调值以后才被加强的，倒不如把它看做是本来就存在的，是继承了上古主要元音所带的紧喉成分。

有趣的是，“缓气言之”里的“缓气”和沈约等所称“去声”，两者的涵义也有相通之处。我认为高诱的去声也是降调，仍然带着紧喉成分，但这紧喉是在音节末尾的，所以比较弱，在发挥缓慢地控制气流来放低音高的一种作用，因而去声可形容为“缓气”。这是从发音时的感觉来说的。“去声”的称呼则是从听觉方面来说的，就是气流接近音节末尾就受到控制，音高降低，音强也随着逐渐变小，这种印象似可用“去”的字眼来比拟。

五

5.1 上面提出的对于上古去声调值的拟测，以及为什么去、入两声属于同一调位的说明，是通过一系列推测得出来的结论，本

文题为“窥探”就是缘此而来。但我相信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一点可以从西藏话里声调分化的情况得到印证。

藏语拉萨话曾经从没有声调的语言发展为有声调的语言,拉萨话里声调的产生和分化是以声母和韵尾的性质为条件的。据胡坦(1980:35页)的概括,其规律如〈表四〉(为排印和叙述方便,将原表的形式稍加改动)。

〈表四〉拉萨话声调系统和古藏语声母、韵尾的关系

韵尾 \ 声母		清	次浊		(全)浊
			带前缀	不带前缀	
		高调		低调	
舒	-ə(零韵尾)	第1调 54		第4调 12	
	-v(元音韵尾)	第2调 55		第5调 113	
	-r -l				
	-m -n -ŋ				
促	-b -d -g	第3调 52		第6调 132	
	-s -bs -gs				
	-ms -nd -ŋs				

上表的“声母”和“韵尾”是藏文所代表的古代藏语的声母和韵尾。后来随着浊声母的清化、前缀辅音的消失,就产生了高调 and 低调的区别。高低两调又按韵尾的种类而各分为三,结果形成了六个声调的系统。拉萨话里古代的-b,-bs 变为-p;-d,-g,-s,-gs 都变为喉塞音-ʔ;-ms 变为带紧喉的-m;-nd,-ns 都变为鼻化元音,末尾带着紧喉^①。因此,第3、第6两调各从第1、第2调和第4、第5调

^① 关于拉萨话第3、第6两调的-m 以及鼻化元音末尾带紧喉作用,参看瞿露堂(1981:6页)、胡坦等(1982:28页、29页)。

分化出来,其原因应该是韵尾的紧喉成分曾把音节末尾的音高拉下的缘故。

上面所提出汉语的去、入两声本即紧喉韵尾所引起的降调这种看法,与关于藏语第3、第6调从其他调值分化原因的说明是何等地相似!当然上古音不会和拉萨藏语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拉萨话里第3、第6两调都是短调,但我并不积极地主张上古的去声即*IMVE型音节也该是那么短的;拉萨话里第3、第6两调的音节没有以-i,-u等元音性韵尾收尾的,而上古的去声则应该是有这类韵尾的。

5.2 我认为上古紧喉韵尾(除内破裂辅音)的紧喉性很可能也是从复韵尾的第二因素变来的,可能还来自轻读的词尾性音节,但我没有能力在这方面再作些具体的拟测。Haudricourt(1954)、Pulleyblank(1962)拟测去声是从词尾*-s变来的。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去声的来源限于*-s。至于后来导致上声的音节里的紧喉元音,它的紧喉性可能是从复声母的第一因素变来的,也可能还来自轻读的词头性音节。

引用文献

- 董同龢 1954:《中国语音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台北。
- 胡 坦 1980:《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22—36页。
- 胡 坦 等 1982:胡坦、瞿霭堂、林联合 1982:《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语言研究》1,18—38页。
-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1—2;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 瞿霭堂 1981:《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创刊号,177—194页。

- 张日升 1968:《试论上古四声》,《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 113—170 页。
- 周祖谟 1966:《问学集》(上册), 中华书局, 北京。
- 高田时雄 1974:《上古濁塞音韻尾について》,《均社論叢》1-2, 1-8 頁。
- 金田一春彦 1951:《日本四声古義》, 寺川喜四男、金田一春彦、稻垣正幸編《国語アクセント論叢》, 法政大学出版局, 東京, 627—703 頁。
- 赖惟勤 1951:《漢音の声明とその声調》,《言語研究》17—18;《中國音韻學論集——賴惟勤著作集 I》, 汲古書院, 東京, 1989 年, 383—439 頁。
- 1953:《上古中国語の喉音韻尾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3;《中国音韻學論集——賴惟勤著作集 I》, 汲古書院, 東京, 1989 年, 139—154 頁。
- 1957:《上古中国語の韻母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東洋學報》40. 1;《中國音韻學論集——賴惟勤著作集 I》, 汲古書院, 東京, 1989 年, 155—172 頁。
- 平山久雄 1984:《江淮方言祖調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調值初案》,《语言研究》1984. 1, 185—199 頁。
- 1986:《上古漢語の聲調調值》,《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國學論集》, 汲古書院, 東京, 1—24 頁。
- 1989:《高誘の‘淮南子’‘呂氏春秋’注に見える‘急氣言’‘緩氣言’について》,《東方學》78, 41—54 頁; 曲翰章译《高誘注〈淮南子〉〈呂氏春秋〉的“急氣言”与“緩氣言”》:《古汉语研究》1991. 3, 39—44 頁。
- Haudricourt, A. G.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69—82 頁。
- Iwata R. et al. 1979: “Laryngeal Adjustments of Fukienese Stops——Initial Plosives and Final Aplosives——”, “Annual Bullet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ics” 13, 61—81 頁。
- 1981: “Laryngeal Adjustments for Syllable Final Stops in Cantonese”, “Annual Bullet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ogopedics and Phoniatics” 15, 45—54 頁。
- Karlgren, B. 1960: “Tones in Archaic Chinese”,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32, 113—142 页。

Pulleyblank, E.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9, 58—144 页, 206—265 页。

1991 年

“声调调值变化环流说”的 形成和应用过程

一 有关论文目录

1.1 本书所收的《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以下7篇(编号十至十六)均与“调值变化的环流”(简称“环流”)这一假设(简称“环流说”)有关,此外我也写过一系列同类的文章。现将它们按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于§1.2中。起头的数字表示发表时的年代,本书收录者于括号内标记其目录上的编号。中文论文略去其所载报刊及书籍的名称、起讫页数等,以免与书末附录《平山久雄中文著作目录》重复。1972年写的论文与环流说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为了引述的方便也列在一起。其他参考文献则列在§1.3里。

本文根据这些论文对环流说的形成过程以及至今应用的情况作一描述,并作一些补充说明,借此算是对上述7篇的一个(补注)。文中引述拙文时不记姓名,只记年代。

1.2 有关环流说的拙文

1972:《客家桃源方言声調調値の内的再構》,《中国の言語と文学》,鳥居久靖先生華甲記念会,天理,299-227頁。

- 1974:《中国語閩南閩北祖方言の声調調値》,東京大学文学部
研究報告《文学哲学論文集》,左起 191—248 頁。
- 1975(十):《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 1983:《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
- 1984a(十一):《江淮方言祖调值的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
案》。
- 1984b:《官話方言声調調値の系統分類——河北省方言を例
として》,《言語研究》86;日本言語学会,33—53 頁。
- 1986:《上古漢語の声調調値》,《伊藤漱平教授退官記念中国
学論集》,汲古書院,東京,1—24 頁。
- 1987:《试论苏州方言变调的成因》。
- 1991(十六):《汉语声调起源窥探》。
- 1996(十五):《再论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
- 1997a:《北部晋语声调调值的系谱分类》。
- 1997b:《阴去和阳去在“声调调值变化的环流”中演变的先后
关系——以河北方言为例》。
- 1998(十三):《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
变调》。
- 1999a:《漢語福州方言の声調体系と“変韻”》,《アジア・アフ
リカ文法研究》27,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
語文化研究所,1—24 頁。
- 1999b(十四):《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类型及其成
因》。
- 2000a:《两点心得——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

感》。

2000b(十二):《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

1.3 本文所引述的其他文献

陈淑静 1986:《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中国语文》2, 112—115 页。

陈章太、李如龙 1991:《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李如龙 1995:《福建双方言研究》,汉学出版社,香港。

李思敬 1995:《切韵音系上去二声全浊声母字和部分次浊声母字在河北宁河方言中的声调表现》,《中国语言学报》5, 184—197 页。

林 焘 1985:《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中国语文》2;《林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2001,81—92 页。

钱乃荣 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谢自立 1982:《苏州方言两字组的连读变调》,《方言》4,245—263 页。

游汝杰 2000:《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张树铮 1988:《寿光方言古调值内部构拟的尝试》,《语言学通讯》11。收于张树铮 1999,127—140 页。

1999:《方言历史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

张振兴 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赵元任 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北京。

Davison, D. S. 1994: "Tone Sandhi & the Dissimilation of

Phonation Types, Reflexes of the Beijing Mandarin Third Tone Sandhi Rule in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李壬癸、黄居仁、汤志真编辑《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二辑《历史语言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二),台北,517—553页。

Giet, P. F. 1946: “Phonetics of North China Dialects—A Study of their Diffusion”, “Monumenta Serica” XI, 233—267页。

Pulleyblank, E. G.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o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 173—203页。

《昌黎方言志》(新1版):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1984年。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语文出版社,北京,1996年。

《泉州市方言志》: 林连通主编,福建省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地方志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

《永春方言志》: 陈章太著,语文出版社,北京,1989年。

《中国语言地图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7年。

二 环流说的形成

2.1.1 “调值变化环流”是为声调调值历时演变的主要途径所假设的一种环形模式,具体内容请参看 1991(十六) § 1.2(本书 289—290 页)和 2000b(十二) § 1.2(本书 220—222 页)的介绍。这一看法最初以尚未成熟的形式见于 1974 中。1975(十)就是根据 1974 中构拟厦门话以及龙溪、晋江、揭阳四个闽南方言“古调值”的部分改写而成的。

1975(十)一文中构拟厦门方言古调值的基本观点如 1996(十五) § 1.1 所述的那样(本书 281—282 页),将调值的循环变化视为推链式的一套演变,其中以高平调变高降调为惟一的动力,其他各调则均为被推动而变,这一点现在看来是有些片面的。此外,1975(十) § 5(本书 182—186 页)将龙溪、晋江、揭阳三个方言的古调值一概视为与厦门古调值相同,结果导致在说明从该古调值系统演变到各方言的基本调值与替换调值时有一些牵强之处,如该文 § 5.3 中所述对晋江古调值的阴上*55 在“非末位”变为 35,阴去*53 变为 55 的解释(本书 185 页),现在看来不如把晋江古调值的阴上拟做*35,阴去拟做*55 来得更自然些。后来我撰写 1996(十五)的目的就在于修订这些错误。

2.1.2 “古调值”在 1975(十)以及以后的拙文中带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是在基本调值(单字调)和替换调值(变调调值)的基础上用内部构拟法所拟得的调值,它并不泛指古代的声调调值,也与方言间比较所拟得的“祖调值”有别,请参看该文 § 1.2(本书

174页)。“古调值”这个名称最早用在1972中。在那里主要是基于从后字的音高曾对前字发挥过同化作用的观点来拟测古调值的,其结论见于1975(十)§6.1(本书187页)。

顺便要提一下,“变调”一词一般有三个不同的含义,即(1)单字调入字组时读做另一种调值的替换现象;(2)某一调类作为这一种替换现象的结果所采用的调值;(3)在基本与替换两种调值系统之中,从原来的单一调值系统(即我们所谓“古调值”)以来经过较多演变的一方。(1)(2)属于共时的概念,(3)则是历时的概念。我担心“变调”的多义性会影响思路,使我们陷入混乱,所以在1975(十)中把“变调”只用作(1)义(也说“声调替换”),(2)义则用“替换调值”来代替(后来的文章中多用“变调调值”)。对(3)义我没有一定的用语。

2.1.3 这里我还要注明以下三点。这些虽然在1975(十)中没有写明,却是我一向所持的看法。

第一,从一般方言学的观点来说,调值的循环变化并不是只发生在“末位音节”(参看本书175页)上的,在“非末位音节”上自然也会发生,因为音节末尾或后半发音运动的渐弱趋向或多或少都会发生在所有的音节中。所以这么一种循环变化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方言中所有带声调的音节上,不论音节在字组或句子里的什么位置。

第二,基本调值与古调值相比变化较大,替换调值则变化较小,这一看法不能视为调值替换现象的一般规律。产生调值替换的原因应该是多样的,即使在同一种语音条件下发生的替换,其条件所发挥的声学作用也可能因方言差别而异。

第三,在我拟测的厦门古调值系统中,同名相对的阴调和阳调保持着它们分化当初应具备的音高关系,即阴调的起音比同名的阳调相对居高。但这一点并非拟测的主要依据,而是根据声调调值所发生的推链式变化及方言间的比较所推演出的结论。只要材料所需,也可以设想出与此相反的调值,如1998(十三)§1.3里拟测的“德州古调值”(本书251页)中阳平*55高于阴平*21便是其例。

2.2.1 1983因篇幅太大,没有收录在本书中。其内容介绍见于1984a(十一)§1.1(本书191—195页)。主旨是:“山东西南方言”的古调值比较忠实地保留在轻声前变调中。

同样是轻声音节,它对前字所发挥的作用在厦门、山东西南两处恰好是相反的:轻声在厦门话里促进了前字末尾音强的弱化(所以轻声前的音节在厦门要算“末位”),在山东西南话里则反而抑制了它,结果使前字保持古调值不变。这两种彼此相反的假设可能使人难以置信,但我认为这种分歧当与轻声字与前字结合的松紧程度有关。与前字结合得较松,那么前字和轻声字中间音强衰弱的程度应该较大;结合得较紧,中间音强衰弱的程度应该较小。1998(十三)§4.1里介绍的临清方言“轻声”与“零音节”的关系(本书260页)便可以印证这一点。

2.2.2 对声调调值的循环变化,1983中的看法与1975(十)中有些不同。参看1984a(十一)§1.1的引文中有关阴平和上声的部分(本书194页)。这里我认为,阴平*11变到13和阳平*55变到51均出于同样的内在(主动)原因;上声*24变到44则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原因。

1984a(十一) § 1.1 的引文中“我想从 55 到 51 的变化可以拿世界各种语言的历史上最常见的[kɪ]变[tɕi](或[tʃi])的现象来比较。……高平调变降的现象还可以说是和音节末的辅音一般容易弱化甚至失落的趋势同出一根的”这一段话(本书 193 页),也许可以作为理解环流说的一个关键。

2.3 在 1984a(十一) § 1.2 后半部分里(本书 197 页)指出,高降调由于开头受末尾低音的同化作用而有可能主动地变为低降调(再进一步说:最后要变为低平调)。高升调变为高平调的过程中也会有末尾的高音逐步同化开头半高音的因素。同时,调值的循环变化中除了推链和主动的因素之外,还可能有拉链的因素在内。可以说,环流说的基本构想已经在这里形成了。

2.4 到 1984b 我明确地提出了环流说。该文 § 1 说明了调值发生变化的各种可能性,然后结合那些可能性描绘了一个圆环,那就是环流,参看 1991(十六) § 1.2 和 2000b(十二) § 1.2 的相关部分(本书 220—221 页、289—290 页)。将环流描绘为从高平调出发再回高平调的圆环,这当然不过是出于绘图上的方便而已。后来在 2000b(十二) § 1.6(2)里(本书 224 页)提到,高升调也有不经过高平调而经过升降调直接变为降调的可能性。这和低降调可以经过降升调变为升调是同一道理。

三 “官话方言祖调值初案”的构拟和“声调型”判定

3.1.1 1984a(十一)算是把环流说应用到现代方言的第一次尝试。该文把江淮官话按其声调调值的特点分成 8 群,其中第一

群“徐州式方言”相当于1983中的“天津式方言”。徐州式方言大多属于中原官话,只有少数属于江淮官话,不过两种官话在这一群里除了有无入声之外,声调调值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分布地域也是连续的,因此把它们看做一个方言群。当然这一群的古调值系统应该有人声,只不过后来在多数方言中消失了。

3.1.2 该文中对祖调值构拟(无论是构拟8群各自的祖调值,还是构拟8群所共同的“江淮方言祖调值”以及“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基本要求是:能按环流的观点说明从假定的调值系统到现代各方言(或下一层的祖方言)调值系统的演变过程。对阴平、阳平和去声祖调值(入声的祖调值一概阙疑),我们都可以按这一要求拟测出来。只有上声不一定能满足这一要求,所以在拟测芜湖式、南京式、阜宁式各方言的上声祖调值时我们只好打个问号阙疑(本书201、203、204页)。直到§2.5,我们才把上声的大祖调值拟为⁵⁵435,用“⁵⁵”号表示整个音节(特别是其中心部分)带有紧喉作用(本书206页)。这样就可以说明,紧喉作用通过拘束声带的迅速颤动,压低了调值,使上声出现一种逆溯环流的特殊变化。

我们给“江淮方言祖调值”(以及“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的上声拟测一个紧喉成分,并非为了说明上声调值演变的复杂性而随意假定的,其实历史上也有一些相应的根据,请参看1991(十六)§4.2(本书296—297页)以及2000b(十二)§1.9(本书227—228页)所述。

3.1.3 1984a(十一)§3.1的结尾(本书212页)认为,由于北方方言中相当多的方言的调值系统可以从“江淮祖调值”演绎出来,因此不妨权且把它视做多数北方方言所共同的祖调值系统,称

之为“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在我后来写的文章中由于“官话方言”的称呼已经复活了，并嫌每加“初案”两字烦琐，因此经常只写做“官话祖调值”，但这只是一种省略，我自己并没有真正取消“初案”的意思。

3.1.4 1984a(十一) § 3.2 对 § 2.5 里拟测的“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作了两点修改(本书 212—214 页)。一是把去声分为阴去 *35、阳去 *24，一是把入声分为阴入 *x₁、阳入 *x₂。但在我以后的文章中为叙述方便常把阴去和阳去并为一个去声 *35 看待。

3.2.1 1984b § 2 以下主要说明“声调型”的设想以及用它来对官话方言的声调调值进行一种系谱分类的方法。这是环流说的一个应用领域。其内容提要(包括一点修改)见于 2000b(十二) § 1.2 以下(本书 220—225 页)。那里规定的高平调范围(参看本书 224 页)包括 43、34 在内，似乎定得过广，但既然高平调变到 53 或 42 才被认为是发生了降调化，那么 43 就不能算高降调，于是为了对称的考虑，也应该把 34 视为高平调。

3.2.2 1984b § 4 以《河北方言概况》〈河北省各县、市声调调类、调值表〉为材料对河北省方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进行了一次判定声调型的尝试，把判定的结果记在地图上。1997a 对北部晋语(即《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张呼、大包、五台三片)作了同样的尝试。在这两篇中使用的声调型代号与后来的 2000b(十二)中不同，例如“1 次 5·1 型”(如北京)用①，“2 次 5·2·3 型”(如德州、济南)用㊦来表示。这么一种代号系统有个长处：只要掌握了图形和“系”的对应关系(如“5·1 系”用○，“5·2 系”用□)，再了解图形里的数字表示“次数”，那么声调型在地图上的具体分布情况就

会一目了然的。不过问题是“次数”越大，“系”的分歧也就越多，而便于印刷的图形是很有限的。鉴于这种情况，2000b(十二)便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如该文 § 1.6〈表一〉(本书 225 页)所示。这种代号系统不过是把“调类行列”中代表调类的数码(阴平 1, 阳平 2, 上声 3, 去声 5)中间的“·”去掉，表示合并调类的“-”以底线来代替，并把“调类行列”中居头位的数码改换成罗马数字，以便让行列的起头醒目一点。如此方式也许称不上什么代号，但我认为这样才能应付声调型多样分化的复杂情况。

3.2.3 2000b(十二) § 2.2(本书 232—241 页)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所收的 92 个官话方言(包括晋语和通泰方言等广义的官话)为对象，绘制了声调型分布地图和系谱表(即〈地图二〉和〈表四〉)。其中贵州黎平的声调型难以判定，只得打个问号(本书 238 页)。后来我读了游汝杰(2000:65 页)得知，黎平话是明初江西军屯造成的赣语方言岛，于是问题就得以冰释了。湖南吉首的声调型表面看来是 3 次 5·2·3·1 型，而它的阳平仍保持浊音。我们难以设想，带浊音声母的音节曾经经过了高平调的状态，因此需要特别加以解释。我虽然对此提出了一个看法，但为慎重起见，亦付之阙疑(本书 238—239 页)。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

3.2.4 2000b(十二)认为西安和宝鸡是“V2135”即“4 次 5·2·1·3·5 型”，与 1984a(十一) § 3.1 中的观点不相一致。那时我把西安等多数关中方言视为与江苏盐城同属一个类型(即“1 次 3·0 型”)(本书 211 页)。至于我改变看法的原因，请参看 2000b(十二) § 2.2 中对西安、宝鸡等方言的一段记述(本书 236—237

页)。

胶东半岛东部一带的方言声调调值的变异情况相当复杂,对这些方言的声调型我目前还感到难以确定。2000b(十二)把烟台判定为“ $\underline{V}2$ ”即“0次5-2型”,只算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2.5 附带要说明一下:2000b(十二)§1.2(本书221页)认为,环流说的前提是声调调值从“官话祖调值”阶段开始演变的时候,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这好像与1984a(十一)§3.2(本书212页)所述的“在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即“官话祖调值”)的时代,全浊声母一定还没有并入清声母”的拟测互相矛盾。其实也并不然,因为从“官话祖调值”的成立到它在方言中开始发生演变,中间可以有一定的时间上的距离。不过,上述的前提本身也可以有商讨的余地。即便全浊声母尚未清化,清音音节的声调(即阴调)也会顺着环流开始变化;而且,全浊声母的清化不一定会在四声之内同时发生,例如会有仄声先于平声而发生清化的阶段,就像我们现在在吉首等部分湖南方言(本书238—239页)里所能看到的那样。

四 环流说对官话方言声调调值史的应用

4.1.1 1998(十三)可以说是把1983的分析对象扩大到了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域。里面虽没有提到环流说,但实际上它是把环流说应用到山东方言轻声前变调的一个尝试。§2.2构拟的“坊子古调值”(本书254页)是在该文中拟测到的最古老的调值阶段。§3.3(表八)(本书258页)表示,山东境内几种类型的代表方言

中一般音节(即轻声前以外的音节)与轻声前音节从“坊子古调值”阶段以后分别经过了几次循环变化。如果用声调型改写〈表八〉的话,便如下表。

地点	荣成	博山	枣庄
一般音节	0次5型	1次5·2-3型	1次5·2型
轻声前音节	0次5型	0次5型	1次5·2型
地点	坊子	德州	X
一般音节	2次5·2·3型	2次5·2·3型	2次5·2·3型
轻声前音节	0次5型	1次5·2型	2次5·2·3型

目前我认为荣成的声调型宁可存疑,因为如上所说,胶东半岛东部的声调调值情况相当复杂,一时难下结论。

该文中我采取从高平调变为高降调能引起一套循环性调值演变的角度来说明轻声前的变调现象的叙述方法。这当然不过是为了图简便。在这一循环演变中其实也会有“主动”和拉链的因素在起作用。

4.1.2 1998(十三)发表后我读到了张树铮(1999),发现里面有张树铮(1988)一文,其中的观点、结论均与我在1998(十三)的论述有不少相类之处。张文(132-135页)认为寿光方言的轻声前替换调值保留着比单字调值更古老的性质,因而选择轻声前的替换调值作为寿光方言的古调值,即:阴平*21,阳平*34,上声*213,去声*55,清入*213。这与我在1998(十三)里构拟的坊子古调值基本相同,只是坊子古调值在1998(十三)里的构拟中没有拟出清入。张文〈表八〉(136页)中所拟的从古调值到今调值的演变过程,即阴平*21→*212→213,阳平*34→*44→53,上声*213→*22→*33→55,去声*55→*43→*32→21,除了上声的演变以外

也都基本符合我 1998(十三)里的拟测(参看本书 254 页〈表四〉)。在 1998(十三)中忽略了张树铮先生早就持有的同样看法,我对此深感遗憾。

4.2 2000a § 1(388—391 页)里介绍了孟子敏先生在该讨论会上的报告《平邑话的功能变调》,并对之加以分析。这可算做对 1998(十三)的一个补证。其概要如下:

平邑方言里处于疑问句、感叹句最末的一个字,例如“明儿星期一?”、“多胖的小猪!”里的“一”、“猪”,这些字的声调采取与单字调不同而与轻声前变调相同的一种调值,这就是“功能变调”。平邑方言的这两种调值如下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单字调	214	53	44	412	3
轻声前变调、功能变调	412	55	214	53	

疑问句包括特指问句如“这些土谁拾?”,这里的“拾”(阳平)由 53 变调为 55。

平邑方言的单字调值、轻声前变调调值分别与德州方言基本相同。它的古调值基本上也可拟为与轻声前变调调值相同。

功能变调的成因应该是:疑问句、感叹句末尾有什么因素控制了古调值系统中阳平*55 变为降调。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因素是句末的音高和音强特征。疑问句往往把句末提高,或让句末的音高维持不降,这自然对句末音节维持高平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感叹句的句末一般是降下的,但(由我对普通话的感觉来类推)音高差别的幅度在感叹句末尾被拉宽,虽然最低音压得很低,但最高音似乎不怎么降下,或许反而会升高。特指问句的情况亦似与感叹

句相同。至于音强,疑问句、感叹句的句末读得似乎比陈述句更强些,这自然也会有利于维持高音。

4.3.1 1999b(十四)讨论的是两个上声字相连时前字替换为阳平(或阴平或去声或不属于任何调类的独特调值)的现象,即“上上变调”。此文试图从低音之间发生逆异化的角度对之加以解释:即发低音时往往需要加以紧喉,这种紧喉作用可以成为异化的对象。这一主张本身与环流说无关,但对于具有“上上变调”的方言,如何解释上声调值不一定包含低音成分这一问题上,环流说就有它的用处。在这一意义上1999b(十四)也可算是环流说的一个应用实例。

4.3.2 1999b(十四)发表后我知道 Davison(1994)以及 Pulleyblank(1978)等早已把“上上变调”看做是紧喉作用乃至由此而来的一种嘎吱声(creaky voice)之间所发生的异化作用。我在该文中没有提到他们的看法,这也是很遗憾的。我和 Davison 见解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我认为上声的紧喉作用从共时的观点来说是发低音的一种手段(不管紧喉的历时来源如何),而发生异化时(拿B型“上上变调”为例)阳平调值需要比上声多少高出一点;Davison 则认为发生异化的只是音节的构音样式(creaky or breathy),不管其调型如何。至于上声紧喉因素的历时来源,我认为(该文中虽然没有明说)在于官话祖调值系统中的上声调值“⁴³⁵调值(“⁴³⁵”代表整个调值带有紧喉),这个紧喉成分先把上声调值逐渐压低,产生了“上上变调”,尔后它在有些官话方言中渐趋弱化、消失,于是上声又开始顺着“环流”往高里变,变为高升调、高平调,或进而变成了高降调;他们二位则认为紧喉的来源就在于上古汉语上

声的喉塞韵尾。

4.3.3 1999b(十四) § 5.1 谈到天津方言两个去声 53 相连时前一个去声变调为阴平 21 的现象,并把它解释为两个高尖顶峰之间的异化(本书 278 页)。据林焘(1985),相当一部分北京人的口音中有一种趋向,两个去声 51 相连时前一个去声变调为阳平 35。这当然也不见得是低音间的异化所致。林文用仪器测量出,两个去声相连而不变调时前字常出现中高平调(听觉上仍是降调),我认为这一种中平调就是从 51 到 35 的过渡阶段:后字开头的高尖顶峰使前字的开头产生异化,同时使前字的末尾产生同化,于是前字 51 可变为平调 33,尔后再可变为 35。

4.4 1997b 是根据《昌黎方言志》、李思敬(1995)、陈淑静(1986)、Giet (1946)等文献里介绍的部分北方官话区别阴去和阳去二声的情形,把阴去、阳去在环流中移动的先后关系分为“阴去、阳去式”(阴去在先,阳去在后。或称“5·6 式”,阳去数码为 6)与“阳去、阴去式”(阳去在先,阴去在后。或称“6·5 式”)。例如昌黎城关方言的声调调值是:

阴平 32, 阳平甲 13, 阳平乙 11, 上声 213, 阴去 55, 阳去 24

昌黎城关方言的声调型可判定为“0 次 5 型”,阴去最先变到了高平调,因此要算是“阴去、阳去式”的一个例子。阴去在环流中走在阳去的前面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在官话祖调值中阴去被拟为高于阳去的升调,那么它先变到高平调是很自然的。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保定方言,它的声调调值如下:

阴平 45, 阳平 22, 上声 214, 去声(阴去)51, 阳去 21(阳去只在轻声前出现)

那么保定方言单字调的声调型是“1次5·1型”，但在轻声前则是“2次6·5·1型”，要算是“阳去、阴去式”，阳去在环流中走在阴去的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在1997b § 2.2(3页)提到：

阴去与阳去原来的高低关系，除了我们曾经所拟过的以外，也可设想其他情形，如阴去*324，阳去*24，即阴去开头附有一点降的成分，阳去则因开头音高较低而失去了这一成分。……如果从这种情况出发，那么阴去、阳去在“祖调值”以后的演变可能是：

阴去	*324	*324>	*35>	*55	……
阳去	*24>	*35>	*55>	*53	……

在此演变的过程中，阳去就把阴去赶过去，赶到阴去的前面。可以说：我们把“官话祖调值”中的阴去拟测为*35，是包含一定的变异幅度的，包括*324等在内。

1997b § 3.2 里讨论了闽南方言里阴去和阳去在环流中的先后关系，并将1975所拟测的厦门古调值认定为“2次6·5·3型”，即属“阳去、阴去式”。

五 环流说在苏州方言和闽南方言声调调值史上的应用

5.1 1987是把环流说应用到北部吴语的一个尝试。该文根据谢自立(1982)的描写，假定苏州方言也曾经过类似官话祖调值的调值阶段，名之为“苏州古调值”，并试图由此推导现代的基本调值与广用式变调调值。苏州古调值比官话祖调值多一个阳上

*'324, 因为旧阳上字在广用式变调 B 式、C 式中的表现显得独特些。从苏州古调值到基本调值的演变(入声从略)可分为 5 个阶段来拟测(原文 46 页〈表六〉):

	I		II		III		IV	V
阴平	*42	>	*313	>	*33	>	*44	44
阴上	**435		**435	>	*55	>	*52	52
阴去	*35	>	*55	>	*51	>	*412	412
阳平	*11		*11	>	*112	>	*223	223
阳上	**324		**324	>	*33	>	*231	231
阳去	*24	>	*33	>	*31	>	*312	>231(=阳上)

由于苏州方言保存全浊声母, 因此同名相对的阴调和阳调应算成属于一个调位的不同调值(allotones), 这一点和官话方言不同。因此, 阳上和阳去便分别依照着阴上和阴去的演变轨迹而变化过来了, 只是阳调所经过的音域比阴调偏低。阳上、阳去的基本调值 231 中微升的开头当是受浊音声母的影响而产生的。

从“苏州古调值”到广用式替换调值的演变(入声从略)可分四个阶段来拟测(原文 46 页〈表七〉):

	I		II		III		IV
阴平	*42	>	*313	>	*33	>	44
阴上	**435	>	*55	>	*52	>	41
阴去	*35		*35	>	*55	>	44(=阴平)
阳平	*11		*11	>	*22	>	22
阳上	**324	>	*33	>	*231	>	22(=阳平)
阳去	*24		*24	>	*33	>	22(=阳平)

以阴上、阴去和阳平为前字的广用式变调分为 A、B、C 三种不同的类, 上面所记的替换调值是其中占优势的 A 类前字调值。

吴语的阳调因受浊音声母“浊流”的干扰,容易发生调类的合并。

如果给苏州方言判定声调型(阳调除外)的话,基本调值是“2次5·3·1型”,广用式替换调值则是“1次3·5-1型”,不但“次数”不同,而且“系”也有别,即前者属“5·3系”,后者则属“3·5”系。在扬州方言(参看1984a §2.5,本书207—208页)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扬州的基本调值是“1次3·5型”,替换调值则是“1次5·3型”。

5.2 1996(十五)是站在环流说的观点上对1975(十) §5的内容加以修订的。原文第二节介绍环流说,其内容与1991(十六) §1.2、2000b(十二) §1.2相重复,因此本书所收将之删略(原文第三·第四节提前为第二·第三节)。

1975(十) §5里假定龙溪、晋江、揭阳三个方言的古调值均与厦门古调值基本相同,这等于说:厦门古调值也就算厦门话和这三个方言所共同的祖调值。而1996(十五)里放弃了这一看法,把厦门、龙溪、晋江三个方言的祖调值重新加以构拟(如本书284页所记),并补充说“我觉得这里一些调类(如阴平、阳平、阳上)的调值还有研究余地”云云。我曾在远藤光晓君主持的“汉语史研究会”上作过一次报告介绍了1996(十五)的内容,并对这三个调类的调值问题提出了一种看法。现将当时的讲稿介绍如下:

关于阴平,问题是怎样说明龙溪的基本调值为升调24。这从上面构拟的阴平祖调值*33是不好推导出来的。其他闽南方言也有阴平基本调值为升调的方言,如漳平永福、菁城均为24(张振兴1992:21页、203页)、浦城下府闽南方言岛(陈章太、李如龙1991:411页)为45。为解释这些升调,我们可以

把阴平祖调值改拟为低凹调*212。由此可以说明,它在有些方言里往平调发展,如*212>*22>33(>44>55),在另一些方言里则往升调发展,如*212>*213>24(>45)。顺昌埔上闽南方言岛的阴平仍保存212(陈章太、李如龙1991:423页)。

关于阳平,晋江的替换调值11难以从*13推导出来。其他地方也有阳平为低平调的方言,如漳平永福、菁城的基本调值各为11,22,永春(《永春方言志》)的替换调值为22等。为解释这些方言的低平调,最好把阳平的祖调值改拟为*11。这*11在“末位音节”里一般产生了升尾,往升调发展,只有少数地点保持了低平。在“非末位音节”里,*11在多数地点与阴平合流,变成22、33等。晋江则仍保持11不变,并接受了阳上、阳去与之合流了。

上面改拟的阳平祖调值*11和阳上祖调值互相冲突。我认为在目前的研究阶段,宁可将阳上的祖调值存疑不论。

如此看来,厦门、龙溪、晋江三个方言所共同的祖调值可改拟如下: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212	*11	*35	?	*55	*31	*5	*1

这一祖调值系统和官话祖调值相当接近;它能很容易按照环流的观点从官话祖调值推导出来。福砂埕镇闽南方言岛的阴去替换调值35(与阴上同调。李如龙1995:121页),尤溪中仙话基本调值中的阴去45[参看1996(十五)§3.1〈尤溪县内七种方言声调对照表〉,本书285页]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闽南话也曾经历过去声为升调的阶段。

5.3 1999a 分析了福州方言的“变韵”，并把“变韵”区分为语音性和音位性的两种。例如福州韵母 a 在阴去 212、阳去 242、阴入 23 下的变韵 α 是语音性的，因为据我观察这三个调位的调值都带有紧喉作用，紧喉时喉头明显被拉低。据此可以解释，音位 /a/ 在紧喉调位的影响下把舌位往后、往低里挪移，以 [a] 这个语音形式来实现。与此相反，韵母 ing 在紧喉调位之下的变韵 eing 要算是音位性的，因为韵母 eing 也出现在阴平 44、阳平 53、上声 32 这些“非紧喉”调位之下（eing 的变韵则是 aing）。我们据此把变韵 eing 看做是已发展为与 ing 不同的音位组合。

至于紧喉调位产生的原因，此文根据环流说来作拟测：福州方言曾按阴去、阳去、上声、阳平的顺序发生过高平调的降调化；调值演变上的一般情况是在降调相继发生时先变成降调的顺着环流再往低平调、低凹调、低升调等挪移，给后来者让出位子；但在福州方言里，最先变为降调的阴去却一直保持着低降的特色（它末尾的微升部分可有可无，是羡余特征），结果在同一个调值系统中就需要区别四种降调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阴去和阳去便带有较强的紧喉音色，以便与后来变成降调的上声、阳平相区别。阴去开头的升调部分应当是紧喉成分把音高拉低的结果。阴入本来与阴去同属一个调位，随着阴去往低里演变，也同样带起了紧喉，不过它现在已显出低升的性质了。

变韵在闽东方言中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有些方言在调值较高的调位下也有变韵，我认为那该是声调调值演变的结果。如果变韵一旦发展为音位性的替换规则的话，那么不管声调调值后来怎么变，也会继续存在的，正如官话里的“上上变调”因低

音之间的异化而产生以后,即便后来上声变成了高调也仍旧存在一样。

六 环流说对上古汉语声调调值构拟的应用

6.1 1986 是环流说对上古汉语的应用。该文从官话祖调值出发,上溯环流,同时也考虑《诗经》中异调通押的频率,拟测出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的调值来。提要见于 1991(十六) § 2.1 (本书 290—292 页)。

6.2 1991(十六)改变了上古已有四声的上述看法,认为上古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各有紧喉与非紧喉音位的对立,而中古的上声来自主要元音为紧喉的音节,去声来自韵尾为紧喉的音节,平声则来自主要元音、韵尾均为非紧喉的音节。不过这是从音位论的角度来说的,随着主要元音和韵尾带紧喉特征与否,语音上当已出现音调的不同,如在 1986 中所拟。

七 余论

7.1 我对环流说的自我评价如 1991(十六) § 1.2 “上文所叙‘环流’,毕竟是个假设……”那一段(本书 289—290 页)里所述。关于声调调值演变的理论应该也能适用于汉语以外的各种声调语言,环流说自然不能例外,只是为我个人的能力所限,目前难以把检验的对象扩展到汉语的范围之外。不过,无论从声调调值的方言性变异来说,还是从反映声调调值的历史文献来说,汉语在世界

的声调语言中最为丰富,远非其他语言所能比。因此我相信,这样的做法也会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7.2 2000b(十二) § 1.10(本书 228 页)举出了在环流的框架之外所能设想到的一些调值变化。除此以外,高平调如 55 会把开头放低一点变为 45,35 等,以便节省发开头高音的力气,但由于在多数场合下,当时会已出现升调 24,35 等与之对立,所以这种变化实际上应该比较少见的。与此相同,低降调 31 变高降调 42,53,虽然也是可能的变化,但也应该比较少见,因为当时会已出现高降调与之对立。

低降调如 31 顺着环流可变 312(再变 213 等),但 312 也可以删掉升尾而变回 31,这也是节省发音负荷的一个形态。

7.3.1 有位日本同行曾提醒我:吴江盛泽的阴平,据赵元任(1928)的描写是降调,可记为 42,据钱乃荣(1992)则是 44(老派),可见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盛泽方言发生了由高降调到高平调的变化,这不是对环流说的一个反证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因为盛泽的发音人在赵元任(1928)(1927 年调查)里有两名,都是店员,一名 16 岁,另一名未写年龄,可能是他的伙伴;在钱乃荣(1992)(1984—1985 年调查)里有四名似属老派,年龄最大的 74 岁,最小的 67 岁(据赵著 8 页、钱著 1107—1108 页所载);因此论出生年代,两书的发音人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我认为两书之间阴平调值的分歧反映的应该是盛泽内部口音的不同。

7.3.2 不过,赵著中盛泽的情况在另一点上引起了我的兴趣。盛泽的全阴上据赵著的描写可记为 51,和钱著没有两样。我认为,赵著的阴平 42 当是从 *44 变来的。高平调变为高降调时,一

般情况是它推动原有的高降调变为低降调。赵著里的盛泽与此不同,阴平*44变成了位于全阴上51下面的降调42,全阴上*51却没起变化,于是阴平在环流中把全阴上赶过去了。这一种演变方式虽然没有包含在环流的图式中,但从环流的观点来看是可以理解的。

在2000b(十二)§3.9(本书246页)所提出的“各地域除了当地优势的声调系以外,偶尔也有不同系的声调型,但其次数与优势方言相同或相近”的问题,可能也从这个观点得以说明。

7.3.3 我们自然可以想到:在一个方言里老派和新派之间调值的分歧可以作为检验环流说的很好的材料。其实,这不一定反映一个方言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纯粹变化,因为新老两派的不同有时会反映出该方言中本来就存在的小方言上的分歧,新派所继承的小方言可能倒比老派的小方言显得保守。此外,年轻一代的口音应该易受邻近优势方言或普通话的横向影响。

7.4 据我目前的把握,我们所拟测的官话祖调值在与环流说相配合之下不仅对官话诸方言相当适用,对闽语(特别是闽南语)的适用面似乎也不小。由于官话和闽语是中国大方言中相互差别最大的两个方言群,因此不妨将它姑且视为代表汉语祖语的声调调值。对其他大方言,如对吴语(除苏州方言)、粤语、客语、湘语、赣语等,则没有尝试过应用官话祖调值和环流说来说明声调调值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上述的想法也许过于乐观,甚至未免有些冒失。要给所有汉语方言的声调调值从历时发展的角度作一个统一的解释,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如果我的尚未完结的一点儿“挑战”对将来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材料的话,那我会十分满意的。

附录 平山久雄中文著作目录

本书所收者于篇名前记其书前目录上的编号。

论文

1975 年

- 十 《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3. 1, 3—15 页;《音韵学研究通讯》1981. 1, 19—28 页。

1983 年

- 《山东西南方言的变调及其成因》:《アジア・アフリカ語の計數研究》21,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59—81 頁。

1984 年

- 十一 《江淮方言祖调值的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值初案》:《语言研究》1984. 1, 185—199 页。

1987 年

- 七 《日僧安然〈悉曇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 中文分册》,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20 页。

《论“我”字例外音变的原因》:《中国语文》1987. 6, 409—414 页。

《试论苏州方言变调的成因》:“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edited by Agatha C. Bramkamp, Yi-chin Fu, Arnold Sprenger, Peter Venne,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台北, 35—56 页。

1988 年

《〈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音韵史背景》(王吉尧译):《音韵学研究通讯》12, 36—47 页。

1990 年

《〈切韵〉序和陆爽》(邵迎建译):《中国语文》1990. 1, 54—58 页。

一 《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 3, 1—11 页。

八 《中古汉语的清入声在北京话里的对应规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5, 72—79 页。

1991 年

三 《中古唇音重组在〈中原音韵〉齐微韵里的反映》:《〈中原音韵〉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34 页。

十六 《汉语声调起源窥探》:《语言研究》1991. 1, 145—151 页。

《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的“急气言”与“缓气言”》(曲翰章译):《古汉语研究》1991. 3, 39—44 页。

《韵镜二事》:《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188—197 页。

1992 年

《从历时观点论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中国语文》1992. 4, 244—252 页。

1994 年

- 五 《用声母腭化因素*j 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Current Trend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Osaka, 132—143 页。

1995 年

- 九 《北京文言音基础方言里入声的情况》:《语言研究》1995. 1, 107—113 页。

《中古汉语鱼韵的音值——兼论人称代词“你”的来源》:《中国语文》1995. 5, 336—34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 45 周年纪念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北京, 1997 年, 39—49 页;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00 年, 281—297 页。

- 六 《昆明为什么不读 Gunming?》:《开篇》13, 好文出版, 东京, 39—43 页。

1996 年

《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失落字项复原尝试》:《语言研究》1996 增刊, 315—324 页。

- 十五 《再论厦门话古调值的内部构拟》:詹伯慧、李如龙、张双庆编《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汕头大学出版社, 29—37 页。

1997 年

《说“欲”——论饮义“喝”的语源》:《训诂论丛》3(第一届国际暨第三届全国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高雄, 161—178 页。

《北部晋语声调调值的系谱分类》: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内山书店,东京,211—225页。

《阴去和阳去在“声调调值变化的环流”中演变的先后关系——以河北方言为例》:《开篇》16,好文出版,东京,1—9页。

二 《重组问题在日本》:《声韵论丛》6,5—35页。

1998年

四 《隋唐音系里的唇化舌根音韵尾和硬腭音韵尾》:《语言学论丛》20,117—138页。

十三 《从声调调值演变史的观点论山东方言的轻声前变调》:《方言》1998.1,7—13页。

《普通话“铅”字读音的来源》:《李新魁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北京,196—201页。

1999年

《〈宾退录〉射字诗的音韵分析》(与将邑剑平合著):《中国语文》1999.4,295—303页。

十四 《官话和晋语方言中“上上变调”的类型及其成因》: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17—233页。

2000年

《两点心得——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感》:钱曾怡、李行杰主编《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388—393页。

《大矢透和他的〈周代古音考〉》: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377—388页。

《“大”字二音的历时消长及其地理分布》: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编《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330—333页。

《北京话一种儿化变调的成因》:《中国语文》2000.5,410—414页。

十二 《声调调值系统在官话方言中演变的不同类型及其分布》:丁邦新、余霭芹编《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李方桂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筹备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台北、Seattle,141—166页。

2001年

《“轻读音变”中介音的脱落现象》:《声韵论丛》11,17—24页。

2002年

《安然〈悉昙藏〉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调值问题》:《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6—22页。

《从语言年代学看闽语的地位》: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3—10页。

2004年

《试论吃(喫)的来源(缩略本)》,《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30—32页。

其他

1987年

《缅甸桥本万太郎》(李秋忠译):《国外语言学》1987.4,167—168

页。

1997 年

《序二》：邓景滨主编《汉语方言论文集》，现代教育研究社，香港，2—3 页。

1998 年

《序》：《语苑撷英》编辑组编《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IV—VI 页。

1999 年

《回忆詹伯慧先生在东京的生活片段》：张晓山主编《立说传薪风雨人——庆祝詹伯慧教授从教 45 周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113—115 页。

2000 年

《祝北京大学继续发挥汉学研究的核心作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2—13 页。

后 记

本书所收的十七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系新近撰写以外，其他都是选自近三十年来我用中文所发表的论文。这些可以大致代表我对汉语音韵史的兴趣所在。

按目录上的编号，从“一”至“六”算是“第一部”，主要讨论中古汉语声母、韵母上的一些问题。虽然“三”、“六”的主题是近代音和现代音，“五”的主题则是上古音，但其内容均与中古音密切相关。

编号“七”至“十七”算是“第二部”，讨论的都是汉语声调史上的问题。其中“七”至“九”是有关声调调类史的，“十”以下则是有关声调调值史的。最后的“十七”是为说明我对声调调值历时演变的基本观点而重新加写的。

选文时除了考虑较有代表性的以外，也考虑了“易接近度”accessibility，如“五”、“六”原载于日本国内的刊物上，难以和国外学者见面。“六”也许还可以起些“幕间小戏”的作用。

所收的每篇论文都作了一些修订，如改正错字，更换或补充若干词句，并在一些体例上加以调整，但除此以外尽可能保存了原来的面貌。在每篇后面记上了发表时的年代，以配合书末的附录〈平山久雄中文著作目录〉。修订时认为应该增补的注解，则作为“补注”加在篇末。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在唐作藩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唐先生还接受了我的恳请,在百忙中特意撰写了序文,为此书增添了光彩,对此我是由衷感激的。以往也有几位先生包括商务印书馆已故的李思敬先生曾劝我出版论文集,我却一直犹豫不定,以为我的论文都是习作性质的,恐怕没有资格订成一本书。这次我能冒昧下定了决心,其中也有要报答几位先生深情厚谊的想法。在兹让我对李思敬先生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我每次用中文写文章都请一位中国先生修改中文,迄今烦扰了不少位先生和女士,其中烦陈力卫先生时尤多。虽然篇中不一定举名道谢,但我对他们是深为感念的。只是由于我的底稿写得太差,虽经他们精心修改,文章中也还会有不少使读者感到生涩的地方。对此我要向读者表示歉意。

在两年多来的选稿、修订、编辑和校对过程中,这本论文集逐步在我的心中具备了它的形象,现在终于要以实际的形态出版了。本书所收的论文哪怕是很不成熟的,也都是用尽了我当时的力量所写成的。我当然“宁敢施行人世”,可是对其得以“出户庭”还是不由得感到喜悦和幸福。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这些论文的内容不吝批评、指教,使我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中得到更加丰美的收获。

最后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何宛屏女士付出的各种辛劳。没有她的热心帮助和细心校改,这本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完成的。

平山久雄

2004年12月20日识于东京西郊之茅居